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四卷

1951.9—1954.1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四卷

1951.9—1954.1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目 录

No20161,别洛夫的工作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经验总结	
1951年9月	17
No11528,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	
1951年9月	20
No1337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问题	
1951年9月1日	32
No1255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1951年9月1日	32
No12985,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	
1951年9月6日	33
No12984,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	
1951年9月6日	34
No1340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把在新疆的苏联孤儿送回国	
1951年9月6日	35
No1337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	
1951年9月6日	36
No0049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8日	40
No0049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年9月10日	41
No11825,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	
1951年9月10日	42
No2483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45
No00496,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年9月12日	46
No2483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种植橡胶树问题	
1951年9月16日	47
No1337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世界工联亚洲联络部派驻苏联代表	
1951年9月18日	48

No0049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0日	49
No1337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	
1951年9月22日	51
No1337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1年9月24日	51
No1338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51年9月25日	52
No00498,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6日	53
No1338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	
1951年9月29日	54
No1338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矛盾论》给尤金发电	
1951年9月30日	55
No20003,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	
1951年9—10月	55
No24839,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	
1951年10月	63
No20162,别洛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情况	
1951年10月	72
No1338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2日	85
No10777,弗拉迪金致巴济金函：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	
1951年10月3日	85
No0049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10月4日	93
No1338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	
1951年10月4日	94
No20042,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朝鲜停战与苏美关系	
1951年10月5日	95
No1338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参加毛选出版委员会	
1951年10月5日	98
No2616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	
1951年10月5日	99
No23388,中国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大使馆今后发函以中文为本	

1951年10月5日	99
№1340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7日	100
№1338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	
1951年10月7日	101
№1338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	
1951年10月7日	104
№00500,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10月7日	105
№24837,库兹涅佐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工会代表团索要文件	
1951年10月15日	106
№0050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18日	106
№00503,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	
1951年10月24日	107
№0050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恢复谈判协议和备忘录	
1951年10月25日	109
№0050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25日	110
№0050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	
1951年10月25日	111
№0050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25日	112
№0050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问题	
1951年10月26日	114
№0050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分界线新方案	
1951年10月26日	115
№24838,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中山大学情况介绍	
1951年10月26日	116
№0051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小组委员会讨论分界线的情况	
1951年10月31日	118
№00511,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同意中方所提谈判方针	
1951年10月31日	119
№2617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提供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	
1951年10月31日	120

No0051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等问题	
1951年11月1日	120
No00513,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拟主动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1951年11月1日	123
No0051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	
1951年11月13日	124
No24840,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	
1951年11月13日	125
No0051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	
1951年11月14日	126
No00520,罗申致莫斯科电：要求斯大林尽快答复关于谈判问题的请示	
1951年11月19日	128
No0052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答复	
1951年11月19日	128
No2001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	
1951年11月19日	129
No02544,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	
1951年11月20日	130
No00523,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苏联声明与中朝做法的差别	
1951年11月21日	132
No0052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对我方分界线方案的看法	
1951年11月22日	133
No0052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发言	
1951年11月22日	134
No11419,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使馆函：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财产问题	
1951年11月23日	136
No20260,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	
1951年11月24日	137
No00526,金日成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把苏联武器留给朝鲜	
1951年11月27日	138
No05295,格里戈良致斯大林报告：国际工会基金会资金支出情况	
1951年12月1日	139
No05295-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国际工会基金会的问题	
1951年12月1日	140
No00527,什捷缅科致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战果	

1951 年 12 月 9 日	142
No24841,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 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	
1951 年 12 月 12 日	143
No133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在华苏联医务人员	
1951 年 12 月 12 日	148
No133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沈越前往苏联治病问题	
1951 年 12 月 28 日	149
1952 年	
No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 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	
1952 年 1 月	150
No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	
1952 年 1 月	152
No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 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	
1952 年 1 月 7 日	157
No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毛岸青来苏治病	
1952 年 1 月 12 日	158
No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译制配音电影	
1952 年 1 月 12 日	159
No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 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	
1952 年 1 月 15 日	159
No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 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	
1952 年 1 月 22 日	168
No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	
1952 年 1 月 28 日	169
No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 年 1 月 31 日	169
No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	
1952 年 1 月 31 日	172
No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	
1952 年 2 月 1 日	174
No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	
1952 年 2 月 3 日	174
No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2 年 2 月 5 日	175

No0053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	
1952年2月8日	176
No24844,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	
1952年2月20日	177
No2484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1952年2月21日	178
No11420,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	
1952年2月21日	179
No1339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	
1952年2月23日	184
No24846,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	
1952年2月23日	184
No11421,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	
1952年2月28日以后	185
No1339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	
1952年3月3日	185
No09869,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	
1952年3月3日	186
No24847,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	
1952年3月7日	188
No1339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	
1952年3月8日	188
No00537,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8日	189
No24848,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189
No0053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10日	190
No1339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	
1952年3月12日	191
No24849,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	
1952年3月14日	192
No24850,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	
1952年3月15日	192
No2485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	

1952年3月15日	193
No09870,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3月18日	194
No11597,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	
1952年3月20日	198
No1339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	
1952年3月21日	199
No1243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	
1952年3月22日	200
No1339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	
1952年3月22日	201
No0054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1952年3月28日	201
No2485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	
1952年3月28日	203
No1340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	
1952年3月31日	206
No0054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	
1952年4月2日	207
No24853,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	
1952年4月4日	208
No11422,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	
1952年4月5日	209
No00542,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2年4月9日	210
No20171,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	
1952年4月14日	211
No24854,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	
1952年4月17日	212
No0054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	
1952年4月22日	214
No11598,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	
1952年4月26日	215
No11599,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	
1952年5月17日	217

No11600,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	
1952年5月20日	218
No24796-1,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	
1952年5月23日	219
No20173,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	
1952年5月27日	221
No26406,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	
1952年5月27日	223
No20172,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	
1952年5月27日	225
No24856,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	
1952年6月2日	226
No24857,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	
1952年6月24日	227
No20176,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	
1952年7月2日	228
No20177,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	
1952年7月2日	230
No24858,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	
1952年7月4日	231
No0054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	
1952年7月4日	232
No03035,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	
1952年7月7日	233
No00548,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	
1952年7月17日	235
No00547,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	
1952年7月17日	237
No0054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	
1952年7月18日	237
No00550,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	
1952年7月24日	240
No20179,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	
1952年8月5日	240
No24859,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	

1952年8月9日	241
No09859,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	
1952年8月18日	242
No20180,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	
1952年8月19日	243
No00553,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244
No24860,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	
1952年8月21日	251
No20181,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	
1952年8月21日	253
No00554,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	
1952年8月25日	270
No24861,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	
1952年8月27日	272
No24863,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	
1952年9月1日	273
No00555,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	
1952年9月3日	276
No11826,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	
1952年9月4日	281
No24864,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	
1952年9月8日	287
No04013,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1952年9月15日	290
No04014,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	
1952年9月15日	290
No00556,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	
1952年9月16日	291
No00557,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	
1952年9月17日	292
No24865,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	
1952年9月18日	293
No00558,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	
1952年9月19日	294

No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	
1952年9月25日	299
No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	
1952年11月17日	300
No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	
1952年12月17日	301
No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	
1952年12月27日	306
No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	
1952年12月30日	307

1953年

No31214, 潘友新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1953年1月3日	309
No005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7日	310
No00567,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12日	312
No005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	
1953年1月15日	314
No12281,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召回苏联驻志愿军总部军事顾问	
1953年1月17日	314
No24868,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美国发动细菌战	
1953年1月18日	315
No12279, 华西列夫斯基呈布尔加宁报告：朝鲜战场的形势	
1953年1月21日	316
No005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	
1953年1月27日	319
No005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炸药	
1953年1月29日	320
No24868-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电：关于细菌战的材料	
1953年2月4日	320
No24868-2, 张闻天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递交细菌战的材料	
1953年2月23日	321
No25947,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	

1953年3月4日	322
No24869,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	
1953年3月7日	322
No12245,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	
1953年3月14日	335
No00574,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	
1953年3月19日	347
No12280,索科洛夫致维诺库罗夫电:关于反登陆防御给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	
1953年3月21日	351
No21322,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苏联介绍学者情况	
1953年3月23日	353
No09994,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	
1953年3月29日	353
No24871,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为中国五年计划提供援助	
1953年4月	355
No23756,斯米尔诺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索要有关缅共的资料	
1953年4月13日	359
No21323,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	
1953年4月17日	360
No23756-1,科兹洛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索要缅共资料电已发	
1953年4月29日	360
No25948,库兹涅佐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感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1953年5月7日	361
No20023,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	
1953年5月11日	362
No21338,齐坦科对长征参加者手稿的简要评介	
1953年5月27日	363
No21339,维纳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关于《长征回忆录》的整理	
1953年6月9日	364
No24872,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	
1953年6月15日	365
No20203,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	
1953年7月3日	369
No0057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措施	
1953年7月4日	373

No00580,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苏联同意中方答复克拉克函等	
1953年7月4日	373
No23759,科兹洛夫提交的情况汇报：来自中国使馆的缅共材料	
1953年7月8日	375
No09969,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中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的态度	
1953年7月17日	390
No20205,波科洛夫斯基致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向中国派遣雷达专家	
1953年7月22日	391
No00582,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关于停战协议签字问题	
1953年7月23日	392
No0058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不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1953年7月24日	393
No09861,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关于请求增派教授来中国	
1953年7月27日	394
No09995,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毛泽东谈停战问题	
1953年7月29日	395
No09862,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感谢苏联为实现停战的努力	
1953年7月30日	396
No23733,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	
1953年8月6日	396
No25108,中共中央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电：缅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表态	
1953年8月10日	398
No23818,苏斯洛夫致马林科夫等报告：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	
1953年8月11日	399
No20207,斯柳萨列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	
1953年9月以后	403
No0059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国通报联合国会议的结果	
1953年9月1日	408
No25109,格拉德舍夫致苏斯洛夫函：缅共中央支持苏共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	
1953年9月11日	408
No21350,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刘少奇请帮助校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1953年9月12日	409
No24873,佩罗夫致葛罗米柯函：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报告	
1953年9月15日	410
No00593,葛罗米柯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	

1953年9月29日	411
No11423,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函:就答复沈阳总领事馆来函给的信	
1953年10月10日	412
No23762,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转呈中共中央寄送的材料	
1953年10月15日	412
No21357,西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帮助翻译西班牙语《毛泽东选集》	
1953年10月30日	415
No20219,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总结报告:苏联空军及中朝空军战果情况	
1953年11月3日	416
No24875,什维尔尼克致楚库洛夫函:对中国煤炭矿井的设计	
1953年11月5日	419
No21358,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	
1953年11月17日	420
No11424,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	
1953年11月17日	421
No25110,费德林致赫鲁晓夫秘书处函:中国驻苏使馆转交缅共中央贺电	
1953年11月21日	422
No11425,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	
1953年11月23日	423
No20220,拉科夫宁的报告:苏联空军与侵入中国领空敌机作战的限制	
1953年11月24日	424
No21359,维诺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	
1953年11月26日	425
No24876,莫洛托夫与张闻天谈话记录:中国增加粮食供应有困难	
1953年12月3日	426
No11426,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资料	
1953年12月8日	427
No23828,波斯佩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	
1953年12月16日	428
No11427,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中国需要苏联歌曲	
1953年12月17日	430
No21360,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中央和中宣部的电报	
1953年12月17日	430
No23826,波斯佩洛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贺电修改稿	
1953年12月24日	432

No13729,捷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	
1953 年 12 月 30 日	433
No05304,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	
1953 年 12 月 31 日	435
1954 年	
No24883,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主题计划	
1954 年	439
No13014,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	
1954 年 1 月 4 日	448
No21367-1,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中国要求在莫斯科设常驻通讯员	
1954 年 1 月 14 日以前	449
No21367,杰尼索夫致斯捷潘诺夫函：外交部提交苏中友好协会草案	
1954 年 1 月 21 日	450

第四卷(1951. 9—1954. 1)

目 录

No20161,别洛夫的工作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经验总结	
1951年9月	17
No11528,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	
1951年9月	20
No1337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问题	
1951年9月1日	32
No1255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1951年9月1日	32
No12985,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	
1951年9月6日	33
No12984,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	
1951年9月6日	34
No1340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把在新疆的苏联孤儿送回国	
1951年9月6日	35
No1337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	
1951年9月6日	36
No0049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1年9月8日	40
No0049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年9月10日	41
No11825,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	
1951年9月10日	42
No2483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45
No00496,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年9月12日	46
No2483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种植橡胶树问题	
1951年9月16日	47
No1337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世界工联亚洲联络部派驻苏联代表	
1951年9月18日	48

No0049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0日	49
No1337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	
1951年9月22日	51
No1337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1年9月24日	51
No1338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51年9月25日	52
No00498,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6日	53
No1338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	
1951年9月29日	54
No1338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矛盾论》给尤金发电	
1951年9月30日	55
No20003,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	
1951年9—10月	55
No24839,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	
1951年10月	63
No20162,别洛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情况	
1951年10月	72
No1338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2日	85
No10777,弗拉迪金致巴济金函：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	
1951年10月3日	85
No0049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10月4日	93
No1338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	
1951年10月4日	94
No20042,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朝鲜停战与苏美关系	
1951年10月5日	95
No1338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费德林参加毛选出版委员会	
1951年10月5日	98
No2616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 and 国民党谍报电台	
1951年10月5日	99
No23388,中国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大使馆今后发函以中文为本	

1951年10月5日	99
No1340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7日	100
No1338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	
1951年10月7日	101
No1338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	
1951年10月7日	104
No00500,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10月7日	105
No24837,库兹涅佐夫致格里戈良函:中国工会代表团索要文件	
1951年10月15日	106
No0050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18日	106
No00503,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	
1951年10月24日	107
No0050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恢复谈判协议和备忘录	
1951年10月25日	109
No0050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25日	110
No0050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	
1951年10月25日	111
No0050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25日	112
No0050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问题	
1951年10月26日	114
No0050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分界线新方案	
1951年10月26日	115
No24838,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中山大学情况介绍	
1951年10月26日	116
No0051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小组委员会讨论分界线的情况	
1951年10月31日	118
No00511,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金日成同意中方所提谈判方针	
1951年10月31日	119
No2617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提供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	
1951年10月31日	120

No0051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等问题	
1951年11月1日	120
No00513,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拟主动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1951年11月1日	123
No0051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	
1951年11月13日	124
No24840,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	
1951年11月13日	125
No0051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	
1951年11月14日	126
No00520,罗申致莫斯科电：要求斯大林尽快答复关于谈判问题的请示	
1951年11月19日	128
No0052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答复	
1951年11月19日	128
No2001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	
1951年11月19日	129
No02544,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	
1951年11月20日	130
No00523,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苏联声明与中朝做法的差别	
1951年11月21日	132
No0052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对我方分界线方案的看法	
1951年11月22日	133
No0052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朝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发言	
1951年11月22日	134
No11419,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使馆函：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财产问题	
1951年11月23日	136
No20260,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	
1951年11月24日	137
No00526,金日成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把苏联武器留给朝鲜	
1951年11月27日	138
No05295,格里戈良致斯大林报告：国际工会基金会资金支出情况	
1951年12月1日	139
No05295-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国际工会基金会的问题	
1951年12月1日	140
No00527,什捷缅科致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战果	

1951年12月9日	142
No24841,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	
1951年12月12日	143
No1338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华苏联医务人员	
1951年12月12日	148
No1338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沈越前往苏联治病问题	
1951年12月28日	149

1952年

No10178,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	
1952年1月	150
No20223,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	
1952年1月	152
No24842,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	
1952年1月7日	157
No1339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	
1952年1月12日	158
No1339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	
1952年1月12日	159
No20167,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	
1952年1月15日	159
No24843,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	
1952年1月22日	168
No24843-1,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	
1952年1月28日	169
No00531,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年1月31日	169
No0053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	
1952年1月31日	172
No1339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	
1952年2月1日	174
No00533,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	
1952年2月3日	174
No1339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2年2月5日	175

No0053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	
1952年2月8日	176
No24844,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	
1952年2月20日	177
No2484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1952年2月21日	178
No11420,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	
1952年2月21日	179
No1339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	
1952年2月23日	184
No24846,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	
1952年2月23日	184
No11421,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	
1952年2月28日以后	185
No1339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	
1952年3月3日	185
No09869,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	
1952年3月3日	186
No24847,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	
1952年3月7日	188
No1339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	
1952年3月8日	188
No00537,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8日	189
No24848,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189
No0053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10日	190
No1339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	
1952年3月12日	191
No24849,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	
1952年3月14日	192
No24850,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	
1952年3月15日	192
No2485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	

1952年3月15日	193
No09870,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3月18日	194
No11597,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	
1952年3月20日	198
No1339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	
1952年3月21日	199
No1243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	
1952年3月22日	200
No1339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	
1952年3月22日	201
No0054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1952年3月28日	201
No2485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	
1952年3月28日	203
No1340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	
1952年3月31日	206
No0054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	
1952年4月2日	207
No24853,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	
1952年4月4日	208
No11422,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	
1952年4月5日	209
No00542,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2年4月9日	210
No20171,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	
1952年4月14日	211
No24854,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	
1952年4月17日	212
No0054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	
1952年4月22日	214
No11598,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	
1952年4月26日	215
No11599,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	
1952年5月17日	217

No11600,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	
1952年5月20日	218
No24796-1,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	
1952年5月23日	219
No20173,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	
1952年5月27日	221
No26406,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	
1952年5月27日	223
No20172,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	
1952年5月27日	225
No24856,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	
1952年6月2日	226
No24857,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	
1952年6月24日	227
No20176,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	
1952年7月2日	228
No20177,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	
1952年7月2日	230
No24858,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	
1952年7月4日	231
No0054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	
1952年7月4日	232
No03035,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	
1952年7月7日	233
No00548,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	
1952年7月17日	235
No00547,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	
1952年7月17日	237
No0054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	
1952年7月18日	237
No00550,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	
1952年7月24日	240
No20179,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	
1952年8月5日	240
No24859,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	

1952年8月9日	241
No09859,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	
1952年8月18日	242
No20180,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	
1952年8月19日	243
No00553,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244
No24860,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	
1952年8月21日	251
No20181,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	
1952年8月21日	253
No00554,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	
1952年8月25日	270
No24861,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	
1952年8月27日	272
No24863,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	
1952年9月1日	273
No00555,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	
1952年9月3日	276
No11826,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	
1952年9月4日	281
No24864,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	
1952年9月8日	287
No04013,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1952年9月15日	290
No04014,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	
1952年9月15日	290
No00556,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	
1952年9月16日	291
No00557,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	
1952年9月17日	292
No24865,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	
1952年9月18日	293
No00558,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	
1952年9月19日	294

No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	
1952年9月25日	299
No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	
1952年11月17日	300
No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	
1952年12月17日	301
No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	
1952年12月27日	306
No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	
1952年12月30日	307

1953年

No31214, 潘友新与朱德会谈纪要：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1953年1月3日	309
No005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7日	310
No00567,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12日	312
No005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	
1953年1月15日	314
No12281,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召回苏联驻志愿军总部军事顾问	
1953年1月17日	314
No24868,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美国发动细菌战	
1953年1月18日	315
No12279, 华西列夫斯基呈布尔加宁报告：朝鲜战场的形势	
1953年1月21日	316
No005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	
1953年1月27日	319
No005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炸药	
1953年1月29日	320
No24868-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电：关于细菌战的材料	
1953年2月4日	320
No24868-2, 张闻天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递交细菌战的材料	
1953年2月23日	321
No25947,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	

1953年3月4日	322
No24869,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	
1953年3月7日	322
No12245,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	
1953年3月14日	335
No00574,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	
1953年3月19日	347
No12280,索科洛夫致维诺库罗夫电:关于反登陆防御给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	
1953年3月21日	351
No21322,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苏联介绍学者情况	
1953年3月23日	353
No09994,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	
1953年3月29日	353
No24871,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为中国五年计划提供援助	
1953年4月	355
No23756,斯米尔诺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索要有关缅共的资料	
1953年4月13日	359
No21323,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	
1953年4月17日	360
No23756-1,科兹洛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索要缅共资料电已发	
1953年4月29日	360
No25948,库兹涅佐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感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1953年5月7日	361
No20023,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	
1953年5月11日	362
No21338,齐坦科对长征参加者手稿的简要评介	
1953年5月27日	363
No21339,维纳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关于《长征回忆录》的整理	
1953年6月9日	364
No24872,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	
1953年6月15日	365
No20203,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	
1953年7月3日	369
No0057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和措施	
1953年7月4日	373

No00580,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苏联同意中方答复克拉克函等	
1953年7月4日	373
No23759,科兹洛夫提交的情况汇报：来自中国使馆的缅共材料	
1953年7月8日	375
No09969,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中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的态度	
1953年7月17日	390
No20205,波科洛夫斯基致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向中国派遣雷达专家	
1953年7月22日	391
No00582,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关于停战协议签字问题	
1953年7月23日	392
No0058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不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1953年7月24日	393
No09861,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关于请求增派教授来中国	
1953年7月27日	394
No09995,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毛泽东谈停战问题	
1953年7月29日	395
No09862,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感谢苏联为实现停战的努力	
1953年7月30日	396
No23733,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	
1953年8月6日	396
No25108,中共中央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电：缅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表态	
1953年8月10日	398
No23818,苏斯洛夫致马林科夫等报告：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	
1953年8月11日	399
No20207,斯柳萨列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	
1953年9月以后	403
No0059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国通报联合国会议的结果	
1953年9月1日	408
No25109,格拉德舍夫致苏斯洛夫函：缅共中央支持苏共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	
1953年9月11日	408
No21350,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刘少奇请帮助校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1953年9月12日	409
No24873,佩罗夫致葛罗米柯函：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报告	
1953年9月15日	410
No00593,葛罗米柯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	

1953年9月29日	411
No11423,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函:就答复沈阳总领事馆来函给的信	
1953年10月10日	412
No23762,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转呈中共中央寄送的材料	
1953年10月15日	412
No21357,西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帮助翻译西班牙语《毛泽东选集》	
1953年10月30日	415
No20219,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总结报告:苏联空军及中朝空军战果情况	
1953年11月3日	416
No24875,什维尔尼克致楚库洛夫函:对中国煤炭矿井的设计	
1953年11月5日	419
No21358,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	
1953年11月17日	420
No11424,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	
1953年11月17日	421
No25110,费德林致赫鲁晓夫秘书处函:中国驻苏使馆转交缅共中央贺电	
1953年11月21日	422
No11425,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在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	
1953年11月23日	423
No20220,拉科夫宁的报告:苏联空军与侵入中国领空敌机作战的限制	
1953年11月24日	424
No21359,维诺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	
1953年11月26日	425
No24876,莫洛托夫与张闻天谈话记录:中国增加粮食供应有困难	
1953年12月3日	426
No11426,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资料	
1953年12月8日	427
No23828,波斯佩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	
1953年12月16日	428
No11427,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中国需要苏联歌曲	
1953年12月17日	430
No21360,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转交中共中央和中宣部的电报	
1953年12月17日	430
No23826,波斯佩洛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贺电修改稿	
1953年12月24日	432

No13729,捷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	
1953 年 12 月 30 日	433
No05304,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	
1953 年 12 月 31 日	435
1954 年	
No24883,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主题计划	
1954 年	439
No13014,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	
1954 年 1 月 4 日	448
No21367-1,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中国要求在莫斯科设常驻通讯员	
1954 年 1 月 14 日以前	449
No21367,杰尼索夫致斯捷潘诺夫函：外交部提交苏中友好协会草案	
1954 年 1 月 21 日	450

别洛夫的工作报告：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经验总结

(1951年9月^①)

.....^②

三、对本军各部队作战活动的建议

1. 战斗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条件和战机的把握

我们目前的战斗任务暂且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本军各部队应防止敌空军对安东和朔州地区的桥梁、渡口、电站和机场以及北朝鲜境内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发动空袭。

与此同时，本军还应在中国空军部队的协助下严防敌空军对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的主要行政和工业中心城市的可能发动的攻击。

鉴于我方已打算在龟城、安州和开城等地区建设新机场，因此我军未来可能面临的任务就是为这些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上级为我军以前规定的作战范围，即最远平壤-元山一线和两侧海岸线之间的区域，以后时期仍将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上述限制性规定导致我军作战时不能充分发挥我战机的良好性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需要强调，即今后在北朝鲜境内的空战行动中，我军仍将继续单独面对美国侵略者，得不到任何来自中国和朝鲜空军方面的支援。因而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实力，将打击重点集中在敌空军的主要机群方面。

至于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后方设施提供空中掩护，本军将作为第一梯队与敌作战，同时也将获得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是中国空军——的巨大帮助。

我军作战行动的特点是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实施机动飞行，这对我们组织与敌空军的战斗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由于朝鲜战场复杂的政治形势，我空军的基地均暂且分布在敌空军的作战区域之外，这相当程度上使我们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任务的过程变得简单了。

以上所列我军作战行动的局限和特点便构成了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的条件。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②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我军战机的把握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根据力量构成

本军在第一梯队共有2个师或5个航空团的兵力，每个航空团平均有120个可以随时参战的机组。在第二梯队有1个师或2个航空团的兵力，每个航空团平均有50个可以随时参战的机组。我军第二梯队的战机，由于所在机场较远且同时要完成相当的改装训练任务，因而他们只能最远至安东一线定期参加战斗。至于对该界线以南地区设施的掩护任务，他们是无力承担的。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主要用作夜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会用其来保卫安东地区的地面设施。

根据战术行动相关规定，我们计算出每名飞行员的工作量：每天起飞2个架次；每月起飞不超过20个架次。近一阶段，我军各部队的实战经验证明，我们的这一计算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在现有条件下，我军指挥部留作第一梯队预备队的兵力至少有两个中队，可同时出击的机组共有100个，每天最大起飞架次为200架次，根据长时段作战的统计，平均每天为75个架次。

根据上述战术行动之规定，我们可能击退的敌机数量也大概是这个数字。

根据我在报告第一节中所列举的敌空军的活动规律和我们的实力，我军的作战可能性具体如下：

——在我地面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在使全军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分批次地、集中地对敌人的空军进行打击，为安东地区的设施提供空中保护；

——用本军第一梯队战机防止敌空军主力机群对安州和熙川一线以北地区的设施和交通线发动空袭，以第一梯队的预备队——2—3个中队和第二梯队1个师的全部兵力保卫安东地区的机场和设施；

——必要时可动用第一梯队各师的3—4个团，以防止敌空军个别机群对安州和平壤地区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发动攻击，由军指挥部预备队、第一梯队各师其他部队和第二梯队所有兵力来保卫安东-安州地区的机场和设施。不过，如果要为安州和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完整而可靠的空中掩护，我们的力量还是明显不足。

我们的力量分配计划是固定的，但在个别情况下，它也会根据空战形势而发生一些相应变化。

（2）根据作战半径

根据导航员的计算，米格-15战机在6000—7000米高空维持10分钟空战的油耗为所携燃料的20%。

我机群作战半径：在携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以分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9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40公里；以团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200公里。

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以分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9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70公里；以团为单位的机群作战半径为140公里。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平壤一线以内，在携副油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以团为单位的机群投入战斗；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只能以中队为单位，在安州一线以内不论带不带副油箱，我们均可以以团为单位组成的机群采取行动。

在低空,我们作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的作战区域均离自己的基地较远。因而我军较合理的参战方式是:沿高空航线飞行,直接降至作战区域参战。

以米格-15组成的机群在6 000—7 000米高空的飞行持续时间为:

——在平壤—宁郁地区:以分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5分钟,不带副油箱——18分钟;以中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0分钟,不带副油箱——10分钟;以团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20分钟,不带副油箱——0分钟。

——在安州—开城地区:以分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50分钟,不带副油箱——30分钟;以中队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40分钟,不带副油箱——20分钟;以团为单位携副油箱的机群——30分钟,不带副油箱——10分钟。

在任何情况下,我机群飞行高度的选择均应根据具体航线而定。为了增加我机群的续航时间,我们起飞时不应以团为单位,而应以中队为单位,每间隔5—10分钟起飞一个批次,以利我机群力量的增加和替换。

总之,在安州—平壤地区,我以团为单位的机群续航时间平均为20分钟。而利用我第一梯队(4个团)80%的兵力,我们便可为平壤一线以内的地面设施连续提供1个半小时,每天共计3个小时的空中掩护。

(3) 空中拦截

我现有对空情报系统可以发现高度6 000—7 000米,距我安东机场250—270公里范围以内,即汉城方向至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敌机。

如果在我发现敌机之时,我歼击机便开始起飞,此时敌轰炸机的高度应在6 000—7 000米。如果其飞行路线为汉城—平壤—安州—安东,那么我们便可在距安东以下距离对之实施拦截:

——我机群在机场地区便爬升至一定高度:以团为单位机群的拦截距离——8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拦截距离——90公里;

——我机群在飞行途中爬升至一定高度:以团为单位机群的拦截距离——110公里,以中队为单位的拦截距离——120公里。

当然,即使在刚发现敌机之时,我歼击机便立即起飞并在飞行途中爬升至一定高度,我以团和以中队为单位的机群能对敌机实施有效拦截的极限距离也无法超过安州—熙川一线。在个别情况下,当敌机已在作战区域待了10—15分钟之时,我们可能实施追击性拦截至宁郁一线。

在敌歼击机向安东方向飞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对之实施拦截的区域为新比岛和龟城一线。对敌人以梯队形式参战的歼击机的拦截,有时只能在安州一线对其后续机群实施截击。

有时,针对敌沿安东方向飞来的机群我们只能在海上实施截击,因为根据实战经验,我们对敌人此类机群的极限拦截距离最远只能在铁山和宣川一线附近。

.....

№11528

佩图霍夫的报告：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

（1951年9月^①）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报告

一、谈判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同志在其无线电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调解“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朝鲜的军事冲突问题”的具体建议。根据马立克同志的建议，“作为调解的第一个步骤，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关于停火以及停止向三八线地区互派部队的谈判”。

马立克同志的建议提出的是如此及时，这个建议不仅在和平民主社会中立即得到了赞许，而且在英美集团的一些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共鸣，他们也认识到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冒险行动是没有希望的。世界社会舆论对侵略者在朝鲜的一系列暴行的愤怒，广泛要求停止侵略的行动，美国的仆从国也明显表现出退出朝鲜战争的意图，——所有这一切，无疑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待马立克同志建议的态度上的立场。美国统治当局在对这个建议做出让步时，他们已经深思熟虑，斟酌再三：如果这样做他们就有可能将社会舆论引入歧途，显示自己的“热爱和平”，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以便获得重大的让步，而在不成功的情况下，就致使谈判破裂，以便轻松地继续扩大受垄断利益驱使的战争。

也不排除，同意参加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局部的和暂时的军事意图的操纵：暴雨季节已经来临，而美军司令部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时期，即美国空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天气情况的严重制约时，利用停战谈判阻挠对手采取重大的进攻行动。

6月2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拜会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并向他提出了与马立克同志建议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葛罗米柯同志向柯克详细解释了苏联对于在朝鲜确立停战的目的和可能性、军事谈判的性质以及各方代表的立场。

6月30日，联合国驻朝鲜部队司令员李奇微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北朝鲜军队总司令”金日成将军提出了开始停战谈判的建议。在李奇微的呼吁中指明了，他是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做出这一举动的。拟定谈判在停泊在元山海湾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进行。

7月1日，我方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李奇微转达了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共同签署的复函。在复函中表示同意，于7月10日和15日期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进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休战的谈判。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7月3日,李奇微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广播向金日成和彭德怀提出建议,为“确保有效地调解与第一次会晤有关的各种细节”,举行联络官的预先会晤。同时在呼吁书中还指明,关于休战条件的协定应该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前签署。这样一来,还是在谈判开始之前,美国人就已经确定了与苏联方面的建议背道而驰的谈判方向。在与李奇微进行会晤时,葛罗米柯同志已经表达了苏联方面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在签署休战协定之前,应该签署一个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临时军事协定。

7月8日,在开城进行了联络官的会晤。会晤的结果是顺利地解决了关于代表团的住所、布置和饮食,关于距会晤地点50公里以内区域的道路修理等方面的行政管理问题。美国人同意了朝鲜人民军联络官的建议,每一方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会晤的结果还明确了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第一次会议的程序和时间,决定了关于警卫以及在开城地区建立一个中立区的问题。

应该指出,朝鲜人民军的联络官对会晤所做的准备工作要比美国军官做得好,因而,他们很成功地进行了会晤,并完全坚持了自己的建议。他们还弄清楚了美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情况,并回避答复美国人关于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人员组成情况的问题。这给变更事先拟定好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组成提供了可能性,根据美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代表的军衔方面都做了调整,将代表团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5人。

任命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为代表团团长,战前他曾担任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育副相,从来没有服过役。南日与朝鲜人民军的其他任何一位军官一样,对于类似的谈判没有任何经验,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作为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将军,南日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在谈判开始的最初日子里,美国观察家们对中朝代表团的首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能够说明的是,南日从来也没有进行过如此重要级别的谈判,因而有许多表述不够清楚,有时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不能肯定和含混不清。但是,在我们看来,南日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做得比任何其他一名朝鲜军官都好。

在谈判期间,南日的工作由在场的中国同志领导,这些中国同志是专门从北京派到开城的。

二、开城谈判的进程

交战双方军事代表的第一次会晤,是7月10日举行的停战谈判的开端。

参加谈判的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如下:

南日——代表团团长,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

李相朝——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朝鲜人民军侦察管理局局长);

解方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张平山——朝鲜人民军代表(第一军团参谋长)。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由以下成员组成:

美国海军中将查尔斯·特诺尔·乔伊——代表团团长；

空军少将 JI. 克莱奇；

Г. 霍乌斯少将；

海军少将阿里·贝克；

李承晚军队的将军白善烨（第一军指挥员）。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并提出了以下 3 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相互的协议，双方同时下达关于停止任何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命令……

第二个问题，应该将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应同时将自己的武装部队撤离到距三八线 10 公里的地区。应该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被双方用来疏散的那些地区，应该宣布为非武装地带，不允许任何一方在这里派驻自己的武装部队或者是进行某种军事行动。这些地区的民事管理方式应该恢复到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的那种管理方式。同时应该立即开始关于交换战俘的谈判……

第三个问题，所有外国军队应该在最短的期限内撤离……”（摘自南日在 7 月 10 日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1951 年 7 月 12 日）

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只作了一个普通的声明，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具体的建议。乔伊特别强调指出，谈判应该只是针对纯军事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方面的问题。

不去立即着手解决与休战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美国代表团坚持讨论谈判的日程。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日程方案，这个方案明确地反映出美国人极力拖延谈判，并企图使谈判复杂化。美国人提出的方案包括以下九点：

（一）批准谈判日程。

（二）红十字会的代表应该有权参观战俘营。

（三）关于只讨论军事问题的协定。

（四）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应该在怎样的条件下，这些条件能够确保这些行动不再发生。

（五）关于建立非武装地带的协定。

（六）组建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

（七）关于由在停止军事行动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监督员小组实施监督的原则的协定。

（八）组建管制委员会并确定其职能。

（九）调解关于交换战俘以及牺牲人员等一系列问题。

正如从美国的日程草案中可以看清楚的那样，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却避而不谈，并被淹没在许多次要的问题中。例如，关于停止军事行动这个主要问题，被作为不合理的问题，放在了次要地位。显然，美国人指望利用像关于红十字会代表的权利这样的问题，作为自己干涉朝鲜内政的辅助工具。除红十字会的代表之外，美国人在草案中还拟定了要成立 3 个监督

机构的计划,企图将北朝鲜置于自己代理人的监督之下。

为反对美国的草案,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7月10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如下日程的方案,这个草案是在现场在会议的间歇时间起草的:

(一) 批准谈判日程。

(二) 关于沿三八线建立一个分界线以及建立非武装地带——这是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 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四) 关于停火以及建立休战的具体措施。

(五) 关于停战以及战后的战俘问题。

该会议日程草案的讨论被拖延了整整16天。对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提出的会议日程草案,美国人主要反对的是第二条里的关于确定分界线(三八线)的问题,反对讨论外国军队的撤离问题。反对第二条的真正含义,在乔伊于7月27日会议上发表声明之后完全明朗化了。下面援引这个声明中的一些内容。涉及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美国代表团声明,它没有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武装干涉部队是根据联合国决议行动的,是根据其政府的命令被派来的,在今后继续的谈判中,应该由这些政府来解决自己军队在朝鲜的逗留问题。

李奇微的代表们拒绝讨论关于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朝鲜和中国的宣传机关广泛地利用这一点来揭露美国企图继续占领南朝鲜并将其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计划。美国人,其中包括艾奇逊,都被迫发表了声明,其目的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并相信他们的声明,在适当时机来临的时候,美国政府将从朝鲜撤回自己的部队。乔伊也在7月25日会议上发表了声明,说美国代表团并不否认,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对于最终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但是,立即又指出,这个问题应该在晚些时候研究。

在3天的谈判间歇时间里(7月22—24日),中国和朝鲜领导人讨论了谈判中涉及这个问题所出现的困难,并协商出一个折中的建议,在7月25日会议上南日阐述了这个建议。该建议的内容是,在直接涉及停战方面的问题之后,还将另外一条列入会议日程,即:“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制订给各政府的建议”,在他们之中还将讨论关于撤军问题的建议。美国人同意了这个建议,7月26日,谈判日程最终以如下方式商定下来:

(一) 通过谈判日程。

(二) 建立非武装地带,确定分界线作为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 在朝鲜停火和实行休战的具体措施。成立监督机构,对停火和休战协定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确定该机构的权利和职能。

(四) 妥善解决关于战俘的问题。

(五) 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制订给各政府的建议。

7月27日,双方转入了讨论关于建立非武装地带和确定分界线的问题。

中朝方面再一次重申了,以前已经阐述过的关于确定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和双方将自己

的部队撤离到距该线 10 公里地区的建议。美国代表团声明说，不能接受关于三八线这个建议。

在 7 月 27 日会议上，乔伊阐述了美国方面的最后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分界线的走向是：从位于海州市西南的松元洞，经金城地区（海州市的北部），经长洪里，继续向东北，经长洪屯—德顺台—潘苏洪里—金城，在此向北折回，最后一直沿位于三八线以北 80 公里处的高松北部的朝鲜东部海岸线到底。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根据所设立的这条分界线，非武装地带应向两方纵深 20 海里（1 海里等于 1 853 米）。

美国人所建议的分界线，在北部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目前的战线，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延伸到前线以北的 35—40 公里处。在这条线与三八线之间的一块领土，面积有 1.3 万平方公里，占朝鲜总面积的 1/20。美国人已经表示，作为交换这块领土，准备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让出翁津半岛南部的领土，虽然这块领土具有某种经济利益（铅矿场），但是组织防御却很困难（在委员会分会会议上，美国代表霍斯声明说，他们对朝鲜这一地区完全不感兴趣，将它给谁——是埃塞俄比亚还是澳大利亚，对于他们都无所谓）。

这样一来，美国人已经公开要求向他们做出让步，将北朝鲜的一大块领土割让给他们，这样的让步，首先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政治打击，并能够加强美国和李承晚政权的威信。此外，上述所说的那块领土，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基地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这将使朝鲜人民军失去最有利的防御线，而敌方将获得最重要的一个阵地，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从这里突然封锁和打击朝鲜的防御，并一跃进入中国和苏联的边界——这就是美国关于分界线建议的军事意图。从经济方面来说，美国人所觊觎的这块领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地区有钨矿。的确，目前在这里还未进行地质勘探，美国报刊多次提到的那些巨大的钨矿层目前还没有被发现，也没有钨矿场（也可能，美国人已经掌握了更加准确的地质勘探资料）。除此之外，在这一地区还开采有铁矿、锰矿、硫酸钡、滑石粉、萤石，而在华川还有一个功率为 6 万千瓦的水电站，该水电站可保证汉城—仁川地区的南朝鲜工业对电力的需求。

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美国人至今为止也没有在报刊上具体地阐述自己关于分界线的建议。更有甚者，这一建议却被蓄意地提供给社会舆论，以便让人们判定拟定的这条分界线仿佛与当前的战线相符合。甚至在开城的会议上，美方代表也回避提到这条他们所建议的分界线，而只是展示标有这条线的地图，看来，连美国人自己也明白，他们的战略野心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害怕社会舆论批判他们的立场。

从 7 月 27 日乔伊在全体会议上的声明（声明原文附后）以及随后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可以明显看出，美国觊觎北朝鲜领土的理由，似乎是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既然在它拥有充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空中和海上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那么这一种让步就应该得到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方面的某种领土让步作为补偿。照美国人的说法，按北纬三十八度线建立分界线的建议不符合当前的军事形势，并且没有考虑战争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空军和海军的意义和状况。美国代表团一面极力掩饰自己建议的政治意义，一面又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

这一建议似乎不是因为它对扩大由它控制的领土感兴趣,而是因为它必须获得合适的防御地域,而在三八线地区却没有这种地域。在8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乔伊断定:

“在停战期间我们关心的是部队的安全保证,而不是领土。为正视听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领土,比你们在三八线以南占领的领土多一倍。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对领土不感兴趣。三八线只有政治意义,这个政治意义是1945年产生的并消失于1950年。在三八线南部边界长达数公里的地段上,都没有适于防御的阵地,而同时在你方面却有优越的地域。我们所建议的分界线将向双方提供同等的地域。”

美国代表团还特别强调,在停战谈判中不可能注意某些政治见解,包括所讨论的建议对随后在政治方面解决朝鲜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代表团声称,政治问题将由政府来解决,而在停战谈判中只应根据军事的考量并只从今天存在的军事态势出发。美国代表团引用海牙公约断言,停战协定只是临时措施,它不能预先确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未来进程。

美国人就以这种方式妄图为在朝鲜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夺取一大块北朝鲜领土辩解,而朝鲜问题的彻底解决可能被美国人拖延很长时间。显然,美国建议追求的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还有深远的政治目的。

中朝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的建议,证明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理由如下:美国的空中和海上优势表现在对和平居民的野蛮轰炸,是破坏国际法的,因此不能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军事因素来考虑。

当前的地面战线是由于各种武器——既有地面的也有空中和海上兵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得不到空军和海军的支持,干涉者的军队就不能守住当前的阵地。当然,对战线形势的估价就包含有对所有种类武器作用的估价。所以,像美国代表团建议的那样,把停战问题对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分开来看是不正确的。

在确定分界线的时候,不应仅仅依据目前的、临时的不稳定的战线态势。战线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今年双方军队的接触线在三八线两边来回移动了4次。最后一次美军进入北朝鲜领土是在一个月前(摘自南日在7月31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停战不是简单的临时军事措施,而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所以停战谈判应该旨在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不是旨在未来军事力量的某种配置。想在现行战线以北建立有利于防御的分界线的要求证明,美方力求获得它未占据的北朝鲜领土以建立有利于自己的阵地是想要战争,而不是想要和平。

中朝方面不仅从政治上也从军事上论证了按三八线设立分界线的理由。战争是从三八线开始的。干涉者越过三八线导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开始停战谈判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马立克的建议,马立克的建议规定的是双方军队离开三八线相互后撤。按三八线设置分界线最好地反映了真实的军事态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

(一) 人民军队两次推进到三八线以南,干涉者的军队也两次越过三八线。

(二) 最近7个月来人民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大约5个月,而干涉者的军队在三八线以北仅两个月多一点。

（三）当前的战线不是稳定的，不能反映真实的军事态势。

（四）人民军队占领的三八线以南领土（3 630 平方公里，其中含三八线 145 公里），基本上相当于干涉者在三八线以北占领的领土（4 630 平方公里，内含三八线 165 公里）。

从 7 月 27 日至 8 月 16 日举行的所有全体会议都在讨论上述两个建议，并且在谈判中没有任何进展。时而出现美国人打算提出比较温和的建议的迹象。比如，7 月 31 日，李奇微司令部控制的东京电台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建立巩固和平甚至打算放弃部分所占领土”。据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报道，李奇微曾在 8 月 14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军司令部仿佛“建议按现行战线建立分界线……但这不是不可协商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能够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的话”。然而，事实上美国代表团任何新建议也没提出，并且也没放弃自己在三八线以北很远地区建立分界线的要求。

在 8 月 16 日的全体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提议建立一个分委员会以进一步非正式审议分界线的问题。看来，美国代表团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分委员会人员组成比较少，比较容易弄清对手的意图，而谈判级别降低（分委员会一建立全体会议就中止）就提供了把谈判彻底引入死胡同的机会，中朝方面则希望，美国人关于建立分委员会的建议是为寻找合适的妥协而提出的。

美国代表团建议，双方各任命一名代表和两名助手做分委员会的成员，但后来又同意南日的建议任命两名代表。中朝方面任命的是李相朝将军和解方将军，美国方面任命的是霍乌斯少将和贝克海军少将。

分委员会会共开了 5 次全体会议（8 月 17、18、19、21 日和 22 日），分委员会没取得什么积极成果。

分委员会中的美国人仍旧提的是全体会议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即：（一）分界线的设立不应涉及和平会议才解决的领土问题；（二）分界线的设立应依据现有军事局势并不应给双方造成损害（指美国由于单方面停止空军和海军行动而遭受的损害）；对防御地域的考虑应该作为划分分界线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方进攻另一方的情况下保证双方的安全。

在涉及自己 7 月 27 日提出的关于分界线的基本建议时，分委员会的美国人仅局限于通过将非军事区的纵深从 20 海里减到 20 公里来“更新”它。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指出，非军事区可以扩大或者缩小，但这丝毫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中朝方面让美国人明白，为达成协议，双方必须抛弃自己先前关于分界线的建议并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为这种途径，北京早就建议朝鲜人，在必要时同意交出美国人在北朝鲜占领的领土和人民军队在南方占领的领土，将它们置于联合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其条件是从这些领土上撤军。在这件情况下，三八线无疑将成为非军事区的基础。

在 8 月 22 日的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朝鲜人民军代表声明：“如果你们放弃自己先前的立场并表现出达成协议的真诚愿望，我们可以对关于三八线的建议做出实质性的修改。”朝

鲜人民军代表坚持,美国人必须放弃因停止空军和海军行动而获得补偿的要求以及放弃将现有战线作为基础的建议,因为它不能准确反映真正的军事态势。朝鲜人民军代表称:“当前我们拥有的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占优势;如果需要进攻南方,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到。但既然我们希望停战和停止流血,所以我们不这样做。”

美国人口头上同意让步。对于在战线和三八线之间设立分界线的可能性问题,他们在8月21日的会议上是如此回答的:“如果你们有通过在现行战线附近设立分界线的愿望,那就请你们提出建议。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以讨论把我们的部队从战线撤往南方的问题。我们不打算在现行战线和三八线之间建立分界线,但请你们提出建议让我们讨论。”

美国人在分委员会中实际上没提出对7月27日的建议进行修改的任何建议。他们显然是希望中朝方面首先做出让步,然后晚些时候再迫使它做出新的让步。

在这种条件下,中朝方面认为改变自己的立场是不适宜的。于是,分委员会的谈判没取得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美国人越发暴露出不愿意妥协,转而在开城中立区进行武装挑衅。看来,美国人已确实把中国人极力想结束战争,看成对手的软弱可欺,决定或者吓唬对手并迫使其让步,或者是结束谈判。

还在早些时候,美国人为查清敌人的情绪并拖延谈判,就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在解决这些事件时又采取粗暴的施压和强制的方法。

比如,在谈判的第二天,7月11日快结束时,美国代表就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即不提出问题来讨论,要求更改联络军官之间达成的协议规定的程序,并离开会场,声称只要外国记者不被容许来开城,他们就不会举行谈判。7月12日,美国代表不等问题解决,除代表团机关的75名成员外,还试图带大批记者来开城,在他们进入中立区时被中朝警卫部队扣留。借此机会,美国代表也掉头回去了,3天没来参加谈判。

尽管在7月8日联络军官会晤时,正是美方代表金尼上校提议,谈判地区的安全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负责,只容许双方代表及代表团机关的工作人员进入这一地区(金尼通报说美方代表团机关由75人组成),但美国代表团在发生7月12日事件时却大叫大嚷说“共产党”限制美国代表在开城的行动自由,李奇微将军则要求重新审查7月8日的协议。金日成和彭德怀在答复李奇微时指出,关于记者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不应该成为谈判中止的理由。李奇微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谈判于7月15日恢复。

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记者所报道的,美国人是故意往开城派了大批记者,希望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妄图以这种方式找到中断谈判的借口,其目的是制造相应的政治局势,让国会通过更新军队装备计划的政府法案。

看来,美国人后来在开城制造的事件也是为追求拖延谈判的同一目的。这些事件有:7月16日,美国人控制的李承晚士兵扫射谈判地区的方文村哨所。为此,南日在7月17日的会议上向美方代表团发出口头抗议。

8月7日,40名李承晚士兵用机枪向方文村扫射,然后又用手枪、步枪和卡宾枪向中立

区的非武装警卫哨所射击。

同一天，一些美国歼击机向协议规定地打着白旗、发动机部分盖着白色罩的朝鲜人民军代表乘坐的汽车扫射。汽车被击毁。

8月19日，30名李承晚士兵袭击中立区警察分队没有武装的警卫处，打死排长姚庆祥和战士王应元（均为中国人）。

同一天，美国飞机扫射并烧毁了从开城开往平壤、打着白旗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军官乘坐的汽车。

美国人对每一个事件都极力回避责任，对中朝方面的抗议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与此相反，中朝方面则公开承认了自己对8月4日事件的责任，当时中国志愿军的一个武装连队从离会场100米的公路上通过去参加会议（中国人以为美国人已乘不久前开走的直升机离开了开城）。

中朝方面尽管抗议美国人的挑衅，但却没破坏谈判进程，相反，美方利用仅仅武装的中国人在中立区出现这一点就中断会议5天之久（从8月4日至10日）。8月4日的事件被美国宣传机关广泛利用，为中断谈判准备土壤。利用中国人的失误，美国人决定破坏关于谈判地区安全保障的协议。

中朝方面对8月4日事件以后美国人一个接一个的挑衅所提的抗议未能阻止美国人。8月22日夜间，美国飞机破坏中立区，在朝鲜人民军代表团驻地和会议室地区投下了3个油箱和6枚小型炸弹，会议室还遭到飞机机枪扫射。

中朝方面在提出抗议后，被迫中断了谈判。8月25日收到李奇微的答复，他否认美国飞机袭击开城的事实，并以前所未有的挑衅口吻凭空捏造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中朝方面出于挑衅的目的杜撰出来的。李奇微的调子不能证明美国人解决事件的意愿，金日成和彭德怀坚持对上述事实进行调查。李奇微坚决拒绝调查，他们之间的通信至今未能导致从8月23日就中断的谈判得以恢复。

并且，美国人9月1日又对开城进行了第二次空袭，以此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对中朝方面抗议的蔑视。除此之外，美国人于8月29日（对中立区守备部队进行炮击）和8月30日（一架美国B-26飞机在中立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又破坏了中立区。

这样，谈判双方的关系继续紧张，缔结停战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

在业已形成的军事态势下，美国人觉得没有必要急忙停战。根据掌握的情报，他们在加紧准备新的大规模进攻。根据他们的如意算盘，这一进攻将强迫中国人和朝鲜人接受更苛刻的停战条件。

应当指出，谈判还没有失去达成妥协的一切可能性。其中包括中朝方面打算提出关于按现行战线建立分界线的妥协建议，其条件是建立更宽广的非军事区——纵深不少于10公里，比如60公里，即双方部队均撤离三八线的纵深。如果问题这样解决，朝鲜人民军部队将被迫在元山以北的东翼建立自己的防御，但敌人也应该在战线两端将自己的部队撤到汉城以南。

但是，中朝领导人还没有就非军事区的行政管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中国领导人认为，

可以把非军事区交给双方司令部的联合委员会管理,甚至同意可以把三八线以北美军占领的地区由美国(李承晚)管理,而人民军占领的三八线以南的地区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管理。朝鲜领导人则认为,非军事区领土上的行政管理应该恢复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存在的状况。

结论:

一、停战谈判开始的态势是不利于我们朋友的。

干涉者的部队在此之前占领了相当大一片北朝鲜领土,美国人照旧拥有无限制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冬季进攻结束后,人民军未能取得战场上的新成就。中国人声称,他们的军队没有受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训练。战场上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美国人不关心急于缔结停战协定。尽管美国及其仆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部分赞成结束朝鲜战争,在当前的态势下,美国政府看来认为继续战争更为有利,指望通过新的进攻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耻辱的停战条件。不排除,美国打算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利用日本军队来继续进行干涉,那将使朝鲜的局势更为复杂。

二、谈判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垄断资产阶级不关心恢复和平,美帝国主义极力想保持国际紧张局势,以保证更换部队武装的完成,加速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拒绝双方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也是因为马立克同志的建议、中国人在谈判期间的表现、北朝鲜方面停止进攻行动被美国人看作对手软弱、被追求和的表现。

三、朝鲜人担心他们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信 of 停战条件。他们对美国人广泛利用日本军队进攻朝鲜的可能性特别感到不安。

中国人拒绝进攻性战役,他们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已经引起了朝鲜方面对他们的明显冷淡。与此同时,朝鲜人对苏联的指望变得越来越坚定而广泛。

四、在谈判的现阶段,双方还没有完全失去达成停战协定的可能性。

朝鲜朋友希望尽快缔结停战协定。

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在停战谈判方面的政治情绪及相互关系将在寄给部长的专门材料中报告。

本材料由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 B. 佩图霍夫编写。

佩图霍夫(签名)

附件:

乔伊在 1951 年 7 月 27 日全体会议上的声明

在你们关于议事日程第二条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中,你们提议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你们说这在历史上是有充分依据的,战争在这条纬线上开始,自然战争也应该在这条纬度线

上结束。你们说战争是在三八线上开始的，这是正确的。但仅此一点还不是战争就该在同一条线上结束的依据。

如果在一年前缔结停战协定，很难相信你们会同意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9月15日之后，当你们的军队败退到鸭绿江地区时，你们也不可能希望我们会同意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从历史的角度和军事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从1950年6月爆发战争之时起，就没有了按三八线设立军事分界线的依据。军事分界线或者限制军队向前推进的线，与历史毫无关系。这条线与停止军事行动的善良信念也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你们提出为在三八线设立军事分界线辩护的论据中，没有一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能反映对这么一条线性质的理解。

你们同意非军事区应该横跨朝鲜，所有的武装力量应该由这个区域分开。我们认为，非军事区的边界应该以实际军事考量为依据，他们现时是如何存在的，涉及政府间关于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最终协议的考虑完全不应对它有影响。另一方面，对敌对双方军队有军事价值的每个因素都应该得到深入的、无偏见的研究。

这样，像纬度这样的设想中的地理线，对缔结军事停战协定就没有任何意义。

谈到非军事区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希望大家注意某些军事因素。

作为任何一个停战协定，都有三个军事意义的区域：

第一个是空中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在自己手中掌握着整个朝鲜上空的制空权。

第二是海上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朝鲜周围所有的海域。

第三是陆地区域。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着从草洞里附近到朝鲜东海岸，在西部方向穿过平康以南高地，然后向西南穿过板门店到东场里并沿汉江西岸直到它的河口，三八线以南的全部领土。

空军和海军力量以及地面力量——所有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对地面非军事区的形势有很大影响。换句话说，地面非军事区应该处于它与由空军和海军代表的其他区域关系的焦点，海、空军的打击力量你们已很好地领教过了。此外，还应以应有的方式考虑到空军和海军对地面战役具有的意义。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军和海军能限制你们部队的行动自由并给你们的地面部队造成巨大损失。联合国军司令部空军对你们后方地区的袭击迫使你们保持大量的部队和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后勤地区，否则这些部队和武器本来可以用在前线的。你们在前线地区集中部队和弹药的能力也大大受限制。你们实际上没有可能保证空中观察以及对你们的地面部队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持。

还有，在海军方面你们也完全熟悉现有的局势。当前，你们被禁锢在陆地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自由进出环绕朝鲜的所有海域，而你们却不能自由地利用海上交通线。你们沿两边海岸线的公路和铁路线是海上有效的轰击目标。联合国军司令部拥有实施登陆作战的能力，这迫使你们沿海岸线保持巨大兵力以预防登陆的危险。你们的港口、军事设施、交通线和供给仓库我们随时都可以从海上轰炸。与此相反，南朝鲜却不会遭到从海上的封锁和进攻。现存局势的军事因素从地理上在这张地图上也清晰可见。你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联合

国军司令部以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控制的广阔区域。它包括从前线到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整个北朝鲜,而在南朝鲜却没有任何类似情况。

如果仅仅观察一个地面局势,那我们的能力可以说近似于打个平手。然而,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是现实主义者,应该深刻和不怀偏见地研究影响敌对双方在他们当前态势下实施战役的每个因素。

现在你们应该清楚了,你们经常建议用来确定非军事区的那条线,完全不符合当前在朝鲜形成的军事局势的所有方面。它甚至不符合当前的地面接触线。它完全不能与空军和海军的作用相适应。它比穿过平壤和元山的分界线更加不符合当前朝鲜形成的总的军事局势。换句话说,你们对我们让步,将你们的地面部队往北撤离穿过平壤和元山那条线的好处,无论如何抵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把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撤出北朝鲜向你们提供的好处。

你们和我们的地面部队当前的接触线,你们和我们都同样清楚,就不必对这条线走向的细节进行讨论了吧。如果只考虑地面部队,就当地所有部队停火达成协议似乎是明智的。然而这意味着仅仅停止部分军事行动。我们的空军就应还有进行侦察和对整个北朝鲜造成军事损失的权利。如果我们要达成我们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都停止针对你们的战役的停战协定,那么我们肯定地说,分界区的设立就应该公道,要考虑所有这些因素。

我们认为,而且我相信你们也这样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最严肃的研究。所有上述因素都影响着地面非军事区的确定。为达成公正而有效的停战协定而进行涉及每一方应提供的军事好处的任何讨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考虑到。

总之,你们应该明白,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部队在地面、空中和海岸地区同时停火是一次重大的让步,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朝鲜及中国在朝鲜的所有部队在现有条件下的停火。作为对这种让步的补偿,北朝鲜和中国的部队最低限度也要向北方进行大踏步地撤退。

非军事区的纵深应该能够防止在停战期间双方个别人员之间产生虽小但危险的事件。这是每个指挥员都能够寄予希望的简单的预防措施。为了实现这一措施并不使区内的行政管理法规不必要地复杂化,我们建议,总的非军事区应有大约 20 海里(1 海里等于 1 853 米)的纵深。正如我们在预备性会议上多次指出的,建立非军事区边界有几种方法。既然这个非军事区是临时的军事手段,为避免可能迟滞朝鲜问题最终解决的机会,我们认为,这个区的边界应该通过地形上容易确定的点。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现在提出如下建议:

一、停止所有地面行动并建立非军事区,所有军事力量都从非军事区撤出。我们建议的这个非军事区就标在我马上就给你们地图上。

二、停止我们在从鸭绿江和图们江南岸至即将协商好的非军事区南部边界整个领土上空的行动。

三、停止我们在从鸭绿江口开始沿西海岸、从图们江口开始沿东海岸直至即将协商好的非军事区南部边界的海上轰炸和封锁。

这张地图的比例尺是 1:250 000,它提供了非军事区总的轮廓,但它以后用于行政管理

目的的细节尚未确定。

就谈这些。

翻译：B. 佩图霍夫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7, п. 32, д. 65, л. 24 - 63

№133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苏中民航股份公司问题

（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日

第340项 关于消除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不足。

考虑到要交换意见，特委托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最终定稿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66

№1255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1951年9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日

第350项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

根据现有的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滥用依靠中方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在 1950 年 3 月 27 日中苏协定中并没有规定,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派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И. Ф. 库尔久科夫同志,授命他就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上述滥用现象。将所采取的措施上报中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68

№12985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 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

(1951 年 9 月 6 日)

接见美国大使柯克

1951 年 9 月 6 日

根据柯克的请求,于 13 点 30 分接见了。大使说他受委托向苏联政府转达照会以及向我递交该照会的文本。大使有预备地宣读了照会的英文本。柯克补充说,这个照会也要发给以下国家的外交部,包括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鉴于美国公众对于这一问题表现出的关注,稍后可能会考虑将照会公之于众。

当我了解了口头翻译成俄语的信函内容时,我发现在他所声明的国家中没有最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柯克说,这是因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我对大使说,这种情况不是……^①

苏联政府没有可能干预,尽管这也可能是美国政府所期待的。

大使开始讲到,他说有很多原因使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涉及在信函中提到的使事态恶化的一系列事件。

我回答说,我支持这一个观点,因为我认为使中美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不在于某些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国内事件，而在于唯一能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以及代表差不多 5 亿人民的是谁，被美国承认的蒋介石政府谁也代表不了。

至于谈到来函中所提到的事件，我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行为是正义的。

在谈话的最后，大使通报说，10 月他要回美国向本国政府述职，因此请求能给予协调帮助，许可他的飞机在莫斯科降落。

我答应给予他协调帮助的请求。

会谈持续了大约 30 分钟。出席会谈的有帕斯托耶夫同志。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4, п. 322, д. 11, л. 89 - 90

№12984

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照会： 关于在中国关押的美军战俘问题

（1951 年 9 月 6 日）

译自英文

美国政府怀着日益增强的不安情绪观察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美国公民的粗暴和不适当的态度。现在有 20 多个美国公民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其中的大部分人已在押 6 个月和 6 个月以上。有人认为，一个被关押的人已经死在牢里了，还有几个被关押的人正处于身体或物质上的艰难状态。我们得知，约有 30 个美国公民正处于“被软禁在家”的状态。其他许多人在长达 2 年多的时间里经常被禁止离开中国，这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拘留。我们得知，至少有些在押人员是不准与狱外的任何人保持联系的。

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逮捕或者被逮捕人所处的地点及近况等相关信息是不会给予任何解释的。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和采访代表美国利益的公共人物，在共产主义的中国是被禁止的。众所周知，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公民也遭到了类似的对待……^①

美国政府怀着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关于被随意逮捕的美国人的消息，期望停止对他们的关押，期望对被关押人提供公认的最基本的权利，即允许与家人和朋友取得联系，允许接受法律保护，了解原告提出的指控，甚至是有对他们的事件诉诸法庭裁决的权利。但是所有对这些的权利都一直被拒绝，对于他们能很快得到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采取非常手段使其获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得自由的希望也不存在。

正是基于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有关对待国外公民的准则,甚至处于通用的人道主义,美国政府以他的名义请贵国政府向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提出请求,请求他们通报这些在押的美国人的消息和采取必要的步骤,能对于他们的事件开始公正地、快速地运作程序……^①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4, п. 322, д. 11, л. 91 - 92

№1340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把在新疆的苏联孤儿送回国

(1951年9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6日

第396项 关于把当地苏联公民中的孤儿从新疆送往苏联的问题。

一、责成苏联外交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关于把由伊宁市(新疆省)当地苏联公民组织抚养的161名孤儿从新疆送往苏联的问题。

二、责成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接受上述孤儿中的81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接受80人,并把这些孤儿安置在幼儿园和第30号技工学校。

三、关于接送80名孤儿从阿拉木图到塔什干路程上的一切开销,由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承担。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76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133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问题

(1951年9月6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6日

第395项 关于克服中苏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中的缺点。
批准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苏联部长会议认为，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以确保中苏民航股份公司正常地开展工作，没有向该公司提供作为苏方在该公司股份中所占有的技术投入的份额，也没有为该公司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干部，其结果使公司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这是不正确的。

二、为了消除上述缺点，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通过民航股份公司的苏方机关，采取措施以彻底改善公司的状况和工作，并达到如下目的：

1. 在今年的11月1日前，根据附件一的内容向公司提供苏方在公司股份中所占有的资产；
2. 在今年的11月1日前，为公司的苏方机关配备必要的专业干部，使其编制人员达到满额，并更换那些在其专业方面不能胜任工作的工作人员(根据附件二)；
3. 为沈阳—赤塔、兰州—阿拉木图航线政治处增设数名副主任。这些工作人员的薪资计在民航管理总局预算苏中民航股份公司工作人员津贴项下；
4. 采取措施使公司固定使用的办公和住宅建筑达到要求，并建设苏中民航股份公司乘客所需要的公共设施；

5. 派国际民航管理总局局长 Г. И. 斯托利亚罗夫同志、机场事务工程师 Б. С. 伊万诺夫同志、运营技术工程师 В. В. 雷巴尔金同志及通讯和无线电导航工程师 В. Е. 诺维科夫同志, 前往中国出差, 期限为 2 个月, 以便在改进公司工作以及分配和使用拨给公司的技术器材方面, 给予具体的帮助。

三、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和苏联民航管理总局(扎沃龙科夫同志)在今年的 12 月 1 日前提交关于采取措施的结果的报告。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 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机 密

关于应该提供给苏中民航股份公司作为股金的物资清单

- 一、АШ-62-ИР 型航空发动机
- 二、РАФ-КВ-5 型固定的无线电台
- 三、ПАР-3 型固定的无线电导航台
- 四、ПКВ-49 型定向仪
- 五、КВЯ 型无线电接收机
- 六、110/220 伏硒整流器
- 七、40 伏特 12 安培的硒整流器
- 八、10-15 千瓦 220 伏特的电站
- 九、СТ-144 型酸性蓄电池
- 十、消除定向仪偏差的振荡器
- 十一、航空无线电试验器材
- 十二、МП-70 型 30 伏特以下的磁电伏特计
- 十三、分流器分别为 3、15、30、75、300 安培的磁电电流表
- 十四、500 伏特的迈格表
- 十五、电压为 250 伏特以下标度为 2 兆的欧姆计
- 十六、鲁缅采夫电池试探器
- 十七、双电极、可调多针避雷器

- 十八、20、50、100 安培的装载电阻
- 十九、吉斯-150 型装载汽车
- 二十、嘎斯-51 型装载汽车
- 二十一、嘎斯-67 型轻型汽车
- 二十二、莫-20 型轻型汽车
- 二十三、БЗ-吉斯-150 加油车
- 二十四、加油汽车
- 二十五、吉斯-150 型汽油油槽车
- 二十六、ДТ-54 型拖拉机
- 二十七、移动制氧站
- 二十八、РМ-30 回收设备
- 二十九、带 ЛЗ-2 的汽油电机泵
- 三十、小砵码分析秤
- 三十一、马尔登斯-宾斯基仪器
- 三十二、细管直径平均 2 毫米的奥斯特瓦尔特细管黏度计
- 三十三、金和斯塔尔克仪器
- 三十四、乌别洛伊德仪器
- 三十五、秋勃斯克和什塔梅尔量热器
- 三十六、列伊德仪器
- 三十七、理查尔德松中心测量仪
- 三十八、氢气瓶和乙炔瓶
- 三十九、2685 模式汽车发动机汽缸镗孔立式机床
- 四十、221 模式的带连杆的吉斯和卡斯牌发动机校准仪
- 四十一、204-1 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主轴承镗孔器
- 四十二、292 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连杆轴承镗孔器
- 四十三、210-1 型吉斯和卡斯发动机连杆轴承启动注油器
- 四十四、发电机和启动机电枢检验仪
- 四十五、带有 4 个规格为 100×130 阀门的 121 型磨合手提钻孔机
- 四十六、立式钻孔机床
- 四十七、万能铣床
- 四十八、ЭБ-652 型双面金刚砂磨轮
- 四十九、机械刀锯
- 五十、Н-940 型裁铁用剪刀
- 五十一、ПУТ-48 检查电热测量器的装置

- 五十二、刻度从 0 到 15 000 千克的测力计
- 五十三、ПЭС-2 可移动的电动启动机
- 五十四、ИП-40 加热器
- 五十五、КП-22 氧化设备
- 五十六、带有上层移动平台的 П-452 型 50 吨水压冲床
- 五十七、1Д63А 型螺丝车床
- 五十八、Щ-3А 型牛头刨床
- 五十九、安装修理工具和飞机维修辅助工具
- 六十、安装电机的 4486001 试验台
- 六十一、飞机机翼可摘部分 4482023 支架
- 六十二、运输电机用的 4466001 小车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 波马兹涅夫

附件二：

机 密

新更换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苏方负责人员名单

- 一、哈密机场的负责人 Н. А. 萨马林同志
- 二、齐齐哈尔机场的负责人 М. И. 萨奇科夫同志
- 三、太原机场的负责人 И. Н. 西马科夫同志
- 四、飞机场管理局经济师 П. С. 切列诺夫同志
- 五、航空技师：А. В. 拉夫金同志、Г. П. 列别杰夫同志、Г. А. 阿列申同志

补充配备的苏中民航股份公司苏方负责人员清单

- 1. 飞机场负责人 2 名
- 2. 地面设备工程师 1 名
- 3. 办事处负责人 1 名
- 4. 翻译 1 名
- 5. 会计师 2 名
- 6. 飞行指导员 1 名

7. 工程师-电工 1 名
 8. 工程师-经济师 2 名
 9. 机库负责人 1 名
 10. 技术试验设备仓库负责人 2 名
 11. 无线电定向仪工程师 5 名
 12. 航空机械师 6 名
 13. 医师 3 名
 14. 无线电技师 1 名
 15. 航海长 1 名
- 总计：30 人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76, 252 - 257

№0049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

（1951 年 9 月 8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9 月 8 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 8 月 27 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

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 83 名顾问：

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共 10 人，其中包括：总顾问 1 人、参谋长顾问 1 人、作战顾问 1 人、侦察顾问 1 人、通信顾问 1 人、后勤顾问 1 人、军事交通顾问 1 人、炮兵顾问 1 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 1 人、工程兵顾问 1 人。

二、5 个兵团的顾问共 10 人：每个兵团 2 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参谋长顾问 1 人、作战顾问 1 人。

三、21 个军的顾问共 63 人：每个军 3 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 1 人、炮兵顾问 1 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 1 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 1951 年 9—10 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 年 9 月 8 日

第 4492 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98 - 99

№0049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 年 9 月 10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 9 月 8 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派遣一名首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

关于是否向军或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根据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合理地加以解决。

我们将派遣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首席军事顾问。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那么陆军大将扎哈罗夫近日前往北京，尔后到达在朝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区。

菲利波夫

1951 年 9 月 10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09

No11825

拉祖瓦耶夫的报告： 北朝鲜的政治情绪及中朝关系

（1951年9月10日）

这封信函是1951年10月2日通过外交信使收到的。
由驻朝鲜的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发来。

绝 密

1951年9月10日

关于停战谈判出现的政治情绪和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

政治情绪

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不过，他们对此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

尽管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理解目前业已形成的局势，也同意必须停战，但是，通过一些私下的观察，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朝鲜领导人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的压抑，即这场毁坏了国家的战争，是不能使朝鲜得到统一的，现在他们不得不在最坏的条件下同意恢复战前的状态。

马立克同志的发言^①被朝鲜人认为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金日成在结束了7月份^②的北京之行后，极其沮丧地谈到了这一想法。与此同时，金日成也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的力量，它的潜力和利益以及它在整个民主主义阵营的共同斗争中与朝鲜的相同作用。在谈到某些同志希望请求苏联提供援助时，金日成多次表示说，苏联是整个民主主义阵营的主要后备军，它目前参加战争还为时过早。

朝鲜社会各个阶层的情绪可分为两种。一种情绪是对于战争感到极其疲倦，希望不再继续进行战争。另一种情绪是普遍出现的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将停战看作是对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的破灭。

在马立克同志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于他的建议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这种情况助长了上述情绪的蔓延。只是在李奇微向金日成提出开始谈判的呼吁之后，朝鲜的报刊才针对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发表

① 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苏联人民认为，朝鲜的冲突是能够解决的，“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规定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编注

② 原文如此。金日成到达北京，并与毛泽东商定停战谈判的时间是6月初。——编注

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这个建议表示欢迎。到最近为止,朝鲜的报刊都在依据该建议的精神,定期地报道谈判情况以及与谈判有关的一些问题。

朝鲜人围绕谈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通过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揭露了美国人的侵略立场,号召社会舆论反对他们,对在开城的中朝代表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朝鲜报刊对停战谈判的反应情况,我们在此不作援引,因为苏联的报界已经广泛地报道了这些情况。)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的反停战情绪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很快就朝着有利于停战的方向转变了。许多情况促进了这种变化,例如,居民所遭受的灾难、对于战争的普遍厌倦、经济遭受破坏、美国空袭的加剧、前线持续的失利、民主主义宣传的影响,等等。在开城谈判期间,朝鲜人已经习惯了战争可能停止的想法,因此,每一次谈判的中断都使他们感到不安和气馁。

马立克的建议在南朝鲜受到了李承晚集团的极端仇视,他们希望在侵略者的帮助下,将自己的政权扩大到整个朝鲜。李承晚分子多次举行反对停战谈判的群众集会。6月底,南朝鲜“国民大会”发表声明,反对在三八线上停止战争。

尽管根据美国人的指示,南朝鲜军队的代表受命加入了出席谈判的代表团,李承晚政府仍然没有停止反对停战的行动。7月31日,李承晚政府在釜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其口号是:“不统一毋宁死!”与此同时,该政府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例如,李承晚政府驻伦敦的公使李安闻(Ли Ан Мук)在8月10日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他给英国政府的呼吁书:

“我请求英国政府,不要力求在朝鲜建立虚假的和平。为此应该研究真实的情况。目前,在朝鲜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和平。”李安闻还声明说,他的政府认为必须摧毁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并通过联合国来确保第三国不在军事、经济和其他方面援助北朝鲜。

显然,李承晚分子对于停战谈判的敌视态度,不仅说明他们已经看到停战将毁灭他们占领北朝鲜的计划,而且还说明他们的立场完全符合美国人的要求……^①第二,给予那些坚持停战立场的自己的仆从国以压力;第三,在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提高李承晚分子的政治威信。

中朝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谈判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对待谈判的立场上存在着差别。

金日成及朝鲜的其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谈判应该这样进行,即不能贬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信,不能破坏它的荣誉。中国人则倾向于向美国人做出让步,只要能达成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中国人并不总是力求及时地、充分地使自己的立场与朝鲜人的立场保持一致,这常常引起后者明显的恼怒。例如,朝鲜人将自己对李奇微的第一封呼吁书的答复函草案寄给了北京,这个草案在实质上与北京方面的草案没有多大区别。中国人对朝鲜人的草

^① 此处档案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案没有复函，但是在8月1日晚他们却简单地通知说，北京无线电广播将在某某时间转播电报中援引的金日成和彭德怀答复函的文本，平壤无线电台也应该在同一时间转播这些内容。由于电报很晚才发出，平壤无线电台比北京无线电台晚播出了一个小时，美国宣传机构立即报道了此事。自然，金日成对类似的合作方式十分不满。

北京向开城派出了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李同时还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领导人）为首的、由众多外交官和军事人员组成的小组，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乔^①（国务院总理是周恩来）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中国人事先告诫朝鲜人，他们的代表除了应该遵循上级机关的指示以外，还要遵循中朝代表联合工作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而这个委员会是在李克农的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的。后来金日成抱怨说，在一系列问题上他都与李有分歧，李对于美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让步。

无论是对乔伊的发言，还是对李奇微的声明，李克农都起草了答复草案。但是，对于他的草案毛泽东并不全部赞同，尤其是最后一份。8月底，毛泽东对李提出了意见，说他所形成的立场让美国人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更关心的是停战，其结果是降低了谈判成功的希望。

鉴于7月12日事件（关于允许外国记者前往开城和重新研究有关中立地区协定的问题），金日成起草了给李奇微的答复函，对李奇微的要求做了让步，他同时还揭露了美国人提出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中国人没有征询金日成的意见，只是简单地向他通报了给李奇微的复函内容，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平壤无线电台进行转播。中方的答复令金日成不满，因为中方对于李奇微的纯粹宣传性的演说没有进行批评，实质上是将所发生的事件解释为不是美国人破坏了联络官之间的协定，只是没有协商好以及李奇微的要求被作为是合理的和有根据的要求而接受了。但是，金日成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只承认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毛泽东请金日成就此问题通告自己的意见。金日成立即答复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让步意味着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严重的政治打击，还因为被美国占领的朝鲜北部地区，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

在答复了毛泽东之后，金日成情绪非常不好，在同朴宪永交谈时他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我宁愿重新进行游击战争，而你们准备转入地下状态。反正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朝鲜。”显然，这样的独白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民族感情的表露，而且也是一定的政治意图的表露。金日成不倾向于通过有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荣誉的让步来达到停战的目的，他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即最终中国和苏联是不会允许毁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当美国代表提出在朝鲜人民军后方地区建立分界线的过分要求之后，毛泽东于7月28日立即给金日成发出一封电报，建议金日成坚决拒绝美国人的要求，同时要以十分尖锐的口

^①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显然是乔冠华，但乔在国内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而不是国务院副总理。——编注

气提醒美国人注意,他们在海上和空中的优势并不能阻止在大邱和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毛泽东的电报使金日成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中国人对美国最近在谈判区的挑衅行为采取的坚决立场,也使朝鲜人感到振奋。

不仅如此,还应该指出的是,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谈判的失败更加强了上述所说的那些情绪。朝鲜领导人认为,第一,由于中国人在谈判时过分暴露了中方和朝方的意图以及他们对和平的极大关注,所有这些建议在谈判的开初就以最终的形式提出来,这就使双方失去了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的机会。第二,金日成和朴宪永以谨慎的方式表示,北京执行着一条前后不一的政策。在朝鲜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美国人不可调和的立场,他们极力将侮辱性的停战条件强加于朝鲜人身上。

目前,朝鲜朋友已经表现出了尽可能快地实现停战的意愿。

苏联驻朝鲜大使

B. 拉祖瓦耶夫

1951年9月10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2卷,第1592—1598页

№248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计划

(1951年9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收到了您关于阐述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初步计划的电报。

1. 为了使我们在天然橡胶这一重要的战略原料上一起最终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认为,计划中应该考虑,在中国种植橡胶树的规模至少应能保证每年得到20万吨橡胶。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考虑的是中国、苏联和部分人民民主国家的需要。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尽快采取措施种植橡胶树，以便尽快得到天然橡胶。

2. 计划草案中提出了关于橡胶种植园的所有制形式问题。橡胶种植园应该属于谁呢？属于国家还是农民？我们认为，首先应该着手建立国有的橡胶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考虑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未开发的土地上建立橡胶种植园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进行改良土壤的工作，需要实行机械化，而这些都是农民所做不到的。在组建国营的橡胶种植园的同时，应该尽力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树。有适合种植橡胶树的农业用地，也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在国家提供的相关帮助下，这将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橡胶。

至于需要栽培的橡胶树苗，则应掌握在国家手中，为此，应当进行特别的组织工作，应该组织专家对种苗的培植工作进行领导，并大规模使用机械化。

3. 从你们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海南岛以其自身的自然条件可以成为生产橡胶的最为重要的基地，而且近年就可以生产出橡胶。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制订计划，着手在海南岛建立大面积的橡胶种植园，这一点非常重要。

4. 准备地块，准备在近年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树所需要的一些机械：拖拉机、耕地机、中耕机等机械。在此方面我们愿意给予必要的帮助。

5.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向中国派遣一组熟悉林业工作和国营农场工作的苏联专家、熟悉对多沼泽的土壤进行改良的专家、熟悉种苗机械化种植工作以及树木种植工作的专家。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1, л. 110 - 112

№0049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

（1951年9月12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

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 5 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

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 年 9 月 12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20

№248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种植橡胶树问题

(1951 年 9 月 16 日)

菲利波夫同志：

您关于种植橡胶树的电报我们收到了。

您提出的意见非常好,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种植橡胶树的计划可以保证每年得到 20 万吨天然橡胶：海南岛可以保证 10 万吨，中国大陆性气候地区可以保障 10 万吨。其中的大部分天然橡胶将会供应给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自己,有很少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正在研究如此大规模地种植橡胶树以便得到 20 万吨以上的橡胶的可能性。

您提出的如下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主要在于,必须建立国营的橡胶种植园。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橡胶种苗的培植将会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

我们非常需要苏联和苏联专家提供技术帮助。

10 月下旬,我们打算在广州召开会议,对关于种植橡胶树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希望苏联专家能够在 10 月中旬到达北京,以便参加 10 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会议。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那么我请求您及时把苏联专家派往中国。

毛泽东

1951 年 9 月 16 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1, л. 123 - 124

№133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向世界工联亚洲联络部派驻苏联代表

(1951年9月1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18日

第550项 关于向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派出苏联工会代表的问题。

1. 接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派 A. Γ. 科雷巴诺夫同志前往中国,负责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日常工作。
2. 批准给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3.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增补外汇预算资金,以用于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工会代表(指 A. Γ. 科雷巴诺夫同志)的开支,并把该同志的工资提高到与大使馆的参赞一样。

附件：

给驻世界工会联合会 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的指示

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的苏联代表应该遵循如下指示：

联络部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应该与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进行密切的接触,依靠中国工会组织的协助,使驻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联络部与亚洲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获得关于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会运动发展情况的全面信息；

采取措施加强亚洲各国工会组织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部门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门)的国际联合会的联系以及吸收新的成员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

在已经加入和尚未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会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在提高工资、进行社会保险、改善居住条件、消除种族歧视等问题方面,组织他们在亚洲各国家里采取共同的行动；

对亚洲各国的大工会组织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斗争给予具体的帮助；

在亚洲各国,广泛地宣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与其相邻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活动,通过报

刊和无线电广播,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及其他工作形式,广泛地宣传苏联工会和中国工会组织的活动,并结合每个国家的情况和条件,促进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关的决定在亚洲各国的实现;

系统地揭露所谓的自由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劳工局在亚洲各国工会运动中的有害和分裂的活动;

使亚洲各国的工会组织积极地参加和平拥护者运动,扩大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协助在一些还没有建立和平拥护者国家委员会和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企业里,建立这些委员会。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03, 302 - 303

№004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0日)

发自北京,1951年9月20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①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除您同意给志愿军司令部派遣5名军事顾问外,我请求你们研究是否可以在必要时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5个兵团司令部工作。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我希望这10名军事顾问能在今年9月底或10月上旬到达北京,尔后他们即将被派往前线。

我们知道,为了生产和运输今年9月8日电报申请单所提出的军用物资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批物资不可能与原先订好的用来装备10个师中6个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同时运到。

根据原先规定的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期限,我们制订了按照新的编制

① 9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中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编注

组建的10个师的战斗训练计划。这一计划从8月份开始付诸实施。

如果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计划不变，那我们的战斗训练计划就可无须改变而如期进行。

这样，在1952年3月就可完全结束按照新的编制组建起来的10个师的训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些师到时候就可投入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改变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战斗物资的计划是不适当的。而且，为了满足今年最后两个月内前线的需要和加强朝鲜境内交通线的对空防御，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于1951年年底向我们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提出的军用物资总值1/5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我们主要需要高射炮炮弹及其他弹药。详细的申请单附于本电报之后。

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所提出的总值4/5的军用物资和满足军事需要的汽车，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上半年提供给我们。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补充提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您研究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申 请 单

一、85毫米高射炮120门。

二、弹药(发)。

122毫米榴弹炮炮弹：杀伤弹19000发、穿甲弹1000发；

供LQC-2用的122毫米炮弹：杀伤弹5000发、穿甲弹5000发；

供LCY用的122毫米炮弹：杀伤弹1250发、穿甲弹1250发；

76.2毫米加农炮炮弹：杀伤弹40000发、穿甲弹60000发；

85毫米高射炮炮弹：140000发、37毫米高射炮炮弹2000000发；

107毫米迫击炮炮弹：20000发。

三、轮胎(个)。

供122毫米榴弹炮用的50个，供122毫米榴弹炮前车用的50个；

供76.2毫米加农炮用的50个，供76.2毫米加农炮前车用的50个；

供57毫米反坦克炮用的78个，供57毫米反坦克炮前车用的78个；

供85毫米高射炮用的100个；

供76毫米高射炮用的100个；

供37毫米高射炮用的500个。

四、反坦克手榴弹100000个。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20日

第 4726 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25 - 127

№1337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对新疆石油矿产进行航空拍摄

(1951 年 9 月 22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22 日

第 598 项 关于新疆的石油和矿场的航空摄影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和波波维同志审理该问题,并向政治局提交就此问题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13

№1337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通过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1 年 9 月 24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24 日

第 602 项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周年之际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

通过斯大林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所提出的给毛泽东同志的祝贺电报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北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请您，毛泽东同志，接受我友好的祝贺。

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本人在中国今后的人民民主建设中取得成就。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伟大的友谊在今后更加牢固！它是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14, л. 334

№133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派遣各界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51年9月2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25日

第604项 关于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

接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苏联共青团中央、苏联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全苏工会

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关于今年9—10月间派遣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赴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庆祝活动。该代表团成员具体包括以下同志：Л. Н. 索洛维约夫(代表团团长)、А. И. 奥巴林、В. Г. 雅科夫列夫、Д. Б. 卡巴列夫斯基、П. А. 玛里宁娜、Р. Г. 特洛菲缅科、И. С. 佐捷拉娃和尤努索夫·萨比尔，访问期限为三个星期。^①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14

№0049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9月26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问题，我们已下令作战部挑选和派遣相应的人选，于10月上旬到达北京。

关于军事顾问在兵团司令部工作问题，我们坚持我们以前的观点——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我们的根据是，特别是在作战条件下，在兵团任命军事顾问不利于兵团的指挥，因为军事专家在兵团要对其战斗行动负责，这样会不可避免走上代替兵团指挥员的错误道

① 据195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前来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苏联人民观礼代表团已在今日到达北京”，“应邀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苏联人民观礼代表团名单如下：团长：索洛维约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团员：雅科夫列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奥巴林，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政治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尤努索夫，乌兹别克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塔什干国立中亚细亚大学教授。卡巴列夫斯基，作曲家，俄罗斯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特洛菲缅科，苏联文化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佐捷拉娃(女)，乔治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玛里宁娜(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关于代表团在中国的观感，参见以下№20003文件。——编注

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关于补充贷款(6 亿卢布)和 1951 年底前提供弹药和军用物资问题。根据生产和运输条件,如我们所通知您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能保证在今年年底前提供您在 9 月 8 日提出的申请单总价值的 1/5,同时又提供 6 个步兵师的装备和物资。

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补充订货,在 1951 年提供相当于总价值的 1/5 的军用物资。

但是 6 个师的装备和物资将推迟半年提供,像我们通知您的那样。

根据上述贷款,我们在收到您 1952 年的申请贷款后,将进行研究,然后通知您满足这一要求的可能性和时限。

菲利波夫

1951 年 9 月 26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28 - 129

№133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专家前往中国

(1951 年 9 月 29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9 月 29 日

第 646 项 关于在 1951 年派苏联专家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问题。

责成维辛斯基同志在 5 天期限内,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向政治局提交详细的报告和就此问题的决议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22

№133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矛盾论》给尤金发电

(1951年9月30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9月30日

第655项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

批准所提交的预备给尤金同志发出的电报内容。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北京

苏联大使转尤金同志：

同意关于在得到作者的同意后，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矛盾论》的建议。

维辛斯基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24, 352

№20003

奥巴林院士访问中国日记

(1951年9—10月)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A. И. 奥巴林院士的旅行日记(1951年9—10月)①

苏联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A. И. 奥巴林曾于 1951 年和 1956 年先后两度前往中国。

① 以下这篇短文是俄国学者公布奥巴林日记时所写，发表于《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 年第 4 期。——编注

他的第一次中国游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第二次则在世界科学工作者联盟10周年。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的奥巴林个人档案中，至今仍保存着他1951年在中国游历时所写的日记，本文将公开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

阿列克桑德罗·伊万诺维奇·奥巴林（1894—1980），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他以首创地球生命起源理论而载入世界科学史册。该理论以解决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为宗旨，以物质经过长期化学进化导致生命起源的规律性演变为根基。奥巴林理论的最初形成和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始于1922年举行的俄罗斯植物学协会大会。192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生命的起源》。奥巴林终生都在发展、深化和宣传自己的学说。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著作被译成世界上的50多种文字。他的理论为我们有目的地研究生命起源问题提供了可能，并促使各专业领域的学者——生物化学家、古生物病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等纷纷就这一课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

奥巴林的研究兴趣并非仅局限于地球生命起源理论。关于酶的研究也是其创造性研究活动的重要阶段。奥巴林还与自己的学生——俄罗斯生物化学科学院院士A. H. 巴赫（1857—1946）一起研究了植物的呼吸过程，从而奠定了俄国植物生物化学的基础。奥巴林的另一个科研活动领域是将自己的生物化学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他被公认为俄国生物化学技术的奠基人。奥巴林及其助手在生物化学、生物酶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科研成果为俄国茶叶的生产、面包加工、食品工业（啤酒酿制、制酒、乳制品）的生产奠定了理论基础。

奥巴林的主要科研活动都与苏联科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1935年奥巴林与A. H. 巴赫共同组建了生物化学学院，并于1946—1980年间担任院长之职。1948—1955年间他还兼任生物科学系院士及书记职务。

他的教学活动是与莫斯科大学紧密相关的，他也是该校的毕业生（1917）。从1942年至1960年的20年间，他一直负责该校的植物生物教研室，即使在临终前夕他依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科学院士奥巴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1951—1959年间为人民代表，1955—1959年间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1974年为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成员，1950—1959年为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他的活动得到了人们一致的肯定。1959年他被授予世界和平大会荣誉证书。1951年奥巴林被任命为全苏文学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管理局主席。在他替代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负责该协会工作6年之后，又将这一职务转交给了哲学家米京。

奥巴林1951年秋在中国旅行期间所写日记手稿共18页，字体大，整体笔迹清晰，且没有拼写错误。内容主要涉及自己旅途中所遇到的典型事件和内心的深刻感受。可能，他作这些札记原打算是为将来写回忆录积累素材。在1948—1979年间的30年里，奥巴林曾到过20多个国家。显而易见，他于1951年10月29日在全苏对外文化理事会分会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对中国科研机构的印象》的演说，就是源于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该演说的原始速记现保存在奥巴林个人档案中。其中部分内容，恰可作为本文中所公开的奥巴林日记

的注释。关于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之际到中国的那次旅行,奥巴林从历史的角度为自己的演说作了如下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是继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大历史事件。中国在人类历史中所取得的意义是广泛而巨大的,我们科学战线上的人绝不应对此视而不见。”^①

奥巴林日记在发表时保留了原文的体例风格。缩写均用方格标注。文中有一些人的资料未找到。

史学副博士 E. П. 库拉波娃

* * *

1951年9月26日

约九点钟,我们乘专机从莫斯科起飞。在这里,我们稍微等了一会,因为还有一位从塔什干来的同志^②,他刚刚飞来莫斯科。我们的飞机很早就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9月27日

我们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飞的较晚。中途在新西伯利亚稍作停留,然后飞到科拉斯诺雅尔斯克过夜。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手提箱事件。

9月28日

我们的飞机按当地时间7点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起飞,虽然本应当是6点。飞机直接在赤塔降落。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会。尽管天气不佳,但为了不迟到,我们还是飞往边境。当晚在波尔扎过的夜。当地气候寒冷,晚间我们都冻得够呛。

9月29日

我们的飞机又晚点了。由于沈阳和北京的天气不佳,飞机只好在齐齐哈尔降落。不久,飞机再次起飞。当地时间6点我们开始飞往北京。从飞机上我得到了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我们飞过东北、黄海。一片片的土地,共同编织成了大地。在机场,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北京时已是夜晚。代表团招待会,中国式的午餐。郭沫若、索洛维约夫以及蒙古、印度、印尼、马来亚、越南、东德、缅甸等国的代表分别致辞。在北京散步。华丽的马戏表演。

9月30日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清晨北京的街道。早点后我们驱车前去拜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玛

① 参见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А. И. Опарина на секц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ОКС 29 октября 1951г.,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науч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Китая (АРАН, ф. 1719, оп. 1, д. 437)。——原注

② 这是指尤努索夫·萨比尔·尤努索维奇(1909—1995),有机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52)、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9)。出版了多部中亚生物碱化学方面的著作。——原注

里宁娜^①耳朵发炎。白天我要准备演讲的讲稿，因此也未跟他们一同去见大使。

晚上毛泽东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穿过镶金铁红色宫门，再通过一道机巧的小门，便看到了一条雕梁画栋的中国建筑风格的长廊。我们被引进一个包厢，印度、朝鲜、缅甸、蒙古、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团成员已在那里了。大厅（总共可容纳2 000多人）的中央是人民——工人和农民（其中很多都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居民——很具中国特色的老大爷，毛泽东的战友）。在人民代表的前面是政府席。外国使节和代表团（包括我们在内）均围绕整体大厅依次站立，高呼毛万岁。那种感受永远也难以忘却。在包厢里我与一些朝鲜朋友见了面。另外，经尤金介绍，我还结识了一些中国学者（哲学家和史学家）。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庆典。我们前去观看在前皇宫前的广场上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来的宫门（装饰得富丽堂皇）如今成了政府要员的观礼台，场面雄伟壮观。我们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均站在右面的看台上。印度、缅甸等国的代表均穿着红色的礼服。

盛大的阅兵式，就像我们在红场上所做的那样，整齐地通过广场。其中有很多重型武器：坦克、火炮，甚至“卡秋莎”。天空有飞机掠过，其中有喷气式。阅兵式之后是游行：首先是被人高举着的领袖肖像，他们很缓慢地通过广场，随后是中学生队伍（他们穿着非常鲜艳，手中高举着绿枝和黄色的花，象征他们就像花儿一样，正在绿色的大地上盛开；覆盖有开着花的树枝的坦克，在蓝色的海波上行进的巡洋舰，等等）。再后面便是铁路工人和其他工厂的工人队伍。场面宏大步调却相当一致。他们手中举着红旗，而队列都是蓝色的。我走下看台，与朝鲜代表团的朋友们交谈。他们的关怀令我感动。游行队伍的最后是大学生和艺术工作者。他们的穿着相当鲜艳夺目。锣鼓震天。最终，民众排着密集的队列面向观礼台，人们都想往前一些，整个广场人头攒动。

游行过后，我们四人（索洛维约夫、雅科夫列夫、特洛菲缅科和我）一起去尤金那里。那里有一个小花园，房间的布置也很别致。晚上我们到使馆看了电影，然后又返回尤金处，站在房顶看燃放礼花的壮观景象。我们与尤金和随行的中国人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

与昨天一样，今天仍是个艳阳天。游行队伍仍穿着同样的服装，没戴帽子。太阳烤着人们的额头。

10月2日

早晨郭沫若和苏中友好协会的代表来看我们。商定了我们在北京和中国的游览计划。

午餐后，我们驱车去参观“紫禁城”（以前的皇帝宫殿）。我们看到了皇帝的私人花园和皇后的寝宫。一开始先到了皇帝的休息室，我们在这里喝了茶。这里立着一把宝座和一个上写

① ИЛ. А. 玛里宁娜，集体农庄主席、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原注

150个相同意思的预祝皇帝万寿无疆的字的屏风,还陈列着一些有意思的钟表。然后,我们顺着过道来到皇后的寝宫。这里有一口井,它是皇妃被淹死的地方。这里摆放着许多名画、玉制品、古代的青铜器、钟表(能像夜莺那样鸣叫),等等。还有一个宫殿是皇帝吃斋和贡献祭品的地方,名曰天坛。宫殿的顶都是陶制的,房屋的正面都由涂了漆的红木建造的,上面还镀了金。远远看去,山腰上有三个亭子的地方是那个自杀的皇帝的上吊之处。在园中参观时我们注意到,游人很多——都是普通百姓,因为今天是节日。场面很感人。我们还看到一个盛有中国金鱼的大缸——里面有金色、银色、杂色、透明、黑色等长着凸出眼睛的各种金鱼。

我们晚饭是在中国饭店吃的。

随后又欣赏了中国京剧。其表情和技艺均带有完整的程式化特色。我很喜欢,虽然有点费力。

10月3日

清晨,在中国保卫和平和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开了一个会。该委员会就位于前意大利使馆的大楼内。这里的花园很美。郭沫若作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报告。中国人民在与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的发言。随后发言的还有印度、朝鲜、印尼、缅甸和德国等代表。午饭后,我们去参观皇帝的园林“北海”,现在看来,它已变为民众从事文化活动和休息的场所了。这里有一个“永宁”殿,但没让我们看。因为那里现在住有西藏来的喇嘛。里面建有一座白色的西藏塔,从塔上看北京,景色很奇特。湖边有一座小房子。姑娘们在跳舞。还有一个五龙亭,是皇帝钓鱼的地方。我驾船游湖。

晚间,我与卡巴列夫斯基^①去城里转,看到了商贸集市。我们偶然地来到了民间戏院或音乐厅。这里非常有意思,不过,尽管遭到巴列夫斯基的反对,我还是决定离开。

10月4日

一大早,曾昭抡教授便来拜访我,要求我去他们清华大学。他本人是有机化学家。商谈之后我与所有团员一起去了颐和园,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公园里的建筑非常雄伟,共有几十个宫殿,亭子、塔、寺院。这里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历史事件。晚上观看了民族歌舞演唱会,演员表演得生动而欢快。

10月5日

清早,我们参观了铁路工人展览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缺点是,协会没有利用展览来开展自己的工作。

12点前我们驱车来到清华。这是市郊一所很大的大学,是用对“遭受损失的”美国人的

^① 卡巴列夫斯基·德米特里·波利索维奇(1904—1987),音乐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1953)、斯大林奖金(1946、1949、1951)和苏联国家奖金(1980)获得者。——原注

赔款建造的。这里就像一座城市，宿舍、体育场、教学楼等样样俱全。校长与我们见了面。我与尤努索夫一起参观了这里的化学和生物学实验室。实验设备并不太多（学校曾驻扎过日本兵，很多设施都被损坏了）。生物化学的教学都是根据我的教学大纲安排的。我结识了沈彤（Шен Тун）。我们在校长那里吃了午饭。之后与学校的教授们（其中还有来自其他大学的教授）见了个面。我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期间有人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晚上是苏中友好协会召集的会议和举办的音乐会，我待的时间很短。

10月6日

早上，我们参观了天坛。这是北京宏伟的建筑之一，或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一个建筑群。它的地理位置较高。皇帝每年都要来这里的主殿，向上天贡献祭品。还有一个规模较小，但装饰特别华丽的皇后的宫殿，这里安置着皇帝祖先的牌位。旁边是地坛，它也像天坛一样，位于一个近似圆形的广场上，只是中间是中空的。这里穹顶都建得很漂亮。建筑内的声学现象非常有趣。这个原是皇家公园的建筑，如今也成了大众文化和休息的场所。

午饭后，我们乘车去农业科学院。该坐落于市郊的科研机构共有如下一些系室：农艺、园林和苗圃、植物保护、农业化学和土壤、育种、动物养殖、兽医。翻译和知识传播——两个委员会，还有一个制作标本和模型的小工厂。

了解了一下知识传播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其主要是引进科研成果，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学院只能指望农业部实验站的成果。农民的实践经验很有限。了解了从块茎菌中制取的药剂（用于花生的生产）的情况。一个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展示的草本植物的标本引起了我的兴趣。学院自己也搞生产，主要是第666号杀虫剂（俗称六六粉）。

晚上观看了浙江省的传统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该戏不论是编剧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很优秀，催人泪下。

10月7日

一个早晨都由于一场不必要的谈话给浪费掉了。午餐后去科技知识传播协会开了一个会，结识了许多科技工作者。他们都是科技知识界的上层人物。作了一个关于我们协会工作的报告。匈牙利科学院院长也发了言。

晚间是政府招待会。会谈很有意思。印度、印尼和越南的代表都发了言。

10月8日

清晨，到科学院附属的各学院去了一趟。生物学院虽然不大，但有很多标本。以中国的植物为主，高、低级植物俱全。该校从科马罗夫学院^①得到了很多树叶标本。研究工作仅仅

^① 指苏联科学院 B. Л. 科马罗夫植物学院。1931 年始建于列宁格勒。其历史可追溯到 1914 年建立的阿博列卡尔斯基养殖园。——原注

根据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理论进行。学院附属的植物园不大。昆虫学院以防治蝗虫为主。其极力想与苏联学者建立联系。

晚上在政治知识传播协会作了演讲。该协会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审判长。期间人们提出的很多问题都非常有意思。

当晚我们乘火车前往上海。火车包厢真棒。陪同我们的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

10月9日

一整天都在中国的大地上奔驰。田野、各地不同的景观从眼前掠过。深夜,轮船将我们与火车一起都摆渡到了长江对岸。

10月10日

到达上海时已是清晨。欢迎仪式非常热烈。孩子们手里都捧着鲜花。为我们安排的旅馆也很舒适。我与尤努索夫住在一起。午饭后我们去城市玩。这里的街道、服装都很有特点。街上人很多。看到了黄浦江,中国式帆船,人们住在舢板上。银行所在的建筑都很高大。还看到了汽轮。我们登上一座12层的高楼去观看上海的景色——的确很美。晚上参加了一个约有25 000人的集会。随后便是用中国民间乐器——琵琶、二胡等演奏的音乐会。

10月11日

早上,参观了工人文化宫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随后我们又去了郊外由孙中山遗孀主办的人民福利协会附属的幼儿园。该园设施很好,孩子们都很乖巧可爱。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土地改革展览。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地主的习俗和爱好。展览反映了新婚姻法公布后中国农村的情况。

午餐后我们又乘车去一个村庄参观。我们先是乘自己的汽车,之后又改乘当地派来的吉普车。鉴于我们的到来,当地政府专门召集农民开了一个会。我们参观了农舍,了解了这里棉花种植的情况。离开时月亮都已经出来了。

晚上举办了酒宴。

10月12日

从早上开始,我便与尤努索夫一起参观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实验室。这里有由生物学科科研机构组建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学院、植物和水生生物学学院,还有一系列化学和物理学院校。这里的实验室都组织得很不错。实验仪器和参考书籍均以美国的为主。从事神经传导和一般性神经肌肉活动领域的科学研究。生物化学方面的科研涉及酶——植酸酶、植物磷酸酶和瓜氨酸抗生素,等等。在植物生理学领域——涉及春化处理、光照和微量元素等。这里的学者对苏联的科研成果很熟悉。这里的水生生物研究工作,主要针对湖泊中的

生物,只涉及纤毛虫。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强调了中苏学者建立直接联系的必要性。

午饭后在分院一个大教室里,我作了题为《关于生命起源》的演讲。与会者有400多人,主要是大学生和科研工作者。他们听得非常认真,并作了笔记。翻译是上海的一位医生,译得非常棒。他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对俄罗斯语言吃得很透。

晚间演的是京剧。与我们在北京所看到的那场戏很相似,只是服装方面有些区别。

10月13日

驱车前往复旦大学的茶叶系。该校位于市郊,占地面积很大,学生共8000人,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茶叶系或组拥有良好的实验设施。人们领我参观了机械系、工艺实验室、农艺系和实验田。观看了各种品种的茶叶制造工艺:两叶和三叶茶的制作技术,茶叶增香工艺和茶叶的穴窝种植法等。

坐汽船横渡黄浦江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来到杭州。这里号称大米和丝绸的故乡。当晚我们在杭州过夜。外面下起了小雨,但我们在舒适的客房里睡得很香。

10月14日

清晨天气很好。我们环湖旅行。游览了佛寺和皇帝的陵墓。然后又沿着堤坝散步,在湖中荡舟。在各个小岛上我们都稍作停留。在到处都是小山的公园里游玩。这里真像天堂一样。晚上又举行了宴会和舞会。

10月15日

早间,我们驱车返回上海。到上海时已是华灯初上。在南京,我们受到了欢迎,并驱车去参观中山陵。月光下这里优美的风景令人难以忘怀。建筑宏伟壮观。实际上,整个山都成为了一座纪念碑。我们在墓前奉献了花圈。晚上宴请过后,我们被送上了轮船。当晚我们将渡过长江,然后再坐火车。

10月16日

经过一整天的奔波,我们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10月17日

到北京后,与翻译交谈。晚上与杨共同晚餐。

10月18日

早上在中国科学院作了题为《生命起源》的报告。我受到了副院长的接见。报告后是午餐。我与邻座的学者们都相互认识了。谈了关于组建科学院的问题。午餐后我又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招待会。

10月19日

为纪念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去世15周年而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10月20日

我们返回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途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有关部门)在和平院为我们代表团的顺利归来举行了宴会。

10月21日

从伊尔库茨克飞往鄂姆斯克。当地也举办了宴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日本等代表团都发了言。

10月22日

飞回莫斯科。

АРАН, ф. 1719, оп. 1, д. 433

№24839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访华代表团报告： 中国的企业和工人状况

(1951年10月^①)

.....^②

工资和关于工人物质状况的一些数据。

中国的工资状况仍然非常严重。在谈到工资分发状况的时候,或许,应该把中国分为两个地区。东北的状况明显要好一些,而中国其他地区的工资状况,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处于“混乱状况”。

在东北,大部分企业实行八级工资支付制度。早在1951年初,对25%的工人实行的是按件支付,而在1951年,按件支付工资的工人的数量应该会达到50%。1951年,中国东北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②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在中国东北的国营企业实行按件支付工资的临时条例,该条例的主要方针是,应该推广按件支付工资的制度,在这一问题上还考虑到了怎样分发工资(生产定额和时间、类别、估价)。该条例还确定了对生产的质量一般的产品和不合格的产品的支付,规定了对工资额进行再考核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该条例将会使东北的企业更好地支付工资,并在最近对大部分工人都实行计件给资制度。

中国其他地区工资支付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企业实行的仍然是在国民党时期实行的、过时的、对各阶层人员进行工资支付的临时政策。在这些地区大量实行的是,无论是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还是在行业内部都实行统一的工资支付制度。

在各单独的工业领域,工人工资的数量差别很大,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的工资要低于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的工资。比如,根据中国全国工联的数据材料,1951年初的平均工资水平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 军事工业 100%
- 火柴工业 111%
- 烟草工业 115%
- 缝纫工业 128%
- 磨面工业 131%
- 煤炭工业 133.5%
- 金属工业 134%
- 铁路 146%
- 机器制造 165%
- 重化工工业 179%
- 纺织工业 181%
- 电站 187%
- 邮电 204%
- 电报 219%

以下是中国 17 个行业工人平均工资的表格,数据来源于全国总工会在 1951 年 5 月从各企业收集到的数据。

序 号	领域名称	平均工资 (工资分)	平均工资 (元)	与印刷业相 比的百分比
1	印刷业	285	570 000	100
2	皮革	243.5	487 000	85.4
3	电力	241	482 000	84.5
4	纺织业	223.8	447 600	78.5
5	机械制造	209.6	419 200	73.5

续 表

序 号	领域名称	平均工资 (工资分)	平均工资 (元)	与印刷业相 比的百分比
6	磨面工业	203	406 000	71.2
7	化工	202.4	404 800	71.0
8	橡胶工业	188.1	376 200	66.0
9	缝纫工业	172	344 000	60.3
10	黑色金属	171.7	343 400	60.2
11	煤炭	164	323 000	57.5
12	机器修理作坊	162	328 000	57.0
13	造纸	156	324 000	54.7
14	有色金属	154.7	309 400	54.2
15	烟草工业	140	280 000	49.1
16	火柴工业	126	252 000	44.2
17	鞋业	67	134 000	23.5

这一表格显示,在皮革、纺织、面粉、印刷这些工业领域的工作要比诸如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橡胶和化工业领域的工资明显要高。

在行业内部也是这种情况。在同一个工业领域,通常小企业的工资要比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企业的工资要高。比如,在上海的“亚洲”金属加工厂,其中共计 530 名工人,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月 231 工资分,而拥有 3 253 名工人的“石岭山”(Шилиншан)金属加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则为 164 工资分。

在江西省的天河(Таньхе)煤矿,拥有 303 名工人,工人的工资为:平均工资 210 工资分,而最高工资为 329 工资分。而在湖南省的广益(Гуан-инь)煤矿,拥有工人1 770 人,工人的工资为:平均工资 121 工资分,最高工资为 167 工资分。湖南省煤矿工人的工资为每月 121—187 工资分,最高工资为每月 167—364 工资分。

在企业内部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

在许多部门,存在工资不同的现象。比如,住房补贴、饮食补贴。在一些情况下住宿是免费的,而如果该企业的工人不是住在宿舍的话,那么他会得到补助金。而一些地方发放粮食补贴、育儿补贴等。这些补助金的发放通常不是按劳发放,而是按照其他的因素:家庭生活、工龄等因素发放,现在也是这样。在国民党时期,工资的发放经常要同工龄联系起来。

由于上述原因,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普通的职工得到的工资要高于技术工人——部门主任甚至是管理部门的领导得到的工资。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的工人甚

至是女清洁工的工资都要高于专业工人的工资。

在单个的工业领域没有统一的关于同一职业的工资标准。比如，在铁路部门，汉口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 397，郑州的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 213，而在太原的机车司机得到的工资是 205，而且工资上的这种差距不是根据该地生活条件的差别确定的，而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很早就形成的。

在单个的工业企业，工人的工资从 20 个档次到 200 个档次，有时档次更多，而且各档之间工资的差距不是很明显。这就阻碍了工人专业技能的提高。比如，在山东省某市的一个铝厂，1951 年以前在工人和职员中实行 21 个档次的工资，但是第 21 档和第 1 档的工资的差距仅有 1.8 倍。

该厂的工人说：“第 11 档和第 12 档工资的差距为 2 个面包，就是回家种白菜也比在这个企业工作要好一些。”

在调整工资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是：没有解决这些共同的问题的统一的法律规则，比如，关于婚假、停工期间的工资的支付和加班费等。

由于这些问题，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在一般的情况下，加班费都不支付。在一些企业里，在停工的时候完全不支付工资，而一些企业则正如在工作时间一样全额支付工资。

1. 实际工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非常低。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够维持 2—3 个人的生活需要。

1950 年，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对生活在北京的 35 个工人和职员的家庭的预算进行了调查，他们以这一调查为基础确定了每人每月食品和工业品的平均需求。

如下一些数据资料表现了接受调查家庭的家庭人数和养活家庭的工资的规模。

性 别	社会状况	共 计	工 人	职 员
总 计		35	20	15
百分比		100	57	43
男 性		26	13	13
女 性		4	2	2

接受调查家庭的成员（按家庭人数），每个家庭的人数平均为 5 人。但是，得到的食品和商品是按照 4 个所谓假定年龄的人的需要进行计算的（各年龄段的孩子的食品的需求另有确定的量），这种计算方法本身，也就是按年龄计算的方法，我们没能掌握。

应该指出，即使工会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为 4—5 人。但是我们没能取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材料。

2. 以下表格显示了接受调查家庭的工资分配。

工资的多少		家庭人数	占总数百分比
小米(斤)	纸币(元)		
从 101 到 200	121 200—240 000	1	2.86
从 201 到 300	241 200—360 000	1	2.86
从 301 到 400	361 000—480 000	12	34.28
从 401 到 500	481 000—600 000	5	14.28
从 501 到 600	601 200—720 000	8	22.86
从 601 到 700	721 200—840 000	4	11.43
从 701 到 800	841 200—960 000	1	2.86
从 801 到 900	961 200—1 080 000	1	2.86
从 901 到 1 000	1 081 200—1 200 000	—	—
1 000 以上	1 200 000 以上	2	5.71
总 计		35	100

用小米的重量来计算用货币,也就是用元来支付的工资。工资用小米的斤数来确定,而根据小米的价值用元来计算每月支付的工资。

在上述列举的表格中,每斤小米的总价值为 1 200 元。这一价值现在是稳定的。我们在中国期间,小米的价值几乎都保持这一水平。

以下列举的数据是假定年龄的一个成人每月的粮食和商品标准。这组数据是通过对 35 个家庭的成人的预算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

食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 量	价格(元)	价值(元)
1. 粮食				
大米	斤	4	2 100	8 400
面粉	斤	11	1 700	18 700
小米	斤	13	1 250	16 250
玉米面	斤	16	1 050	16 800
挂面	斤	0.5	3 000	1 500
豆面	斤	2	1 000	2 000
土豆	斤	5	800	4 000
洋白菜	斤	10	1 000	10 000
食用甜菜	斤	2	1 000	2 000
绿豆	斤	1	1 600	1 600
绿豆芽	斤	2	500	1 000
葱	斤	1	600	600
猪肉	斤	1	5 400	5 400
牛肉	斤	0.5	4 400	2 200
大麻油	斤	1	8 000	8 000
大豆油	斤	1.5	1 600	2 400
食盐	斤	0.7	1 000	700

续 表

食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 量	价格(元)	价值(元)
西红柿	斤	0.4	2 800	1 120
食糖	斤	0.15	9 000	1 350
茶叶	斤	0.17	38 000	6 460
总计				110 480
2. 布匹				
白棉布	尺	2	3 000	6 000
蓝棉布	尺	2	4 000	8 000
帆布鞋	双双	0.5	33 000	16 500
棉袜	双双	0.5	4 000	2 000
总计				32 500
3. 其余商品				
毛巾	条	0.3	4 500	13 500 ^①
肥皂	块	2	2 500	5 000
香烟	包	3	2 000	6 000
火柴	盒	2	200	400
总计				12 750
4. 取暖、水电				
煤块	斤	90	110	9 900
木材	斤	9	330	29 700 ^②
电	千瓦/时	2	—	—
水	桶	12	—	—
总计				12 870 ^③
5. 其余开支				
理发	每次	2	5 000	10 000
洗澡	每次	2	—	—
6. 住房	套	1 个家庭		50 000

这样,在北京,按 1951 年 8 月 30 日的价格计算,仅食品和工业品方面每人每月至少就需要花费 156 730 元。如果考虑到的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那么这些开支为 626 920 元,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公共开支(住房、燃料、照明),而这些开支甚至是相当多的。

根据工会提供的材料和数据,17 个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在 250 000 元到 570 000 元之间。关于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一个家庭通常只有一人工作。

这些数据说明,大部分工人无力购买上述必需的食品。

在访问一些企业的时候,同个别工人进行的谈话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

比如,在同北京的一个汽车修理厂的钳工王喜章(Ван Сичжан)同志进行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他每月的工资为 40 万元。每月他的家庭大致需要如下食品:

小米 40 俄磅 40 000 元

玉米面 35 俄磅 35 000 元

①②③ 原文如此,数据有误。——编注

高粱 15 俄磅 10 000 元

玉米 30 俄磅 20 000 元

各种蔬菜 180 000 元

总计 285 000 元

他每月支付的房租为 60 000 元

根据他的计算,他家购买衣服和食品大概需要 90 000 元。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是怎样弥补预算中的不足的?王喜章同志回答说,靠他的妻子打一些零工。王喜章同志的家庭有 5 个人:他、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在与“凌道”(Линдао)染料厂的杨奎龙(Янь Куйлун)同志进行谈话的时候他说,他在该工厂工作 10 年了。每月挣 50 万元。他家有四口人: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每月养家糊口的费用为 30 万—35 万元。他家的主要食品是:大米、高粱、面粉、蔬菜、豆面。只有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才购买一些肉食和动物油。杨奎龙同志有自己的住房。

在北京近郊门头沟这个小地方的一个煤矿中,在同一名矿工家庭进行的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一家有九口人,只有一人工作,他每月挣 35 万元。据他的家人说,他们每天早餐需要花费 2 500 元,午餐需要花费 3 500—4 000 元,晚餐需要花费大约 3 000 元。他们的食物主要是大米稀饭。矿工的妻子为矿工准备的稀饭要稍微稠一些。衣服和鞋子一点也不购买,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甚至光着身子。

在该煤矿每人每天在食堂的饮食的花费是:早餐 750 元、午餐 2 000 元、晚餐 1 500 元。食物是米饭和一盘蔬菜。

在北京近郊的石景山电厂的食堂大概也是这样的花费:早餐 750—800 元,其中大米粥 200 元,鸡蛋 400 元,热饼 150—200 元。午餐要花 1 800 元,晚餐花 1 400 元。

在对天津市第四纺织厂的食堂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得知,那里的食堂是合作化的食堂,工人可以得到午餐,午餐是米饭和配菜。这顿午餐提供 14 天,价值 16 000 元。

该工厂的宿舍也有食堂,工人每月得到价值为 90 000 元的一日三餐,其中早餐和晚餐是蔬菜汤或者是米饭肉汤,不加糖的一杯茶以及两个小饼。午餐除了这份东西之外加一份稠大米粥和配菜。肉每 10 天吃一次,每次 100 克。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论的只是关于每个家庭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品和一些商品。为此还必须加上住房、燃料以及其他的一些公共开支。这些开支高达每月 10 万元,有时甚至更多,因为,北京每套(间)住房每月就需要 5 万—10 万元。

北京的医疗费用特别高。比如,在医院治疗一天一夜需要花费 1.2 万元到 5.4 万元。在北京的医院一天一夜的住院费是 8 万元。手术费另算,而且每项手术费平均为 60 万元。胃或肠透视需要 40 万元,X 光拍片需要 1 万—1.8 万元,腹腔拍片需要 8 万—14 万元,一颗牙 1.5 万—2.5 万元。

中国的工人和职员每年需要为子女上学支付 1 万—6 万元。

通过对得到的一些报告材料进行分析,以及对北京、天津、青岛市的一些企业进行访问,

我们确信，中国的工人现在过得非常贫穷。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水平的饮食上的需要。他们的衣着非常朴素。绝大部分外套都是用棉布制成的，鞋是用绳子纳的鞋底为材料做成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并非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衣服穿，特别是孩子们。

如下情况特别具有说明性。我们参加了北京的五一游行。游行的队伍非常庞大，人非常多，人们也都很兴奋。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参与游行的人的衣着反映了他们都非常贫穷。大部分工人都是仍然穿着工作服走在游行的队伍中。这也说明，大部分中国工人没有能力购买节日的服装。

调整工资方面的工作。两年内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致力于提高劳动人民的工资。制定了关于调整工资条例的总方案，其基础就是实行的八级工资制。这一草案也规定了用统一的单位工资分来计算工资，并确定了单独的工业领域工资的多少，而且对于一些主要的工业领域来说，工资水平确定得比较高。

工资分是计算工资的单位，它由 5 种食品和物品来计算：

米（小米或大米） 0.8 斤

白色材料（布） 0.20 尺

植物油 0.05 斤

盐 0.02 斤

煤 2 斤

用这 5 种计量单位举出了 26 种食品的平均需求。

使用工资分这一计量单位的必要性在于，中国各地区食品的价格是不统一的，也是不稳定的。因此，通常的解决方法是，用工资分计量的食品的价格来计算工资，而用钱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以此希望来解决工资的统一，并在现实中使其稳定。

在该方案中，工业领域按支付工资的多少被分为 8 个等级，而且规定最高的工资是在那些最为重要的部门。比如，煤炭工业和采矿工业、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行业被列为第一等级，石油和电力工业被列入第二等级，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被列入第三等级，等等。

由于该方案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同时由于在全中国推行该方案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目前，中国政府是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的，因此该方案没能推行，而只是在财政条件许可的一些企业作为对工资进行审议的一种辅助手段。并且规定，在审议工资的时候，工资的增幅不能高于 10%—15%，在审议工资的时候，需要削减工资的工人的数量不应超过 10%。

这样，根据该方案，工资的调整要由企业开始推行，但是，正如上述所述，需要经上级财政委员会的批准。

现在已经有许多企业开始审议工资。根据非常不充分的数据，这些企业的工人的数量将近 37.9 万人。应当指出，在推行八级工资制的地方，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比如，青岛市水压站工人们说：“以前，专业工人和非专业的工人得到的工资一样多。专业技能什么也不值。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来说，实行八级工资制是正确的。有了努力的目标，也有了希望。”

在推行八级工资制的各企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现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

们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比如,在山西省的一个工厂里,在审议工资之后,一名钳工在 10 天内完成了工作计划的 300%。工人对加强社会教育和技术水平的兴趣也提高了。比如,在山西省的一个工厂里,工人参加社会教育培训班(不脱产)的出勤率明显提高了,在审议工资之后,所有的工人都开始积极地参加这一培训班。此外,他们还请求为他们安排一些技术课程,购买一些技术资料,请求技术工人解释机械的结构等问题。

在山西省的另一个工厂,去年每本书(初中使用)卖 100 元。许多工人不愿买这些书。而现在,当按每本 2 万元出售《机床绘制》一书的时候,300 名工人马上就表现出了购买该书的意愿。他们担心,随后这些书就没有了。这说明,随着八级工资制的推行,工资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工人们开始明白专业技能的意义。他们知道,专业技能越高,工资就越高,因此就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正如中国同志自己所承认的,这是工资调整方案中规定的八级工资制的优点之一。

在那些正在对工资进行审议的企业,工资通常都在提高。比如,在山东省某市的一个铝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 17.58%,技术工人的工资提高了 27.63%,职员的水工资提高了 21.71%,平均工资提高了 19.19%,而在被批准的时候增加了 20%。

在所有的工人中,85.09%的工人的工资都得到了增加,7.5%的工人的工资保持不变,7.33%的工人的工资降低了。

在山西省晋华(Динхва)纺织厂,工人工资增加了 15%,在广东省的糖厂和卷烟厂,工人工资增加了 15%—20%。在审议工资的时候,各个企业总工资提高了 5%到 30%。

中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送给中共中央党组关于中国的工资调整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在一些地区进行的工资调整的结果是,使我们更加坚信了改革工资体系的信心。我们相信,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对旧的工资制度的逐步改革,工资正在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为重要的杠杆。”

应当指出,以个别企业审议工资的经验为基础,一些部门制定了整个工业领域调整工资的方案。目前制定了铁路工人工资的调整方案,该方案已经得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批准。总的来说,铁路工人的工资将提高 20%。还制定了调整纺织工业工人工资的方案。该方案已经开始在青岛的纺织工厂实施,以便进行试验。根据这些工厂工会工人的通报,方案得到了赞许,并且,从 10 月 1 日开始,将在其他的国营纺织企业实施。

现在,交通运输部正在制订关于调整远洋运输工人和江河运输工人的工资方案。该方案的基础考虑到了苏联海员和江河运输工人的工资的制定原则。打算把工资的多少同工人所在的船队的种类以及船舶的功率或者载重量相挂钩。

其他部门也在调整工资方面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在中国,在审议(调整)工资的时候,所有的工作都以三个原则为基础,这三项原则得到了 1950 年全中国调整工资筹备委员会与会者的赞同。

这三项原则如下: 1. 尽可能使劳动工资制更加平等,为全中国建立统一的公平的劳动工资奠定初步的基础。2. 必须考虑到现实条件。要使工资的调整得到大多数工人和职员的支持,因为这是取得成功的保证。3. 要考虑到国家的财经条件。不能使工资的调整成为

国家的沉重负担。

为了实现这三项原则,制定了一份总方案,该方案为工资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并且规定,第一,不允许降低10%以上的工人的工资,第二,允许总工资的增幅平均不高于10%—15%。

.....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工资问题上提供的帮助。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小组采取如下方式在工资方面对中国同志提供了帮助:通过会谈、提供咨询、授课、参与一些文件的制定工作、参与对工会干部和业务干部进行培养的特别培训班的工作、在访问中国期间就工资问题进行的各类会谈和参加的会议达14次,涉及的人数为240人。参加这些会谈和会议的既有全国工会联合会和工会部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有业务干部(主要是部局级干部)……在就工资问题开办的培训班上,我们的工作小组上了共计80小时的课程,参与的课堂讨论共计27小时……应当指出的是学员们听课都很认真……学员们的另一些特点是坚持不懈,非常乐意而详细地弄明白所听的内容。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对上课之后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在讲授“苏联劳动支付的形式和体系”的课堂上,一些学习小组提出了如下不同的看法:计时工资和计时奖励工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支付的原则。由于在学习小组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国同志们请求我们详细解释这些问题,并且在苏联工会经验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在讨论课上我们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剖析。还有许多问题都反映出学员们在努力对讲授的材料进行研究。

.....

ГАРФ, ф. Р-5 451, оп. 72, д. 879, л. 37-58

№20162

别洛夫的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作战情况

(1951年10月^①)

.....^②

二、本军战斗任务及完成任务的条件和战机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②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根据军事部长的指示,本军的作战任务:为安东—朔州地区的桥梁、渡口、火车站和机场以及北朝鲜境内的朝中军队后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保护,使其免遭敌人空中打击。

与此同时,该军还应在中国空军的配合下随时准备对敌人空军可能发动的对沈阳方向中国东北的主要行政和工业中心的空袭实施反击。

上述战斗任务的完成是由一定的特殊条件决定的,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本军才可能采取行动。这些特殊条件具体包括:

——本军的作战活动范围只能在于平壤、元山一线和海岸线之内,这一局限就使我们的飞机充分利用战机完成上述战斗任务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如果不把敌人对中国境内设施的空袭的反击计算在内的话,我们还必须在面对优势敌人和得不到任何中朝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仅以本军的力量孤身投入战斗。虽然目前已有一些中国空军师投入了战斗,但其对本军部队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作战区域的机场网络配置是我军的最大局限,它完全限制了我军作战的机动能力。这在我方战机前往前线区域作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便于我军完成上述任务的因素在于,由于朝鲜战场复杂的政治形势,我空军的基地均位于敌人空军的活动范围之外。

上述这些特殊条件决定了我军在作战时必须集中兵力来对付敌人的主要机群。因为如果分散兵力来应付所有在作战区域出现的敌机就可能出现无法完成作战任务的局面。

本军由三个歼击航空师以及一个航空兵团独立情报部队和两个高射炮兵营组成,其目前的部署情况如下:

——为安东地区的设施提供空中掩护,以梯队方式或集约方式攻击敌空军,必要时将动用本军所有力量参战;

防止敌人主要机群对安州一线以北地区的交通线和后方设施发动空袭,为此我们将动用第一梯队的两个歼击航空师,其余第一梯队各师的2—3个中队和第二梯队所有师将作为本军预备队保卫安东地区的机场和设施;

——防止敌人个别批次飞机对后方设施和安州、平壤地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为此将动用第一梯队各师的3个,或(特殊情况下)4个团。其他——第一梯队各师的剩余部队和整个第二梯队各师将作为本军预备队安东—安州地区的机场基地和设施提供空中保护,严防敌人可能发动的袭击。如果要为安州—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可靠和彻底的保护,本军力量有限。

在第二梯队各师(如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出现保养维修情形,本军的作战能力将有所缩减。

三、本军各部队的作战方式和把握战机的主要原则

事实表明,本军将要与力量占优势的敌方空军作战,在得不到中国和朝鲜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单打独斗式的战斗。这就迫切要求它只能集中力量去对付主要敌人,即敌人的轰炸机群,而不能分散使用自己的力量。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军的打击目标不应是每个,甚至小型的敌机编队,而应是定

期地集约式地将我们的歼击机组成一个大规模的集群,且只攻击敌空军的主力,其中首先便是其轰炸机和强击机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攻击只能是定期实施的,因为如果经常性地每天都组织这么大的力量,我军没有那样的实力。

此种打击应安排在敌人空军活动相对频繁的时期,且我机群应当具有一定规模,至少以团为单位。除自由“搏击”式的出动之外,小规模机群的出击只会导致我们力量的分散和白白浪费我歼击机的实力。

总之,我军的任务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以集约式、定期的、事先充分准备好的大规模歼击机集群去打击敌空军的主要机群。

我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

- 根据机场值班情况出动大规模机群对敌机实施拦截;
- 用小机群(分队、中队)与敌自由“搏击”;
- 个别情况下以巡逻方式保卫地面设施。

四、组织管理

歼击机、高射炮和探照灯均由军指挥部统一管理。

根据具体情况,飞机的导航由军指挥部、航空师指挥部和歼击航空军空中指挥所负责。高炮部队的火力和高射探照灯的管理由高炮航空师和探照灯团指挥部负责。

本军指挥部将部署在安东机场地区。各航空师指挥部——自己飞机所在机场区域,各高炮航空师指挥部:第九十二高炮航空师——安东,第八十七高炮航空师——博川,第十探照灯团——安东。

歼击航空兵师的空中指挥所组建地区:一号在富秋里地区,二号在博川地区。

预警系统可以发现 250—270 公里处位于中等高度的敌机。

关于空中目标资料向歼击航空军对空情报总站的传达可通过以下方式:用无线电台,用机场无线电技术设备——热线直拨电话和 A-76 型超短波无线电台,利用中国雷达站的电话和广播。

向本军各部队通报敌情可经歼击航空军对空情报总站用广播报告。

为了给我方飞机导航,指明敌机位置,除雷达站外,还可使用分布在车岭关、朔州和宁郁地区的可视无线电导航台。

五、本军作战成果简述

自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1951 年 9 月 15 日期间我军战斗结果如下表所示:

作战活动类型	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师	第五十歼击航空师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	歼击航空军
战斗持续时间(天)	30	68	82	166	131	320
出动战机数量	151	1 196	993	2 731	3 757	8 828
击落敌机数量	16	61	39	82	102	300

续 表

作战活动类型	第二十八歼 击航空师	第五十歼击 航空师	第一五一歼 击航空师	第三二四歼 击航空师	第三〇三歼 击航空师	歼击航空军
我方损失情况						
飞行员	2	5	5	6	7	25
飞机	2	7	6	17	15	47

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6月间,本军只有少量飞机投入战斗。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朝边境地区没有机场,另一方面,本军部分部队要承担中朝飞行员的改装训练任务。

自1951年6月起,当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这使我们有可能在安东机场同时集中两个师的兵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缩减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

尽管我军的空战条件相当复杂而不利,尤其是敌机数量上总是占据优势,但我军各部队还是担负了大量的战斗任务,并取得了不错的作战成绩,使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其关键在于我们的飞行员均训练有素,我们的米格-15战机性能优秀,全军指战员忘我的作风及其思想上对所肩负责任的正确认识。我们的飞行员在多数空战中均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充分发挥了我们飞机的特点,因此即使在敌人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赢得了这些战斗的胜利。

各部队指挥员及其参谋部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战斗经验,学会了如何能够更正确地对作战工作实施组织和领导。因而近一段时间来本军的作战行动变得更为坚定,军指挥机关,各师、团所制订的作战计划也愈加严谨周密。

由于本军各部队基本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为安东—宣川地区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的任务,一段时期敌空军没有对这些设施造成重大的损失。

本军并不完整地完自己所承担的为安州—平壤地区的设施提供掩护的任务,直到最近敌空军经常对这些设施实施轰炸机和强击机空袭,从而对中朝部队的后方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本军没有能够完成对上述地区的设施提供保护的主要原因在于:

- 本军力量有限,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只能以巡逻的方式来保卫这些目标。
- 我们歼击机所在的机场与这些目标距离太远。
- 我们对敌机的预警能力有限。我们飞机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据机场值班报告以起飞拦截敌机的方式来对上述目标实施保护的。
- 我们很难确定敌机群的真正目标(意图),且我们的歼击机起飞后必须在指定地区(三八线附近)拦截这些敌机,而敌人只要一飞过这个界线,便已到达了自己的主要作战区域。
- 我战机活动区域的局限导致我们只能以自由“搏击”的方式来对上述目标提供

保护。

除了前面所列举的积极成果外，我军各部队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重大不足，其中主要包括：

——我们一些指挥员及其参谋部并非每天都能够深入分析敌空军活动的战术，从而有针对性地为我们歼击机及时提出克服这一战术的新方法和新战术。这种状况导致我们歼击机的战术往往千篇一律、墨守成规，从而不能有效地制服敌人，降低了我军作战的整体效果。个别情况下我们的负责歼击机作战行动的指挥员及其指挥部，未充分详尽和正确地估计敌空军机群的力量和意图，从而导致对敌主力机群的动向判断失误，错误地命令我歼击机起飞和错误地引导其发起攻击，结果白白浪费我们的力量且未给予敌人明显的打击。

——过分地与敌人为轰炸机和强击机提供掩护任务的歼击机进行纠缠，使我们的歼击机主要攻击少量敌机，从而放弃了我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消灭敌轰炸机和强击机。

在很多情况下，在第一阶段只是一味地攻击敌发挥“掩护”作用的歼击机，而未预先与我机群领队研究和制订周密作战计划，从而必然导致最终没有明确的主要攻击目标，从而影响了我歼击机的作战效率。目前这方面不足已经被我们克服。

——在地面和空中对我大规模机群和为我几个机群同时导航方面经验不足，这导致我机群在起飞拦截敌机时只有一部分机群遇到敌机并与之发生战斗，而我其他机群虽然当时也在这一区域，却没能遇到敌机，从而无法对我实施攻击的机群提供帮助。

——我们情报部门的工作缺乏必要的精确性。来自空中指挥所和对空情报总站的关于发现敌机的情报数据经常明显带有大量的不确切之处，如未指明敌机的组成及其高度等。多数无线电报站的操作人员，尤其是在具有强大干扰的条件下工作训练不足。

——空战中我中队和团级（领导机群）指挥员对敌机群的力量和构成估计有误，多数情形下其与地面指挥部均会引导我歼击机与力量占优的敌机进行战斗，从而导致我军战斗的失利和不必要的损失。

——还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我歼击机群在未占据有利进攻位置的情况下便匆忙迎敌，这一般均会导致原本应当最有效的攻击的失败，进而打乱我机群的阵脚，使其分散成独立的双机，甚至有些飞机常常会彼此失去联系。从而为敌人创造了战机。我方飞机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而损失。

——允许个别飞行员在较远距离、仰角过大和未使用移动式自动瞄准仪的情况下便向敌机开火。这既导致了弹药的无谓浪费，也降低了我歼击机的攻击效率。

——很多情形下对敌人所发动的攻击并未彻底取得胜利，对敌人不是穷追不舍式地追击，从而导致战斗不彻底，即便在形势和力量对比于我有利之时仍不能轻松地赢得战斗的胜利。

——空中战斗的组织和管理还存在不足之处。各机群之间和机群内部的合作经常不到位，中队指挥员，尤其是团级指挥员经常找不到自己在战斗队形中的适当位置，从而导致以分队甚至双机为单位各自为战，个别情形下出现由普通飞行员领导的尴尬局面。

——在寻找和接近敌机过于谨慎,在战斗中经常显得疲弱,导致敌人对我发起突然攻击。

——在撤出战斗时步调不一致,一些飞行员(双机)在机群指挥员退出战斗之后,仍在空战区域与敌纠缠,从而受到敌人的夹击和追击。

——个别战绩优秀的飞行员居功自傲,不顾整个机群的战斗队形,擅自向敌人发起攻击,从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一些领导机群在接近敌人时速度过快,动作过于剧烈,导致整个机群乱了阵脚。

导航台的工作人员不能完全遵守无线电台的纪律,由于共用同一波段而影响了我战机的指挥和管理。

为了纠正上述不足和提高我歼击机的作战效率,我们将在各部队实施以下措施:

提高关于战斗飞行和空战的分析质量;

——制订主要的空战模式,以便各机组据此在地面及时进行模拟训练;

——召集各部队指挥员会议,专门分析作战行动中的不足,明确空战失利的原因;

——经常,尤其是在非飞行时间,与飞行员们系统地研究敌人空军的战术,总结军内各部队的战斗经验;

召集各团和各师(第三二四和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甚至全军会议,总结和研究战斗经验,以提高作战素质;

——下大力气改善预警和通报体系,使雷达站和空中指挥所的作战统计系统化,为部队管理部门装备必要的示意图板、通讯设备等。

自1951年6月10日至9月15日整个作战期间,高炮部队共击落敌机17架;自身损失:阵亡8人,伤27人。

整个作战期间高炮部队的不足之处在于:战斗统计零散。各指挥部的统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炮部队的射击效率。目前该部队正在进行补充性专业训练,以逐渐消除这些不足。

六、截至1951年9月15日本军作战部队和人员构成。

空军部队: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米格-15飞机52架。后备发动机48台,飞行员61人,其中:由于健康原因临时不能执行飞行任务者11人,1人正在接受战斗培训。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49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目前该师正向朝鲜歼击航空师移交自己的所有物资。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米格-15B飞机85架,其中:4架没有助力操纵系统,不能投入战斗。备用发动机48%。飞行员100人,其中21人由于健康原因临时不能执行战斗任务。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79个。该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米格-15B飞机52架。备用发动机49%。飞行员54人,其中22人因身体有病和过于劳累不能执行战斗任务。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机组共42个。该

师以团为单位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和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以航空兵大队为单位投入战斗。还有 20 个机组准备在夜间以双机为单位投入战斗，但此类夜间飞行有 5 个月的间歇期。

该师已连续作战五个半月，全体飞行员们都很疲劳。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拉-11 飞机 20 架，其中，4 架需要修理和更换发动机，备用发动机 35.8%。飞行员 30 人。该团有 30 个机组随时准备在白天中、高空一般气象条件下和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可在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应战的机组有 22 个，夜间以单机和双机方式投入战斗的机组 20 个。

全军共有米格-15 飞机 189 架，需要修理的飞机占 2%，平均剩余备用发动机 48%。零备件不齐整的飞机数量：米格-15——10 架，米格-15Б——17 架，拉-11——1 架。

全军各部队的人员出勤率为 93.6%，将领和军官的出勤率为 93.7%。

全军人员目前的素质状态完全可以确保顺利地完成任务。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

……整体而言，高炮和高炮探照灯部队的战斗准备，全体专家和指挥部备战水平和战斗统计情况均令人满意。物资、技术保障方面也没有不足之处。

……

八、物资、技术保障

第十八航空机械师包括第六独立汽车运输营、2 个航空兵团独立机场技术保障营和 1 个汽车营。上述部队人员齐整，战斗经验丰富，完全可以胜任本军部队的作战后勤保障工作。

现有航空技术装备的数量、武器、弹药和汽车运输等状况完全可以保证本军部队的教学和作战工作的连续性。

全军人员的住所都位于军营内，房屋为日本时期建造的营房，有平房，也有 2 层和 3 层楼房。多数房舍很脏，门窗、玻璃和地面需要整修，墙面需要粉刷。很多楼房没有自来水、下水道和照明设施。很多部队驻地没有教室和俱乐部。多数楼房快到冬天时御寒还没有准备就绪。

本军全体人员的饮食由中方接待部门组织供给。公共饮食服务设施也由中国同志提供。驻扎在朝鲜的警备部和空中指挥所全体人员的粮食供应由安东地区负责。

全军飞行员和飞行、技术人员的服装、鞋和床具均能得到保障。全军的过冬服装将于 9 月底供给；冬夏季作训服目前已运抵仓库。

九、航空工程部门

本军的工程、技术部队完全可以胜任所肩负的作战任务。

米格-15 飞机显示了高超的战斗性能，使用简便，工作故障率低。

在与装备有大口径机关炮的美国飞机进行空中对抗时，我们的米格-15 即使在遭到严重损坏和燃烧的情况下发动机仍能坚持工作，保证战斗的进行。

我个别飞机即使在中弹 30—50 发的情况下仍能顺利返回自己的机场。

……我们飞机上的弹射椅均能保持正常工作,已拯救了 18 名飞行员的生命。它在任何高度和飞机处于任何情况下(飞机进入螺旋、翻转和以 950 公里时速俯冲等状态)均能正常使用。

……我米格-15 飞机的飞行距离和持续性……相关参数:

——在没有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 130 公里,带副油箱作战半径 190 公里;

——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持续飞行时间 45 分钟,带副油箱持续飞行时间 1 小时;

——在没有副油箱的情况下平均每小时油耗 1 160 公斤,带副油箱平均每小时油耗 1 380 公斤。

米格-15 飞机准备再次作战起飞的平均时间:

——以中队为单位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 40 分钟,带副油箱和为机载火炮装弹的情况下 55 分钟;

——以团为单位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下 1 小时,带副油箱和为机载火炮装弹的情况下 1 小时 20 分钟;

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且以团为单位的起飞时间 2—4 分钟,处于二级战备状态的起飞时间 6—8 分钟,处于三级战备状态的起飞时间 12—14 分钟。

十、医疗、卫生保障

在部队组建之初并未想到全体飞行员会如此疲劳,因而在出发前没有对其进行身体状况检查。例如,于 1950 年 8 月抵达中国的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在全体人员出发前未作空勤人员健康检查,而且该部队自 1949 年 3 月起便没有人休过假。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出发前也存在同样情况,没有对其全体人员进行医疗检查。

在向飞行部队补充兵源时也未考虑这方面情况,在没有进行身体状况检查的情况下便将人员派遣到了中国,导致很多人在抵达目的地时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胜任飞行任务的医疗文件。

这对部队的作战行动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致使很多人提前退出了飞行员编制。

对飞行员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在于工作过于繁重。通过对飞行员的疾病状况分析表明,其生病的原因在于:战斗活动过于紧张和劳累,对中国的居住生活条件不适应等。

飞行员在执行高空战斗任务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氧气及相关呼吸设备,并要求飞机座舱内具有一定的物理、卫生条件,但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从而导致一些飞行员因此生病。

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的决定性因素有:神经、心理压力过大、劳累、慢性风湿病等。

神经、心理性疾病主要在战斗第一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经、心理方面的疾病症状已经消失或已表现得不太激烈,疲劳因素成为影响飞行员健康的主要原因。

作战任务的紧张沉重,长期在机场不间断地值勤,每昼夜平均 2—3 次执行战斗任务,休息和饮食保障没有规律——所有这一切经过一段时间无疑会导致飞行员的身体出现疲劳过度,身体抵抗力降低,慢性病加重。上述情况一般在投入战斗 3—4 月以后便显现症状,随后

病情不断加重，患病人数不断增加。

以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飞行员的健康为例：在经过5个半月的作战活动之后，多数人出现了疲劳过度 and 慢性病（肠胃道、心血管系统和耳、鼻、喉等疾病）加剧的现象。该师全部飞行员中，有16%的人需要立即去医院治疗，22%的人需要住院，40%的人出现了疲劳过度症状，只有22%的人身体表现健康。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在经过五个半月的作战活动之后，飞行员身体状况如下：健康的占58%，出现过度疲劳症状的占35%，需要住院治疗的占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经过3个月的作战活动之后，最合理的举措便是让飞行员休息一个月。

.....

十二、本军飞机出动的组织方式和贯彻情况

根据对朝鲜战场空中形势的评估，早在我军飞机实施此类作战起飞之前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歼击机的使用必须以军团为单位，并由军指挥部统一调动。

可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导致我们不能按照事先在9月初便已制定的战略方针来实施，具体原因如下：

——6月以前，由于在安东地区没有足够数量的机场，从而导致我们能直接参战的部队最多只有3个团，即仅仅一个师。只是到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同时在安东地区集结2个师的兵力。

——整个6月份和7月初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各部队没有参加战斗和实际训练，只有集团军其他各团、师参加了空战。这是根据特别计划而实施的，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担任掩护，最终，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截至7月15日前本军的作战方式：以2个师的兵力同时投入作战，另有3个师作为第二梯队为上述部队提供掩护。但从7月下半期开始至9月初气象条件急剧恶化，从而导致我们完全无法以军为单位出击作战。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利用个别好天气实施了一系列以一个师为单位的出击作战，以便为全军整体出击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利用天气不好的时间在第三〇三、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和全军召开了各团、师级飞行、战术会议，以总结战斗经验。这些会议为我军各部队战斗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如何以军为单位实施空战。

总之，截至9月初，我们已为实施以军为单位的出击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9月初敌人空军开始系统性地动用轰炸机和强击机对安州和开城地区的清川江渡口实施集中轰炸。自第八十七高炮航空师被转移到安州和泰川地区始，敌人空军的攻击重点也同时移至这一地区的交通线。在此类空袭中，平均每批次敌机中便有20架B-29轰炸机，30架以上的歼击机和F-80、F-51型强击机。

在前往宣川、定州和龟城地区实施轰炸的行动中为敌轰炸机直接提供掩护的歼击机为40架以上的F-84飞机，作为轰炸机“掩护”的敌歼击机有30架，个别情形下甚至达到60架

F-86 飞机。

敌轰炸机的飞行高度为 6 000—7 000 米,强击机为 4 000—2 000 米,甚至可以超低空飞行,为轰炸机直接提供掩护的歼击机飞行高度为 6 000—8 000 米,歼击机“掩护”飞行高度为 7 000—11 000 米。

敌空军飞行的主要方向:轰炸机——元山、安州、铁原——安州;强击机——汉城——永柔;提供直接掩护的歼击机——从南边经过平壤;歼击机“掩护”——汉城——镇南浦、鹤山(Какусан)车站。在完成战斗任务后敌机群一般会撤向大海方向。敌人每天实施此类飞行共两次。大致时间为:第一次——9—11 时,第二次——15—17 时。

为了掩护安州和开城地区的渡口,我空军第八十七高炮师随着敌人空军打击重心的变化,在新义州、宣川、定州、安州、介州和开城各地区不断迁移。根据空军行动小组负责人克拉索夫斯基同志的指示,在 9 月 9—13 日我们组织了 6 次以军为单位的出击,其中 5 次与敌人的强击机和歼击机发生了空战,一次(在 1951 年 9 月 12 日)敌机在我歼击机靠近时无心恋战,逃向大海。而敌人的轰炸机,每当在空中看到我们的歼击机,往往在未到达预定轰炸目标前,便向回逃窜。

我并不想详细描述我们所有出击的经过,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同一个计划实施的,只是在我们歼击机出击的个别行动方式和方法上略有差异。这里我仅以 1951 年 9 月 9 日发动的一次出击为例。……

当时,我军各部队接到的任务如下:

——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携两个团——作为突击机群,在攻击敌人担任直接掩护任务的歼击机的同时,消灭在宁郁、金山、坞所里(Осори)、开城、定州和安州地区的敌轰炸机和强击机,不允许其轰炸定州、安州和开城地区的交通线和渡口。一个团作为我军预备队增援前方实施突击的部队和掩护其撤出战斗,对敌机实施干扰。起飞 75 架次。2 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个团处于二级战备状态。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以 2 个团作为牵制机群,任务是:接触和消灭在宣川、定州、泰川和龟城地区为轰炸机提供“掩护”的敌歼击机,不允许其对我军突击机群实施攻击。起飞 43 架次,2 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携 2 个团,作为全军预备队,为安东地区的我军降落机场和设施提供掩护,防止敌人可能发动的空袭。1951 年 9 月 7 日第二十八歼击航空团转迁至安东机场。起飞 44 架次。1 个团(安东机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1 个团(安东机场)处于二级战备状态。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准备击退和消灭敌人的轰炸机,防止其可能发动的对安东地区设施的打击。起飞 25 架次,1 个团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上述部队均需在接到军指挥部发出的关于在相关区域可能出现敌人空军的“鱼雷”预警信号的 30 分钟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我歼击机的飞行路线已经确定:突击机群——玄马台(Гематан)、朔州、汶山、开城、龟城和安东火车站;干扰机群和空中预备队(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 1 个团)——文翰里

（Уэнхари）、新川、泰川、安州和安东；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鞍山、凤凰城，在收到特别指示之前，该团负责在上述地区空中 5 000—6 000 米高度的巡逻任务……

各机群（突击机群和干扰机群）中的每个团从不同地点（南、北两个方向）实施起飞，在实施 180 度转弯之后完成机群的集合过程。机群各团之间的集合以追赶方式进行。突击机群第一个团的起飞时间是固定的。

根据各师指挥部的决定：突击机群——第一批起飞的是第十七歼击航空团，第二批——第一五二三歼击航空团。干扰机群——第一批起飞的是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第二批——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我歼击机的指挥工作采取如下方式：

——根据军指挥部的命令歼击机开始出击；

——我歼击机在空中的指挥和导航由军指挥部、空中指挥所、歼击航空军和歼击航空师指挥部负责。在歼击航空军第二空中指挥所（博川）的是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领航员谢廖金。

为了能够在更远距离处发现向东飞行的敌机，在以军为单位实施作战期间，我们在盈德地区空投了一个 П-3-a 无线电遥控系统。但该系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由于朝鲜东北部地区多为山区，其远距离发现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在靠近元山一线的地区再空投一个这样的站点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同志的同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战局很不稳定。由于最终通过设置远距离站点，以便发现敌人从元山方向出动前往安州和宁郁一线地区的轰炸机的设想并未落实，我空军针对这些敌人的拦截行动并没有充分的把握。

这导致我们的歼击机不得不在敌人作为“掩护”的歼击机一出现之时便提前起飞，以便拦截紧随敌歼击机之后的轰炸机。这些行动并不总是成功，因为很多情形下敌人的轰炸机并未出动。

我军突击机群和干扰机群在行动中以“团为单位”的战斗队形迎敌，各团间隔 2—4 公里。团与团的接合部均高出 200—1 000 米；各团的战斗队形以“中队为单位蛇形”配置，各单位前后距离 800—1 500 米，相互横向间隔 600—800 米，各单位前后接合部相差 800—1 000 米；各中队的战斗队形以“分队为单位梯形”配置，前后左右间隔 400—600 米，接合部相差 400—600 米。

1951 年 9 月 9 日的空战情况具体如下：

敌人由 4—8 架歼击机组成的机群先进行了试探性空中侦察。11 时 25 分至 12 时 35 分期间敌人试图对安州、宣川、龟城和泰川地区的我行军部队和道路上的其他设施实施空袭。

参加空袭的敌 F-80 和 F-51 歼击机、强击机达 50 架以上，其中由 8—16 架飞机组成的机群沿中、低空飞行。敌人强击机的空袭行动得到了由 60 架以上 F-86 歼击机所组成的两个机群“掩护”的掩护。敌歼击机“掩护”比强击机机群早 10 分钟飞抵定州、宣川、龟城和泰川地区，然后便在 9 000—12 000 米高空担任巡逻警戒。

11 时 25 分，敌人第一批歼击机群出现在公州和镇南浦地区。为了拦截和消灭敌机，我们出动的飞机有：11 时 21 分至 11 时 28 分——突击机群（由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的 2 个团组成），54 架米格-15 战斗机；11 时 23 分至 11 时 27 分——掩护机群（由第三二四歼击航空

师的2个团组成),34架米格-15战斗机;11时45分——预备机群,22架米格-15战斗机。共计米格-15型战斗机110架。

11时40分至11时45分,我干扰机群和突击机群在定州、安州、泰川和汉沽仁(Хакуен)地区与敌“掩护”歼击机遭遇,后者从我歼击机群起飞始便转头飞往东南方向。我机群与之在9000—12000米高空发生战斗。

我掩护机群战斗持续时间20分钟,突击机群——12分钟。

根据各歼击航空师师长的战果报告,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击落F-86敌机4架,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击落F-86敌机5架。我方损失情况: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第一九六团飞行员上尉安德留什科因执行作战任务未返回基地。

结论和建议:

1. 经过上一阶段的战斗,我军各部队均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我军的计划、组织工作和我歼击机的战略战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经过一些小规模机群的战斗实践,如今我们已能够以团、师和军为单位实施集群式作战,并使美、英空军受到了重创。

2. 经过长期的作战活动我军各部队在战备水平和战斗能力方面均发生了一些变化:

——各部队的战备工作都本着我歼击机群应迅速、准确地起飞,整体步调一致的原则来抓,从而使其空战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由于全体飞行员疲劳过度,导致我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战斗能力、机组战备水平和质量有所下降。从该师的定员构成来看,能承担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50%。该师需要持续休整,人员和物资方面也需要补充和替换。

——虽然也存在上述原因,但第三〇三歼击航空师的战斗力下降得还不太明显。该师完全可以胜任所肩负的战斗任务,但也需要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加以补充。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的战斗能力仍保持原有状态,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

3. 鉴于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即将返回苏联,因而急需向我军调入一个新航空师。否则,将大大降低我军的战斗能力,从而完全丧失凭借自身力量实施战场机动的可能性。

4. 我米格-15型战机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美英空军战机,其使用简便,战斗灵活性强……

5. 在和平条件下对飞行员进行培训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以最短的时间练习以团为单位的起飞、集合和飞机的爬高等动作;

——在顺风,风速为20公里/秒,携副油箱和不带副油箱情况下练习飞机的起飞动作;

——让以双机乃至以整团为单位的机群练习以最大速度爬升至飞机最大上升极限的技术;

——练习以大规模机群为单位的机群编组和战斗队形;

——双机飞行时,飞行员应能够完成一整套特技飞行动作,如飞行交叉和半筋斗翻转等;

——训练长时间滞空,并能在13000—15000米高空进行空战的技术;

——练习高速度飞行技术,能够在飞机倾斜至极限“磁方位角”的角度上与敌作战;

——为便于我飞行员确定对敌 B-29 和 B-36 型轰炸机实施攻击的最佳距离，应当在实习场和机场上设立敌 B-29 和 B-36 模型，大小应与真正的敌机相仿。这样，我飞行员便可在不同角度和距离每日练习对敌机的瞄准动作；

——练习在空中使用移动瞄准镜对敌射击动作；

我飞行员应掌握在飞机以最大时速飞行时向敌发动攻击的技术；

——练习以 80 度角长时间俯冲时空中停车的技术；

能够在以分队和中队为单位的编队中向目标瞄准和开火。

6. 为了改善通讯部队的管理和提高其战备水平，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派一个携有必要的仪表测量备件和测量仪器的 155 КРАС 型移动修理厂到军里待上 2—3 个月；

——给第八十七空军高炮师补充一个 СОН-3К 型无线电遥测系统，对现有的 14 台 КАМЕНС 柴油机和 3 台 ЛИТСЕР 柴油机进行大修；

——给军里一个定员不全的无线电报站配备一个通讯连；

根据第十八航空机械师的需求，尽快发送通讯配、备件和器材。

为了解决本军各部队的物资-技术保障问题，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在第二十九航空机械师第八十航空机械团机关编制内设立运输处，该处人员包括处长、军官和办事员；

——所有受训独立汽车运输营人员均转为第二十九航空机械师第三十三航空机械团独立航空技术保障营编制；

——给每个航空团配备一个 АКЗС-40 型充氧车（平均每个中队一个）和一个能给蓄电池充电的 15 千瓦电站；

——航空机械师应拥有如下工厂：高炮师光学仪器修理厂；地面火炮武器修理厂；由三个车间——电力、无线电技术和电话—电报等组成的通讯设备修理厂；师汽车修理厂必须应提高现有修车速度，即每月 70 个中修。

医疗卫生保障：

为确保部队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补充扩建医疗设施：一个医疗卫生营和一个传染病医院；

——经常而及时向部队供给各种药品和消毒器具；

——在军首长领导下建立一个行军 X 光室和一个配备有必要人手的临床实验室；

——建立一个空军医院附属医院，并配备物理仪器和 X 光设备；

——在发送那些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之前，应对之全体注射传染病疫苗。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

近卫空军少将别洛夫

№133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同意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2日

第665项 关于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采纳苏联作家协会邀请由12—15个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于今年10月来苏联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和苏联作家的工作经验的访问的提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25

№10777

弗拉迪金致巴济金函：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 关于停战谈判的报告

(1951年10月3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致苏联外交部美国司代理司长

В. И. 巴济金同志：

在此呈上由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二等秘书 К. Н. 斯米尔诺夫起草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

附上述报告共20页。

驻远东委员会的苏联代表

Н. 弗拉迪金

华盛顿市

1951年10月3日

共3份，送：通金、巴济金，存档

附在1951年10月11日第1189号密电之后

附件：

远东委员会苏联代表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

撰稿人：K. H. 斯米尔诺夫

机 密
仅1份

华盛顿市

1951年9月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 （调查报告）

一、美国统治集团对马立克同志建议的态度

马立克同志今年6月23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可能性的声明，在美国各阶层居民中得到广泛赞同和支持。由于该声明指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现实道路——这一点即使部分美国反动报刊也承认——在美国人民中赞成和支持结束朝鲜战争的意见骤然加强起来。马立克同志的建议甚至在某些保守分子，包括美国国会议员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比如，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康纳利6月24日称，应该“仔细研究马立克的建议”，而众议院共和党人议员波特（来自密执安州）和民主党议员曼斯菲尔德（来自蒙大拿州）都表示赞成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据美联社6月24日报道）。

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在联合国各方面人士中也产生了强烈印象。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于6月24日向报界代表称，“马立克的声明是重要的”，将立即采取措施以利用苏联的建议。联合国一系列其他官方代表也发表了声明指出苏联声明的重要性质。

尽管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在国会某些议员中引起了积极反应，但美国统治集团方面总体上对它是另一种态度，因为这一建议使他们措手不及，并将其置于困难的境地。众所周知，由于美军在朝鲜的失败，为给进入死胡同的美国外交找到一条出路。杜鲁门政府曾在今年4月对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开始试探。为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威信，美国政府倾尽全力想把美国描绘成“胜利者”，而朝鲜人和中国人则是“失败者”。从这一点出发，美国政府打的算盘是，最终由朝鲜人和中国人来建议或请求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会比较容易扮

演胜利者的角色,并提出自己的条件。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算计被马立克同志的建议打破了。

美国统治集团对苏联建议在美国引起的积极反应表示严重不安。在杜鲁门政府开始全速展开庞大的军事计划并准备让国会通过关于为军需和用于对外国军事援助的巨额拨款法案的时刻,这种反应对美国统治集团十分不利,因为这种反应可能给各种军事措施的实施造成严重困难。

在马立克的声明之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威尔逊等人就立即讲话,警告“虚假的安全感觉”,并呼吁不要降低美国的军事准备速度。杜鲁门6月25日在图拉霍姆市的讲话中虚伪地宣称,美国“任何时候都准备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随后就呼吁不要降低军事准备速度,而是更要加速。艾奇逊6月26日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讨论对外国军事和经济援助案时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因为朝鲜冲突的解决而削弱对外国的军事援助计划(《相互安全计划》,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第23页)。在给杜鲁门的关于第二季度美国军事准备进程的报告中,威尔逊写道,美国“应该继续执行更新部队装备计划,而不管朝鲜的军事行动停止与否”(威尔逊1951年7月15日给杜鲁门的报告,第1页)。

即使在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开始后,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仍然继续发表类似的宣言。这种讲话中最典型的是马歇尔7月18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会上讨论对1952年的军事拨款法案时的讲话。马歇尔声称:“最令人苦恼的事实是,他们,俄罗斯人,仅仅凭借一次讲话,就使美国人民的情绪得到了稳定,并削弱了我们的防御计划。更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如此容易受到宣传的感染,仅仅一次讲话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绪,使我们在国际局势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次讲话是个精心的骗局,在美国对这次讲话的反应是一场悲剧。我们不应该改变我们的计划……”(《国防部1952年拨款》,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会的听证会,第196—197页)

从上述宣言可以看出,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保持和维持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对轻易实施自己的军事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美国政府预先采取了一切措施,以削弱马立克同志的建议引起的巨大效果,并消除建议造成的轻松气氛。他们立即发动了所有宣传机器以散布对苏联建议的怀疑情绪,并千方百计贬低它的意义。为贬低苏联建议的意义,美国国务院甚至不惜采取粗暴的手段,比如在6月26日通过李奇微司令部在东京公布了一份新闻备忘录,其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对苏联建议的杜撰和捏造,包括声称,马立克的建议在华盛顿“被负责的官方人士”看作是苏联妄图取得“军事优势”的一个策略。国务院在这份备忘录中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它宣称,马立克的建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说得太直截了当了”——这似乎与苏联先前的行为大相径庭(1951年6月2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然而,美国政府的措施并没取得预期的结果。一些报纸评价国务院备忘录的公布是美国宣传的“一个明显失误”,而把政府对马立克同志建议采取的策略称为“失败的”(1951年6月27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麦克纳)。

美国统治集团从开始就对苏联建议采取的这种立场表明，在做出关于开始停战谈判的决定时，美国的指导思想不是致力于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及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而是如何保持这种紧张局势。所以，还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反映政府观点的美国报刊就预言，谈判将不会导致远东的和平。《华盛顿邮报》7月2日在编辑部文章中写道：“美国人民应该明白，朝鲜的停火不会导致共产主义势力与自由世界势力之间的斗争停止……朝鲜即将开始的谈判的结局不是现实的和平，而是新形式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没有人员伤亡，但它在各个方面将更加严重……”

二、美国政府拖延停战谈判的利害关系

7月10日在开城开始了预备性谈判，其目的是要制订一个停战谈判的会议日程。

美国统治集团从自己保持远东紧张局势的计划出发，从谈判一开始就采取消极怠工和拖延的方针。他们认为，这种谈判方针使他们不仅能保持远东紧张局势，而且还会加剧这种紧张，以便吓唬社会舆论，并造成一种有利局势，使美国政府能顺利地让国会通过军事预算、增加税收法案和加强监督法案以及对外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扩大计划。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计划在马歇尔的发言中暴露无遗。今年7月18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上，在回答众议员马洪（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在拨款法案通过之前朝鲜谈判是否会取得某些成果”的问题时，马歇尔宣称，他不认为，至少在6个月或者更多星期的时间内（即法案通过之前）会取得成果。马歇尔说：“我认为，如果在达成最终停战协定前你们（国会）通过法令，将是件有益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法令的通过将非常有助于我们达成我们希望的（停火）协定。”（《国防部1952年拨款》，听证会，第202页）

7月25日，艾奇逊也发表了同样性质的声明。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艾奇逊宣称：“在朝鲜继续进行反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时，会比较容易地说服我们自己和我们国外的朋友相信迅速巩固我们国防的必要性……”（《1941年^①的相互安全行动》，听证会，第1页）

美国统治集团暗中破坏停战谈判还有其他目的。正如美国报纸指出的，美国极力拖延谈判并保持远东紧张局势还为了迫使自己的盟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签订与日本的单独媾和条约，以便较为容易地缔结太平洋安全条约和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美国统治集团并不致力于朝鲜问题的真正和平解决，当前极力把谈判拖延到11月初联合国在巴黎召开的例会开幕。他们这样做的算盘是，如果联合国例会工作期间停战谈判还在继续的话，就可以避免联合国讨论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关的问题。除此之外，美国还希望，由于紧张局势，他们会得以比较容易地快速武装日本，拼凑“团结一致”的侵略性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组织并准备扩大自己在远东的侵略行动。

美国政府走到停战谈判桌旁来又力图拖延它，还是由朝鲜局势的纯军事方面决定的。美国要求拖延谈判是为了使自己在战斗中严重受挫的部队得到喘息，为部队的整编和调集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1951年。

新的增援部队争取时间。美国报刊的大量报道证明,从停战谈判开始以来,美国往远东地区调集了大量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在朝鲜的美军不论在人员上还是在兵器上得到加强这一事实,记者艾伦在7月2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指出来,他具体地报道了由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及其他州航空大队组成的第一一六歼击轰炸机联队调往远东的情况。在最近一段时间(9月份)报纸上又报道了军舰调往远东的消息。同时,这一时期美国还加强了对自己盟国、卫星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往朝鲜增派增援部队。8月8日,助理国务卿希克逊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宣称,美国“正在努力(从盟国)得到派往朝鲜的补充部队”,“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希克逊进一步声称:“我们希望有更多数量的国家往朝鲜派兵,希望那些在朝鲜已有部队的国家加强自己的部队。”(《1951年的相互安全行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听证会,第681页)结果,在美国的压力下泰国、希腊和加拿大政府往朝鲜派了自己的部队。在长期的支援之后,法国和挪威也派了兵。据最近的报道,新的英国部队也到了朝鲜。

应该指出,美国政府向朝鲜派增援部队追求的是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军队以进行进一步的、可能更大规模的战役;另一方面,如果停战能够实现,那就在停战之前在朝鲜积聚更多军队,因为在停战协定缔结之后就不可能指望有这样的调动了。

三、美国在开城谈判期间的挑衅行动

为暗中破坏和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美国政府采取了挑衅和制造各种事端的办法。谈判开始后才过了两天,美军司令部就提出了关于容许联合国记者进开城及关于在开城设立中立区的最后通牒式要求,以此不仅拖延了谈判,而且使谈判受到中断的威胁。美国政府的意图在于人为制造“事件”并利用它来作破坏谈判的宣传。利用记者“事件”掀起的报刊上的喧嚷,对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谈判“无诚意”、“不诚实”的指责,明显地表明美国政府的意图是想冷却社会舆论对朝鲜谈判寄予的希望,并为他们自己的拖延辩解创造条件。然而,美国政府的这些企图未能得逞:朝鲜人和中国人让了步,在关于容许记者进开城和建立围绕开城的中立区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甚至一系列美国报刊都指出了美国政府企图的破产,它们指出,美军司令部的“挑衅行为”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危险的。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和李奇微司令部看来持另一种意见。他们制造的“事件”得以拖延谈判,而美国宣传是站在向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提出自己要求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一边的。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让步被美国人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并认为他们有可能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承诺。

8月中旬,美国政府转向在开城进行军事挑衅。从8月19日开始,美方多次对开城中立区武装入侵。中立区还遭到了空中来的轰炸和扫射。在答复就这些挑衅提出的抗议和进行调查的要求时,美军司令部不仅公开否认自己对挑衅的直接责任并拒绝调查,而且还极力把罪责推到朝鲜人和中国人头上。李奇微司令部进行的和美国报刊鼓吹的公开否认破坏中立区的事实并指责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大合唱,再一次证实了美国政府的意图,是要驱散人们对谈判的任何乐观情绪并在朝鲜制造令人担心的空气以有利于他们继续进行战

争行动。在9月20日朝鲜人和中国人提出立即恢复谈判的建议之后，李奇微先是拖延回答，后又提出关于把会谈移到另一地方的建议，再次证实了美国统治集团在这种局势下的居心。

四、美国的停战条件

还在制定日程的谈判预备性阶段就已清楚，美国政府不希望迅速和公正地解决建立停战有关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它甚至就不打算讨论。

美国代表团在预备性谈判期间拒绝将关于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日程说明，美国政府不打算放弃自己在朝鲜的掠夺计划，它也不希望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许多官方人士的声明以及美国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言论都指出，即使在不仅达成了停战，而且实现了和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不打算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比如，艾奇逊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言时称，美国只同意“分阶段地”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艾奇逊说：“为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必须巩固南朝鲜武装力量，以便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有能力进行抵抗。”（《相互安全计划》听证会，第45页）今年7月19日，艾奇逊在对新闻界谈话时又重申了美国关于在朝鲜保留自己军队的意图（国务院1951年7月19日第648期新闻稿）。马歇尔在7月24日五角大楼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布莱德利8月19日在电台上也发表了类似言论。美国报刊对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言论特别有代表性。《新闻周刊》杂志在今年7月23日一期中写道：“不要期待朝鲜的和平会意味着美国从朝鲜总撤军或者大幅削减这些部队的数量。华盛顿认为，为了占领及为了预防他们，还将留在那里至少两年。”

持续15天的预备性谈判就停战谈判的日程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它包括以下问题：（一）通过议事日程；（二）建立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作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基本条件的非军事区；（三）制订实际措施以实现停火及在朝鲜范围内停战，包括监督停火和停战条件实施情况之观察机构的组成、权限和职能；（四）关于涉及战俘的措施问题；（五）向双方各有关国家政府的建议。

在双方开始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之后才弄明白，原来美国代表不愿意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设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美国政府的代表先前曾多次宣称，三八线对停战是最合适的一条线。比如，众所周知，早在6月2日，艾奇逊就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举办的“麦克阿瑟案”听证会上发言时称，美国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实现停战。（《远东的军事局势》，听证会，第3卷，第1782页）

但是后来，当关于停战的预备性会谈开始之后，艾奇逊（在7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声称，他当时讲的似乎“不是关于地形测量学的线，而是讲的一段的区域”（1951年7月1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这似乎表明，“联合国武装力量拒绝撤到三八线或者三八线更南以达成停战”。（1951年7月14日《巴尔的摩太阳报》）

尽管美国政府以纯军事理由为自己目前的立场辩解，毫无疑问，美国人抛弃自己关于准备同意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的声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于威信考虑。报刊多次确认，同

意以三八线为基础停战,不能不被世界社会舆论看作美国承认没有能力在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杜鲁门政府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它也不能不考虑到共和党人“安抚侵略者”的指责,况且,日益迫近的总统竞选运动也迫使政府对此类指责特别敏感。就在最近,《纽约时报》的军事评论家鲍尔杜因写道:“退回三八线将会是亚洲共产党宣传的一大胜利。它会被敌人充分利用来损害我们,有可能严重削弱抵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意志。它将在美国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1951年9月27日《纽约时报》)

美国政府拒绝在三八线停战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谈判期间,美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不沿三八线设立非军事区,而是在远离三八线以北地区,这样北朝鲜就将被夺去等于13000平方公里的一块领土。美国政府的目的在于侵占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这里有丰富的矿藏,并且对于展开今后的战役在战略上十分有利,美国人可在很短时间内来到中国和苏联边境。共和党众议员富尔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在7月29日就曾公开地表露了这些侵略计划,他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在美国手里只有朝鲜的农业区深表遗憾,声称,如果美国能够把德川、安州和咸兴一线控制住,那么北朝鲜的整个工业部分和战略上有利地区就会都掌握在他们手中。(1951年8月3日《纽约邮报》,记者P.艾伦)关于北朝鲜的什么东西吸引美国垄断集团的问题,美国兵器全国委员会主席斯摩尔说得更加明确。斯摩尔称:“保持我们今天在朝鲜的地位,不仅从军事角度,而且从我们国防计划的角度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域之外的钨矿藏的90%都处在美国武装力量现在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对于保证这一地区十分丰富的钨的供应,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51年8月3日《纽约邮报》,记者P.艾伦)参议员马龙(来自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也在8月23日宣称美国对北朝鲜的钨有兴趣。(1951年7月3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刊登的消息)在报纸上也有详细报道,比如,德鲁·皮尔逊8月9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李奇微将军的武装力量控制的三八线以北的一块领土,储藏有没被利用的丰富钨矿”,这就是李奇微在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所取的“不妥协立场”的原因。

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向公众舆论掩盖自己就分界线提出的要求内容,害怕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引起负面反应,这一事实是非常典型的。在美国报刊上过去和现在都指出,李奇微司令部的建议似乎仅“限于”当前的战线走势,“最能符合防御的任务”。为了将社会舆论对有关分界线问题讨论现状的认识更加引入歧途,美国报刊还放出风来,似乎美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作某些让步。(1951年7月3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刊登的消息)但是,最终解决还取决于朝鲜人和中国人。很典型的是,当8月初美国报刊开始有报道说,美国要求甚至在战线以北很远建立分界线时,美军司令部出面否认这些报道并采取措施,极力把这些消息说成是“敌人宣传”的结果。(1951年8月5日《指南针日报》,记者丁)

从美国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讨论停战谈判日程的其他问题时,美国政府将故意提出一方面旨在从停战中捞取最大好处,另一方面更加拖延谈判的要求。正如报刊上指出,在

讨论日程上第三个问题，即制定实现停火和在朝鲜范围内停战的实际措施时，美国代表团将提出要求，不但要实施地面检查，还要实施空中检查。接受这个要求，就会给美国人进行侦察活动和进行各种挑衅开辟广泛的可能性。报刊上还指出，在讨论关于涉及战俘的第四个议程时，美国代表团将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的“建议”。美军司令部的出发点是，这样交换，在它的手里就会留下大批没交换的战俘，因为如报刊所说，美国人手里的战俘比朝鲜人和中国人手里的战俘多。美国司令部计划，这个情况将被用作对朝鲜人和中国人施压的工具。

美国政府企图利用军事措施来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它的要求，这一点特别鲜明地表现为在谈判期间他们加强了对北朝鲜和平城市和村庄的空中和海上轰炸。美国报刊指出，李奇微希望用加紧轰炸来“迫使北朝鲜人最终接受他想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为掩盖自己的军事行动，美国人在报刊上散布谣言，说在停战谈判期间似乎已达成在谈判期间军事行动将继续的“相互谅解”。（1951年8月8日的《芝加哥太阳时报》，记者肯特）与此同时，考虑到社会舆论对在朝鲜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不利态度，美国军事新闻检查机关极力隐瞒美国军队在停战谈判期间实施大规模战役的事实。比如美国军队8月19日发动并持续到9月4日的大规模进攻这一事实。很典型的是，这一进攻是在朝鲜和中国代表宣布就设立非军事区问题将做出妥协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一次进攻，直到它结束美国报刊上都没有任何消息。

在9月4日范弗里特将军正式通报了美军进行的进攻之后，报纸直接指出，是军事新闻检查机构禁止对进行的战斗作任何报道的。9月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该报记者麦克纳的一篇报道说：“3个星期之前，在汉城的记者们被告知说，美军司令部不希望我们报道联合国军在和平谈判进行期间参加进攻的消息来惊扰美国的社会舆论。”

结论

一、开城的谈判进程表明，美国政府选择的是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的策略，为此目的而制造各种“事件”和挑衅。杜鲁门政府之所以拖延谈判，为的是维持紧张气氛，以便它比较容易地在国内和盟国内推行武装计划，并为武装日本和拼凑太平洋军事同盟创造有利局势。

二、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表明，它并不致力于迅速而公正地解决与实现停战有关的问题。它不打算同意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停战，不打算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诚实地解决涉及交换战俘、监察制度等谈判议程的其他问题。

三、杜鲁门政府用拖延谈判的策略和李奇微司令部的挑衅行动，实际上已中断了开城的谈判。它依旧奉行继续自己在朝鲜的侵略方针。它加强美军，继续对盟国施压以得到补充军队并加紧在整个战线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No0049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 年 10 月 4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10 月 5 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 9 月 26 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一、请派 5 名军事顾问于 10 月上旬到驻朝志愿军总部工作,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二、请苏联政府于 1951 年底即 10—12 月按照我在 9 月 20 日发给您的电报所提出的申请单(该申请单所列物资价值约相当于 9 月 8 日申请单所提物资总值的 1/5)给我们发出 120 门 85 毫米高射炮、7 种火炮弹药、6 种火炮轮胎和 10 万颗反坦克手榴弹,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同意从 10 月开始暂停发出供余下的 6 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待到 1952 年 4—6 月全部发出这些物资。

三、请苏联政府于 1952 年 1—3 月给我们全部发出价值相当于 1951 年 9 月 8 日申请提供的物资总值 4/5 的其他各项军用物资。

我们将用电报发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于 1952 年 7 月开始发出其余 50 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根据您原来的通知,全部 60 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应于 1954 年上半年发货完毕。现在,由于发货期限推迟半年,全部 60 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 1954 年底发货完毕是否恰当。

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对此做好准备。

四、今年 6 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 60 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 8 年内分期偿付。

不久前,我国贸易部接到了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通知,说相应的中国机构代表同它签订了提供 3 510 辆汽车和 1 900 辆自行车的贸易合同(这些汽车和自行车包括在第一批 5 个师的军用物资内)。

请苏联政府考虑，是否可以将汽车和自行车的价款列入 60 个师所需军用物资项内用军事贷款偿还，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困难，则请将此通知我们，以便我国代表就上述数量的汽车和自行车同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签订贸易合同。

请您考虑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 年 10 月 4 日

第 4933 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34 - 135

№1338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生产汉语配音电影

(1951 年 10 月 4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4 日

第 694 项 关于发行《金星英雄》汉语影片。

准许苏联电影部生产用汉语配制的电影《金星英雄》。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31

No20042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朝鲜停战与苏美关系

(1951年10月5日)

机 密

今年10月5日14点00分,我应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 A. T. 柯克的请求接见了 him。

开始会谈之后,柯克通报了,在从莫斯科启程前往美国,而后是巴黎之前,他希望与我讨论两个问题。首先,他希望告知我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他在今年9月6日与我会谈时阐述的关于苏联政府保护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的利益请求。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这个问题。

柯克声明说,他希望触及关于改善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合众国政府全权委托他提请 H. 斯大林大元帅注意这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指明必须改善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柯克宣读了美国政府的这份声明,其内容可归纳如下:

目前最危险的国际问题是关于朝鲜的问题。顺利地完 成关于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将有助于妥善解决由于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而引起的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能够确保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无法理解拖延关于停战谈判的原因。北朝鲜军事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就停火路线问题提出的要求,不符合目前现实的军事状况,除此之外,按照大使的意见,上述要求也不符合葛罗米柯今年6月27日针对马立克的声明给他的解释。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感到吃惊的是,朝鲜和中国代表在谈判时坚持的关于停火的分界线,因为这个问题带有政治性质和在军事谈判中各方不应该触及政治和领土问题。这类问题应该在停火谈判结束之后与有关政府进行讨论。合众国政府不准备参加与“不相称的人员”就政治问题的谈判。

共产主义集团没有表现出妥善解决由于在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引起的问题的愿望。苏联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关于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无果而终的话,那么,这将会导致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美国政府以自己的声明和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真诚地追求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完全赞同它的这种立场。

在声明中接着谈到,1950年6月25日侵入南朝鲜的行动,是公开的侵略行动和朝鲜问题已经成为要求立即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评价这件事情的。北朝鲜军队在战争最初阶段向釜山的进军行动,清楚地表明了谁应该为侵略行动承担责任。

大使声明说,他不希望就此问题继续进行辩论,但是,希望提请注意在朝鲜停战谈判陷

人僵局的严重性。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北朝鲜人确信必须对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持现实的态度以及政治和领土问题应该由联合国和相关政府进行讨论。

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引起合众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不安情绪。面对苏联的这种立场，民主国家准备彻底地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独立性。目前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军事领域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和仅仅是为了防御。

大使有权声明，合众国对苏联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侵略的打算。正面地结束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将是在创造有助于妥善解决一切未解决问题的条件方面的第一个步骤。不解决关于朝鲜停战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其他任何问题，柯克对此强调说。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将在正面结束朝鲜停战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如果在开城的谈判不能获得正面的结果的话，那么，这将会引起我们两国之间的不愉快。

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也真诚地希望停战谈判能够顺利地结束。但是，经验表明：开城不是进行停战谈判的合适地点。因此，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坚持把谈判地点改为另一个“中立”地点，它不处于任何一方的监督之下和双方都能够方便地到达那里。联合国军队军事指挥部不理解，为什么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拒绝关于把谈判地点换成能够排除某一方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的另一个地点的建议。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赋予朝鲜停战谈判以巨大的意义和希望最迅速地解决朝鲜问题。它希望苏联政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朝鲜停战谈判顺利地结束和以此为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开辟道路。

听完大使的声明，我问他，是不是能给我提供他宣读的美国政府声明的副本。

柯克回答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指示，他应该口头做出这份声明，而不转交书面的这份声明。他表示相信，我在没有书面形式声明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声明的内容。

我对这种不寻常的转达声明的方式表示吃惊。我说，当然，我肯定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В. 斯大林汇报大使声明的内容。但是，在没有大使的书面声明的情况下，我无法承担对准确转达美国政府声明的责任，况且这份声明的内容大约有 8 页，按照大使的话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赋予在声明中触及的问题以巨大的意义。

柯克还是拒绝了向我提供他所作的声明的副本。

转向声明的实质，我提请柯克注意他所犯的错误和歪曲。我指出了，不是北朝鲜人，而是南朝鲜人和美国人入侵了北朝鲜，可以用苏联代表团向联合国提交的无可驳斥的文件证明这一点。苏联政府赞成顺利结束朝鲜停战的谈判，苏联政府是这些谈判的倡议者。涉及关于停火线的问题的话，那么，苏联不能同意：确定作为拥有政治和领土性质的这条界线，不能成为开城谈判的内容；不能同意：北朝鲜代表团应该为这些谈判出现的僵局承担责任。这方面的责任完全在美国军事指挥部身上，尤其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李奇微将军，他不仅拖延

了谈判,而且还不明原因地坚持把谈判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指出,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使建议为使停战谈判顺利进行,苏联政府可以对北朝鲜政府施压影响。苏联政府并不参加谈判。而直接参加谈判的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朝鲜谈判得以顺利地完成。

我对柯克关于仿佛苏联政府不可调和的立场引起国际关系中紧张局势的声明感到困惑,并请求大使哪怕是列举出任何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这种声明的事实。

涉及大使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无结果可能会导致在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事情发生的声明,我说,对此我无法理解大使这个意见,它可能被视为暗示着某种威胁。

柯克连忙解释说,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赋予自己的关于在我们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话以某种威胁的性质,而只是强调,在战争历史上,有限的战争经常会转化成无限的战争。

对此我说,有限的战争变成无限的战争的这种转化,取决于进行战争的那些人们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政策。

就大使的关于美国对苏联及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侵略打算的声明,我回答说,我已经知悉这一点。但是,应该确定,遗憾的是,大使的这些话与事实不符。

在会谈结束时,柯克声明说,他想再次强调以下两种情况:

1. 美国对苏联没有任何侵略的打算。这个声明是官方的,按照柯克的话说,他有权向苏联政府作这样的声明。

2.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如果苏联政府将以自己善意的服务和善良的意愿提供帮助的话,那么,朝鲜问题将会得到妥善的解决,这将为妥善解决一切尚未解决的其他问题提供可能。

我回答说,我已经知悉大使的这个声明,但是,应该回答,关于美国政府针对苏联没有任何侵略性打算的这些话与事实不符。至于说苏联政府的话,那么,在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它始终坚定地表现出和将继续表现出善良的意愿。

在会谈结束之际,柯克再次请求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美国政府的声明。

我保证说,当然,一定转告。

会谈共持续了 50 分钟。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卡明和一等秘书麦克苏伊宁。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作为翻译的 И. Г. 乌萨切夫同志。

A. 维辛斯基

№133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批准费德林参加毛选出版委员会

(1951年10月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5日

第705项 关于费德林同志的问题。

批准所提交的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复电草案。中共中央曾在来电中请求苏联派费德林同志参加毛泽东同志选集出版委员会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北京

苏联大使

第1567号电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

“中共中央：

你们在今年9月20日的电报收悉。

兹作如下答复：我们不能派遣费德林同志到毛泽东同志著作出版委员会工作。费德林同志可以继续在大使馆工作的同时兼职这一工作。

联共(布)中央”

收到请回复。

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1951年10月5日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34, 366

№2616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领土活动的 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

(1951年10月5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65号决议

第704项 关于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为中国政府提供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的在中国领土活动的美国和国民党谍报电台的相关数据资料(附件一、附件二)。^①

2. 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苏联外交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上述第1条中提到的在中国的谍报电台的数据资料。

第83号记录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62, д. 46, л. 83

№23388

中国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 大使馆今后发函以中文为本^②

(1951年10月5日)

馆字第(51)0354号

敬启者：

本大使馆顷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自1951年10月1日起，本大使馆发出之重要公函及文件均以中文为本，并附俄文译本。特此通知苏联外交部及驻在莫斯科之各大使馆及公使馆。

此致

① 附件未发表。——原注

②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苏联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印章）

1951年10月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8页

№1340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同意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

（1951年10月7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7月31日至10月7日会议第83号记录

1951年10月7日

第719项 关于刘少奇同志的请求。

批准所附给刘少奇的电报。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北京

致苏联大使

对第1591号特别电报的回复

请向刘少奇同志转交如下电报内容：

“刘少奇同志！

您的来电已收到，在电报中您通报了关于派中国农民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打算。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接待中国农民代表团，并将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使代表团成员了解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代表团到来之际，正是十月革命34周年的日子，由于农田工作已经结束，因此可以主要地向代表团介绍一下社会主义畜牧业和水利工作方面的问题。

如果代表团在 1952 年 4—5 月份来访,即在春季农业工作开始之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全面地、深刻地了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更直观地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收到电报后请确认,并按电报要求执行。

维辛斯基

1951 年 10 月 7 日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36, 371

№1338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准向中国提供轧钢

(1951 年 10 月 7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7 日

第 723 项 周恩来同志今年 9 月 30 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

接受提交的:

(1) 对周恩来同志今年 9 月 30 日关于向中国提供轧钢的电报的答复草案。

(2)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黑色轧钢的指示草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一: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交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

您的 9 月 30 日关于提供 2 701 吨黑色金属轧材的电报已经收到。

将按电报中指明的规格,于 1951 年第四季度向你们提供 1 376 吨,1952 年第一季度向你们提供 1 325 吨,结算方法:根据 1950 年 2 月 14 日协议提供的贷款进行结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51 年 10 月 7 日

附件二：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

1951 年 10 月__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责成冶金工业部按照附件的规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 2 701 吨黑色金属轧材，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 376 吨，其中 1 007 吨使用购买大型轧材的出口基金，369 吨使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

1952 年第一季度 1 325 吨利用出口基金购买。

对外贸易部应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上述所说数量的轧材，费用计入根据 1950 年 2 月 14 日协议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项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附件：

应于 1951—1952 年期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黑色金属轧材规格(吨)

名 称	总 计	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952 年第一季度
1. 等面角铁			
200×200×20	30	15	15
200×200×16	200	100	100
150×150×16	200	100	100
150×150×12	100	50	50
2. 不等面角铁			
150×100×16	5	5	—
150×100×12	25	10	15
150×100×10	55	25	30
130×90×10	80	40	40
130×90×8	25	15	10
100×75×10	35	20	15
100×75×8	30	15	15

续 表

名 称	总 计	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952 年第一季度
90×60×6	12	12	—
75×50×5	10	10	—
3. KP-70 钢轨	200	100	100
4. 工字钢			
第 55A 号	115	55	60
第 45A 号	110	55	55
第 36A 号	30	15	15
第 30A 号	30	15	15
第 24A 号	50	25	25
第 18A 号	100	50	50
5. 槽钢			
第 24A 号	55	30	25
第 20A 号	25	10	15
第 18A 号	25	15	10
第 16A 号	25	10	15
第 14A 号	20	10	10
第 12A 号	410	205	205
第 10 号	45	20	25
6. 厚度为 6 毫米的波纹铁板	120	60	60
7. 第 40 号宽边工字钢	225	110	115
8. 门窗带孔专用钢材(根据订货人提出的规格)			
35×20×4	6	6	—
35×45	18	18	—
55×25×4	13	13	—
90×65×5	22	22	—
75×25×12×2	4	4	—
20×15×1	1	1	—
50×6	1	1	—
9. 第 14CTOC 号工字钢	15	15	—

续 表

名 称	总 计	其中包括	
		1951 年第四季度	1952 年第一季度
10. 第 36A 到 55ACT3 号工字钢	20	10	10
11. 第 14A 到 20ACT3 号槽钢	75	50	25
12. CTOC 号槽钢	5	5	—
13. 吊车钢轨(苏联国家标准 4121—48)	154	54	100
总计	2 726	1 401	1 325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36, 374—377

№133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

(1951 年 10 月 7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7 月 31 日至 10 月 7 日会议第 83 号记录
1951 年 10 月 7 日

第 731 项 关于遣返三名被拘留的中国公民。

1. 采纳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关于把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董洪德(Дун Хундэ)、奥永德尔格尔(Оюндылгер)和纳拉诺夫(Наранов)遣返中国的提议。
2. 委托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同中国政府商定把第 1 条里所指出的被拘留的中国公民移交给中国当局的事宜。
3. 准许苏联内务部(库尔格洛夫同志)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之后把上述中国公民遣返中国。
4.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的负责遣返事务的全权代表(斯莫罗金诺夫同志)从苏联内务部接收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董洪德、奥永德尔格尔和纳拉诺夫,并把他们移交给中国当局。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138

№0050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

(1951年10月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0月4日的电报收到了。我现在回答您电报中的问题。

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军事顾问将在近日派往北京。

关于提供装备。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120门85毫米高炮、炮弹、反坦克手榴弹和炮车用轮胎，按照您9月20日申请单(申请价值1.09亿卢布贷款，即申请单总价值的1/5)，将在1951年底之前，在我们确定的时限内提供给您。

根据上述贷款，相当于申请单总价值4/5的1952年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期限在接到您申请单后通知。

其余6个师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时限将推迟半年，在1952年7月之前提供。同样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因为我们需要保障新的大规模供货，所以50个师的装备和军用物资提供的限期也不得不推迟半年，即在1954年底完成供应。

您提出要我们重新研究把为战斗师提供的汽车和自行车列入军事贷款的可能性问题。

根据1951年2月1日关于军事贷款的现行协议，汽车牵引器材的结算至今都是按照商业协定办理的。

您所说的结算方法，与现行的协议和据此形成的结算办法相矛盾。我们财政部门 and 军事部门认为没有理由修改现行条款，并反对改变条款，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菲利波夫

1951年10月7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36 - 137

№24837

库兹涅佐夫致格里戈良： 中国工会代表团索要文件

（1951年10月15日）

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格里戈良：

现在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代表团请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把如下文件的副本提供给他们：

1918年1月23日关于教会和国家相分离的法令。

苏联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4月3日关于合并教会的决议。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请求把上述材料的副本转交给中国工会代表团领导人。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К. 库兹涅佐夫

1951年10月15日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37, д. 723, л. 150

№0050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18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19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今年10月18日5时30分发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10月18日1时15分的电报已收到。

当前，在联络官会议上，我方应坚持促使迅速恢复会议活动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既急于求成，也不拖延时间。

为了解决某些次要问题，我们应及时主动提出双方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方法。

至于我们打算改变的方法和次要问题,我们不要立刻提出改变,同时,我们不应在头几次会议上或在报刊上表明我们的观点是绝对不可改变的,相反,我们应为进一步谈判准备条件,以便在进行谈判时不致太感突然,好像我们作了重大让步。

因此,你们打算指示新闻记者,让他们在报刊上声明,我方提出的关于缩小开城-云山中立区和两个居民点之间沿途的中立地带的建议是重大让步,这是极为不妥的。

我们提出这一建议不是什么重大让步。

如果敌方不同意,我们愿意进一步缩小中立区。这难道不是在已经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做出的更大让步吗?因此,在报刊上发表这样的声明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实际上,会议转到板门店,双方负责实施警戒,把中立区扩大到云山,在敌方看来,这些都没有给它带来什么好处。

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敌机不能飞临云山上空,这对敌方是不利的。因此,从10月7日开始,敌方的所有报刊和社会舆论都不认为这是我们的让步,相反,都认为在板门店开会将会比在开城更加麻烦。

至于敌方,则仍然对利用联络官会议感兴趣,其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进行侦察。

我们也应谨慎行事,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这在今后的会议斗争中对我们有利。

但从敌方提出的4个方案来看,显然敌方尚不完全倾向拒绝恢复会议。

毛泽东

1951年10月18日5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10月1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39 - 140

№0050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

(1951年10月2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将军^①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 1 个由 3 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二、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 1951 年 11—12 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 463 名飞行员完成雅克-11 的飞行训练。

根据您原来指定的计划，预定组建 3 个米格-9 歼击机师、1 个图-2 轰炸机师、1 个伊尔-10 强击机师、2 个拉-11 侦察机团、1 个拉-9 歼击机团、1 个里-2 运输机团。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 1952 年 3 月 15 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一）给中国派出 3 个喷气歼击机师和 3 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 3 个歼击机航空师和 6 个米格-9 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二）给中国派出 1 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 1 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 2 个侦察机团和 2 个拉-11 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三）给中国派出 1 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 1 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 1 个歼击机航空师和 2 个伊尔-10 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四）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 1 个图-2 轰炸机航空师、1 个拉-9 歼击机航空团和 1 个里-2 运输机团，但到 1951 年 12 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 14 名顾问，给拉-9 歼击机团派出 5 名顾问。

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1 年 10 月 24 日

第 5281 号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41 - 143

^① Г. А. 洛博夫，接替别洛夫继任苏联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编注

№0050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美方提出恢复谈判协议和备忘录

(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 1951 年 10 月 22 日 18 时给我的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1951 年 10 月 22 日 14 时,敌方联络官送来乔伊就批准协议和取得相互谅解问题致南日信以及肯尼上校就复会日期问题给张春山上校的备忘录。

敌方这么快就批准了联络官达成的协议,并赋予它正式文件形式,乃是因为害怕我方提出尚未解决事件问题。

敌方还提出,复会后立即开始讨论第 2 项议程。

敌方这样做可能也是为了使我们没有机会提出未解决事件问题。

我们事先研究了乔伊的信,并认为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至在谈判中束缚我们。

尽管他们在信中宣布,联络军官拟定的协议是正式协议,但他们肯定并未批准该协议百分之百是正式的,而无须在会议上再给它补充什么。

尽管他们声称,复会的目的在于讨论第 2 项议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坚持也不可能坚持在复会后第一次会议上不可以讨论安全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不提出未解决事件问题,而立即提出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不会表示反对讨论这一问题。

但是,考虑到他们高度的神经紧张,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事先考虑到尔后的过渡措施问题,在敌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讨论上述问题。

如果你们同意,那我们就复信批准联络官拟定的协议,并向敌方建议于 1951 年 10 月 24 日 11 时复会。

复信应于当天上午或于今年 10 月 23 日下午送交敌方。

请您就问题的实质予以指示。

李克农

1951 年 10 月 22 日”

毛泽东

1951 年 10 月 25 日

文件送: 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005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2日23时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我10月22日18时的电报料您已收到。

一、我们再次研究了乔伊的信。尽管乔伊在这封信中没有对下述问题表示明确的意见：联络军官协定是否就是双方代表团协定，复会后是否可以对不涉及到第2项议程的其他问题不进行讨论，但他可能诬指我方答复不够明确，因而建议首先恢复小组委员会活动，而不要立即恢复大会活动。

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解决我方可能提出的问题。

如果敌方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我们认为可以同意。

在小组委员会上，我们也应提出我们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

二、情况迫使双方代表建立一定的机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机构称之为联络军官联合机构，敌方是会爽快同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联络军官会议就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举行。

双方联络军官全都参加会议，因此没有必要建立某种其他常设机构。

三、在小组委员会开始讨论第2项议程后，我们将坚决坚持让敌方首先提出折中建议。如果敌方仍然坚持己见而不提出新的建议，那我们就认为自己取得了主动权，以便探明敌方意图。

过去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已得出结论，不妨在开始时提出第1方案，即双方军队各自向三八线以北和以南后撤，在三八线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但是，考虑到三八线以南我们所占地区和三八线以北敌方所占地区的巨大差别（我们占领面积约为2640平方公里，三八线以南和临津江以西的岛屿尚不包括在内，敌人当前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所占地区面积约5364平方公里），估计敌方不会同意我们的建议。

我们认为，提出这一方案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因此最好是我们立即提出第2方案，该方案包括金日成同志于今年8月16日提出的方案以及你们对这一方案的意见。

在阐述我们的方案时，我们可以指出，其中包括考虑当前战线做出的修改。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拖延时间，尔后我们就提出经过修改的规定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第三方案。

近来,敌人在临津江以东地区有所前进,因此应对第3方案做出修改。过1—2天我们将提出这一方案。

四、请您对上述问题做出指示。

李克农

1951年10月22日23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44 - 146

№0050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关于修改分界线建议第二方案

(1951年10月25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5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3日22时给我的电报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考虑到我军与敌军接触线近来发生的变化,我们决定对我方关于分界线建议的第2方案做出一些修改,以便向敌方表明我们的方案反映了当前的军事状况,从而促使谈判进行发生转折。

一、分界线始于巨津里居民点附近的东海岸,向西经单发岭、林塘里、长坪里(杨口西北10公里)、下甘岭、新望里(铁原西南15公里)、全谷(家南里东南5公里)、马智里(高浪浦里西南10公里)、板门店、交道里(开城以南12公里)、水流道里(开城西南9公里)、安昌、青丹(海州东南22公里)、新道(海州以南6公里)、盐尾岛(瓮津西南22公里)、曲掘里(瓮津西北19公里)到西海岸的阿山里(曲掘里以西10公里)。

二、双方军队将要撤出的地区就成为缓冲地带。缓冲地带内的非军事分界线将由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前在双方所占领的地区内另行划定。

至于交换地区和改变预定作为分界线的军队接触线,则从上流洞居民点开始,以该居民

点中心为准，我方军队向西后撤到成源里—谷佳里—板门店地区，而敌军则向东后撤到高浪浦里—药潭—大龙里地区，即双方军队均应后撤约 5 公里，双方军队所撤出的地区则应归入缓冲地带。

三、当前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我军占领了 2 460 平方公里的地区。根据您的指示的方案，由于军队后撤。则我军所占地区只剩下 1 880 平方公里。敌军在三八线以北所占地区面积约为 5 364 平方公里。根据您的指示的方案，由于其军队后撤，则其所占地区面积只剩 1 944 平方公里。

这样，双方剩下的占领区面积大体相等。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所经过的地带考虑到了敌方的“堪萨斯”防线地区内具有良好的地形，免得敌方借口该地区不适于防御而加以反对。

该方案已经过讨论并得到我方代表团赞同。

请您指示。

李克农

1951 年 10 月 23 日”

毛泽东

1951 年 10 月 25 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50 - 151

№0050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恢复谈判后的策略问题

（1951 年 10 月 25 日）

发自北京，1951 年 10 月 25 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今年 10 月 24 日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今年 10 月 22 日 18 时和 23 时以及今年 10 月 23 日 22 时的电报均已收到。

在南日同志对乔伊的答复中，我们在其前面加了两段文字，说明给谈判制造障碍的责任在敌方，同时也表明我们对缔结协定和取得互相谅解问题所持的态度，以保证在政治方面占优势。

敌方已承认,他们曾两次破坏中立区协议。

敌方什么花招都耍过,因而它已在全世界人民舆论面前处于不利地位。

如能达成新的严格的协议并达到相互谅解,我们同意您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复会后,首先提出关于建立联络军官联合机构以保证履行协议。

至于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已经发生的尚未解决的事件,则可以暂时不提它。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包括敌方破坏协议在内的过去所有的事件都已完全解决。因此我们应掌握必要时指控敌方可能用得着的武器。

至于分界线问题,则我方可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先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建议。

不管敌方同意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大会会议上讨论问题,我方都可主动建议双方不讨论旧方案,而提出双方可以探讨的分界线新方案。

如果敌方仍然坚持其原先提出的把分界线划在我防御纵深内的那个建议,而不同意双方提出新的双方可以讨论的关于分界线的建议,那我们就不要急于提出新的方案,而要推迟几天。

如果敌方同意我们的建议,那我方就可提出根据你10月23日电报所示的当前战线划定分界线的经过修改的新方案。

分界线应以下述方式具体划定: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东地区的敌人放弃1944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而三八线以南临津江以西地区的我方放弃188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

尔后,双方军队均应从划定的界线各自后撤5公里,并应在这一地区建立缓冲地带。

在缓冲地带内的行政管理职责仍由双方各自单独执行。

分界线通过的具体地点可大体根据你今年10月23日电报所示确定。

根据这一方案同敌方进行斗争的结果,可能达到根据把分界线划在当前战线地区的建议稍加修改而划定分界线的目标。但是我们要与十分狡猾的敌人打交道。

希望复会后你们在谈判过程中仔细思量每一步,尔后经过周密研究后把你们的建议告诉我们。经我们同意可以在会上提出。

请告诉我们金日成同志在复会后对谈判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1951年10月25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0050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问题

（1951年10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6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今年10月25日13时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10月25日11时，谈判会议开始。敌方代表团的南朝鲜代表白善烨由李亨根少将取代，其他代表仍然是原来的。

我方提出关于建立联络官联合机构的建议。

敌方原则上同意这一建议，并说当天下午给予答复。尔后，敌方询问我方对第2项议程有何方案。

我方建议继续召开小组委员会。敌方要求休会20分钟。

休会以后，敌方表示同意建立我方提出的机构，也同意继续召开小组委员会会议，但敌方声明，必要时可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召开谈判代表会议。

会议于11时53分结束。

规定在14时开始小组委员会工作。敌方参加小组委员会的有霍奇斯和布尔科，我方有李相朝和解方。

李克农

10月25日13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0050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提出分界线新方案

(1951年10月26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26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5日来电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小组委员会于1951年10月25日14时开始工作。双方一开始就互相建议提出分界线新方案。小组委员会开会约1小时,敌方代表建议休会15分钟。

休会之后,敌方代表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提出了新方案的发言稿。此外还出示了标有缓冲地带的大约相距4公里的南北界线的地图。南北界线的中间线基本上与当前战线重合。在有些地方,即在其东部和中央部分,该线处于战线偏南处,而在西边部分,则该线处于开城之北直到临津江出口处。

敌方代表多次重复说,这是他们的最终方案;同时他还说,该方案可以向全世界公布。

我们建议休会到1951年10月26日11时,但敌方要求1951年10月26日10时召开会议。

随后他声明,如果1951年10月26日我方不做出决定,则必须将此通知他们,若是这样,就无须召开会议。

最后决定,1951年10月26日11时,谈判继续进行。今天的会议于15时40分结束。

李克农

1951年10月25日18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26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No24838

马特科夫与冯乃超会谈纪要： 中山大学情况介绍

（1951年10月26日）

机 密

冯乃超，广东人，中共党员，掌握北京方言和广东方言。他是一名诗人，非常了解俄国经典作品和苏联作家的作品，特别喜欢普希金的作品。曾在延安、沈阳、北京和上海作过几年记者工作。去年，作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到过莫斯科。返回中国后他作过几场关于苏联的报告，写过几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他对苏联和苏联同志的态度是友好的。在重庆和北京，他同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同费德林同志和科瓦廖夫同志的关系都很好。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冯乃超就中山大学总的特点谈论了如下内容：

中山大学是中国最大和最为著名的大学之一。它占据了广州郊区风景最好的地段。学校面积5 000亩，其中有各系（医学系除外，该系在广州市）、宿舍、各体育场、两个大的池塘和菜园。

学校有五个系：文学系、法律系、地理系、工程建设系和农业系。医学系是独立的，事实上它同中山大学没有任何关系。该系不仅在中国著名，而且还名扬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

文学系有如下专业：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通史和俄语。全系共有206名学生，其中157名男生，49名女生。法律系有如下专业：法律、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会计，该系有363名学生，其中300名男生，63名女生。地理系有如下专业：天文学、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土壤学，该系318名学生，其中男生285人，33名女生。工程建设系有如下专业：土木工程、电子技术、机械和民用建设，该系有730名学生，其中686名男生，44名女生。农业系有12个专业：林业、化肥、灌溉设施、养蜂学等，该系有577名学生，其中431名男生，146名女生。

中山大学（不计医学系）共计有2 197名学生，其中1 862名男生，335名女生。一年级有808名学生，二年级798名学生，三年级348名学生，四年级243名学生。

各系的学习年限均为5年。

1951年录取了大约900名新生，其中部分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来自其他的大学）。所有的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并享受各项保障。学校只向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征收学费（这些学生的父母是地主、商人和企业家）。

中山大学没有关于学生出身的准确的材料。一年级的615名大学生中有114名出身于

工人,23人出身贫农,56人出身于中农成分,21人出身于富农,58人出身是地主,314人出身是小资产阶级,29人是海外华侨的子女。高年级班级大体上也是这种状况。该校没有少数民族学生。近来能够看到外来的学生的数量在增加(主要来自广州、澳门和新加坡)。

该校有大学生联合会,有新青年民主联盟的分会以及中苏友协的分会。新青年民主联盟成员有600多人,工会成员有250人,中苏协会会员500人。

中山大学有306名教授和教师。主要是国民党时期的旧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在广东省出生。北方人不超过10%。教授每月得到150万中国元,老教师、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每月的薪资为100万—150万中国元。普通教师每月80万—100万中国元。

大部分教授和教师都在美国学习过(达70%),部分在英国(10%)、德国和法国学习过。冯乃超开诚布公地说,中国共产党任命其担任该校的副校长是为了整顿学校的秩序,在教授、教师和学生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这一工作是重要的、及时的,因为前不久(大概在1951年3月之前)该校存在不良的气氛,广东人和北方人之间公然相互敌视。现在还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少多了。广东人坚决反对用北京方言上课,即使现在仍然反对。因此大学在教学时仅用广东方言授课,用北京方言进行上课近来是毫无希望的。冯乃超说,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山大学存在,而且在广东省的其他主要大学也都存在。在广东省各学校,首先在各高校用北京方言进行教学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在几年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南军区教育司(中山大学直接隶属于该教育司并接受其财政拨款)的命令,中山大学在教授和教师中开展了政治教育工作。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非常复杂,因为教授和教师们对改造的接受非常缓慢。现在,该校还有一些教授非常反动,非常亲美。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教授较为反动,难以对他们进行改造。亲美的教授人数最多,力量最大。学校管理层将不会解聘这些教授,而是要继续使用他们,并希望他们今后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改造。

该校党员人数不多。全校共26名中共党员,其中17名是大学生。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广东人。对大学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都很消极。政治学习不经常进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受到了具有反动情绪的人的影响。前不久,冯乃超被任命为该校党组织领导人。此外,该校还有2名民盟成员和1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没有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

教授、教师 and 大学生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朝鲜的运动:他们募集购买武器的资金、献血、报名参加军校、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但是参加支持土地改革的运动以及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要消极一些。参加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及其开展工作的只是那些出身于工人和贫农的教师和大学生。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一些教授和大学生(出身于地主家庭)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反对严惩反革命。近来可以发现,参加这三大政治运动的大学生和教师的数量在增加。

该校有500多名中苏友协的成员,但是对关于苏中友好和苏联的各种材料的传播这一工作做得不够。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去年还是今年,该校的教授、教师 and 大学生都没有学习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天才著作。

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在广东省解放之后的2年内，中山大学培养出了700多名专家，他们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工作。因为对专家的需求在增长，因此，大学的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在谈话的最后，冯乃超请求我转达他们对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的感谢，感谢他们给该校送来一些文献。他同时说，该校急需汉语和英语的科技文献和参考书。

苏联驻广东领事馆副领事

Н. Ф. 马特科夫

1951年10月26日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37, д. 723, л. 160 – 164

№0051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小组委员会讨论分界线的情况

（1951年10月3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1951年10月29日1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您10月28日1时30分电报已收到。

10月28日在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以当前战线为依据，批评敌方提出的方案，按照该方案划定分界线，敌方只应放弃东海岸洪城地区的122平方公里以及金城以南地区的125平方公里，总共247平方公里，然而，我方则应在洪城地区各凸出部之间地段上和金城地区放弃190平方公里，在金化地区放弃562平方公里，在开城地区放弃520平方公里，总共1272平方公里。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我方比敌方多放弃1025平方公里。

敌方看到我方对当前战线表现出兴趣，因此想利用这一机会迫使我们放弃我方的方案。按照我们的方案，我方应放弃三八线以南西段地区，而敌方则应放弃东段地区。

对此，敌方提出的理由是，在西海岸地区，我军和敌军之间没有接触线。因此敌方企图以欺骗手段迫使我们同意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因此,在今天的会议上不可能开始对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进行具体讨论。

双方同意明天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并在2个方案的基础上对地区分歧意见进行协调。

在1—2天内可望确定共同承认的双方军队接触线。

敌方已经暗示,在这一问题上双方分歧意见不大。只要军队接触线一经确定,敌方抢去开城地区的要求就会毫无根据。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的抵制不可能迫使敌方在采纳我方方案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因此对我们来说,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在确定共同承认的接触线之后,我方可主动提议在修改后的方案的基础上休战,也就是说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李克农

1951年10月29日1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58—159

No005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金日成同意中方所提谈判方针

(1951年10月3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0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收到的金日成同志1951年10月25日9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已收到,我同意您在电报中提出的谈判方针。

金日成

1951年10月25日9时”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1, л. 160

№2617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向中国提供安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

（1951年10月31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10月31日会议第84号记录

第214项 关于向中国提供国家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的决议。

接受华西列夫斯基、伊格纳季耶夫和缅希科夫同志关于向中国提供国家全部所需无线电台和设备的提议，并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该问题提出的方案。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62, д. 47, л. 11

№0051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等问题

（1951年11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 1951年10月30日2时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您 1951年10月29日5时的电报已收到。

1951年10月29日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敌方仍然不愿一开始就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

然后开始讨论双方提出的方案,而坚持首先根据方案做出决定,尔后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

敌方声称,确定双方公认的双方军队接触线并不困难。

在当天下午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敌方慑于我方压力而不得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其结果是,问题部分地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敌方对此并不是认真的。可能明天的会议将是今天会议的重演,即不会取得任何结果。

除此之外,在同意恢复小组委员会活动时,敌方同时声称,谈判会议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恢复。

现在,乔伊和唐纳已回到云山。可能是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敌方为建议开始谈判会议而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在今年10月30日早晨的会议上敌方仍不同意讨论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那么我认为,不要等到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我们就提出经过一定程度修改的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

如果在1951年10月30日下午,我们修改的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不能准备好,那么提出这一方案的时间不得迟于今年10月31日。

关于改变不大的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我们认为:

一、该方案必须是能为敌方所接受,亦即最好是我们提出来的方案是最终方案。

二、撤走军队后双方所放弃的地区的面积应当大体相等。显然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公正的。

三、缓冲地带的面积是大是小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确定大面积缓冲地带有利,因为敌军的前线南移,铁原—金化地区成为非军事区,从而消除了该地区对我方阵地的威胁。但是我方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按同样长的距离后撤,因此,我方也就放弃了我方军队控制的一些有利阵地,例如,五圣山(金化以北)和其他制高点。

大面积缓冲地带的消极的一面是,停战后在广大地区组建非军事管理机构和进行监督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认为宜于同意敌方建议的确定缓冲地带宽度为4公里。

四、在地区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今后在临津江以西地区内保留阵地不会给我们带来危害,因为从军事观点看该地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五、在军事方面,金化—铁原地区划入缓冲地带是有利的。但是,敌方大概会坚决反对这一点。而且我们没有相应的地区来补偿敌方放弃的地区。

因此,只剩下一条:在确定双方军队接触线时,坚决坚持将金化(这可能是可以实现的)和铁原(这大概是难以实现的)划入缓冲地带或置于缓冲地带的边缘地带。

六、至于东海岸的洪城地区和巨津里地区前线的凸出部以及凸出部之间的地区,我们只好基本同意敌方的方案。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拟定了在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初步方案(其中对战线作了一些改变):

一、金化以东地区缓冲地带的界线基本上与1951年10月25日敌方方案所定界线重合。金化以西地区双方军队应从当前战线各自后撤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应当从东到西由大井里经柳松洞、姑味城里以南 1 公里地区、姑味城里西南 4 公里高地、海参岱、朴达以北 1 公里地区、下青松（文登里东北 5 公里）、那衣里、下溪浦西南 1 公里居民点、旧岱里（开城东南 18 公里）西南 1.5 公里居民点、寺洞（开城东南 14 公里）以南 1 公里居民点、新木洞、金化东北 1.5 公里无名高地、榆谷里、亭渊里、地域山（铁原东北 9 公里）、下马山（铁原西北 5 公里）以南 1 公里居民点、德山西北 1.5 公里居民点、葛谷、赤巨里（朔宁东南 10.5 公里）、桂堂村、葛岬里西北 1.5 公里居民点、黑松、高浪浦里西北 2 公里居民点、山后洞西北 2 公里居民点、后川洞（板门店以东 4.5 公里）、高岭里东南 1 公里居民点、智育台、水松以南 1 公里居民点到大洞里（云山西南 10 公里）。

北边界线在离南边界线 4 公里处与之平行延伸到最后一点。该线从东到西由水津里（位于东海岸）东南 1 公里居民点经西希里、1098 高地、黑渊里、御牛里、青松里、佳音洞、鱼隐山、边岩洞、旧岱里以北 1 公里居民点、高洞里东北 1 公里居民点、间榛岬、上九井、上甘岭、斗浦里西北 1 公里居民点、塔洞、牧馆闹洞以东 2 公里居民点、长松洞西北 1 公里居民点、新开岭、高里店东南 1 公里居民点、新开岭、溪洞山里东南 2 公里居民点、清溪山里、鸡荣里西南 1.5 公里居民点、上甘岭西北 1.5 公里无名高地、班固台、高津里、高柚里以南 2 公里居民点、讷水里、山西洞、河顺山里、基成东南 2 公里居民点、大龙里以北 1 公里居民点到梨洞西南 1 公里居民点。

二、根据双方军队当前的实际接触线，洪城以南地区的敌人由于其军队后撤到南边界线而放弃 101 平方公里，在金城以南地区放弃 193 平方公里，总共放弃 294 平方公里。在姑味城里地区——下溪浦西南 1.5 公里居民点，由于我方军队撤到北边界线，我们将放弃 275 平方公里。双方军队放弃的地区面积相差不大，而敌人所要撤出的地区是前线的各个凸出部。

三、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基本上是根据 1951 年 10 月 27 日 23 时志愿军司令部电报所提供的资料确定的。

我认为，关于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还会有些争论，但改变不会很大。

如果在我们提出这一方案之后，敌方仍然坚持以洪城以南地区的凸出部和金城、开城地区交换，那我们就直截了当提出在当前双方军队接触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案，双方军队各自后撤 2 公里，不要求敌方从洪城和金城以南地区内的凸出部地区撤走军队，以避免敌方提出不公正的要求。

请您考虑上述意见并提出指示。

李克农

1951 年 10 月 30 日 2 时”

毛泽东

1951 年 11 月 1 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0051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中朝拟主动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1951年11月1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10月31日1时30分给李克农同志的电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李克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你1951年10月30日2时和1951年10月30日21时20分发来的电报已收到。同意你1951年10月30日2时的电报,在该电报中,你建议在10月31日的会议上我方主动宣布在已做出某些改变的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

如果敌方反对这一建议,并坚持他们于1951年10月25日提出的建议,那么我方应当立即或在当日下午的会议上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发表公报和记者报道,以揭露敌方不愿意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和划定军事分界线,以及敌方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在我方的深远后方的企图,以使之成为我们手中的一种武器,从而有利于我们在1951年11月1日或2日提出我们的具体方案,并迫使敌方同意我们的这一方案。

如果敌方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在11月1日的会议上提出我们的具体方案,从而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于具体方案。我同意你们提出的6点建议以及南边和北边界线。如果敌方坚持以开城地区换取洪城和金城以南地区,则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直接提出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确定南边界线和北边界线,并迫使敌方接受这一建议,而不要就地区交换问题继续进行争论。

毛泽东

1951年10月31日1时30分”

毛泽东

1951年11月1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0051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防空和 训练中国飞行员问题

（1951年11月1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我们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我的复电晚了一些。

一、我们认为，保障北朝鲜交通枢纽的安全应主要由歼击机航空部队负责。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在内此降落中方空军部队。

高炮部队的主要力量只须掩护主要的大型目标，现在应由苏军的5个高炮师负责掩护机场和安东—新义州地区的鸭绿江大桥。

根据朝鲜所出现的局势，加强高炮的掩护是必需的。我们认为，中方司令部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拨出装备各师所必需的180门高炮和一些高射机枪。在12月，我们将根据补充的军事贷款向您再提供120门85毫米高射炮。

二、关于苏联向中方派出3个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师及飞行员和3个航空技术营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因为米格-9飞机我们已不生产，我们也没有米格-9飞机。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完成所有训练大纲后做返回苏联的准备，返回苏联的时间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

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机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机团中派遣教练员。

将向贵方派遣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歼击机航空团的顾问，共计19人。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将下达相应的命令。”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的电报：

我们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临时派去训练中国米格-9飞行员的顾问应按期准时返回。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3日

№24840

高京深致纳雷什金函： 中国专家在苏联的实习工作

(1951 年 11 月 13 日)

致苏联黑色金属部

Н. И. 纳雷什金部长：

我非常荣幸地请求您在解决如下问题上提供帮助，这些问题是关于中国的专家到贵部工厂进行实习的问题。

1. 专家苏伟明(Су Веймин)、陈国伟(Чэнь Говей)在吉尔吉斯斯坦工厂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实习工作之后，必须转到摇摆式平炉工厂进行实习。

专家杜金龙(Ту Цзсньлунь)、牛英德(Ню Индэ)、胡万光(Ху Вэньгань)在一年半后应该有机会转到其他的金属工厂进行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铸造的钢种应有别于吉尔吉斯斯坦工厂铸造的钢种。

2. 专家黄庆发(Хуан Цзиньфа)在半年之后必须转到另一工厂进行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该有生产无缝管道轧钢的设备。而专家黄丹斌(Хуан Даньпин)在半年以后应该转到另一工厂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该有生产成块轧钢片的设备。

3. 冯伯仲(Фун Боджуин)同志在半年后应该转而至另一工厂实习，转入实习的工厂应有生产上等轧钢的设备。

4. 杨伟(Ян Вей)同志、江洋清(Цзен Янцин)同志和赵万明(Чжао Вэньминь)同志在吉尔吉斯斯坦工厂学习半年之后，其中一人应该转到一些大型金属联合加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因为这些同志在回国后将要担任金属联合加工厂的厂长。

5. 根据同您和厂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五名焦炭化工专家在一年之后应该转到扎波罗热炼钢厂工作。

6. 王迈(Ван Май)同志和程庆(Чэн Чин)同志(金属物理化学分析专家)在半年之后应该转到另一工厂，在转入的工厂他们应该有机会了解用 X 射线对金属进行分析。

7. 请您帮助尽快开设如下专业的夜校学习班：金属生产——7 人，学习半年，铸铁生产——6 人，学习 2 年，轧钢——5 人，学习 2 年。用于开设学习班相关的开支由中国政府承担。

此致

敬礼！

中国驻苏大使馆商务参赞

高锦深(Гао Цзиншень)

1951 年 11 月 13 日，于莫斯科

No0051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国内情况

（1951年11月14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14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

目前，在签署停战协议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是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6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曾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

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

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1—2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3个国家承担此项

任务。

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

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3种方案:

一、召开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二、召开4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三、召开7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3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从朝鲜战争还要拖延半年甚至一年着想,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正在节约兵力、物力和人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国内,我们正在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持朝鲜战争,并保证国内财政状况及市场物价继续稳定和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加紧进行。

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1950年预算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的32%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

因此,如果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的方针,则明年的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11月14日

第5631号电

№00520

罗申致莫斯科电： 要求斯大林尽快答复关于谈判问题的请示

（1951年11月19日）

发自北京^①

北京时间11月19日18时受到周恩来接见。他请求向菲利波夫同志转告，毛泽东要求对他的就朝鲜谈判问题给菲利波夫的电报作出答复。这个电报是11月14日经克拉索夫斯基转交的。

周恩来给我看了电报并补充说，在等待菲利波夫同志答复期间，中方已两次推迟了同美方在朝鲜的代表的会晤。

Н. 罗申

1951年11月19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2, л. 22

№0052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答复

（1951年11月1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

近来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

^①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编注

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 1—2 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议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性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 年 11 月 19 日”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828, л. 42—45

№200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取消朝鲜给联合国的呼吁书

(1951 年 11 月 19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1 月 19 日会议第 84 号记录

1951 年 11 月 19 日的决议

第 422 项 关于致拉祖瓦耶夫同志的第 1352 号电报。

批准附件中对拉祖瓦耶夫同志的指示。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绝 密

优先拍发

北朝鲜

致拉祖瓦耶夫：

从你的第 1352 号电报中,我们并不知晓与下述呼吁问题有关的一切情况以及是谁主动

挑起了下述呼吁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呼吁，要求加快解决朝鲜问题的速度。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朋友如何看待这件事，因为你在电报中没有传递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正如你的电报中提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发出呼吁：关于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关于沿前线撤走军队、建立两公里宽的非军事区以及关于追究那些在朝鲜拖延战争的人的罪责。在目前局势下，即在美国人敲诈勒索的形势下，这样做可能被视为中朝方面软弱的一个迹象，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因此，在没有（朝鲜）呼吁的文本、不知道中国同志的看法，且不知道引导朝鲜朋友的动机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需要劝告朝鲜朋友，在解释清楚前面提及的诸问题之前，取消对其提出的问题予以解决的呼吁。

我们等待你发回更为详细的报告。

确认收到。

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19日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同志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829, л. 44 - 45

№02544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 关于朝鲜呼吁停战问题

（1951年11月20日）

Г. М. 马林科夫：

现送上给拉祖瓦耶夫同志的电报草案。请阅示。

A. 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20日

附件：

葛罗米柯给拉祖瓦耶夫的电报稿

1951年11月20日

优先拍发

北朝鲜

致苏联大使：

请注意您在朝鲜朋友就加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给联合国的呼吁书一事中表现出的不能容忍的行为。

您只是在11月18日(您的1352号电报)报告说朝鲜朋友打算在给联大和安理会的呼吁书中提出以下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请军队撤离前线并建立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对挑起朝鲜战争的罪犯追究责任。同时您询问，这种呼吁书是否会同维辛斯基同志的发言相矛盾。

因为我们对朝鲜朋友的提出了上述要求的呼吁书以及是谁建议向联合国提出上述要求等情况一无所知，我们要求您做出解释(我们的1059号电报)。

还没等到对您的电报(即陈述朝鲜朋友的上述要求的电报)做出答复，您又报告我们(您11月19日的第1353号电报)，说当天即11月19日将全文广播朴宪永的声明。此外，您在收到我们的询问电报(第1059号)后，就朝鲜朋友的上述要求仅仅报告说，是您主动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并再次询问，维辛斯基同志关于从三八线撤军的建议同在开城商定的关于建立分界线的各项议程有没有分歧。关于呼吁书，您也只是报告说，它将在11月19日发表。

可见，无论是在11月19日的第1353号电报中，还是在11月19日的第1355号电报中，您只是向我们报告朝鲜朋友将要发表自己的呼吁书，尽管在此期间您还没有得到我们的指示，并且也没能得到对您的询问的答复。结果，朝鲜朋友在没有同我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呼吁书。

可见，您的行为极其轻率。您更大的错误是，您甚至没有努力向朝鲜朋友搞清楚，关于向联合国提出上述要求的呼吁书这一问题，他们是否同中国朋友协商过。只是在我们直接要求您弄清这一点，并且是在朝鲜朋友发表了呼吁书之后，您才这样去做的。

请今后注意。

№00523

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 苏联声明与中朝做法的差别

（1951年11月21日）

优先拍发
特档

北朝鲜

拉祖瓦耶夫同志：

11月20日向罗申转达了菲利波夫同志的下述指示：

“向毛泽东并通过拉祖瓦耶夫向金日成解释清楚，维辛斯基关于美国军队立即撤离三八线的要求，同中朝同志所声明的关于军队实际接触线的当前立场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为了抗议美国拒绝把自己军队撤离三八线的非正义立场，维辛斯基不能有其他的表示。维辛斯基的这一立场有利于中朝同志，因为这样做一方面表示抗议美国人的贪婪，另一方面展示出为了达到和平而肯做出重大让步的中朝同志的忍让和热爱和平的精神。”

由于罗申同志同您没有联系，因此无法执行菲利波夫指示中通过您向金日成作解释的指令，故由外交部直接向您发出这一指令。

请确认已收到。

立即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1年11月21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8, л. 44 - 45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5, л. 67 - 68

No0052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方对我方分界线方案的看法

(1951年11月22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2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李克农同志关于今年11月21日小组委员会会议进程的简报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毛泽东同志,并抄送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

今年11月21日小组委员会于11时开始。我方代表首先发言并提出了我们的方案(附发言全文^①)。

敌方声称,我们所提方案与我们上次提出的方案互相矛盾,因此不能接受。

敌方之所以反对我方方案,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一、敌方认为,我方方案第1条所述‘确立规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的原则’,其中‘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概念不太明确。

敌方认为,必须指出接触线系指何时的接触线,也就是说,当前双方军队的接触线应确定在30天的时限内作为分界线。应当规定30天以后以签署协议那天双方军队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因此没有必要加上‘实际’和‘修改’之类的词。

二、还有,在我方方案的第1项中说:‘双方军队各自后撤分界线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敌方认为,只要规定建立缓冲地带的原则在于确定以分界线向南和向北在一定距离上经过的两条平行线作为缓冲地带的南边界线和北边界线。因此,不需要加入关于双方军队各自后撤2公里之类的词句。如果有必要加入这一句,就必须规定后撤时间。

三、关于我方方案第2项所述‘确定以双方同意的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则敌方认为,目前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应当称为‘临时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

四、关于在我方方案第3项中所述‘敌对行为将继续进行’的词句,敌方一开始就提出把它作为辅助词句,并将其置于建议的末尾,随后敌方又建议将此句单列一段。

我方对敌方提出的问题作了相应的答复,并阐明了我方的观点。

在今天的会议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将于明天11时继续进行。

李克农

11月21日17时”

毛泽东

1951年11月22日

^① 见以下No00525文件。——编注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2, л. 32 – 33

№00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中朝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发言

（1951年11月22日）

发自北京，1951年11月22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我方代表1951年11月21日发言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我们仔细研究了你们1951年11月17日的方案和你们对它的解释。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所提方案的形式不符合正式协议的形式。同时我们对某些具体规定也有不同意见。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我们认为，根据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的正式形式应当由3部分组成。首先，我们应当解决关于确定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原则问题。在讨论其他各项议程时不应当改变已确定的原则。

其次，当前我们应当确定分界线和缓冲地带。

最后，我们应当解决关于在最终签署停战协议之前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可能改变的问题。只有以这种形式就第2项议程在会议上提出的协议才是完善的。

二、尽快达成全面停战协议，是我们从谈判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一贯要求，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相信，如果共同努力，经过30天的讨论，在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能够达成全面停战协议。你们在自己所提方案中建议，如果在30天之内不能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就可由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确定以双方军队的接触线作为新的分界线，尔后应由双方代表团就此新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也认为，对第2项议程应一次达成协议，没有必要过了30天在双方达成协议后重新讨论与该项议程有关的问题。

我们建议：

如果在30天之内不能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那就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关于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原则的基础上给已经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做出一些改变，即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

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改变。

三、你们在自己所提方案中建议双方代表就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的第1条中再次强调对签署停战协议之前的敌对行为互相谅解。实际上我们之间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从未达成立即停火协议。因此,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互相谅解问题,更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单列一条。

因此,我们建议将互相谅解问题列入关于改变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协议中作为辅助词句。

根据上述意见,我们正式向小组委员会建议通过下述协议方案:

‘在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为一方以及以联合国军代表为另一方的小组委员会中,就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主要条件的缓冲地带的第二项议程达成以下协议:

一、制定原则: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双方军队由该线各自后撤2公里,以建立缓冲地带。

二、双方代表小组委员会应在该协议第1条的基础上立即解决关于目前双方军队接触线问题,以便双方同意确定以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同时确定以离分界线两边各2公里的线作为缓冲地带的北边界线和南边界线。

三、敌对行动可能一直继续到签署停战协议之时。如果在双方代表会议批准该协议以及分界线和缓冲地带的具体规定之后,在30天之内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则不论双方军队的实际接触线出现何种改变,已确定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30天已过尚未就全部议事日程达成协议,则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根据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改变而对之做出某些改变。’

我们相信,上述协议方案与你方1951年11月17日所提方案原则上没有区别。

我们已正式建议小组委员会立即通过上述协议方案。

我们同意你方意见,考虑到双方同意任何一种方案,双方均应选派参谋来调整当前的接触线,以便事先确定双方代表可能同意的当前军队接触线的具体位置。参谋不能确定接触线的地方,则应在小组委员会上确定该地的接触线。

在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同意军队实际接触线并据以确定缓冲地带以后,则可将小组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转呈代表团会议批准。与此同时可向代表团会议建议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

毛泽东

1951年11月22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11419

苏联外交部致中国驻苏使馆函：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财产问题

（1951年11月23日）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敬并谨作如下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50年2月2日照会，苏联外交部已向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发出指示：向阿富汗外交部递交照会，请他们担负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及财产的任务。

根据这一指示，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于1950年5月10日向阿富汗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有关的照会。1950年10月12日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口头声明，阿富汗政府同意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1950年5月10日照会中所阐述的苏联政府的建议。

中国驻阿富汗使团的财产由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于1950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接管保护，但是由于并非苏联驻阿富汗使馆的原因，上述财产接收书于1951年9月5日才签字。

在致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的6月19日第1534/1117号和1951年第2385/1744号照会中，阿富汗外交部请求向阿富汗国家银行送去57 914阿富汗尼38普尔的款项。照会指出，这笔款包括前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1950年2月1日至1951年1月13日期间的房租费和水电费开支。

苏联外交部为此在发出阿富汗外交部上述照会副本和前中国驻喀布尔使团财产接收书时，请求将上述情况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51年11月23日

于莫斯科

已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莫斯科市。

№2026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

(1951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

您发自今年10月24日的电报我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所以给您的回复迟了。

1. 我们认为保护北朝鲜交通线应该主要借助歼击机来实现，我们坚决建议迅速在南市(Нанси)和大成(Тайсен)地区建设机场，以使中国空军能尽快在那里着陆。

必须用高射炮掩护最主要的大工程，现在位于安东-新义州地区掩护机场枢纽和鸭绿江大桥的两个苏联炮兵师，将实现对朝鲜西北部分南市与大成地区机场建设的掩护。

由于朝鲜形势，这种高射炮掩护是必需的，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指挥官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射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给一个师分配180门高射炮和一些高射机枪。12月我们将按说好的条件(补充的军事贷款)向你们提供120门85毫米口径高射炮。

2. 至于从苏联向中国派遣3个装备米格-9的喷气式歼击机的航空师及飞行员以及3个空军技术营，您的这点请求我们无法满足，因为米格-9我们已经不生产了，并且我们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有必要继续派遣我军飞行员训练驾驶米格-9的中国飞行员，那么可以利用驻扎在广东、殒山、公主岭的3个苏联歼击机航空师的教官进行为期3个月的指导，在完成所有训练任务后，这些部队要在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返回苏联。

而关于一个强击机航空师的飞行员训练任务，我方认为，由驻中国第5、第11强击机航空师的军事顾问就能顺利完成。

关于两个中国侦察机航空团的训练，我们将从驻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的军队中的侦察机团中拨派教官完成。

我们将给你们图-2型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型歼击机航空团派出19名顾问。

如果您同意我的决定，那么我们将下达相关指示。

仅给克拉索夫斯基指示：

您一定要注意，我们临时留下来训练米格-9飞行员的空军驾驶员务必按时回国。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24日

密码电报 1951年11月14日第6648号

№00526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 毛泽东同意把苏联武器留给朝鲜

（1951年11月27日）

什捷缅科同志：

现将金日成给菲利波夫同志的密码电报呈上。

拉祖瓦耶夫

1951年11月27日

第4448号电

附件：

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关于供应朝鲜人民军3个步兵师武器的问题我已问过毛泽东同志，并接到他的回答，内容如下：

“由于朝鲜战场需要补充供应弹药和装备，按计划今年年底应发运出10个步兵师的武器，而苏联只能给我们运出4个师的武器。

明年4月我们将收到余下6个师的武器。已收到的4个步兵师的武器已于9月份转送到我军各部队。

如果在今年内能达成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应返回中国进行改编。

所以我认为，把我们部队留下的苏式武器转交给朝鲜人民军的2个师是合理的。而给另一个师的武器则要到明年4月份我们得到苏联又一批武器时再转交。

请告知我您的意见。”

考虑到总的形势，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建议。

致真挚的敬意！

金日成

1951年11月27日于平壤

№05295

格里戈良致斯大林报告： 国际工会基金会资金支出情况

(1951 年 12 月 1 日)

致斯大林同志：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建立了附属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会，该基金会 1951 年对以下共产党给予了财政援助：

芬兰共产党，87.4 万美元

法国共产党，60 万美元

意大利共产党，50 万美元

意大利社会党，20 万美元

瑞士共产党，2 万美元

卢森堡共产党，2 万美元

以色列共产党，4.5 万美元

丹麦共产党，7.5 万美元

希腊共产党，5 万美元

特里亚斯特共产党，2 万美元

基金会 1951 年的 153 万美元及 1950 年结余的 81.5 万美元已全部用完。

这样，附属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会 1951 年援助各共产党的数额总共为 234.5 万美元。

在 1951 年国际基金会的款额用完后，除去基金会的款额外，从联共(布)资金中援助了：

芬兰共产党，60 万美元

日本共产党，10 万美元

印度共产党，10 万美元

特里亚斯特共产党，5 万美元

奥地利共产党，1 400 万先令

目前，各国共产党正请求给予财政援助。

参加基金会的各党向援助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属下的左翼工人组织的国际工会基金理事会缴纳 1952 年度的基金是合适的。

把 1952 年的联合会基金数额确定为 250 万美元是合适的。其中包括：

联共(布)——85 万美元(占全部基金的 1/3)

中国共产党——62.5 万美元(占全部基金的 1/4)

波兰统一工人党——22.5 万美元

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每个会员党 20 万美元。

在与各国共产党谈判充实基金的问题时的合理做法是，向参加基金会的各党通报基金消费的情况，并确认由联共（布）、罗马尼亚工人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1952 年基金会理事会。

派遣波诺马廖夫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去同各国共产党谈判这个问题。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和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请审阅。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B. 格里戈良

1951 年 12 月 1 日

ЦХСД, ф. 89, оп. 38, д. 26, л. 2 - 5

№05295-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国际工会基金会的问题

（1951 年 12 月 1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2 月 1 日会议第 84 号记录

绝 密

第 П84/614 号

1951 年 12 月

致格里戈良同志

1951 年 12 月 1 日决议

第 614 项 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问题。

^① 参见以下文件 №05295 - 1。——编注

一、会议认为,把1952年附属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国际工会基金会用于援助左派工人组织的基金确定为250万美元是适当的。

二、会议决定,由联共(布)向附属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的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会支付85万美元。

责成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拨给格里戈良同志85万美元用于特殊目的。

三、会议认为,基金会董事会应向参加基金会各国共产党通报基金会开支情况,并向各党提出交纳1952年应付的会费问题,合理的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交纳62.5万美元,波兰统一工人党应交纳22.5万美元,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各应交纳20万美元。

四、会议决定,委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驻基金会的代表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提出关于追加基金会理事会款项的有关建议。

五、会议认为,由联共(布)中央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代表组成1952年的基金会理事会是合适的。

批准库兹涅佐夫同志任联共(布)中央驻基金理事会的代表。

六、会议决定,派波诺马廖夫同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出差与各共产党谈判关于1952年的基金问题。

七、会议批准了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文。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联共(布)中央给毛泽东的电报稿

致罗申:

请拜访毛泽东同志,按照上级的委托通知他以下情况:

“如您所知,罗马尼亚工会理事会下属的援助左派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会的资金目前已用完。

现在必须建立1952年的基金。

鉴于各国共产党呼吁增加援助基金会的资金,建议建立基金会数额为250万美元,并按下列数额捐助基金会:联共(布)捐助85万美元(基金会的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捐助62.5万美元(基金会的四分之一);波兰统一工人党捐助22.5万美元;匈牙利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各捐助20万美元。

请告知您对该问题的意见。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确认收到电文后，电告执行情况。答复的报告要简短，无须详细叙述。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05—2106页

№00527

什捷缅科致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 苏联空军在朝鲜的战果

（1951年12月9日）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根据您的查询向您通报，在整个战斗中，我在朝鲜的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在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期间，共击落敌机569架。

我歼击机航空兵击落510架，其中：

B-29,40架

B-26,1架

B-45,2架

F-94,8架

F-84,132架

F-86,172架

F-80,101架

F-51,22架

流星式-4,32架

我高射炮兵击落59架

我们损失63架米格-15和米格-15Б飞机以及30名飞行员。高射炮部队亡29人，伤53人。

什捷缅科

1951年12月9日

No24841

马卢欣致外交部报告：中国南方商品展销会

(1951年12月12日)

10月14日,在广州解放2周年之后,隆重举办了华南(包括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岛)商品展览会。该展览会同时也是一个展销会,会上签署了大量的商品合同,国营和私营企业、来自华南、华中和全国各地的以及来自香港、澳门和南海各国的私有商人进行了贸易活动。展销会的这些特点说明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地区意义。

展览会的规模和组织。展销会预计进行3个月,但是,地方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认为,该展销会的时间可能会被延长。按照展销会组织者的意图,该展销会将展示两年来人民政权在华南地区各个领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成果。为了举办展销会划拨了以前广东最繁华地段的两条商业街,这两条街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美国的空军轰炸得一干二净。4月份通过了举办展销会的决定,并在当月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在展销会开办之前曾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中南军区对举办展销会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后来,广东人民政府和广州市就华南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商品生产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地商品生产的成果和前景,并且特别注意到了食品的生产问题。从广州向南方各地区派遣了特别成立的小组,对当地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状况以及对商品发展和开展贸易的机遇进行了研究。

以汉口会议关于中南商品的生产以及在当地组织商贸展览会的材料为基础(该会议确定了华南商品生产的具体任务和政策方针),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了在华南举办展销会的计划。

展销会的组织工作从6月初开始。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周围的各中心城市都举行了会议,会上确定了参展企业和地区的规模和具体条件。华南各地区都开始准备展品,其中包括动植物展品:植物、果实、动物、家禽等。

参展展品共计68 012件,其中包括568个大小模型和232幅图片和图表。60 594件展品是各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样品。展品被置于10个特别建造的位于展区的大型橱窗中。这些橱窗如下:中国各省、各地区商品贸易和商品流通联系橱窗、交易橱窗、林产品橱窗、果蔬橱窗、饮品橱窗、海产品橱窗。除了这些橱窗,展览区还建造了接待厅,以便展示华南文化和在艺术领域的发展成就以及各种小摊、小卖部和亭子。还建造有大型的餐厅。其中建造的一个大厅设有1 400个座位,该厅曾被用于广州市各界代表召开的一场隆重的会议,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4周年。

展览设施以及开展的为期3个半月的展览显示了高度的组织性,显示了具有组织、建设和大规模行动的巨大能力。在这段非常紧迫的时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清理被摧毁的

房屋、建筑、寺庙残留的废墟，腾出地方，规划地块和便道，栽植许多树木，敷设水管，进行了大量的建设以及把展品放置到各个展位。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人超过 300 名。在这些工作中，广州市各单位派出了 1 000 多人向政府提供了帮助。有 100 多名各领域的专家对这些工作进行了领导。共计有数百名艺术家、设计师、书法家、雕刻家、青年建筑工人和其他的艺术工作者参与了展览会的艺术和设计工作。超过 300 多名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的代表参与了对展品的鉴定、分类和安置的工作。在展览会举办之前为开展工作培训了将近 1 000 名的导游和解说人员，向展览会的游客进行解说，并提供咨询。

展览会的展厅有三个单独的展出展品的场所，同时在这些场所进行贸易活动。并且为举办商业会谈和签署合同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地方总是有许多人。早在展览会开办之前就已经签署了 74 份贸易合同。

根据展览会举办者的设想，该展览会的贸易额总计应为 1 万亿元。可以通过如下比较来对这一庞大的贸易规模进行设想。1951 年夏，整个广州的居民超过 150 万人，有 188 个各类经济部门，31 851 个贸易单位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达 1.024 万亿元。由此可知，展览会的贸易活动不仅仅对于华南地区，而且对于整个中国都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展销会的实际贸易额事实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广州市所有的国营和私营的贸易公司、工业企业的资本总和。从 1951 年 11 月 18 日展览会开展以来到 12 月 14 日，贸易额已经达到 1.186 8 万亿元（3.3 多万亿港币），展览会还有两天，在 12 月 5 日和 6 日内贸易额增加了 5 亿元。也就是说，在举办展览会的预定时间刚过一半的时候，其贸易额就已经超过了预计贸易总额的 18%。

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这场展览会是成功的，而且还可以看出华南的经济能力，当局在其制定的关于举办展览会的初步计划中对华南经济的增长做出的评价是非常谨慎的。

展览会引起了广东和其他城市居民以及南方各地农民的巨大兴趣。访问展览会的人数每天都在 3 万—6 万人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广州，都是为了特地了解展览会。为此在沙面的江岸上特地开设了一个码头，开设了一些旅馆和饭店。举办展览会在秋季的几个月都成了广州市生活的中心。

展览会是在隆重的气氛中举行的。有来自中国各中心城市，来自华南各市和各地区以及来自香港和澳门的 4 000 多名工商界代表参加了展览会的开幕式。到广州的客人超过 1 500 人，其中有 200 多人来自香港，他们是英帝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的 28 个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的代表。报纸也对苏联客人，其中包括对苏联贸易代表处广州分部的代表普辛同志参与展览会开幕式的活动给予了报道。

举办展览会的目的和任务。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叶剑英简短的话语来说，举办这场华南商品展览会的目的在于“全面了解、全面研究、全面宣传和全面联系”。

展览会应该使人们熟悉华南的经济能力，应当为研究当地生产状况以及通过这种研究改善状况提供土壤。展览会应该是对新制度在经济方面和经济政策方面取得的新成就进行宣传的场所，将会明确地证明，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是无效的。

展览会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其成为一个市场,今后提高华南地区的贸易工作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扩大华南地区同中国其他地区、苏联、新民主国家、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

根据半官方的报纸《新商晚报》在10月14日的社论中表达的中国贸易界和工业界的看法,举办展销会的主要任务是:1. 恢复和加强贸易联系,处理好旧的贸易联系并增加新的贸易联系,特别是在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的相互关系方面;2. 稳定和调整市场价格,加强商人之间及其与客户的相互信任,为商业关系的正常化奠定基础,消除投机的可能和突发事件;3. 使商业活动面向农村,吸引农民对商业的兴趣,为工业产品向农民进行销售奠定良好的基础;4. 确保能够全面交换经验,创造条件改善业务领导,使其成为文化、经济活动和企业家的学校,使经济发展较为盈利,使贸易和生产计划更加现实;5. 使展销会成为各经济组织、机构和个人为其利益,首先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在发展华南工业和贸易领域进行合作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开端。

按照组织者的意图,展销会应该表现出:华南各阶层居民的自觉性和爱国主义情绪迅速得到了提高,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承认工农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盟,广泛推行能够促进国营和私有工业和贸易业得到发展的政策,使城市和农村的合作都能获利,处理好内外市场的相互联系。展销会显示,所有这些都是今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所必需的。

举办展览会的一些主要想法还在于,显示正在进行的以满足内需和脱离帝国主义的束缚为目的的生产改革,而在解放前华南地区的经济则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展销会的材料包含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利用华南的原料和资源,其中包括利用丰富的矿产来发展一些部门是有利的。

在显示华南农业落后的同时,还可以举出一些明显的事例和证据,证明正在消除农业的落后,努力加强农业生产,正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发生的总转变一样。把消费性的城市转变为生产性的城市是另一个目的,这将是推动民主的中国城市今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展览会的宣传意义具有内外两个方面。它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回击,并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进行揭露的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展览会以自己深思熟虑的、合理而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己的这些目的和任务。在举办展览会之前,政府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统计工作、调查工作和组织工作。这在展览会上都有许多表现,许多数据和事实都证明了曾做了许多特别的工作。生产部门和展览品都被提供了相应的展位,而提供的展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些部门的规模及其在地区和全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在展览会的材料中有如下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数据,比如:1950年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份额占9.7%,城市手工作坊份额占9.5%,矿山开采工业的份额占1.7%,农产品(大米及其他的粮食以及饮品)的生产份额占据34.2%,各地的特产——蔗糖、黄麻、水果和蔬菜、林产品、

橡胶产品、松脂等占 11.5% 的份额，农民手工作坊生产占 28.9% 的份额，海产品占 4.5% 份额。

在展销会委员会的宣传单上，写有关于叶剑英就举办展览会的目的的简单的语句，该目的同 1951 年的财经任务相关（调整资本和商品流通，处理好城市同农村的经济联系，增加当地产品的销售），此外，他还强调了举办展览会的展示意义和动员意义：华南属于温带气候，在任何季节各种各样的植物都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华南地区水分充足，沿海位于暖流。因此该地区有许多机会增加自然赋予的财富，而且这种机会是无尽的。打破华南对帝国主义市场和生产的依赖是取得经济建设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表现。

该展览会给农民带来什么呢？在广东省和广西省，在有 680 万农民的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些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作坊生产明显增长了，这些产品是用于销售的。农民们需要的所有工业品和城市用品都得到了增长。举办展览会考虑到了这一问题。

展览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什么呢？工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质量高的、便宜的商品。处理好同农村的贸易交换，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商品将会创造一些条件，更好地满足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

展览会将给工业界和贸易界带来什么呢？企业家和商人们希望扩大自己的业务，加强同国营生产体系和商业体系的合作，增加商品的销售，发展市场关系。展览会的举办有助于这些目的的实现。

因此，展销会的宣传单和展览会委员会都受到了欢迎。

橱窗观察。华南贸易联系以及同国内各地区的交流橱窗设有按地区分出的一些单独的展位，展览着从上述地区运送来的以及在广东和华南其他地区销售的商品。商品比较丰富的展位是华东展位，该展位展出了上海的一些商品。东北展位较差，根据该展位的展品很难判断该工业区的经济及其意义。

对这些展位的展品可以作如下评价。华东展位展出的是纺织工业品以及能够表现旧中国工业生产的其他部门的产品。华北盛产小麦、皮革、毛料。东北是新的重工业区。西北是肉制品原料区、农业区和可以狩猎的地区。西南盛产的药材较为出名。关于上述地区的其他方面的展品在展览会中展出得很少，或者完全就没有展出，这说明，华南地区同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很弱，华南地区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地区的经济能力。

展品的橱窗中同时也进行接待工作，在其中进行各种会谈、谈话和招待活动。这里不仅仅进行谈判、签署商业合同，而且人们也到这里休息，并把自己的印象和愿望写进访客意见簿里。

在工业展品橱窗集中了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岛加工工业、采矿工业领域的展品、模型和图表。主要有 9 个领域的代表：纺织、食糖、纸、橡胶、电子设备、皮革、化工、机械制造、采矿。

用各种各样的黄麻编制的粗绳，其中包括编织的袋子和包，这样的展品展出得较为充分，这些产品大量从华南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国家。

糖厂的巨大模型充分展现了从甘蔗生产蔗糖的工艺。经常有成群的大学生、工人和带着笔记本的专家围着这一模型参观。展出的图表展现了当地的甘蔗原料基地蔗糖生产的发展前景。在甘蔗的种植面积方面广东省占据了领先的地位。该地区甘蔗的生长期是1年,而在中国的其他省份,甘蔗的生长期是1.5—2年。现在蔗糖由家庭手工生产。

在纸业生产的展位展示了新闻纸的样品以及其他的纸张。在广东省有两个造纸厂。一个是广东造纸厂,在停工18年之后于1951年4月投产。该厂只生产新闻纸。广东省生产的主要的纸浆来自许多小的作坊。该厂生产的纸的质量不高,主要是各种包装纸、画纸、硬纸板等。由于对纸的需求不断增长,该厂的生产也在不断增长。

橡胶产品的生产发展非常快。1950年7月广东共计只有50多个橡胶加工企业并生产橡胶产品,而到1951年初,橡胶加工企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218个。橡胶加工企业最为重要的产品是橡胶底鞋。1950年7月生产了118 700双橡胶底鞋,而在12月生产了786 800双橡胶底鞋。还生产了大量的橡胶轮胎以及用于其他设备的橡胶产品。

在电子设备领域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大量的带罩的电灯、电灯电池、汽车电瓶以及各种蓄电池。

皮革制品展位的产品数量众多,品种丰富。广东省的皮革,特别是广州的皮革是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首先作为原料的毛皮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然后进行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再在中国销售。现在中国市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依赖完全消除了。由于拥有大量的大型牲畜和猪,华南具有继续发展皮革工业的广阔前景。

机械制造是一个新的部门。广州没有什么大的机械制造厂。但是有一些小的企业,它们在协作的基础上生产出一些复杂的机械,比如缝纫机、小功率的摩托车、照相机、各种光学仪器,比如显微镜。

采矿业展位的许多展品表明,华南在稀有金属的开采方面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展出的样品有:钨矿、锡矿、锑矿、钼矿、铜矿、锌矿、硫化铁矿、硫矿以及其他的矿藏。这些展品通常是大量的矿石岩块,还有海南岛的铁矿样品以及其他的矿藏样品。广东省和广西省的主要矿藏是钨矿、锡矿、锑矿、锰矿和硫矿。

矿山模型引起了展览会参观者的注意,这些矿山的设计考虑到了使用电力的新方法开发矿藏,考虑到了发展电力来利用水资源,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山区水资源都很丰富。

橡胶产品展位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该展位展出了活灵活现的橡胶植物,展示了生产橡胶产品的流程,然后展现了在橡胶产品半成品之前的加工。

在其他的展品中较为特别的是广州水泥厂的部分模型。

在手工作坊产品橱窗展出的是制作丝袜的丝绸(供热带国家使用)、瓷器和陶器以及各种各样的苇席和用草编织的编织品——草席、篮子、包、帽子,等等。亚麻制品和绣花制品——桌布、刺绣(不同于汕头地区的刺绣)、伞、折扇、装饰品、用象骨制成的制品,在广州享有盛名。对于象骨雕刻品,在南方的中国人是非常引以为荣的。除了做工精细之外,它们还表现出了如下特点:在半粒米大小的象骨上可以刻上13个文字,在细如发丝的骨头上可以

绘上多达 23 个字的三字经,这些字句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

日用品橱窗给人留下的完整的印象是:华南当地的产品通常都是消费品。华南生产的所有产品几乎都是当地所需求的,以前那些首先用于出口丝绸、亚麻、瓷器、皮革等产品的行业现在也是这样。矿山工业除外,重新发展的一些行业,比如松香及部分制糖工业除外。因此,在日用品橱窗展出了所有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缝纫机和各种鞋、家具和服装、器具和作业本等。参观该橱窗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华南当地的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居民对日用品的需要。

苏联驻广州领事

A. M. 马卢欣

1951 年 12 月 12 日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37, д. 723, л. 215 - 228

№133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在华苏联医务人员

(1951 年 12 月 12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2 月 11 日至 1952 年 2 月 27 日会议第 85 号记录
1951 年 12 月 12 日

第 20 项 关于 B. X. 瓦西科夫、H. C. 切特韦里科夫和 B. C. 特列菲洛夫等同志。

一、接受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建议:

1. 将 B. X. 瓦西科夫教授从中国召回,派遣医学副博士 B. C. 特列菲洛夫同志赴中国中共中央从事医务工作,为期 1 年。

2. 将切特韦里科夫教授在中国的工作期限延长 1 年。

二、特列菲洛夫和切特韦里科夫两同志在中国逗留期间的物质保障问题可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49 年 8 月 9 日第 3424 - 1425cc 号和 1950 年 1 月 30 日第 357 - 122c 号等决议相关规定加以确定。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2, л. 5

№1338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沈越前往苏联治病问题

(1951年12月2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1年12月28日

第162项 关于沈越同志来苏联治病。

1. 满足中国外交部的请求,并准许沈越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主任^①来苏联治病。
2. 迎接和招待沈越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2, л. 29

^① 原文如此。经查沈越时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编注

1952 年

№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 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

(1952 年 1 月^①)

对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签署的与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目前除日本外,已得到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和洪都拉斯的批准。最近杜鲁门也向国会请求批准对日和约。无疑,继美国之后,其他国家也会批准条约,该条约将被他们视为生效。

美国及其支持美国的国家无疑将借口和平条约生效,在最近宣布取消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将只剩下苏联的代表。在远东委员会中可能也会形成类似局面。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如今早已无所事事,所以美国也就毫无顾忌地奉行自己的对日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等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占领”而由我们方面采取主动,宣布停止对日占领和取消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取消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以及要求从日本领土上立即撤走所有占领军并将全部主权交还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就作这样的郑重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很难向社会舆论解释,为什么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却建议取消 1945 年 12 月由盟国决议建立起来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美国代表或者其他国家代表提出建议或者发表声明要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活动时,我们驻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不应反对停止这些机构的活动,但是应该发表简短的声明对美国政府在這些机构中奉行的对日政策进行批评。鉴于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所以我们反对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活动的意见,第一,不能阻止这些机构被取消;第二,必然招致日本本国的不利反应。除此之外,美国人和日本反动派绝不会放过机会,把我们的反对意见说成似乎苏联想继续占领日本并且必然会被英美集团和日本反动派用作煽动敌视苏联的目的。

由于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行将被取消,于是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以什

^①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么方式保留我们在日本的代表处以及我们今后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日本报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日本报刊不久前曾报道,在日本首相吉田与杜勒斯会谈期间曾达成协议,将苏联驻日代表处作为商务代办处保留下来,似乎日本政府打算通过苏联驻日代表将此非正式地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认为,不必等到英美集团的代表宣布停止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之时,现在就采取相应步骤,通过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来与日本建立直接关系是适宜的。之所以必须建立这种关系是因为,建立这种关系必然在日本人民中产生良好反应并在相当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的宣传化为乌有。而在日本仅仅保留苏联商务代办处是不够的,因为苏联与日本之间已产生和将产生的不仅是贸易问题,而且还有需要与日本政府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外交部提议授权基斯连科同志以非正式方式弄清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可能性的态度,并将查明的情况上报以获取进一步指示。

如果查明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的态度是积极的,那么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指示基斯连科同志以正式方式向日本人提出这个问题。在与日本政府谈判时要指出,苏联驻日代表处的任务将是就涉及和平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苏日相互关系中将发生的其他问题,与日本政府直接联系。

在办理苏联驻日本代表处手续时,不需要通过天皇裕仁,因为裕仁是被苏联宣布为战争罪犯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在苏联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交换信件就够了。

至于远东委员会,如果提出就它是否停止活动进行表决的问题,我们驻远东委员会的代表就不参加表决投票。

苏联外交部认为,将我们关于建立苏联与日本直接关系的预定措施计划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①

敬请审议。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14—2117页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No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
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

（1952 年 1 月^①）

.....^②

3. 关于高炮部队武器装备及其人员的评估和鉴定

——我第八十七高炮师 1951 年 4 月组建于哈尔滨市。该师由 2 个团（第一五一和一七七高炮团）组成，配备有各口径高炮多门。1951 年 6 月 4—12 日期间转移至新驻防区——中国安宁市。

该师各部队人员和武器装备均根据国家相关计划配给。

每团拥有 4 个营，各营平均有 8 门 85 毫米大口径高炮，共计 32 门，各营平均有 6 门 37 毫米小口径高炮，共计 24 门。

另外，各营还补充了一门 57 毫米中口径高炮，为各营提供掩护任务，防备敌强击机和俯冲轰炸机空袭。

——我第九十二高炮师 1951 年 4—5 月组建于伊尔库茨克市。该师共有 3 个团（第六六一、第六六六和第六六七高炮团），拥有各种口径高炮多门。1951 年 6 月 1—10 日期间该师抵达新驻防地——安宁市。

其各团装备情况与第八十七高炮师类似。

抵达中国安宁市我高炮部队构成情况如下：

部队名称	所属团数量	所属营数量		高炮数量		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	炮瞄雷达站 (COH)		环视雷达站 (CKO)		武器弹药基数	
		步兵	机械化兵	步兵	机械化兵		COH-26 型	COH-3K 型	长波	低频机站 C-3	85 毫米	37 毫米
第八十七高炮师	2	8	8	64	56	8		8	1	2	18	30
第九十二高炮师	3	12	12	96	84	12	3	9	4		9	15
总计	5	20	20	160	140	20	3	17	5	2	18	30

①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②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第10高空探照灯团由2个营组成,1951年6月15日抵达新驻防地——安市。

该团武器情况:

雷达探照灯:

150型雷达探照灯——36台;

3-15-4型雷达探照灯——36台;

长波型环视雷达——1台。

高炮部队的人员配备情况:

——军官,97%;

——士官,86%;

——士兵,102%。

各部队人员不齐的总体比重为3%。

根据政府指令,各部队在出发前的组建时间为1个月。在组建过程中各部队均补充了一些未经培训人员。这些人主要来自其他兵种各部队。

这种情况对各部队参战初期完成保卫相关目标的作战任务增加了一定困难。

中口径高炮营在作战中不能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紧密配合和协作,而各高炮营没有进行过8门高炮的齐射训练。

各部队在火力配置、仪器操作、测距仪和无线电雷达等使用方面均没有与敌机尤其是高速飞行的敌机作战的实际经验和训练。

由于缺乏相关的指导文件、教令和操作规程,均增加了各部队增强军事技能和训练的难度。

于是,我部只能在实战中摸索和利用军官们提供的一些理论知识和经验。1951年7月初从军机关指挥部派来的空防部门的军官对各高炮部队的实际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随后,从1951年7月起,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各部队还是利用作战间歇和一级战备期间组织了大量战备训练。

高炮部队武器装备的技术情况属于一级和二级水平。

高炮部队所装备炮瞄雷达站的雷达-3K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设备中替代了许多非标准零部件,因而工作状态很不稳定,往往过2—3个小时就会出现故障。

各高炮部队在武器、弹药和汽车交通运输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各部队自己都有高炮牵引车和交通运输车辆。它们基本上都是些外国产的老牌汽车,由于长期使用,汽车零部件大都老化,可我们的替代零部件储备却很有限。

各部队总体战备技术指数平均为85%。

.....

三、高炮部队作战行动的成果

(1) 1951年6—8月期间

在完成作战任务,防止敌空军对鸭绿江铁路桥和安东、庙沟、新义州等地区机场实施空

袭的同时,我第九十二和第八十七高炮师还配合歼击机航空部队、防空火箭部队等部队对敌空军白天和夜间的空袭活动实施反击作战。

1951 年 6—8 月间,安东地区高炮部队共对空军实施反击作战 45 次,其中:

编 号	月 份	空袭数量				总 计
		机群	单机	白天	夜间	
1	6	3	16	4	15	19
2	7	3	9	3	9	12
3	8	2	12	5	9	14
总 计		8	37	12	33	45

期间,我军高炮击中敌机 125 架,个别高炮部队实施战斗射击 260 次……

……6 月份,高炮部队实施对空射击的次数比 7—8 月多。原因在于,6 月间敌机飞越高炮部队炮火射程控制区域的次数较多,即这一时期敌机在我高炮部队掩护目标范围内活动比较频繁。

高炮部队对空射击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夜间,且主要针对敌 B-26 轰炸机编队。

例如,当月敌人所实施的 45 次空袭中完全由轰炸机实施的便有 37 次,而由敌 F-84 和 F-86 以 2-4-6-8 为编队单位所实施的空袭只有 8 次。

我高炮部队所实施的 260 次对空射击中,126 次是使用中等口径高炮进行的。其中:夜间 84 次(针对敌轰炸机),白天 42 次(针对敌歼击机)。

使用小口径高炮作战 134 次,其中:夜间 84 次,白天 50 次。

……小口径高射炮兵射击数量在 7 月,尤其在 8 月份明显减少,原因在于:敌 B-26 在空袭时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 4 000 米以上。

由于在 6 月份遭到了我高炮部队的重创(被击毁飞机 5 架),敌人放弃了在白天继续使用歼击机来完成本应由强击机和侦察机所承担的任务。与此同时,敌歼击机在我高炮射击区域内也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 7 000—8 000 米),而不像 6 月份时那样,在气象条件差和我空军不出动的情况下只在 100—1 500 米范围内飞行。

面对这一情况,我中口径高射炮兵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 等部队紧密配合,采用对空齐射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空袭。

我小口径高射炮兵部队在夜间的对空射击只是拦阻性射击。

……以整团为单位投入战斗,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可能。问题在于,我炮瞄雷达站-3к 工作状态还不太稳定,而拦阻性射击也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使用。

1951 年 6 月 10 日至 9 月 1 日间,我驻防安东地区高炮部队(不包括运动作战的各营在内)共击毁 F-84 敌机 9 架。

击毁敌机的数量、射击方式和炮弹口径等相关情况参见下表:

月份	部 队	击毁敌机数量								弹药消耗	
		中口径高炮部队				防空导弹部队				85 毫米	37 毫米
		雷达	高射炮 射击指 挥仪	强击 航空 兵	总计	主力 轰炸 机	强击 航空 兵	俯冲 式轰 炸机	总计		
6	九十二高炮师	-		2	2	—	1	2	3	1 008	6 925
	八十七高炮师	1	-	—	1				—	340	3 647
总 计		1		2	3	-	1	2	3	1 348	10 572
7	九十二高炮师			1	1	—	1	1	2	671	2 681
	八十七高炮师	-	—	—	—	—	—		—	982	1 796
总 计		-	—	1	1		1	1	2	1 653	4 477
8	九十二高炮师			-	-	—	—	-	—	610	3 275
	八十七高炮师			-		—			-	996	6
总 计						—				1 906	3 281
总 计①		1	—	3	4	-	2	3	5	4 907	18 320

……高炮部队作战成果

(2) 1951 年 9—12 月期间

第九十二高炮师在完成保卫鸭绿江铁路桥及安东、庙沟、新义州和义州等地区各机场的同时,还在 1951 年 9—12 月间配合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和防空导弹等部队对敌空军的 38 次空袭实施了反击作战,其中:白天 10 次,夜间 28 次。

期间,我高炮射击共击中敌机 99 架。该师各部队共实施战斗射击 147 次。其射击时间,攻击敌空军类型和所用火炮口径等情况可参见下表:

月 份	在我高炮部队火力控制 范围内的敌机数量			我部队实施射击次数						
	轰炸机	歼击机	总 计	中型口径高射炮			小口径高射炮			总计②
				白天	夜间	总计	白天	夜间	总计	
9	2	1	3	2	2	4	—	—		4
10	11	1	12	1	34	35	—	6	6	41
11	19	21	40	7	48	55	1	10	11	66
12	20	24	44	10	18	28	-	8	8	36
总计	52	47	99	20	102	122	1	24	25	147

① 此行数据系 6、7、8 月份的合计数量,其中 18 320 应为 18 330。——编注
② 此列数据应为“我部队实施射击次数”的合计。——编注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的射击次数总量几乎比前3个月（6—8月）减少了2倍。

原因在于：敌空军活动减少；敌机在我高炮防护区域内活动时提升了飞机飞行的高度。

我军在9—12月共实施射击147次。如果以我高炮部队所防卫的43个目标来计算，针对每个防卫目标，我军平均有三个营在实施射击。

在实施射击时，我高炮部队多采用中口径高炮（147次射击中有122次都是使用中口径火炮），其中：针对敌轰炸机52次，针对敌歼击机47次。

中型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122次，其中：夜间针对轰炸机102次，白天针对歼击机20次。

小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25次，其中：夜间24次，白天1次。

在配合友邻部队对敌空军的空袭所实施的38次反击作战中，我高炮部队针对敌B-26轰炸机群的射击就达到24次，针对敌空军集群式空袭所实施的反击性射击14次，其中：夜间6次，白天8次。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击毁敌机数量——无。

在此期间弹药消耗总体情况：

——85毫米，6 092发；

——37毫米，2 116发。其中：

拦阻性射击：

——85毫米，1 160发；

——37毫米，1 964发。

在未击毁敌机的情况下消耗如此多的弹药，原因在于：

——敌空军白天活动减少；敌轰炸机白天完全停止活动；

——敌B-26轰炸机在对我设施实施轰炸时飞行高度均保持在8 000—9 000米；

——当敌轰炸机进入我高炮最大射程范围时，我军炮火火力密度不够……

……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副军长、上校

波巴霍

№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

(1952年1月7日)

绝 密

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以及驻上海和天津的总领事的报告,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部分当地苏联公民长期没有工作,陷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

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现象,中国当局无力保证当地的苏联公民找到工作。我们的领事多次向中国当局呼吁,请求安排工作,哪怕是部分安排当地苏联公民的工作,这些请求通常都会遭到中国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中国公民中也存在失业现象。

此外,正如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所指出的,中国当局拒绝为当地苏联公民安排工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政治上对这些同志不信任。中国当局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允许这些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

根据可靠的资料,在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现在共计有大约2500名无业的苏联公民。

由于没有工作,这部分苏联公民被迫向非常敌视苏联的国际救援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以及加拿大、以色列驻中国的领事代表在招募一批苏联公民到其他国家。根据得到的情报,驻中国的国际救援组织分部完全处于英美间谍的控制之下,最近该组织开始积极活动,打算以难民为伪装把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当地的苏联公民和没有苏联国籍的俄罗斯移民送出中国。

拒绝使当地苏联公民返回苏联的同时,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正在从中国被遣返回国,这使生活在中国各地的苏联公民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情绪,并且被我们的敌对势力用来反对苏联。此外,我们拒绝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可能引起中国当局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他们会想,好像我们很想把这些苏联侨民留在中国。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以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建议,在1952年春夏之交把那些没有工作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国,遣送的条件正如1947年把在中国的3000名苏联公民遣送回国的条件一样。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还建议,允许国内较为需要的一些苏联公民在1951年返回苏联,其数量为100—150个家庭,他们在苏联应该有亲属,并且同意接收他们。

我们认为,在1952年应该允许250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以及东北返回苏联,还应该允许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认真进行逐个的审查之后,在1952年为100—15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分发返回苏联的签证,这些苏联公民在苏联应该有亲属。为了分发签证,允许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建议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隶属于苏联驻中国大使

馆，其成员应该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要取得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的同意。

这一问题已经在 195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一周后再审议该问题。

决议的草案附后。^①

请审议。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

葛罗米柯

1952 年 1 月 7 日

РГАСПИ, ф. 82, оп. 2, д. 1259, л. 132 - 133

№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

（1952 年 1 月 12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2 月 11 日至 1952 年 2 月 27 日会议第 85 号记录
1952 年 1 月 12 日

第 252 项 关于毛岸青来苏联治病。

1. 满足中国政府关于让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青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 迎接和招待毛岸青同志及其随行人员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毛岸青同志的工作则委托给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和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2, л. 51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

(1952 年 1 月 12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2 月 11 日至 1952 年 2 月 27 日会议第 85 号记录
1952 年 1 月 12 日

第 254 项 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1952 年 1 月 20 日第 604 号记录第 1-rc 条)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的提议。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2, л. 51

№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 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

(1952 年 1 月 15 日)

.....^①

一、本师的作战行动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由师机关、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第三十四航空技术营、第七五五航空技术营、第一一五独立通讯连、第一五八流动航空修理部队(修理车 4 辆)和第二一八警备营等部队组成。根据苏联军事部长和苏联空军驻中国行动小组负责人的命令,我部于 195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间从鞍山机场转场至安东机场,任务是: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地区的铁路桥、水电站和机场以及朝鲜西北部地区的交通线实施空袭。

本师歼击航空兵各团在顺利转场之后,目前已做好准备,并随时可以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的飞行员有:第一七六近卫歼击航空团 29 人,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 30 人。

^①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已装备武器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战机有：携 PД-45Φ 型炮弹的米格-15 共 30 架。另外，师机关还有 4 名飞行员和 2 架携 PД-45Φ 型炮弹的米格-15 飞机。

本师从 1951 年 4 月 2 日起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共有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机组 58 个，其中：师机关 2 个，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 26 个，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 30 个。其他飞行员由于健康原因暂时均不承担飞行任务。

在我师来此之前，驻防安东机场担负保卫北朝鲜交通线和后方设施任务的是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该师现已转场至鞍山机场。

总之，我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未曾参加过战斗的情况下，于 1951 年 4 月 2 日开始担负上级所赋予的战斗任务。期间我们只能以自身的力量，即 58 个携 PД-45Φ 型炮弹的米格-15 战机的机组来单独对敌。在我师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敌人空军来袭的情况下，其他部队由于基地距我达 175—200 公里之遥，根本无法给予我们及时和实质性的帮助。

截至 1952 年 1 月 5 日我师作战行动总体情况如下：

实施战斗飞行 6 269 架次，其中，夜间 6 次，截击敌空军 4 715 次；掩护安东地区目标 1 282 次，自由“搏击”132 次，执行其他战斗任务 134 次；

飞行时间 4 946 小时，其中：在复杂气象条件下——1 167 小时 07 分，夜间——5 小时 36 分；与敌进行大规模空战 142 次，参战飞行员 2 201 人次。

在空战总数中：

1. 以双机为单位作战 5 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 5 次，

中队为单位作战 36 次，

团为单位作战 40 次，

师为单位作战 14 次，

军为单位作战 42 次。

2. 与优势敌人作战 83 次，

与力量相等敌人作战 17 次，

以优势力量对敌 42 次。

3. 与敌轰炸机作战 3 次，

与敌侦察机作战 2 次，

与敌歼击机 F-80、F-84、F-94、F-51、“格洛斯特流星-4”作战 35 次，

与敌歼击机 F-86 作战 102 次，

以编队方式作战 384 次，其中：

以双机为单位作战 18 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 14 次，

以中队为单位作战 130 次，

以团为单位作战 122 次，

以师为单位作战 20 次,

以军为单位作战 80 次。

空战中我师飞行员共击落敌机 194 架,其中: B-29,12 架,B26,1 架,PB-45,1 架,F-86,97 架,F-94,8 架,F-80,22 架,F-84,36 架,F-51,6 架,“格洛斯特流星-4”,11 架。

击落敌机的我师飞行员及其战果:

上校维什尼亚科夫,6 架: F-86,2 架,F-84,2 架,F-51,1 架,“格洛斯特流星-4”,1 架;

少校苏博京,10 架: B-29,2 架,F-86,3 架,F-84,2 架,F-80,1 架,“格洛斯特流星-4”,2 架;

少校舍别尔斯托夫,12 架: B-29,1 架,F-84,7 架,F-86,3 架,F-51,1 架;

大尉克拉马连科,10 架: F-80,2 架,F-86,6 架,“格洛斯特流星-4”,2 架;

大尉戈什,8 架: B-29,1 架,B-26,1 架,F-86,2 架,F-84,1 架,F-80,1 架,F-51,1 架,“格洛斯特流星-4”,1 架;

大尉苏奇科夫,9 架: B-29,2 架,F-86,2 架,F-84,3 架,F-80,2 架;

大尉米拉乌什金,13 架: B-29,1 架,F-86,5 架,F-84,3 架,“格洛斯特流星-4”,4 架;

大尉贡恰罗夫,4 架: F-86,2 架,F-84,1 架,F-94,1 架;

上尉阿博拉兹佐夫,4 架: B-29,1 架,F-86,2 架,F-84,1 架;

上尉普利特金,4 架: B-29,1 架,F-86,1 架,F-51,1 架,F-84,1 架;

大尉瓦西科,3 架: F-86,2 架,“格洛斯特流星-4”,1 架;

大尉穆罗舍夫,1 架: F-86,1 架;

上尉戈洛瓦乔夫,2 架: F-51,1 架,“格洛斯特流星-4”,1 架;

大尉韦尔德什,2 架: F-86,1 架,F-51,1 架;

上尉久兹,2 架: F-86,1 架,F-84,1 架;

上尉戈戈列夫,1 架: F-80,1 架;

上尉古雷,1 架: “格洛斯特流星-4”,1 架;

大尉祖巴金,1 架: “格洛斯特流星-4”,1 架;

上尉克拉夫佐夫,1 架: F-84,1 架;

上尉尼库林,1 架: F-86,1 架;

上尉拉祖金,3 架: F-86,2 架,F-84,1 架;

上尉谢尔久克,1 架: F-86,1 架;

上尉马洛兹,1 架: F-86,1 架;

大尉雅博洛科夫,1 架: F-86,1 架;

少校古利亚耶夫,1 架: F-86,1 架;

上校佩佩良耶夫,15 架: F-86,11 架,F-94,2 架,F-80,1 架,F-84,1 架;

中校米图索夫,6 架: F-86,4 架,F-84,1 架,F-80,1 架;

大尉伊万诺夫,7 架: F-86,5 架,F-80,2 架;

大尉阿尔费耶夫,7架：F-86,5架,F-80,1架,F-84,1架；
上尉舍巴诺夫,6架：B-29,1架,F-80,5架；
少校舍拉马诺夫,5架：B-45,1架,F-86,1架,F-94,1架,F-80,2架；
大尉博卡奇,5架：F-86,4架,F-84,1架；
大尉阿巴库莫夫,5架：F-86,3架,F-94,1架,F-80,1架；
上尉雷日科夫,4架：F-84,2架,F-86,1架,F-80,1架；
大尉扎布拉夫涅夫,4架：F-86,2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纳扎尔金,3架：B-29,1架,F-94,1架,F-80,1架；
上尉科切加罗夫,3架：B-29,1架,F-86,2架；
上尉傅金,3架：F-86,2架,F-80,1架；
大尉陀思妥耶夫斯基,3架：F-86,1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穆拉维约夫,3架：F-86,2架,F-80,1架；
上尉索斯科维奇,2架：F-86,2架；
上尉布伯科,2架：F-94,2架；
上尉科尔巴科夫,2架：F-84,1架,F-80,1架；
上尉博罗夫科夫,2架：F-86,2架；
上尉基里索夫,1架：F-86,1架；
上尉瓦西里耶夫,1架：F-86,1架；
少校安季波夫,1架：F-84,1架；
上尉奥斯塔片科,1架：F-84,1架；
上尉雷巴斯,1架：F-86,1架；
大尉卡波拉诺夫,1架：F-86,1架；
上尉约夫列夫,1架：F-86,1架；
上尉利特维纽科,1架：F-86,1架。
各部队战果分配情况：

作战类型	部 队			总 计
	机 关	第一七六团	第一九六团	
1. 战斗飞行数量	75	3 114	3 074	6 263
其中：拦截敌空军	43	2 405	2 267	4 715
掩护工业和铁路设施	10	571	701	1 282
自由“搏击”	22	41	69	132
其他		97	37	132 ^①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续 表

作战类型	部 队			总 计
	机 关	第一七六团	第一九六团	
2. 夜间战斗飞行次数	2	—	4	6
3. 空战时间	59.00	2 498	2 389	4 946
其中：夜间空战时间	1.45	—	3.51	5.36 ^①
4. 特殊飞行时间				
云后飞行	15.02	356.24	281.35	653.01 ^②
云中飞行	2.24	47.33	45.00	94.57
能见度差情况下飞行	6.20	154.38	258.11	419.09 ^③
高空飞行	36.09	1 499.36	1 639.00	3 174.45
5. 空战实施情况				142 ^④
以双机为单位		4	1	5
以分队为单位		4	1	5
以中队为单位	—	21	15	36
以团为单位	-	28	12	40
以师为单位	-	14	13	14 ^⑤
以军为单位	-	42	40	42 ^⑥
单机空战	12	1 172	1 029	2 201
6. 机群式起飞				
以双机为单位	2	10	6	18
以分队为单位	—	7	7	14
以中队为单位	-	63	67	130
以团为单位		58	61	119
以师为单位	-	20	20	20 ^⑦
以军为单位	—	60	80	80 ^⑧
7. 击落敌机数量	1	98	95	194
8. 己方损失：飞行员 飞机	—	4	4	8
	—	13	10	23
9. 煤油损耗(吨)	69	3 450	3 195	6 714
10. 弹药消耗：H-37 弹 HC-23 弹	54	4 170	4 622	8 846
	120	12 215	15 544	27 879
11. 抛弃副油箱	140	3 880	3 588	7 608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

尽管气象条件复杂多样,但我师飞行员在与敌空军的战斗中表现得坚定果断,战术运用和组织得当,因而仍是取了相当优秀的战果。关于我师的空战,我们可用我部队 1951 年 6 月 18 日、20 日和 7 月 8 日、11 日和 21 日等的实战情况来举例说明。

1951 年 6 月 18 日,我师 8 架米格-15 组成的编队在苏博京少校的率领下起飞,拦截敌歼击机。在宣川地区高空 9 000 米处,我机群与敌 16 架 F-86 相遇。敌人以“纵队”战斗队形向我迎头飞来。根据形势,在敌力量多出我一倍的情况下,苏博京少校依然决定向其发起攻击。

苏博京少校果断地率队向敌进攻,一个回合之后敌队形被打乱,一些敌机退出战斗。

在此次空战中,苏博京少校表现得尤其勇敢顽强,并展现了自己高超的空中格斗技术。他带领自己的僚机率先向敌分队机群开火,经过近距离三个点射之后,敌 1 架 F-86 当即在空中爆炸。

之后,苏博京少校迅速前去帮助我军 1 架正受到敌 2 架 F-86 夹击的战机。虽然此举可能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勇敢地向这 2 架敌机冲去。他的果断行动迫使敌人放弃了对我军那一架战机的攻击,并退出战斗。

正在这时,另 2 架敌 F-86 已成功逼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

苏博京少校极力以大角度俯冲来摆脱敌人,但并未获成功。其中 1 架敌机已接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 50 米距离,并不断向其开火。

为了彻底消灭敌人和赢得这场不对称战斗的胜利,苏博京少校一个空中急刹车向敌机撞去。敌机在与苏博京的飞机相撞的同时,失去平衡,尔后与飞行员一起像石头一样向下栽去。而苏博京少校则在两机相撞的同时用弹射椅将自己弹出,而其被撞碎的飞机则向相反方向跌落。

.....

我师损失情况概述:

截至 1952 年 1 月 5 日我在空战中共有 8 名飞行员阵亡,其中之一为朝鲜高炮部队所伤;损失飞机 23 架。

12 人在飞机战斗中受伤后使用弹射装置逃生,其中 9 人是因飞机被击伤后操纵失灵,1 人因飞机发动机停止工作,1 人因飞机起火,1 人与敌撞机。另有 3 人跳机后氧气罩脱落,其中 2 人短暂失去知觉。

我师飞机和飞行员损失的具体情况:

1951 年 4 月 3 日,在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上尉尼基琴科牺牲,所驾飞机被击毁。

1951 年 4 月 3 日,在与敌 F-86 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上尉莱伊阿特洛夫斯基的飞机被敌击中,飞行员仍驾机在机场迫降,机身上被击中 27 弹,但尚能使

用,不必大修。

1951年4月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上等飞行员上尉韦尔德什的飞机在空战中被敌击中,机身中弹45发。飞行员驾机在机场成功迫降。受伤的飞机不用大修。

1951年4月7日,在与敌F-86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大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伤。由于飞机控制失灵飞行员跳机并顺利着陆。所驾飞机坠毁。在跳机时飞行员左前臂和左胫肌肉被碰伤,住院3个月后康复归队。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中尉Φ. B. 斯拉博津牺牲,飞机被击毁。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中尉涅戈佳耶夫的飞机被击伤。由于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被迫在机场外迫降。飞行员安然无恙,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大尉萨姆辛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生还,并于两天后归队。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4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中队长上尉穆罗舍夫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导致眼睛巩膜充血,腰和颈椎受伤。经1个月住院治疗后,终因外伤性肌炎,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1951年5月1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大尉尼库林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他在从高空11500米坠至2000米期间失去知觉。飞行员失去知觉系面部所带氧气罩脱落和供氧器-15停止工作所致。他在住院2个月零10天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5月20日,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上尉纳扎尔金的飞机在空战中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在落地时由于地面不平导致其左膝和左胫受伤。飞行员1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18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领航员苏博京少校的飞机在与敌F-86空战中受伤。在所驾飞机与敌机相碰撞的同时我飞行员跳机,导致眼巩膜充血,右肩关节囊扭伤和破裂。飞行员3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大尉普利特金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20天住院观察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涅戈佳耶夫中尉的飞机被朝鲜人民军高炮击毁,飞行员阵亡,飞机坠毁。

1951年7月11日,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政治处副中队长拉里奥诺夫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布拉兹佐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大尉拉里奥诺夫当场牺牲。奥布拉兹佐夫大尉在负重伤情况下丢弃了已降至最低速度并处于半翻转状态的飞机,跳伞着陆。在住院观察期间由于休克导致死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9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大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着陆。在跳机期间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左前臂碰伤,眼巩膜充血,腰椎剧烈拉伤。由于脑震荡、外

伤性肌炎、眼巩膜充血住院 42 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其所驾飞机坠毁。

1951 年 10 月 26 日，在与 F-80 和 F-84 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 Ф. А. 舍巴诺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阵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 年 11 月 8 日，在与 F-80 和 F-84 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 А. Ф. 特拉温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所驾飞机坠毁。

1951 年 11 月 27 日，在与敌兵力占优的 F-86 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韦尔德什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约西普克大尉的飞机被击伤。我两名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韦尔德什大尉左肩扭伤，12 天后归队，约西普克大尉左膝关节碰伤，1 个月后归队。所驾两架飞机均坠毁。

1951 年 11 月 28 日，在与 F-86 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尉所驾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其着陆时左膝关节韧带拉伤，目前尚未归队，仍在疗养院疗养，所驾飞机坠毁。

1951 年 12 月 5 日，在与 F-80 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 А. Д. 雷日科夫大尉所驾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飞机坠毁。

1951 年 12 月 11 日在与敌歼击机 F-86 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夫钦尼科夫大尉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肩关节脱臼，关节囊撕裂。目前尚未归队，仍在接受治疗。所驾飞机坠毁。

除上所述外，在空战中我方还有 43 架飞机受伤，其中之一是被敌人一架被击毁的飞机在空中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击伤的。

共有 6 名飞行员受伤：

1. 1951 年 4 月 12 日，上尉雅科夫列夫在战斗中受伤——右肩胛骨、右手腕和左半部下颌骨大面积创伤。住院 20 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2. 1951 年 5 月 1 日，飞行员戈洛瓦乔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太阳穴前顶部分弹孔正切式创伤。25 天后归队。

3. 1951 年 5 月 20 日，飞行员济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粉碎性创伤。1 个月后归队。

4. 1951 年 6 月 20 日，飞行员尼古拉耶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身体多处粉碎性骨折，左膝 1/3 中段粉碎性骨折。45 天后归队。

5. 1951 年 11 月 23 日，飞行员缅希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区域和右肩正切弹孔式创伤。至今尚未归队。

6. 1951 年 12 月 17 日，飞行员卡波拉诺夫上尉在战斗中负伤——左手腕贯穿性创伤，5 个手指被切除。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关于空战中我军物资损耗情况将在空军工程部门工作一章中再作详细叙述。

.....

结论:

1.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所属部队圆满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为安东地区的设施和朝鲜西北地区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防止敌人空袭的任务。

本师全体飞行员,每天都在一般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积极地与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敌机进行着战斗。他们在战斗中共击毁了 191 架敌机,与此同时自己在物质和人员方面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2. 在投入作战的第一个月里,我师所属部队通过与敌激烈战斗,将敌轰炸机和强击机驱逐出了安东和朝鲜西北部地区。

1951 年 4 月 12 日,我师所有部队发挥我米格-15 战机的优势,在空战中击退了敌在大量现代歼击机掩护下的轰炸机群大规模密集式空袭行动。战后总结表明:在我歼击机的攻击下,敌人损失了参战轰炸机总量的 25% 以上,敌人的空袭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 7 月 21 日与敌 8 架 F-94,11 月 28 日与敌 30 架 F-86,12 月 1 日与敌 16 架“格洛斯特流星-4”和 16 架 F-84 等的交战中,我师各部队在数量占优势的敌人面前积极战斗,勇敢机智,最后均以大获全胜而告终,只是在 7 月 21 日和 12 月 1 日的战斗中有个别敌机逃脱。

3. 整个战斗期间我师各部队全体飞行员不怕牺牲,竭尽全力,以期能更好地完成政府所交给的任务。

全师飞行员的作战条件极其艰苦,经常是连续不间断地投入战斗,充分表现了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其他辅助部队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确保全军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不惜贡献出一切力量。

由于作战勇敢和英勇我师五位飞行员荣获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他们是:少校苏博京、上尉克拉马连科、戈什和阿博拉兹佐夫、大尉舍巴诺夫。

由于在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组织方面表现优异,能力突出,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所担任的任务,我师 153 人被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其中 15 名飞行员已是两次获得这一殊荣。

4. 经过 9 个半月不间断地紧张战斗,我师在保卫我战役纵深地区设施和防止敌空军轰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我师全体飞行员在以现代化高速喷气式歼击机与敌现代化喷气歼击机和轰炸机大、小机群的作战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我工程技术部队也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保障飞行员作战起飞,飞机、发动机、武器和电子特殊设备的保养,以最短时间使飞机再次起飞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经验。经过一年的锻炼,他们还对在野战条件下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对被战斗损坏的飞机装备进行抢修有了大量的实践和认识。

团、师各级指挥部也对在复杂空战条件下如何计划和指导部队投入作战,挫败敌人的大规模空袭,组织我大规模机群同时起飞和降落以及在地面和空中对我歼击机的作战进行现

代化的集中管理指挥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军上校

科热杜布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参谋长、近卫军上校

马列文内伊

1952年1月15日

ЦАМО РФ, ф. 324. иад, оп. 152723, д. 3, л. 1—5, 54—55, 87—91, 151—153

№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

（1952年1月22日）

绝密，禁止复印

急电、特电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打算在1953年在全国进行货币改革。由于没有能力在我国印制货币，我们请求苏联政府为我们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四种货币，印制的总数量为4.66亿张，用苏联的纸张印刷，并带水纹。

提供面值为5元和10元的货币的总数为450 000 000张，可以在1953年3—9月份提供，其余货币可以在1954年完成供应。

如果您同意，那么我们将派出专员把货币的样品和关于该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带往莫斯科，以便解决问题。请把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告知我们。

周恩来

1952年1月22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57—58

№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

(1952 年 1 月 28 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答复：

“周恩来同志，您在 1 月 22 日发送的电报我们收到了。我们同意按照您的请求，为中国印制货币。请通知我们，你们的代表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以便在莫斯科就所有的细节问题进行磋商，并完成这一任务。

菲利波夫

1952 年 1 月 28 日”

执行情况请回电告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59

№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

(1952 年 1 月 31 日)

发自北京，1952 年 1 月 31 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议。

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 3 点协议。

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 6 点协议(协议全文附后^①)。

① 见以下№00532 文件。——编注

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借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议的细节问题。

从敌方所提停战协议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议仍然不是最终协议，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议条款，同时还声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性出发。

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阴谋。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

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议，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一、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

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

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3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二、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记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三、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议规定的后方卸货点把用于增援的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运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议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

（二）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

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四、同时根据第3项协议第1款有关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议条款所规定的。

五、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货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

阳、原州、忠州、堤川、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川、釜山——共 12 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镇、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兴、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 15 处。

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货点中心向外 30 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

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 3—5 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义州、清津、咸兴、满浦镇和 1 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货点中心向外 5 公里。

六、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 4 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 2 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 1 人共 2 人组成。

美方提出建立 40 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双方各自开放 5 个后方卸货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 16 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 10 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货点,6 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七、中立国小组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和性能。

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八、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载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的地点。

所有上述 8 条都涉及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

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

请予答复。

关于第 2 项议程所达成的协议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 年 1 月 31 日

第 326 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No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

（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1952年1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第2项议程：‘规定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作为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1951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①

一、确立原则：双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线应成为军事分界线（办法是，根据情况在本协议第2条和第3条做出规定），按签署后的停战协议规定的时间，双方军队各自由该线后撤2公里，以便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

二、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述原则立即确定以现在的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确定非军事区的中间线。对这一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该协议和以上所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内停战协议签字，则不管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都不得作任何改变。

三、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将继续发生战斗，鉴于这一事实，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本协议以及本协议第2条所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和中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之内尚未签署停战协议，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根据实际接触线的改变，对该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做出改变，以便使改变后的军事分界线确系严格按照当时存在的双方之间的接触线划定的，从而成为休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

第3项议程：‘制定在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其中包括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能。’（1951年10月12—29日达成协议）^②

一、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武装人员应从停战协议签字之时起24小时内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二、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均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72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

除带有警察性质的部队（关于该部队双方专门达成相互协议）外，双方的任何军队从此时起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双方的任何武装力量都不得对非军事区实施任何武装暴力行为。

根据停战协议条款，双方均应在位于军事分界线属于己方的非军事区地区内处理行政

^① 这里指的是小组委员会达成协议，双方代表团会议达成协议的日期是11月27日。——编注

^② 原文表述有误，实际上第3项议程谈判是1951年11月27日开始，1952年5月2日达成协议。——编注

管理事务。

三、处于监督之下各方全部武装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均应在停战协议签字,并于生效后5天内撤出另一方后方的和沿海的岛屿和水域(原先处于另一方控制下的岛屿和任何其他岛屿另行达成协议)。

如果上述武装力量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撤出且无任何相互协议和拖延撤出的任何原因,则另一方为保证其安全和秩序有权对武装人员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四、为保证持久停战,以便双方较高级代表政治会议顺利进行,从而达成和平调解,双方均应保证,一旦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即不向朝鲜运送任何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和弹药。

在相互协定的规模内进行的军事人员的一切轮换均应报告停战委员会,以便受全权委托的中立国观察机构能够执行其任务,对在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内的轮换地点进行观察和监督。

五、双方均应指派同等数量的成员组成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停战协议进行观察和监督,通过谈判对任何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进行调解。正如停战协议所规定,观察和视察的职能应根据下列两点规定进行:

(一) 停战委员会应对非军事区负责,它通过直接派出联合小组履行其职责;

(二) 在非军事区以外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情况的地点内,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按委托履行职责。

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要求调查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时,它应进行直接视察。

六、双方同意向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能够为双方所接受的中立国提出要求他们同意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观察机构。该观察机构由停战委员会授权后,应按第4条和第5条第2款的规定负责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每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请求进行这种调查时,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立即向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或中立区以外发生破坏停战事件的地点派出视察小组,并应按停战协议的规定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并将这种观察和视察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双方均应给这些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视察小组提供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交通线上履行职能所必需的一切交通工具。”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第325号电

№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

（1952年2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2 月 11 日至 1952 年 2 月 27 日会议第 85 号记录
1952 年 2 月 1 日

第 362 项 关于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汉语配音。（1951 年 1 月 28 日第 606 号记录第 108 - rc 项）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在保留用俄语演唱的声乐节目的情况下用汉语配音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建议。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2, л. 75

№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

（1952 年 2 月 3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以下复电电文转告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您 1 月 31 日有关停战谈判的电报已经收到。

同意您所拟定的计划和您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

关于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观察委员会一事，我们认为应与波、捷领导同志商量，他们自然会同意的。

致以敬礼！

菲利波夫”

收到电报后请来电确认。

请电告执行情况。

第 72 号密码电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2, л. 78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5, л. 80

№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

(1952 年 2 月 5 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 年 12 月 11 日至 1952 年 2 月 27 日会议第 85 号记录
1952 年 2 月 5 日

第 380 项 斯大林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

通过斯大林同志建议的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即祝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2 周年。

附件：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同志

北京

在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 2 周年之际,请主席同志接受我的衷心祝贺,希望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与合作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2, л. 78、216

No0053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

（1952年2月8日）

发自北京，1952年2月8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发给我的电报和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的内容摘要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的电报：

“一、今年1月16日1时，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曾来我处。他在谈话中说，朝鲜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不愿继续进行战争。

如果苏联和中国认为继续进行战争有好处，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并坚守自己的阵地。

我答复说，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上进行和平调解对我们是有利的。我还向他说明，在当前军事状况下，我方的有利条件和美国的困难都在增加。因此，停战协议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在军事方面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兵力，以便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朴宪永外务相离开我处时，表示同意我对整个局势的观点，并说他的访问只是一般的会见，他的意见不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意见，而纯粹是个人意见。

二、1951年，朝鲜政府征收农业税粮食计65万吨，其所占总收获量的百分比过大。现在有10%的居民正在挨饿。大多数农民的口粮仅能维持到2—5月。

如不迅速给予援助，则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春耕进行，而且会影响粮食产量。

据说，我国政府已批准给朝鲜政府提供30000吨粮食。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必须在3月份及时提供30000吨谷物给予帮助，以便农民能进行春耕生产。

三、我认为，尽管我们的预算也很紧张，但根据1951年预算年度的援朝计划来看，我们完全应计划拨出16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37亿卢布）来援助朝鲜。这一数字未必能缩减。请尽早将此列入总预算。”

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如下：

“你今年1月22日电报已收到。至于援朝问题，我们已将15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22亿卢布）的经费列入1952年的预算，该数额略微超过中国于1951年提供给朝鲜的贸易贷款、中国提供的紧急修复朝鲜铁路和供养东北境内朝鲜公民的款额。

如果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则可预见援朝经费势必增加。

今年1月底，朝鲜贸易相张时雨同志曾来北京就1952年交货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是确定由我国提供的货物总值为7000亿人民币（约合1.03亿卢布）。

朝鲜什么也不给我们作为交换,因此上述款额应作为贸易贷款额。

至于申请中规定的粮食将按该申请规定于2-5月份交货。按每月5 000吨大米和5 000吨小米(总共提供大米和小米40 000吨),每月提供200吨豆油。

此外,在2月份还要提供330万米棉织物。

谈判将于近期内结束。按你的实际观察,如果朝鲜军事行动停止,朝鲜应首先恢复什么?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恢复公路和农业方面可用劳动力予以支援。除此以外还需要我们提供何种援助?

请你研究这些问题并将意见告知。”

毛泽东

1952年2月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2, л. 81-83

No24844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 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

(1952年2月20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负责“苏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波波维同志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把设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处,并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设立代表处的分支机构,其人员配置为14人。

根据波波维同志的提议,需要委托代表处完成在基地进行货物的装配工作以及一些与苏联工作人员进行出差的登记工作相关的业务管理工作(应该到股份公司出差,并使这些人返回苏联)。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审议了这个问题之后通报说,政府在1951年9月25日决定,同转运往新疆股份公司的货物相关的所有工作都全部委托给了对外贸易部。

为了开展工作,对到新疆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并使其返回苏联,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不需要组建特别的代表机构,因为中央机构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以及在阿

拉木图市的相关部和部门应该履行这一职能。

根据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需要对波波维同志就上述问题提出的请求做出答复，而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以及设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的相关基地应该被撤销，国营转运站联盟和上述基地的财产应在1952年1月1日之前转交给对外贸易部。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 帕乌金

1952年2月20日

РГАЭ, ф. 4372, оп. 54, д. 1031, л. 91

№248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1952年2月21日）

菲利波夫同志！

在1952年1月28日到2月17日20天的时间内，敌人通过高射炮用飞机8次在朝鲜阵地伊川—平康—朔宁三角区中央地段以及阵线东部的部分地段，向我军阵地投放了三种昆虫：黑苍蝇、跳蚤和虱子。

现在，在上述地区的田野、公路、树林、草地和小河岸都可以发现这三种昆虫，而且一些地区的密度较大，每平方米达到10—15个昆虫。

对从前线得到的这些昆虫进行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昆虫是霍乱和鼠疫。根据从前线得到的报告，已经发现了一些患有霍乱、伤寒、斑前伤寒、脑炎的病人。病人中有2人死亡。

现在正在对死亡者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其死亡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上述细菌。

为了前线的需要，我们已经派出了医疗队，同这些疾病作斗争，并通过飞机向前线运送了340万份预防霍乱和鼠疫的疫苗以及4000俄磅灭杀昆虫的药粉。

我们得到的秘密情报以及得到的报纸的报道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经常在朝鲜有计划地散播细菌。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照会中提到的5名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其中3人现在在朝鲜，这三人是：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和北野政次。他们随身携带了进行细菌战所必

需的装备,其中包括霍乱、鼠疫、能破坏人的血液的毒气以及开展细菌战的其他各种装备。

在美国人的领导下,日本战犯利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进行细菌武器试验。这些战犯在他们制定的报告中谈到了关于怎样在冬季作战的时候使用细菌武器。

早在1951年3月,隶属于联合国军总参谋部的卫生部长官、陆军准将赛姆斯乘坐第1091号细菌战登陆艇到了元山港口,然后他访问了巨济岛,在该岛上,在他的监督和领导下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身上进行了细菌武器的实验。美联社的美国记者在1951年5月18日报道了这件事情,该记者曾访问过巨济岛。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散播细菌,这些行动以及行动的方法同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以及其他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在日中战争时期采取的行动和方法相似。

我们首先打算以朝鲜外务省的名义,然后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呼吁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战争行径。全中国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行径的运动。

我们向您通报了这件事情,并且希望,苏联政府积极帮助我们,也希望得到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的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2月21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87 - 89

№11420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 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

(1952年2月21日)

绝 密

文本第10份

И. В. 斯大林同志：

一、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现在除了日本外,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

根廷和洪都拉斯都已批准。澳大利亚议会和美国国会现在都正在讨论。毫无疑问，其他国家也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批准这一条约并将其视为已经生效的条约。

美国及其支持者最近将会公开发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借口是和平条约已生效。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委员会里将只剩下苏联代表了，而在远东委员会可能也会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现在都无事可做了，而美国却不受监督地在实行着自己对日本的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要等美国政府发表“停止对日本的占领”的声明，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盟国委员会，同时也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一郑重的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还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楚，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废除 1945 年 12 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召开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会议时，将在会上提出废除这一机构的问题。苏联代表不应该反对废除针对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但是，我国代表在盟国委员会中应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这一建议是美国方面根据非法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而采取的新的非法行动。如果对日盟国委员会会议不举行，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以书面形式发表自己的声明，之后，正如声明所宣布的那样，这一机构就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在解决与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有关的我国驻日本代表处的问题之后，由于可能取消远东委员会，有关我们给潘友新^①的指示问题另行解决是恰当的。

二、至于我国今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我驻日本代表处的状况，那么显然，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而且战后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但是，苏联当然感兴趣的是，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外交部认为，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是适宜的。作为贸易代表团的我国代表处，既可以履行商务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履行比如像 1920—1921 年期间我国驻英国的贸易代表团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最好能在这种情况下同日本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也可以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还应注意到日本人也可能希望有自己驻苏联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类似的驻莫斯科的代表处。

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在单独和约生效后如何维持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发表任何官方声明。但是国务大臣冈崎今年 1 月 31 日在议会就苏联驻东京代表处今后地位问

^① 潘友新，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52—1953 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编注

题发表的谈话应值得注意。他在谈话中暗示成立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处的可能性。

鉴于冈崎的谈话,苏联外交部认为利用苏联代表处同日本某些官方人士的有关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必要的。为此,我国的商务代表多姆尼茨基同志最好能邀请日本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

会晤时,副政治参赞鲁诺夫同志应该在场。在同高桥(或副大臣)会晤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后提问:这次谈话是何用意,他可否对此作某些解释?我国代表应当利用这次提问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我方关于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的建议的态度。如果高桥(或者副大臣)也提出这一问题,那么日本人就应当说清楚。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困难。

四、苏联外交部认为,为了查明日本政府在维护苏联与日本今后的关系问题上的意图而预定采取行动的计画,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事先询问它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请审阅。

A. 葛罗米柯(签名)

1952年2月21日

第108-ги号

附件一:

东京

致基斯连科、帕夫雷切夫:

第一,由于最近单独对日和平条约即将生效,显然,废除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问题会被提出来。当然,苏联反对废除因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些机构是不适宜的。

但是苏联驻盟国委员会的代表不能对废除盟国委员会的建议默不作声,而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的又一非法行动。之所以确定这一行为为非法,是因为它是在违反了以下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是:开罗和波茨坦宣言、雅尔塔协议、远东委员会的一些决议及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

在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时,必须列举有关的事实,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在签订单独和平条约之前就已经严重违背了几个大国就日本问题一致达成的上述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指出以下问题:

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在实施占领日本时不是去执行使日本民主化的决议,而是帮助建立对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实行警察专制的制度。

还要举出一些事例加以说明,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没有采取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的政策。签订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美国政府粗暴地坚持违背它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继续。这一条约的签订表明,美国政府在把日本变成自己在远东的军事桥头堡方面走得有多远。正因为如此,不能不把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和所谓的

安全条约看成是在远东准备新战争的条约，因为日本正是在这些条约的帮助下，变成从属于美国的国家，使自己的民族利益从属于美国统治者的侵略目标。除了这是一个在远东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之外，再不能对条约作任何其他评价。美国政府旨在粗暴违背自己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以废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而告终。众所周知，尽管盟国委员会远未履行 1945 年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交部长及中国也派人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决定赋予它的职能，但是这个建议还是被提了出来。由于强加给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和上述“安全条约”而使美国军队留在了日本，这就突出了日本的从属地位。事实上日本的情况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变，日本仍处于被占领国的地位，因此这对日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产生了消极后果。当然，对这种状况，首先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来负责。苏联政府坚持从日本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在所有相关国家的参与下实现真正的和平解决日本问题，苏联政府对业已出现的状况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上述情况，请你们在 3 天之内将你们在盟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全文起草好并报送莫斯科。

第二，至于我国今后与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苏联官方驻日本代表处地位的问题，那么现在显然还不可能建立所谓正常的苏日外交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苏联和日本间的战后关系仍未得到解决，更不用说吉田政府持公开的对苏联不友好的立场了。但是苏联感兴趣的是，即使在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在日本建立苏联代表处的问题，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是合适的。贸易代表团形式的我国代表处（如果合适，可以叫别的名称）可以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时也可以例如像 1920—1921 年我国驻英国贸易代表团那样履行其他的某些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同日本达成协议，使苏联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以及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同样也应当注意到日本人也可能会希望在苏联有他们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在莫斯科设立类似的代表处。

第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尚未发表任何有关其打算在单独和平条约生效后维持同苏联关系的声明。但是我们认为国务大臣冈崎今年 1 月 31 日就今后苏联驻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在议会发表的谈话不是偶然的。（你们 126 号电报）他在谈话中暗示了在日本设立苏联代表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利用你们同日本官方人士的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适宜的。我们认为，为达此目的，多姆尼茨基可以邀请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在会晤时鲁诺夫应在场。在同高桥（或同副大臣）谈话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询问这一谈话是何用意，他是否可以对此作某种解释。

请你们利用提出此问题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关于我驻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建议所持的态度。如果高桥（或副大臣）提出类似的问题，那么应该说，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

困难。

有关谈话结果请立即报告我们,以便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第四,你们建议发表声明,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尽快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这是不可取的。向社会舆论还难以解释清,为什么不同意单独和平条约的苏联却建议废除由几个盟国于1945年12月决议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及远东委员会。

请确认是否收到此件。

附件二:

急件

北京

致罗申:

请您拜会周恩来并告诉他:

鉴于单独对日和平条约近期即将生效,关于废除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的问题显然要被提出来。苏联政府认为反对由于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是不适宜的。同时苏联政府认为,绝不能忽视废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新的违法行为。因为它是破坏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权利的非法的单独和平条约所产生的后果,更不用说它对日本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了。为此,苏联驻对日盟国委员会代表将受权发表相应的声明。

同时,随着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也出现了今后同日本关系的形式问题。现在很明显,尚无可能建立苏联和日本间所谓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及苏联与日本之间原本的战争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苏联感兴趣的自然是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之后,苏联代表处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在日本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要力争同日本政府就苏联驻日代表处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设立达成协议是适宜的。这个代表处既能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也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

估计日本人也有在苏联设立自己的贸易代表处的愿望,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同意在莫斯科有一个这样的日本代表处是可行的。

您可以告诉他(周恩来),苏联政府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执行情况请电告。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同志

№133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

(1952年2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23日

第517项 关于公民P.普罗列塔里耶娃赴中国的事宜。

鉴于中国大使馆的请求,现批准苏联公民罗扎·普罗列塔里耶娃前往中国进行长期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2, л. 107

№2484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

(1952年2月23日)

毛泽东同志！

您在2月21日的电报收到了。

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必须做出回应,以便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采取重大的反击措施。

我们同意您提出的如下计划：从朝鲜和中国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也从全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方面采取措施。

苏联方面将会对采取的这些措施予以积极的支持。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2年2月23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92

№11421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

(1952年2月28日以后)

绝 密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通告他，您已被授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如下事项：

最近可以预料，鉴于对日本单独和约生效，美国发言人将提出建议：停止对日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对此，苏联政府认为，搞清楚同日本政府建立直接关系的可能性是适宜的。也已向苏联驻日本的代表发出指示：探明日本政府对相互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的可能性的态度。之所以直接同日本建立关系，是因为需要解决苏联和日本相互关系中现在及将来出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认为，建立这种关系将是有利的，日本人民是欢迎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失去作用。

请您也通知中方，不言而喻，同日本建立直接的关系并不改变苏联不承认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和平条约的立场。

请确认此件是否收到。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中苏关系》第9卷，第2128页

№133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

(1952年3月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日

第6项 关于米玉道(Ми Юй-дао)、尤开元(Ю Кай-юань)和杜长志(Ду Чжан-чжи)到

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1. 批准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的提议，并准许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作为翻译见习生从中国到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2. 责成莫斯科市苏维埃（杨松同志）于今年4月向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提供莫斯科市里的住所。

3. 迎接和招待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的工作委托给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3, л. 3

№0986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

（1952年3月3日）

我拜会了周恩来并把两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交给了他。

在会谈过程中，谈到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周恩来说，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了国家机关不少工作人员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有很大一批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贿赂，攫取国家资金，把大笔国家的钱用于非生产性措施。

出现这种状况有几方面的原因。1949年之前，革命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所以干部不了解资产阶级那一套。来到城市后，处在全新的条件之下，许多党政工作人员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被腐蚀而变坏。对干部的政治教育搞得不好。许多工作人员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地主，平分土地。另一些工作人员，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将要到来。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这一革命的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许多工作人员被腐蚀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中留有相当数量的原国民党官员，他们带来了不少国民党制度的恶习。

由于一大批工作人员被发现有营私舞弊行为，党为了保护干部不得不逐个审查营私舞弊现象。90%的犯有营私舞弊的工作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仍留岗工作。其余10%严重的受贿分子、贪污分子，将按其罪行受降职处分，并从国家机关开除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被投入监狱，或枪决。

到3月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将在中央机关、县以上大企业和部队连以上单位中结束。最大的贪污犯将被枪毙。在这之后，党要着手解决农村和连以下部队中的贪

污、盗窃国库和官僚主义问题。由于农村和部队基层单位也有大量比较轻微的经营私舞弊现象,同他们做斗争也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和动员广大的居民阶层。为了不影响春播,农村和部队中的这一运动将推迟到春播完成之后开始。

然后周恩来指出,反贪污、反盗窃国库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第二阶段演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广泛斗争。在革命胜利之初,资产阶级害怕共产党,但看到共产党对它很好,同它进行合作,资产阶级决定利用这一点。然后它看到,同共产党不仅可以合作,而且可以收买其中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使用收买、思想腐蚀、讹诈这些方法,使许多工作人员拜倒在其脚下。通过投机倒把、生产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攫取国家资金、进行破坏活动、收买经济情报,部分反动的资产阶级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阵地。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发现,仅有2%的企业主和商人遵守政府法令进行经营;40%的人攫取了一部分钱——近100万元;53%的人干了各种半合法半违法的勾当;5%的人干了大量的投机倒把活动,以高价向国家出售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收买国家职员。这些大的犯罪分子中,4%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和征收复税,使他们的财产回到国家手里。这些资产阶级中其余的犯罪分子(1%)将被投入监狱和被枪毙,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每一个城市都要枪毙几个大的奸商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犯罪分子。

在总结上述发言时,周恩来指出,共产党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实施有力的打击,借此使资产阶级名誉扫地,使其孤立于中小资产阶级,进而消灭之。至于资产阶级的其余部分,要把它活动严格限制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

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斗争开展得并不平衡。到3月底,北京和天津将结束这一运动,然后是上海和其他城市。这样做是为了积累经验,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对资产阶级要发动全面进攻,防止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这一措施。这种办法乍看起来似乎不妥,好像这会使没有开始运动的地区的资产阶级做好准备,隐瞒自己的罪行。其实不然。资产阶级的每一个罪行,毫无疑问,不是这个工人就是那个工人和职员知道。现在无产阶级已充分发动起来同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他们将勇敢、坚决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资产阶级已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行。资产阶级本身也感到了这一点。例如,尽管上海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运动尚未开始,上海的企业主和商人已找到政府,建议赔偿他们给政府造成的损失500亿元,只要政府赦免他们的罪行。

周恩来补充说,一些企业主和商人贯彻颠覆国家经济的路线,同美国人和国民党有联系。但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重点。早些时候,当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政府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参加会谈的有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 罗申

№248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

(1952年3月7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为了采取有效的措施，同敌人在朝鲜战线和东北领土投放的细菌生物作斗争，同时，为了防止因此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流行病，我们在继续加强预防流行病的力量。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尽快向中国派出9名预防流行病的专家：预防流行病小组组长1名，高水平的防疫和细菌微生物学实验医师1名，昆虫寄生物学专家1名，生产疫苗，并且了解培植疫苗的细菌专家2名，使疫苗标准化的实验专家2名，消毒和灭鼠专家1名，流行病专家1名。

此外，必须使上述专家，特别是要使细菌学专家在来的时候带上必要的准备和细菌设备，以便进行微生物学的、细菌学的以及其他的研究。

请把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决定告知我们。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7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97 - 98

№133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

(1952年3月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8日

第42项 关于中共中央的请求。

1. 满足中共中央要陈昌浩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

2. 责成联共(布)中央属下的出国事务委员会给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办理出苏联国境的手续,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霍洛德科夫同志)则要安排好送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去中国的工作。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3, л. 10

№00537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8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将以下电文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们得到报告,据称彭德怀打算对美国的一个师采取局部军事行动。有人询问我们的意见。

我们怀疑现在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是否恰当。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2年3月8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2, л. 100

№24848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 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

(1952年3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敌人继续向东北投放大量的昆虫细菌,我们估计,我们在今年3月7日发出的申请

中要求提供的防止三种流行病的帮助是不够的。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除了提供今年3月7日的申请中提供的数量的帮助以外，另外再向我们提供如下防止流行病的物资：纯滴滴涕600吨，抗鼠疫的疫苗2000万剂，四联疫苗（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霍乱）2000万剂。

如果可以的话，请求苏联政府及时把上述所述的部分物资以及我们在今年3月7日请求提供的部分物资空运到北京。

请把这一订货纳入双方贸易的账单中。

能否供货请告知。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10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104

№00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

（1952年3月10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10日收到

复您第325号电。^①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的电报转发给您。

“致菲利波夫同志：

3月9日，罗申同志转告联共（布）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计划对美军1个师进行局部战役以及这一战役在目前不适合的通知。我们没有从彭德怀同志那里收到该战役计划。如果他同苏联顾问谈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认为当前进行这样的战役是不合适的。我们将此意见通知彭德怀。也将此意见通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① 档案原件未标明收报人，但根据内容可以判断电报是打给葛罗米柯的。——编注

1952年3月10日”

Н. 罗申

1952年3月10日

说明：

葛罗米柯同志指示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收到通知说，彭德怀计划对美军1个师实施局部战役，认为现在进行这种战役会引起怀疑。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2, л. 102 - 103

№133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

(1952年3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12日

第70项 关于胡明同志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1. 满足中国外交部关于胡明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妻子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 迎接和招待胡明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3, л. 16

№2484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

（1952年3月14日）

周恩来同志！

您在3月7日、8日和10日发送的电报收到了。

1. 根据您的请求，我们向中国派遣了您在3月7日的电报中指出的9名专家，并使他们带上必要的试验样品和装备。这些专家将在3月25日到达中国，为期3个月。

2. 4月10日之前将向中国发送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百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80万剂，预防肠伤寒的疫苗和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850万剂。第一批预防鼠疫的疫苗100万剂，将在3月25日之前空运到北京。

此外，6月1日之前将会另外提供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00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20万剂，预防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400万剂。

苏联没有生产您在电报中提出的四联疫苗，但是将会发送在苏联加工过的疫苗制剂以取代四联疫苗。

4月10日之前还将提供100吨纯滴滴涕，并在5月1日之前另外再发送100吨滴滴涕。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4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 д. 342, л. 190 - 100

№248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 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

（1952年3月15日）

请转告周恩来，对于他提出的关于苏联提供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请求我们已经进行了审议，这些请求将被满足。

苏方将提供 141.1 万吨的石油产品,这些产品将在 1952 年 3—5 月期间运往中国。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和氧气设备共计 1 万辆(件),这些设备将在 1952 年运出,每季度的供应量大致相当;关于这个问题,苏方将不提供 486 辆嘎斯-63 汽车和 844 辆吉斯-151 汽车,但将提供吉斯-5 和嘎斯-51 型汽车。

特制汽车将提供 258 辆,而不是中国政府要求的 600 辆。不足的 342 辆特制汽车将另外提供嘎斯-51 和吉斯-5 型汽车作为弥补。

苏联贸易代表处有关于上述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详细说明,该贸易代表处被委托同中国进行接触,提供上述货物,并把其列入 1952 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协议的结算中。

菲利波夫

1952 年 3 月 15 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112 - 113

№248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

(1952 年 3 月 15 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前不久听取了从中国归国的苏联代表团主席科尔达诺夫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得知,橡胶一方面将从农民那里得到,另一方面将从国家经营的橡胶园得到。科尔达诺夫通报说,种植的橡胶面积完全足够完成通知给您的关于橡胶生产的计划。中方需要技术、拖拉机、汽车和俄罗斯专家。在提供技术和派遣专家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1951 年 10 月,朱德同志在同尤金进行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能够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或许您希望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合作。请把您的看法通知我们。

第二,1951 年 5 月朱德在同费德林进行会谈时表示,应该铺设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关于这个问题他说,能够找到足够的中国人建设铁路,需要苏联政府提供的是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是钢轨、枕木、车厢以及其他的设备。如果您同意这一看法,我们愿意铺设这条铁路。

第三，如果您同意上述两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应该立即在莫斯科或者在北京进行谈判。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114 - 115

№09870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3月18日）

3月18日，我会见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

在转达了给他的电报内容之后，我请他谈了现正在开展的报刊上称之为“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的内容。

刘少奇同志非常详细地谈了该问题：

还在整风和清理国家机关的时候，党中央就掌握了这种情况，一些在地方和中央党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表现卑劣。一些人官僚主义；一些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挥霍国家资金，追求享乐；而有的直接窃取国家金钱或从事奸商活动，倒卖商品和建材等。当时党中央已严肃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0—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中央委托政治局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给会议提供一定的材料。这个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了认真研究，最后做出了决定：广泛开展同盗窃国库者、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运动。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党中央和政务院为开展运动准备有关文件。出于策略考虑，提出了三反的口号。11月份拟定了相应的指示，这个问题还拿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讨论过。

与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还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从12月10日起，运动开始。

为了积累经验和使运动在高政治水平上进行，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中央机关和天津市这一运动的领导。从运动的第一天起便发现，不坚定的工作人员、思想不纯洁和没有受过充分政治教育的人染上了严重的恶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使他们滋生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各种习惯。

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初期，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共产党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害怕同资产阶级分子有某种联系或共事。资产阶级分子的表现也有分寸，他们观察研究问题，看情形如何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民族资产阶级看到共产党员还不算什么坏人，他们提倡合作，努力建立业务联系，而其中一些人不仅建立这种接触，甚至不择手段追求享乐，与资

产阶级建立紧密关系。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钱投入商业和工业企业共同经营。利用这一点,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寻找、接近这部分人的途径,他们成功地把党的一些干部和行政官员拉到自己一边。接着资产阶级便更大胆地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把不坚定分子拖下水,收买他们,腐蚀他们,把他们控制在手里。

利用党政机关中各种思想麻痹的人、官僚主义者、盗窃国家资金者以及其他的人,资产阶级如此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成了从内部颠覆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的最大威胁。所以在三反运动中发现这些初步迹象和看到很多腐化分子党龄很长、资深权重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下达命令竭尽全力开展这一运动,清除党内和行政机关中所有变质分子、受贿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为了这一目的,动员起了所有党的组织,工交、建筑企业及其他所有机关的职工开展运动。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特别委员会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坚决开展了这一运动。由于做了大量工作,揭露出了一系列腐败行为;我们发现,我们党的不少重要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仅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而且变成了真正的腐败分子、大贪污犯、骗子,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谋者。他们给资产阶级提供必要的财政和经济情报,从我们揭露出的问题看,个别人不仅将国家资金攫为己有,而且变成了奸商、投机倒把者、企业主,同资产阶级分子合作。

刘少奇说,我不一一列举全部事实,这些报上已经公布了。我只指出一点,在同财政经济和钱物打交道的所有国家机关里,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被揭露出存在着滥用职权、腐败、贪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原来,染指这些恶习的不仅是一般的职员和干部,而且有中央、省市机关的重要的工作人员。这些骗子已被揭露,他们有的盗窃不多,有的则高达数百万。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原国民党官员(在许多机关中高达40%—50%)由于过去的习惯,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滥用职权行为。

在资历很深、身居要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中,我们发现其中一些人参与了肮脏勾当,同资产阶级有联系。在人民政权机构建立初期入党的党员中,有5%—7%的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肮脏勾当。被腐蚀瓦解最严重的是财政经济机关、建设单位、同物资和贸易有关的下属经营单位和机关。

这些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现在这一运动已接近尾声。

初步的总结表明,相当一部分职员是通过收取佣金被资产阶级收买的。佣金数额为购货和订货款的5%—10%。在中国,售货的企业或某一贸易组织交纳佣金似乎是合法的。所以人们按照老习惯收取佣金,不顾这样做却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其中一些人甚至这样认为,商人或业主支付佣金,在这里国家并未受损失。但他们谁也没有考虑到,他收取的这5%—10%的佣金,不是商人和业主的钱,而是国家的钱,因为商人要从国家机关或企业那里多拿5%—10%的钱。另外,更有甚者,他们把通过收取佣金积攒下来的钱再投入商业或企业,这样他们变成了商人和业主的同伙。

另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拼命捞钱,放纵享乐,忘记了共产主义道德,走上了腐化的道路,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肆意挥霍的环境。这些人忘记了家,在外面鬼混姘居,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凶,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政治面目,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质分子。

另一部分人不仅收取佣金，还把巨额公款据为己有，盗窃国库资金，挥霍浪费。这些人成了真正的小偷，盗窃国库者，变成了奸商、各种投机倒把者和坏分子的帮凶。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央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分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分子、贪污盗窃分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分子则被枪毙。

伴随这一运动的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

另一部分人，由于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很低，又不乐意学习，加之这一工作在党内开展得很差，他们也受到了这一恶习的侵袭，变成了与党性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他们利用党员的身份为自己捞好处，争福利。

在三反运动中，我们发现，民族资产阶级在同我们的合作中追逐的是黑心的目的即发财，他们不惜一切手段获取巨额利润。

在我们面前，刘少奇说，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是拒绝同它合作，开展反对它的严肃斗争？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

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于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他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在9.9万家工商企业以及小商小贩、手工业经营者中，有25%遵守法令，依法经营。其余75%的工商企业都不同程度的违法者，或犯有一种或两种甚至五种罪行。然后我们对这75%又进行了研究，发现近40%的工商企业不依法经营，即隐瞒自己的真正经营额。通过收买税务机关，账上做鬼，逃税漏税，即只交他们应交税款的极小一部分。不过这仅是一些小的企业和小店铺，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还不是很大。

比较严重的是中等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对国家偷税漏税，而且收买国家职员，以便对自己的活动提供方便，收买国家职员偷来的东西，替其销赃。这些人在75%中占了30%。

最恶劣的是大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隐瞒自己的经营额，而且偷窃国家巨额资金，给国

家企业提供伪劣制品。例如,天津一个厂主为前线提供不合格的铁锹;武汉一家公司为朝鲜前线提供不合格的急救包,其中以染色液体充当碘酒,以最次的棉花充当药用棉;上海一家出售医疗器械的公司,通过收买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得知国家要购买一批外科手术器械,结果这家公司把所有城市的外科手术器械抢购一空,之后漫天要价将其卖给国家。

在建筑企业里揭露出了不少坑害人的家伙,他们用最次的建筑材料修建楼房,把国家拨给的最好的材料攫为己有。这些人收买国家官员,与他们串通一气干坏事,给国家带来了物质损失。

利用我们与资产阶级进行的合作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最彻头彻尾的敌对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头面人物。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

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对25%遵守法律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给予自由,我们给他们继续经营的机会。对其余75%中犯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罪行但一般比较轻微的40%的工商企业,我们通过社会法庭和组织让他们受到惩罚;认识比较好的我们予以完全解放,其中一部分必须赔偿损失,这之后我们将给他们提供继续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比较恶劣的部分——占中等资产阶级的30%,我们让他们退回所有隐瞒部分或其中所带来的损失;还让他们交纳一定的罚金,让他们尝受社会的谴责;这之后让他们遵守法律,给他们提供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4%的有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我们迫使他们补交所有的偷税漏税和其中所造成的损失金额。此外,对他们还将处以罚金,要罚到这种程度,即让他们的经营被迫完全停止。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一家贸易公司有20亿,则我们罚它25亿,这一公司将被迫终止自己的经营。交纳罚金我们规定一定的期限,到期不交,则财产充公。这一部分人中最恶劣的将被我们投入监狱。根据新制定的法律,他们将被国家追究责任。

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

这样,资产阶级在这期间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全部得到补偿。

按照预计,我们可为国家挽回损失2500亿,这等于是1952年我国预算的1/6。这可以弥补我们国家所有的亏损,但不能弥补我们党和国家在干部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但失去他们,我们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将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健康和巩固,使我们能够更满怀信心地前进。

在对以上所说进行总结时,刘少奇说,我们看到,五反运动是严肃的政治运动,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对它反动的有重要影响的上层人物的打击。但运动是在五反的口号下进行的,我们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他们在各个党派里的代表反对和能够反对这一口号。

这一运动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为什么我们能够采取这一决策?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即国民经济中的成绩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除轻工业外,主要的工业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此外,我们可以这样做还由于,在1951年期间对反革命势力、土匪实施了

有力的打击，顺利地进行了土改，使全国 3.1 亿农民有了土地。我们还稳定了财政形势，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并发动亿万群众完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人民跟着我们走。我们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在这之前我们不能进行类似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

在北京、天津取得经验之后，现在我们正往各大城市派遣政府工作组。从 3 月 20 日起我们将在各大城市开展这一运动。我们已收到消息，上海资产阶级已召开多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请求政府宽恕，向政府赎罪。现在他们打算，如不开展这一运动，给国家财政上交 500 亿，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在其他城市，运动将继续到 4 月和 5 月。全国大约有 30 万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受到惩处和被消灭。

这就是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

接着刘少奇指出，在县城和农村，三反和五反运动要推迟到春播完了之后进行，而某些地区推到麦收之后进行。

在开展运动期间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由于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生产财政计划没有完成。但我们相信，第二季度生产将有增长，城乡交流将会增加，1952 年下半年经济将有大的增长。我们相信今年年度计划能够完成。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现在对运动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清楚。他们现在已开始抵抗。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坚决地进行斗争并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运动。

至此，刘少奇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会谈持续 3 个半小时。卡爾斯基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 罗申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5, п. 343, д. 12, л. 30 - 42

№11597

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 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

（1952 年 3 月 20 日）

副 本

绝 密

И. В. 斯大林同志：

3 月 12 日，日本政府从李奇微司令部获得了指令：司令部批准日本生产武器、弹药和其

他战争武器,军舰和各种类型的飞机以及它们的零配件。3月14日,李奇微司令部通告日本政府关于恢复日本在其领空飞行的权利,除了军用飞机之外。

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里的代表们认为:李奇微司令部的这些行动,是单方面取消了远东委员会关于禁止日本生产战争武器的决定,应该通过在远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的途径,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

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目前对李奇微这些行为提出抗议是不合适的。第一,在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声明了,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和为这些武装力量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苏联外交部认为,我们现在针对美国人提出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在目前的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并把这解释为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民族武装力量。最好是,当美国人向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由于对日单独和约生效而停止该机构的活动的活动时,我们的代表应该发表一个声明,并在这个声明里谈到美国人这些单方面的、破坏了相应国际协定的行动,包括部分地恢复日本的武装力量。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文本。^①

请审理。

A. 维辛斯基

1952年3月20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198—199页

No133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

(1952年3月2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1日

第125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1952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① 见以下No12433文件。——编注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提议：邀请由 10—12 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 1952 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逗留期限为 3 周。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3, л. 28

№124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 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

（1952 年 3 月 22 日）

草 案
绝 密

关于李奇微司令部允许日本生产武器、军舰和飞机事宜。
批准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指示草案（附件）。

优先拍发

东京

致基斯连科和帕夫雷切夫：

第 265 项 我们认为目前对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以及恢复日本允许民航飞机在自己的领空飞行的权利提出抗议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已经发表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和生产一定种类的武器。

除此以外，我们对美国的这些行动提出抗议，不仅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而且还可能在目前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苏联以及将其解释为苏联企图阻止日本拥有国民武装力量。

收到后请确认。

№133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

(1952年3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2日

第145项 关于准备向中国政府移交中长铁路的措施计划。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机关审议和批准,由苏联外交部就该问题所提交的提案。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3, л. 32

№0054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

(1952年3月28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29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体规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求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并给予贷款。

您如果同意,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二、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

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

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三、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

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四、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

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1954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前线朝鲜人民军。

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五、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 000公里,与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

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及苏联政府在修建这条铁路方面能否给予我们铁路设备的援助。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

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126 - 130

№248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 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

(1952年3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以科尔达诺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在对广东和广西省的橡胶种植区进行调查之后,1951年12月25日以书面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发展橡胶业问题的可能性的建议。

我们同意了这些建议。

现在已经派出了1000名农林学院的大学生和教授，他们将到橡胶种植区进行具体的研究，并确定一些土地，以便建议在这些土地上开辟橡胶种植园。我们决定，要在3年的时间内使橡胶的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便每年得到共计25万吨的橡胶。

为了完成上述计划，同时根据您在1951年9月10日的电报中的指示，我们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一些汽车、拖拉机、可燃烧的材料、耙、犁以及其他一些机器（见附表）。这些设备的清单由中国专家根据汇总的材料拟定。由于经验不足，该清单也许很不准确。

如果您同意向我们提供设备，那么我们将派一些专员到莫斯科，在您指定的相关机构的帮助下由这些专员来审议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如果今后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向您请求帮助。

至于就供应的设备达成协议，我们是期待的，在今年5月和6月份有两批设备运往中国，以便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开垦荒地的工作。

我们在7—8年以后偿还这些技术设备的价值，您认为是否可以？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生产橡胶，以便使这批设备的价值能够以分期供应橡胶的形式偿还。

请您审议我们的建议。

同时，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派遣31名专家和26名技术工人（共计57人）帮助我们。

这些专家和技术工人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2名机械专家、3名机械工程师，共计5人。希望这组专家在4月底到中国，以便参加拖拉机站的场所、修理场所和燃料库的计划工作。第二组：1名种植橡胶树的高级专家、1名育种专家、3名育苗专家、4名组建国营农场的专家、1名研究橡胶的科学工作者，以及4名树苗栽培专家，共计14人。希望这组专家在5月底到中国。第三组：2名机械专家、10名机械工程师、26名技术修理工，共计38人，希望这组专家在6月底到中国。

请对我的这份电报进行审议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附件一：

必需的机械和物资清单（清单的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第二项是数量）

1. С-80型拖拉机，77台。
2. ДТ-54型拖拉机，223台，其中带精选推进轴的拖拉机，120台。
3. Д210Б型掘根收根机，21台。
4. 适合灌木沼泽地作业的 ПКБ2-54型双铧犁，153台。
5. Д174-А型灌木铲除机，48台。
6. УТУГАРП-5-35-М型的五铧拖拉机，764台。
7. 密集耕种的 КАП-3型耕种机，223台。
8. ЗИГ-ЗАГ5Т型钉刺耙子，764件。
9. П-3-3-П型的三铧深耕犁，252件。
10. К-6型三横梁的拖挂割草机，120台。

11. ГПТ-14 和 ГПТ-5 型的宽幅耙子,120 件。
12. ОМП-А 型马达喷雾器,50 台。
13. ПКБ2-54 双铧犁的挂钩,76 件。
14. П-3-30-П 型三铧犁的挂钩,77 件。
15. 吉尔(ЗИЛ)-150 载重汽车,60 辆;嘎斯-51 载重汽车,40 辆。
16. 油罐汽车,40 辆。
17. 移动维修作坊,20 个。
18. 在野外条件下维修 30 台拖拉机及其配备的农业机器所需的整套工具,10 套。
19. 保证在两个月内维修 50 台拖拉机的维修作坊的设备,或者在一个作坊内同时修理 12 台拖拉机的设备,6 套。
20. 现修和大修拖拉机的储备部件:(1) С-80,77 套;(2) ДТ-54,223 套。
21. 带 50 千瓦的柴油发动机的发电机,16 台。
22. 储存 500 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 个。
23. 水平放置的储存 30 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 个。
24. 润滑油(桶装):(1) 柴油机润滑油,980 吨;(2) 汽车润滑油 181 070 吨;(3) 拖拉机黑机油,446 吨;(4) 黄油润滑油,535 吨。

附件二:

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引进计划(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和机器的类型;第二项是数量;第三项表示在 5 月 31 日之前供货的数量;第四项表示在 7 月 1 日之前供货的数量)

1. С-80 型拖拉机,77,17,60。
2. 吉尔-150 载重汽车,60,60,0。
3. 嘎斯-51 载重汽车,40,40,0。
4. 油罐汽车,40,40,0。
5. 移动维修作坊,20,10,10。
6. 带 50 千瓦柴油机的发电机,16,16,0。
7. 储存 500 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10,0。
8. 水平放置的储存 30 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120,0。

附注:附件一中列出的其余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以及附件二中没有列出的机器应该在 1952 年 7 月 1 日之前供货。

润滑油供应计划(形式是:第一项为名称,第二项为总吨数,第三项为在 3 月 31 日之前供应的数量,第四项为在 11 月 31 日之前供应的数量)

1. 柴油机润滑油,980,490,490。
2. 汽车润滑油 18,1070,535,535。

3. 拖拉机黑机油,446,223,223。

4. 黄油润滑油,535,267,268。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2, л. 122 - 123

№134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

(1952年3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1日

第190项 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给驻华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

附件：

绝 密

优先拍发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向他通报，根据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处得到的消息，在地方当局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盗窃斗争的运动之际，在伊宁地区有一些敌视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坏分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个措施。这种现象反映在：在公开的集会上，他们向当地苏联公民中的某些负责人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问题，问题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公民与苏联领事馆的关系。

有鉴于此,请问一下:中国朋友是否认为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防止各种反动分子利用伊宁地区进行集会的机会,从事针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曾与中国民主力量合作的当地苏联公民的活动。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3, л. 45, 96

№00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

(1952年4月2日)

密电, 1952年4月2日11时12分收到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 迄今为止, 我们认为, 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 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 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 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

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 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 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 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 以免得出印象, 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 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 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 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 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 我们认为, 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 因为: (1) 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它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 (2) 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 (3) 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 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 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 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

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

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答复。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2—3

№248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

（1952年4月4日）

毛泽东同志：

……^①

第三，根据您最近就种植橡胶树问题发来的电报，我作如下通报。我们同意签署种植橡胶树的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技术和物资、派遣苏联专家、把中国每年开采的50%以上的橡胶以优惠的条件供应给苏联，供应给苏联的橡胶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打一一定的折扣。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正如您所建议的，在5月中旬举行。

关于贷款的条件，我们的设想如下：贷款年利率为2%，3年以后开始偿还，10年以后偿还清，每年偿还的金额相同。

贷款以向苏联提供在中国生产的橡胶的形式进行，而在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橡胶之前，以向苏联提供精钨矿、钼矿、锡矿、锑矿等商品的形式进行。

苏联专家的派遣将会根据您的请求进行。

技术和物资的供应将会根据您的请求在如下的期限内进行，每批的供货量相同：ДТ-54 拖拉机、载重汽车、油罐汽车、拖挂工具以及移动发电机在195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供应；С-80 拖拉机、掘树机、灌木铲除机、维修器具和润滑油在1952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供

^①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应;移动维修站、维修站的设备以及拖拉机的备用零件在 1952 年第四季度和 1953 年第一季度供应。

菲利波夫

1952 年 4 月 4 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3, л. 5 - 6

№11422

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

(1952 年 4 月 5 日)

(译自中文)

对苏联领导社会主义农业若干问题的咨询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土地实现了国有化。这是否意味着所有人的土地都已国有化了? 贫农和中农的土地也已国有化了呢? 列宁在 1920 年 7 月 20 日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为农民保留土地,只是在他们反抗劳动者和被剥削者政权时才没收他们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当时并没有被没收。

土地没收后是否就为农民平分土地呢?

二、共耕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劳动生产队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三、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之前是否有像我们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组织形式?

四、在苏联的农业中现在是否有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以外的其他的组织形式? 如果有,那么叫什么? 其内容是什么?

五、加入集体农庄时要不要交费? 如果要,那么根据什么标准交费的?

六、国家根据什么标准向集体农庄提供所必需的土地? 是根据居民的数量还是根据劳动生产率? 在集体农庄需要增加土地的情况下,国家会向集体农庄提供土地吗?

七、在集体农庄里,农庄庄员的劳动成果是怎样分配的? 在体力、性别、年龄和技能等级上都不同的劳动者,其报酬有没有差别?

八、集体农庄对红军(苏军)军人、年迈者、弱者、病人和残疾人家庭的供给如何?

九、集体农庄和汽车拖拉机站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成的?

十、汽车拖拉机站的组织和经营管理如何？

十一、集体农庄的年收入和支出分配比例如何？公粮占集体农庄收入的多大部分？

十二、进出集体农庄自由吗？

十三、集体农庄和消费合作社的相互关系如何？

十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农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是哪些机构实现这一领导的？

A. 科祖博夫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47—2148页

No005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

（1952年4月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①：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

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被利用。

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① 从内容上看，在此电与4月9日电（No00541文件）之间应该还有一封电报，但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电。——编注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

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 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 2—3 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 60 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 5 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 4 月份来莫斯科。第 167 号密码电报。

结束。

菲利波夫”

1952 年 4 月 9 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3, л. 8—9

№2017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 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

(1952 年 4 月 14 日)

第 45077 号,1952 年 4 月 14 日

你们提出的关于替换洛博夫同志所率领各部队的建议,我们认为应作如下修改:

1. 应在今年 6 月 1 日前替换第六十四军所属机关,而非你们所建议在 5 月 1 日前。
2. 根据今年的时间安排,每隔 4—6 个月对该师各航空师进行替换较为合理。
3. 对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中的高炮师和探照灯团的替换可能不会早于今年 10 月 1 日。

关于与国家防空部队司令协商和共同制定的洛博夫同志所率各部队的替换计划,你们最迟必须在今年 4 月 25 日前向总参提交如下给政府的报告。

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等同志报告,近期美国空军在我空军驻防机场附近的活动较以往更加频繁,其目的就是企图用自己的 F-86 歼击机来缠住我米格-15B 机群并对我机场实施封锁,以确保其强击机在战区的活动。敌人所实施的这一战术之所以经常得逞,是因为我军所在的安东和庙沟机场距离朝鲜湾有 8—14 公里,敌机能够从空中很清楚地看到我空

军的活动。

虽然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掩护，但从朝鲜湾方向高速俯冲而来的美国飞机仍能对我正在起飞，尤其是已完成战斗任务而燃料即将耗尽的正在降落的米格-15B飞机发动攻击。如果这些发动攻击的敌机遭到我军反击，美国人又会立即向朝鲜湾方向撤退，而其飞回那里总共也只需30—60秒，但我们的飞机根据规定是不得飞入朝鲜湾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追击飞机被击毁或击伤，飞机和机组人员将落入敌人之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敌人掌握了海上的制空权，而朝鲜湾很多地区都很狭窄，敌机一天内便可轻松抵达。

还应报告的内容包括：在这一地区中国人共有5个空军师。他们作战非常小心谨慎，主要只与敌F-80和F-84等机型作战，而一般不参加针对敌F-86的战斗。朝鲜人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则根据本国政府的禁令，不参加作战活动。

总体而言，我们在沈阳和安东地区部署的10个歼击航空师中实际能与美国空军作战的只有2个师。正因为此，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在战斗中均能在兵力上优于我方，而我们的飞行员则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25, л. 13

№24854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

（1952年4月17日）

机 密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今年4月10日发送的第536号电报中报告说，一些部对苏联部长会议在1951年12月8日做出的关于派遣专家到中国工作的第4991—2162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应该向中国派遣共计103名专家。其中73人已经到了中国，14人委员会已经决定把他们派往国外，5人正在委员会办理出国手续，11人正由相关的部和部门挑选（附名单）。

在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往国外的 14 名专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国的签证,并且近期他们将前往中国(名单附后)。至于 11 名尚未挑选的专家,已经从相关的部得到证实(苏联农业部和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除外),这些专家将在 1—2 周内完成挑选(名单附后)。

苏联外交部也在采取措施,尽快向中国派遣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出的 14 名专家,并加快尚未选定的 11 名专家的挑选工作。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上述电报中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无论是在一些部应当派遣的专家的数量方面,还是在已经派往中国的专家的数量方面。比如,上述电报指出,黑色金属部应当向中国派遣 15 名专家,但是根据上述提到的决议,应该派往中国的是 13 名专家。电报中通报说,轻工业部没有向中国派出一名专家,但是实际上该部早在今年 2 月 27 日就向中国(哈尔滨市)派出了 3 名专家。

苏联外交部将让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做出必要的解释。

维辛斯基

1952 年 4 月 17 日

附件:

对苏联部长会议 1951 年 12 月 8 日关于相关部门

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决议履行情况的报告
(拟定日期 1952 年 4 月 15 日)

序号	部门名称	需要派遣人数	前往工作的人数	委员会已决定人数	委员会正在办理	尚未挑选人数
1	煤炭工业部	2		1		1
2	重工业建设部	4	1			3
3	有色金属部	6	4	1		1
4	电力部	4	2	2		
5	轻工业部	3		2		1
6	电力工业部	3	1		2	
7	卫生部	9	6	2		1
8	河运部	1		1		
9	财政部	4	4			
10	交通部	8	7		1	
11	汽车拖拉机工业部	2		1		1
12	高等教育部	13	12		1	
13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	2	1			1
14	农业部	4	3			1

续 表

序号	部门名称	需要派遣人数	前往工作的人数	委员会已决定人数	委员会正在办理	尚未挑选人数
15	黑色金属部	13	9	3		1
16	内务部	1	1			
17	国家计划委员会	3	3			
18	国家保障部	1	1			
19	国家银行	3	2	1		
20	轻工业部	4	4			
21	地质部	2	1		1	
22	机器和仪器制造部	1	1			
23	中央统计局	1	1			
24	贸易部	2	2			
25	运载汽车建设部	1	1			
26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设委员会	1	1			
27	机器制造部	4	4			
28	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	1	1			
总计	103	103	73	14	5	11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 通金

РГАСПИ, ф. 82, оп. 2, д. 1257, л. 65 – 68

№005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

(1952 年 4 月 22 日)

发自北京,1952 年 4 月 22 日 19 时 10 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 1952 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能够装备 15 个航空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
今年年底前,现有 8 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 26 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

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

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 15 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 4 个团的米格-9 飞机外,还有 8 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 3 个飞行员分配)。

二、在我军航空兵现有 19 个米格-15 歼击机团中,有 15 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 个歼击机团共缺少 154 架米格-15 飞机(按每团 31 架飞机的编制计算)。

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 4 月 9 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 15 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 1952 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 100 架米格-15 飞机。

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

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三、1952 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

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 年 4 月 22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22 - 23

№1159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

(1952 年 4 月 26 日)

副 本
绝 密

致 И. В. 斯大林同志：

1. 正如 4 月 28 日所了解的那样,对日单独和约生效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将停止

存在。鉴于此，出现了一个关于苏联在该委员会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联共（布）中央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于2月24日给我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了指示：不能表现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性不应该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于日本人。

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声明，没有表明它是否打算采取措施，鉴于单独和约生效而解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日本政府代表至今只做出了一个声明，说正在研究苏联代表处的地位问题。根据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通报（发自东京的第371号电报），国务大臣冈崎胜男于4月23日最后一次在国会里发表了这种声明。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冈崎胜男说：“至于说到苏联，那么，与它关于互换代表的谈判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它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由于解散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此处理这个代表处的问题。”

2. 尽管日本政府目前还没有完全表明，它是否打算对苏联代表处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不能排除它可能会阻止我们的代表享用外交官的特权，尤其是使用密码通信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委托基斯连科对类似不合法的行为向吉田提出抗议，因为这些行动的基础是单独和约，而我们不承认这个条约的法律效力。在给基斯连科的信中，按照外交部的意见，应该指出，苏联代表处的地位不应该有任何改变，因为它的法律基础是由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各国在对日方面的其他协商一致的决议确定的。

鉴于基斯连科同志收到的来自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司令部的通告说，自单独和约生效之时，外交公使团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停止使用无线电台的指示，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

3. 由于可能出现以下意外：借口失去了外交特权而对代表处进行搜查，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军事部在今年3月24日，已经指示基斯连科同志销毁代表处里多余的机密文件和密码，仅保留与莫斯科进行紧急联络所必需数量的密码，并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机密文件和密码落入警察的手中。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①

请审批。

A. 维辛斯基

1952年4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51—253页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1159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

(1952年5月17日)

副 本
绝 密

鉴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停止活动和我们在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阐明以下意图。

日本政府在关于妥善解决与苏联关系的问题上采取观望的立场。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代表处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尽管日本的某些官方人士声明说,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公使团就没有理由留在日本了。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日本的统治阶层里以及在实业界里,追求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的官方代表也做过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期待着我方的倡议。例如,5月6日,日本外交部情报局局长宫崎章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

“日本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不包括和平条约。日本已经与其他一些国家恢复了这种关系,它们也不同意和平条约,没有在旧金山会议上签字(指印度,意大利)。”

在国会里回答这些问题时,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在5月7日声明说,日本将向苏联建议“通过友好国家”解决一系列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在他看来,“苏联也希望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

5月15日,吉田首相在国会里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正在就苏联外交使团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回答可能解决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时,他补充说,“共产党国家没有提出关于谈判的任何建议”。在吉田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几家报纸,例如《日本经济新闻》,也援引了日本外交部的声明说,关于苏联公使团问题的谈判将在近期内开始。根据《共同社》电讯社的报道,日本政府打算通过瑞士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苏联代表处的问题。

通过日本实业界,对和平解决苏日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探测。5月5日和6日,日本商贸公司的代表拜访了贸易代表处负责人多姆尼茨基同志,他们在与多姆尼茨基同志进行会谈时,通报说,在日本流传着关于进行和平条约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已经抵达的传言以及日本外交部期望苏联提出和平的建议,日本外交部已经挑选了一批商业工作者,在互惠的条件下派往苏联,如果和平条约谈判开始的话。

考虑到以上所述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适宜的是,让我们在日本的代表不要回避与日本官方代表的接触,为此可利用各种理由。目前可成为这方面理由的是:鲁诺夫同志拜会日

本外交部相关司的政治顾问，以解决某些业务问题。

在发自东京的电报中，基斯连科同志谈到我们在日本代表处的不正常地位和作为被解散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成员所处的境地，提出了关于把他从日本召回的问题。

苏联外交部认为，目前召回基斯连科同志是不适宜的，因为他的离开可能会被日本政府利用作为提出在日本的苏联代表处其余工作人员离开的借口。关于基斯连科同志离开的问题，应该视所形成的情况稍晚些时候再做决定。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指示，指示草案附后。^①

A. 维辛斯基

1952年5月17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3—264页

№11600

联共(布)中央决议：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

（1952年5月20日）

草 案
绝 密

认为基斯连科同志离开日本返回苏联是不适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通报基斯连科同志，他奉命留在日本，一直到指示下达之前，同时还应该指出，从基斯连科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表现得神经紧张，他应该更多地表现出耐心和镇定。

致 A. H.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1952年5月19日批准。

请求签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6页

^① 见以下№11600文件。——编注

№24796 - 1

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 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

(1952年5月23日)

李京文(Ли Цзэнвэнь)^①在同苏联电影进出口公司驻中国全权代表斯特罗伊捷列夫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文化部领导人非常关注对影片《普尔热瓦利斯基》所进行的研究,为此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参与了进来。在对该部影片进行审查的时候,就该片在中国的译制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意见,为了使外交部了解这一点,文化部已经向他们作了通报。在外交部两名副部长对该片进行审查时候,又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并且被提交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对该部影片进行审查的结果是,他们并没有反对就该部影片涉及到中国的一些情节提出的意见,因此,关于对该片进行中文配音的问题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4月16日该片被提交给毛泽东同志审议。

后来就该片提出了如下三点“不足”:

“1. 影片中涉及中国的一些片段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没有支持英国人针对俄国人民代表的那些阴险的诡计,因为当时全中国的人民,其中包括中国的封建地主,都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充满仇恨。当时中国也没有像影片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俄国人民表露出任何敌意。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会伤害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感,并且会被英美势力利用,来反对新中国和苏联。

2. 影片中展现的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现实的。当普尔热瓦利斯基受到了朝鲜人和蒙古人的友好接待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代表无端地对他表示了敌意。一名中国士兵毫无根据地对叶戈罗夫说,‘俄国人和中国人是兄弟’,这句话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当塔舍列夫通过镜头向一位中国姑娘解释‘莫斯科’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的时候,这位中国姑娘听到这个词语后显得非常高兴,这个情节不符合事实,它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强调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饱受屈辱的、不识字的、毫无地位的中国姑娘应该怎样更加自然地表现自己?她能否理解‘莫斯科’这一词语的意思?任何一位中国观众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何况在当时‘莫斯科’这一词语还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意义。

普尔热瓦利斯基下令用大米供养中国的孩子,他的这一友好的和人道主义的姿态不能

① 李京文,时任中国文化部电影业中央管理局局长。——原注

体现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观众将会把这一姿态看作是一种小恩小惠，帝国主义者经常会采取这种手段，来尽力掩盖其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态度。

3. 影片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片段有损中国人民的尊严。影片中有一个片段，在昂帮（Ам-бань）府邸的大门口，当一些中国农民跪着，对他们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行径表示反对的时候，站在他们前面的一些官员一下子抓住了跪在前面的中国人，对他们进行摧残，而中国人居然没有进行有力的反抗，这是对事实的歪曲，也有违历史的正义。在普尔热瓦利斯基来到中国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明，中国的农民是有能力组织起来反对封建地主的。但是影片却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把中国人民贬低为一群默不作声的、无助的、无组织的人。

当普尔热瓦利斯基作为一名陌生人出现在朝鲜的时候，警觉的朝鲜人在迎接他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后来他们得知普尔热瓦利斯基是朝鲜人民的朋友，随后向其讲述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同外国干涉者进行的斗争，其中包括同美国人进行的斗争。

中国的观众完全会发问，为什么在关于中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影片表现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呢？此外，在影片中，中国人民的代表竟然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中国观众会问，为什么在影片中朝鲜人和蒙古人都是穿着如此好的衣服，如此的富足和欢快，但是中国人却是低下的、肮脏的、衣衫褴褛的和饥饿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总是尽量把中国人民当做是贫困无知的，以便为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辩护，好像殖民政策会使殖民地人民富裕起来，使他们更加有文化一样。对于影片把中国人民描绘得如此悲惨，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报告”提出了三点结论：文化部领导人感到疑惑和愤怒的是，影片的导演尤特克维奇没有接受早在该部影片拍摄之前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很显然，尤特克维奇尚未摆脱形式主义，对于这种形式主义在苏联是应该公正地遭受批评的。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尤特克维奇是不信任的。

李京文还通报说，中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大使在发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报告说，“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消极的。这些大使们反对在他们所驻在的国家放映这部影片。

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小组，在从莫斯科写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件中对“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中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这些大学生在信件中断言，这部影片的放映会给苏中友好带来伤害。

格里戈良

№2017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 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

(1952年5月27日)

第48321号,1952年5月27日

兹报告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现状、提高该军作战能力的举措及其所属各师的换防等情况。

我们已于今年4月23日至5月17日间对该军的作战工作、各航空师现状和近期损失增加的原因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为此目的,我们曾于今年4月21日派遣苏联空军副司令、空军中将阿卡里佐夫同志、国家空防歼击航空兵司令、空军中将萨维茨基同志和国家空防高炮部队司令、炮兵中将高洛霍夫同志去了洛博夫同志那里。这些人已于今年5月19日从洛博夫同志处返回。

在分析了形势和直接研究了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航空兵的作战行动之后,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就地采取一些措施,以消除我歼击机各师作战行动中的缺陷,并准备在返回之后向上级报告自己的结论和意见,以便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了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歼击机师作战行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具体内容如下:

——在作战行动的战术上墨守成规。在敌人已改变战术,转而使用小规模机群作战的情况下,该军和各师级指挥员却不对我们歼击机部队的战术进行相应调整,还是经常以团以上、师以下的大规模机群模式出击,从而导致这一时期我空军在空中的歼击机数量明显劣于美军,作战效率低下。大机群以密集队形投入作战时,飞行中往往只能有少量机组可顺利对敌实施攻击。另外,我歼击机在各个高度都受到了敌歼击机的钳制,因而根本无法突破至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

——很多团级指挥员不参加实际战斗,不熟悉敌人和自己部队的作战性质和作战条件,从而导致其只能根据普通飞行员的判断指挥战斗,在下属中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

——军指挥员对我空军的夜间作战行动缺乏组织和领导。

——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高炮部队对我空军所在机场和基地的掩护存在漏洞。

由于上述不足,该军近3个月来共损失米格-15B飞机48架和16名飞行员,其中23架飞机和7名飞行员,即近50%是被美国歼击机在我机场上空击毁的。

由于作战任务过于繁重,很多飞行员因病不能正常出勤。

为改善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的作战状况,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当即提出了以

下措施：

——与各航空师飞行员详细分析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部队的行动战术。

——指示我歼击机飞行员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以双机和分队为单位的参战频率。因此，我歼击机群已可突进到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并击落敌机。

——改善我飞机起降的组织和安全保障工作。

——各歼击机团级指挥员开始参加本团战斗。

——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我空军夜间起飞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规定每个飞行员一天之内战斗起飞不得超过2次。

为提高我歼击机针对美国空军的作战效率，根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的报告，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中的许多飞行员由于已连续完成了80—90个战斗飞行任务，身体已相当疲劳。因此决定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今年4月抵达沈阳地区的第一三三航空师替换该师。而后者则作为第二梯队进驻鞍山和辽阳机场，担负我安东地区2个空军师的掩护任务。

由于敌机尚未进入沈阳地区，我空军目前在这一地区并未驻扎部队。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将于7月份撤回苏联，替换他们的将是巴库地区的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 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由来自旅顺口的第三十七航空师替换，时间为1952年6月15日以前，而前者将进驻旅顺口地区，也就是这两个师更换驻地。

3. 在替换飞行员的同时，上述各师所属的技术保障部队的替换也同时进行。

4. 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3个歼击航空师（即第二一六、第三十七和第一三三师）都有两组飞行员。第二组飞行员应由国家防空和空军歼击师调配。

5. 该军每个师平均都有10—12架备用米格-15B飞机。

6. 为了加强对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所驻机场的高炮掩护工作，我们将于今年6月调遣负责朝鲜境内南市和泰川等地区掩护任务的我第八十七高炮师进入安东和庙沟地区，担任这里机场的保卫工作。

7. 为加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指挥部的人力，增强各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决定从国家空防和空军司令部抽调训练有素军官来担任该军指挥部内相应的领导职务。

8. 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师配备超短波联络装置。因为目前该军只有第九十七歼击机航空师有该通讯装备，从而导致各师之间在空战中无法组织直接的战斗协作行动。

9. 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配备“潜望镜”雷达和“白蜡树”指挥装置，但按规定此类装备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10. 通过我国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①总司令提出如下请求：

——为了给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战斗行动创造条件，请其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3个带有水泥跑道的机场，以便喷气式歼击机起飞。第一个机场的建成和投

^① 原文如此。应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编注

人使用应在7月份,第二个在9月份,第三个在今年底。

——中国歼击航空师应积极行动,配合我空军各师,并参加在朝鲜和安东地区的战斗行动。

11. 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说,我米格-15B在武器、拉升速度和水平速度上均略胜于美空军的F-86歼击机,只是在飞行距离、滞空时间、水平技术动作、俯冲和射击瞄准方面不如对方。

我飞机配置的BK-1型发动机很少出现故障。由于飞机结构设计方面的局限,使我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不能充分发挥,输出功率时常不超过45%。在作战条件下,飞行员也只能使用发动机最大功率的80%以上。因此,我们应对飞机的结构重新加以设计,以期增加发动机在最大功率下的工作时间。

上述关于米格-15B飞机和BK-1发动机的意见,目前正由军事部与航空工业部及总设计师共同研究。就这一问题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将在两周内向政府提出报告。

我们将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并请您审查和确认。^①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日加列夫

副本已于1952年5月28日发给Г. М. 马林科夫、Л. П. 贝利亚和Н. А. 布尔加宁

ЦАМОФ, ф. 16, оп. 3139, д. 157, л. 28 - 35

№26406

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

(1952年5月27日)

绝 密

摘自列多夫斯基同志的报告

1952年6月2日

第 on6008 号

在1952年5月27日举行的会谈中,高岗对列多夫斯基同志说道,5月26日通过非官方

^① 见以下№20172文件。——编注

的私人途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得到通报说，中央决定解除他在东北担任的职务，并调入中央工作，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似乎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不足，必须加强中央机关的领导等等。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北京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些人对他不怀好意，决定惩罚他关于农民问题发出的激烈的言论，惩罚他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高岗补充说，对于他对苏联以及在东北工作的苏联专家非常友好的态度，刘少奇过去和现在都是不满的。关于这一问题高岗提到了1950年发生的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肖像的政治事件。

高岗说，刘少奇及其亲近的朋友——彭真、薄一波、李立三、李富春等人早就决定解除高岗的东北地区领导人职务，使他起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作用，并为此千方百计地在实际工作中寻找途径。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同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会谈中，这帮人曾多次就中央某些“高级职位”委婉地向他提出建议。高岗说，每次他都委婉地拒绝这样的建议，因为他明白，为了不让他再从事重要的工作，这些人想让他担任一些名称很响亮的职务，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样的高级职务（高岗强调说，让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长期处在由高岗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解放区），而实际上这是徒有虚名的职务。

高岗说，像以前一样，现在他仍然被提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这一职位上，他（高岗）将无事可做。高岗说，他不愿做这一工作，并将请求允许他到国土部或者水利部工作。他补充说，这些部门的业务他很熟悉，他将会更为平静地在这些岗位上工作，并将使自己有机会更加深入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高岗的话来说，他也会同意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会使他有机会“到全国多走走、多看看”。

高岗指出，他认为不应让他到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领导机构工作，因为在这些机构他将不得不遇到在这些机构中担任高级职位的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其中高岗指出了军事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他补充说，以前他曾拒绝到这一机构工作，如果这次再提出这一建议的话，他仍要拒绝，因为实际上不会让他领导军事工作，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和不足的责任都会被推到他的身上。

高岗说，他的职位暂时由他现在的副手林枫担任，林枫曾是刘少奇的私人秘书，刘少奇现在对他是完全信任的。高岗认为，他以前的副手李富春今后将会被安排担任东北地区的领导人。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他调离东北之后，东北党、政、军的领导班子将会有重大调整。

高岗在谈话的最后指出，关于调离东北的正式通知他还没有收到。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决定或许会在他到北京的时候通知给他，6月2日他将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补充说，中央可能会因他自己的朋友——林彪、陈云和其他人的大力支持而重新审议这一决议，但高岗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他补充说，毛泽东更加相信刘少奇和彭真。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中央的领导机构中主要由两大派别。其中的一个集团是刘少奇、彭真、李立三、李富春、饶漱石。用高岗的话来说，周恩来与这一集团走得很近。高岗对饶漱石

的看法非常消极。其中包括他强调说,饶漱石是“书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得不够。用高岗的话来说,这一集团的人在党和国家事务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他获得支持的另一个集团的人员组成中,高岗举出了林彪、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高岗对朱德的评价也很好,但他强调说,朱德很消沉。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清查指导员

瓦拉金娜(签名)

1952年9月24日

АПРФ, ф. 495, оп. 225, д. 20, л. 79 - 81

№2017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

(1952年5月27日)

为了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的作战能力,苏联部长会议兹做出如下决议:

一、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日加列夫和戈沃罗夫等同志):

1. 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用第一三三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作为第二梯队撤至鞍山、辽阳等机场,担任我驻防安东地区机场各歼击航空师飞机的起飞和降落的掩护任务;在1952年6月15日以后再以巴库地区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替代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2. 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旅顺口边境地区空防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

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则改驻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原驻守的旅顺口地区。

3. 在全体飞行员被替换的同时,第九十七和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所属后勤技术保障部队也随之一起替换。

4. 在派遣过程中,第二一六和第二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在苏联境内时着苏联军服,但当到达中国时将一律改穿中国军装。

5. 为第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配备两套飞行员班子,必须于1952年7月15日以前完成配备工作。

所需人员均从苏联空军各歼击航空师和国家空防各歼击空军师调拨。

6. 为第三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各配备 12 架备用米格-15B 飞机。

7. 规定上述部队的飞行员在洛博夫航空军不超过 6 个月。

8. 在 1952 年 6 月 10 日以前将第八十七高炮师从朝鲜泰川和南市地区调往东北安东和庙沟地区，以加强对洛博夫同志航空军下属各部队所驻机场的掩护。

9. 从空军司令部和国家空防司令部调拨经验更加丰富的军官担任洛博夫同志航空军指挥部的领导职务，以增加其司令部中的高级指挥员数量，加强其作战指挥能力。

10. 于今年 6 月为洛博夫同志航空军配备一台“潜望镜”雷达和一台“白蜡树”指挥调度设备，但其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二、根据此决议，所有派往中国的飞行员均可按照苏联部长会议 1950 年 12 月 16 日第 4949—2147 号和 1951 年 9 月 1 日第 3237—1537 号相关决议所规定的标准享受给养津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57, л. 36—38

№24856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

（1952 年 6 月 2 日）

绝 密

第 2 份

苏联部长会议 1952 年 3 月 27 日第 1508—524 号决议责成苏联国家全部通过乌兰巴托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

上述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1. 中国政府保证：以自己的力量和资金建设从蒙古边界到北京的联络路线；为在二连浩特和淮德（Хуадэ）站点的高频信号加强站提供场所或者建设场所，并为在上述站点工作的苏联专家提供住所；为中国境内的线路和站点提供技术服务并予以保护。

2. 苏联政府保证：为高频站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装备；完成高频站点的装配工作；苏联专家为这些站点提供技术服务。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还应向中国政府作如下通报：中国政府可以使用高频站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保持联系。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同意了上述第1项条款中的条件，但是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高频线路以及在北京的高频站、在二连浩特和淮德的分站都归中国政府所有；要求在北京的高频站不要设在苏联大使馆内，而是设在中南海（在北京地区，政府所在地），同时敷设到苏联大使馆的线路，以便在高频站工作的苏联专家可以根据1950年3月27日的协议规定的条件在中国工作，并且使他们除了在工作之外，还可以培训中国的专家。

国家全部反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如下建议：关于高频站设备的出售问题以及关于中国有权使用这些高频站、有权用其训练中国专家的问题，因为同北京的高频联系将会被纳入到总的政府高频联络网中，并安装特别的设备，这对苏联来说是国家秘密。

中国人提出的如下建议也不可接受：让高频站设在中南海。他们的考虑是利用这一线路进行秘密活动，同时不暴露自己的秘密机构。

苏联外交部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看法，并建议不再主动讨论这一问题。一旦中国政府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外交部将另外提出自己的建议。

请审议。

维辛斯基

1952年6月2日

РГАСПИ, ф. 82, оп. 2, д. 1257, л. 92 - 93

№24857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 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

（1952年6月2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达到北京之后，苏联代表茹科夫已了解了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和一些材料，他建议邀请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彼得

里切夫、寄生虫学家捷普洛夫、病毒病专家列夫科维奇以及一名昆虫学专家乘专机到北京，以便帮助我们准备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

我希望，这4名专家能够在近期被派往北京。一旦工作完成，他们就可以返回苏联。

请您考虑他们到北京出差的可能性，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52年6月24日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43, л. 51 - 52

№20176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 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

（1952年7月2日）

第48852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向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发出如下命令：

1. 为替换目前正在执行特殊使命的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自1952年7月10日24时起从空防巴库地区就地发运苏联空军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师机关、3个歼击航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所属后勤保障部队。

该师共有飞行员120人，其中28人为后备飞行员。飞行员缺额由国家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之飞行员补充。

2. 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全体人员最迟必须在今年7月15日以前经铁路用客车发运至沈阳，归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洛博夫同志指挥。该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得超过今年8月1日。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2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3. 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32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32师全班人马。

——部队的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部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及时确保该师所有飞机和专列顺利通过国界。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人员均须将自己在到达国境线之前旅途中所发差旅费、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人员在到达国境线之前的饮食由所在列车的餐车组织供给,出了国界之后将由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负责安排。

4. 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责成苏联空军总司令从国家空防各歼击航空师中为其抽调16名飞行员。

5. 最迟于今年7月7日前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责成苏联空军司令:

1. 自今年7月10日24时起在国家巴库空防区就地发运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 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在沈阳地区集结后即编入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全体人员均改着中国军装。

3.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自今年9月1日起退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建制,并发往巴库空防区。

4. 根据该指令,就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各师在替换过程中应继续保持战备状态,以便随时执行战斗任务。

责成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和苏联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的情况。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20177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 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

（1952年7月2日）

第48853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命令：

1. 为替换正在执行特殊任务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根据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洛博夫同志的指示将用铁路发运第五十四航空军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所属师机关、3个歼击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后勤保障各部队。该师共有飞行员120名，其中28人为备用。

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超过今年7月18日。

另外，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从边防空军部队的各歼击航空师中再为其调拨32名飞行员。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0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2. 于今年8月15日以前撤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并将之并入第五十四航空军，部署地区为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原驻防的滨海地区各机场。

3. 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第一四七歼击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三十二航空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三十二航空师全班人马。

——部队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部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之人员均须将自己的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该师全体人员在旅途中粮食供给均可得到保障。

4. 根据该指令，就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

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5. 责成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情况。
 6. 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25, л. 21 - 23

№24858

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 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

(1952年7月4日)

格里戈良同志：

兹向您送上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请求信的文本，该请求信是戈宝权在今年7月2日拜访苏联外交部时提交的。

请求对如下内容进行通报。

维辛斯基

1952年7月4日

附件：

“由于必须调整中共中央委员会各部以及中共各地方委员会的档案工作，决定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特别的培训班，以便培训关于档案工作的干部。

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不要推辞，通知各加盟共和国联共(布)，联共(布)中央将向中国派遣一名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担任教师，为期2年。该专家将列入今年下半年中国邀请的教授和专家的名单。

莫斯科，1952年7月2日”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137, д. 945, л. 215 - 216

№005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

（1952年7月4日）

发自北京，1952年7月4日13时2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6月13日来电已收到。

有一些迹象表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敌方似乎会有转变（关于这一点另行通报），尽管如此，也不排除敌方将拖延谈判的可能。

6月份，敌人在朝鲜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加强了军事行动。6月23日敌人对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进行集中轰炸，结果发电站被毁。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敌人企图对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我们认为，敌人有可能发动新的局部进攻。

为了给予敌人坚决打击和反击以及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我们急需补充一些炮兵弹药和器材，以保证顺利完成上述任务。

在1952年5月31日我给您电报附件中，已提出了炮兵武器和弹药申请单。

请您研究一下提供炮兵弹药、润滑油料和火炮零部件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5月31日申请单提出，请在今年8月至年底提供并计算在军事贷款项目下的。这份电报也附有这类申请单。

请把您的决定通报我们。

申请单（电报按下列格式拍发：名称、已订购数量、1952年8—9月运到数量、1952年10—12月运到数量）：

一、弹药（单位：发）

1. 152毫米全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8 000、8 000、无。
2. 152毫米减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2 000、2 000、无。
3. 122毫米杀伤榴弹 159 000、76 320、82 680。
4. 122毫米杀伤爆破榴弹 78 500、37 680、40 820。
5. 122毫米空心装药榴弹 12 500、6 000、6 500。
6. 85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150 000、70 000、80 000。
7. 37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2 120 000、1 000 000、1 120 000。
8. 107毫米杀伤爆破迫击炮弹 20 000、10 000、10 000。

二、炮兵用润滑油（单位：吨）

1. 加农炮油（ГОСТ3005—45）40、20、20。

2. 枪油(ГОСТ3045 - 45)60、30、30。
3. 炮弹油(ГОСТ4113 - 48)10、10、无。
4. 21 号油(ГОСТ3258 - 46)20、无、20。
5. 12 号油(ГОСТ3334 - 46)6、6、无。
6. 衬管油(ГОСТ5078 - 49)5、5、无。
7. 锭子油(ГОСТ1642 - 42)20、10、10。
8. 索立多尔(炮兵专用、不锈)20、10、10。

三、其他器材(单位：件)

1. 1939 年式 85 毫米高炮平衡机弹簧 270、135、135。
2. 1938 年式 76.2 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100、50、50。
3. 1939 年式 37 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600、300、300。
4. 37 毫米高射炮备用炮身 500、250、250。
5. 步兵武器整套量规和仪器(发往中国的每种步兵武器)各 10 套、各 10 套、无。

毛泽东

1952 年 7 月 4 日

第 1947 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55 - 57

№03035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 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

(1952 年 7 月 7 日)

B. M. 莫洛托夫同志：

一、中朝代表团 1952 年 7 月 3 日就朝鲜和平谈判提出的新建议涉及到战俘问题。

在 7 月 3 日会议之前，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坚持自己在战俘问题上的如下立场：

“我们建议，在遵守我方 3 月 21 日提出的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就关于协调进行遣返的具体条件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一）应遣返现处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中的联合国军的全部非朝鲜籍战俘及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应遣返现处在联合国军中的非朝鲜籍的全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及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

（二）应遣返现处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而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以及处于联合国军中而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但希望回到自己原住地各地区者除外，这些人不必遣返。”

上述建议包含在朝中方面于1952年3月27日参谋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遣返战俘问题处理原则的协议草案中（1952年5月10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3页）。

1952年7月3日，朝中代表团团长南日将军提出了关于战俘问题的新建议。南日7月3日声明要点归纳如下：

南日宣称，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你方对战俘名单的审核结果不符合我们达成一致的原则。我们始终认为，由于双方保证根据第52条之规定，战俘在遣返之后不参加朝鲜战争，双方战俘“只被允许回家过和平生活”，所以，双方战俘应分为不同类别，战俘名单根据国籍与居住地加以审核。这将简化全部战俘的遣返工作，如同第51条之规定，即被任何一方所俘的外国的（联合国军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人员均应全部遣返；被任何一方所俘的朝鲜的（南朝鲜的和朝鲜人民军的）军事人员，其居住地在对方所辖各地区者，均应全部遣返，而其居住地在俘获方所辖各地区者可允许直接回家，无需遣返（1952年7月4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7—20页）。

这一声明是南日根据所接到的毛泽东的指示做出的，指示内容拉祖瓦耶夫同志已在2118号电报中通报给我们。

二、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如下，即自3月27日至7月3日，中朝代表团坚持签订停战协议后：

（一）非朝鲜籍战俘应全部遣返；

（二）居住地在敌对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自己的居住地；

（三）居住地在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如果其本人愿意，可以留在这个地区。

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建议，主张朝鲜籍战俘均应回到其居住地，不考虑其本人的愿望。

中朝方面在非朝鲜籍战俘问题上的立场仍维持不变。

因此，中朝代表团的新建议仅涉及朝鲜籍战俘，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

A. 维辛斯基

1952年7月7日

№00548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 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

(1952年7月17日)

1952年7月17日18时45分发出

1952年7月17日20时50分收到

致 A. M.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A. Я. 维辛斯基同志：

呈报金日成 1952 年 7 月 16 日给 И. В. 斯大林同志的信。

拉祖瓦耶夫

1952 年 7 月 17 日

第 2250 号电

附件：

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

致尊敬的大使同志，请您告知 И. В. 斯大林同志下述电文内容：

亲爱的 И. В.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向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报告下述情况：根据对朝鲜状况的总体分析，不排除停战谈判有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

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例如，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敌方就破坏了朝鲜的所有发电站，并且空军活动猖狂，使电站无法恢复。这就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并继续带来巨大损失。

敌机对平壤一个城市仅仅一昼夜(1952年7月11—12日夜)的狂轰滥炸，就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6000多人。

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

当然，中国朋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然而，为了避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遭受苦难和过多不该蒙受的损失，我们必须安全地掩护好最重要的设施并转入积极行动。为此希望最好能做到：

一、加强高射炮防御。为此根据我们的估算，需要获得 10 个高射炮团的补充武器（其中 3 个团的中口径炮、7 个团的小口径炮）。最好能由中国同志提供一半，而朝鲜人民军 5 个高射炮团的武器则直接从你们那里获得。

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要积极进行夜间战斗。在白天需要由歼击机航空兵掩护北朝鲜，至少掩护到平壤一线。朝鲜人民军空军准备好随时开始积极战斗。此外，近期内有 40 名图-2 机组飞行员在苏联完成学业。希望这批飞行员能同图-2 飞机一起抵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使它们能立即投入对敌方重要设施的积极战斗。

三、进行一系列触动敌方要害的地面战役，以引开敌空军对我后方的行动，并对开城谈判进程施加影响。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按照我们 1952 年 1 月 10 日照会、1952 年 7 月 9 日照会以及 1951 年 10 月 6 日照会上对 1952 年的申请，近期内我们非常需要从你们那里获得你们可能供给的技术装备和材料。

四、同时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改变地面及空中战斗行动的性质，将会对敌方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相应的影响。

相同内容的电报已拍发给毛泽东同志。朝鲜人民无限感激您曾经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无私援助。

我们等待您对上述问题的指示和建议。

祝您为了进步人类的幸福而健康长寿！

致深切的敬意！

您的金日成

1952 年 7 月 16 日于平壤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8, л. 65 - 68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4, л. 40 - 43

№005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

(1952年7月1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请将以下复电转告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认为，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① 今天我们收到平壤的报告，据说金日成同志也同意您的立场。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16日^②”

第303号密电

执行情况请电告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69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5, л. 89

№005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

(1952年7月18日)

发自北京, 1952年7月18日12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

① 该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近况和中方在目前阶段的立场和方针。中方于7月3日和6日提出双方均应遣返全部或绝大部分战俘，但对方于7月13日提出了83 000人的遣返数字，其中朝鲜人民军76 6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而中国志愿军仅6 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我方亦对扩大战争有所准备。——编注

② 斯大林这封电报应是17日写的，因为：（1）金日成的信虽然是16日写的，但平壤的报告则是17日发出的（参见文件№00548）；（2）斯大林该电报的档案原件最后注有“7月17日确认”的字样。——编注

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

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

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

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

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

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渡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

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

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

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

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激您。

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

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江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江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二、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

(一)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

(二)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

(三)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三、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第2084号电

№005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

(1952年7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实现您对弹药的申请，因为我们同时应该向你们提供10个师的武器。我们尽最大努力能拨给您申请的五分之一。这一部分您将于今年下半年收到。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24日”

收到并送交后，请告知。

菲利波夫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76

№20179

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 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

(1952年8月5日)

第2527号, 1952年8月5日

兹报告：

应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委员会的委托，我们仔细研究了关于将海军部歼击机航空团全体飞行员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的问题。^①

① 关于将海军歼击航空团并入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建议于1952年7月22日由ИГ. 库兹涅佐夫递交给了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7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Н. А. 布尔加宁、В. Д. 索科洛夫斯基、Н. Г. 库兹涅佐夫和П. Ф. 日加列夫研究该问题。——原注

最终决定：在不带飞机的情况下将 1 个团——海军第五舰队(来自海参崴)空军第七歼击航空师第五七八团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

所有飞行员将由洛博夫部队的飞机空运。

该团人员构成如下：

12 名团指挥部行动小组成员和 40 名飞行员，其中包括：团长、所有中队长和分队长。

该团的发送工作将于今年 8 月 20 日开始进行。

库兹涅佐夫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34, л. 7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9, л. 54 - 72

№24859

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

(1952 年 8 月 9 日)

由于武器装备部第 9 号工厂停止了钻铤的生产，乌斯季诺夫同志请求撤销武器装备部对钻铤的出口，同时责成有色金属部在 1952 年第 3 季度向中国提供 55 个六又五分之八型号的钻铤，其中 6 个是带钻头的，费用从石油工业部储备金中支出。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武器装备部提出的建议。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Г. 佩罗夫

1952 年 8 月 9 日

РГАЭ, ф. 4372, оп. 54, д. 1031, л. 28

№09859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

（1952年8月18日）

今天18时，我会见了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是来我这里做礼节性拜访的。

会谈开始周恩来说，从1950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变化；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谈到中国的形势，周恩来强调，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动员人民群众，中国在稳定经济和财政形势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去年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到1952年底，国家预算将出现顺差。国家正在大力进行工业建设，土改接近完成，正在兴修农田水利。

同时，周恩来强调了苏联、苏联人民、联共（布）和斯大林本人所给予中国援助的特殊意义。周恩来说，没有苏联过去和现在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便不可能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取得和平建设的成就。周恩来指出，斯大林同志为中国取得历史成就起了伟大的作用。正是他的英明指导，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此期间，它从未放弃过最强大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关于人民和革命一定能战胜敌人的科学论断。周恩来指出，依靠这些武器，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危害和平与民主国家阵营命运的任何敌人。

与此同时，我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指出了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杰出贡献，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新解放和独立的国家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还指出了我们友谊的重要性，指出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好合作。

然后，周恩来问我对他在8月18日与费德林同志会谈中所陈述的原则有什么意见。我说，我看了这些原则，没有什么意见。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表示，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希望就一些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随时准备同他会面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马列、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德林。

维辛斯基

№20180

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 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

(1952年8月19日)

第49544号,1952年8月19日

兹报告：

洛博夫同志提议，为了我军顺利完成战斗任务，有必要在凤凰城—辑安沿线建设2—3个新机场。

目前在大孤山、安东、凤凰城和庙沟的4个机场中驻扎了6个歼击航空师，其中有我们2个，中国空军师4个。这非常有利于我军兵力和作战行动的展开和实施。另外，其中三个机场直接临近朝鲜湾。美军歼击机经常从该地区向我发动空袭，而我飞行员却根据相关指令不得到达那一地区。

鉴此，我认为洛博夫同志的建议是合理的。我请您允许，通过我方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军事司令部^①提出请求：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两个适合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带水泥跑道的机场。

索科洛夫斯基

手写批注：

转交 B. Д. 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同意。

布尔加宁

1952年8月20日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34, л. 2

^① 原文如此。——编注

No00553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 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

（1952年8月20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费德林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①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并祝斯大林同志健康。

斯大林感谢周恩来，并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周恩来告知，近两年来毛泽东自我感觉良好，并说中国对即将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极为关注。

斯大林指出，许久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1939年有150万党员，现已将近600万，尽管我们限制接纳党员，但党仍然在发展。

询问代表团旅行情况。

周恩来感谢关照，并回答说，旅途十分顺利，途中代表团得到了一切方便条件。他代表毛泽东为在发展中国国民经济事业和对敌斗争中所得到的巨大援助，向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斯大林：不必感谢。这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状况，难道中国同志不帮助我们吗？

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虽然给予援助是应当的，但表示感谢也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我们也应感谢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中国给我们提供橡胶，这也是中国的巨大援助，我们也必须感谢中国。

周恩来说，遗憾的是，中国给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你们执政晚，晚了30多年。

周恩来请求允许说明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他提到毛泽东阐述中国政府希望的电报，谈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朝鲜形势。第二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近3年的国内形势以及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并指出，正在准备书面报告。中国代表想在提交书面报告后汇报

^① 陈云、李富春、张闻天（已在莫斯科）、粟裕均是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代表团于8月17日抵达莫斯科。——编注

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延长旅顺口协定。

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

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并建议互换照会。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相应请求。

下一个问题是建设从乌兰巴托到蒙中边界的铁路。

斯大林问,中国对这条铁路是否感兴趣?

周恩来指出,新疆的铁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中国政府打算首先建设在蒙古方向出境苏联的铁路。在中国境内铁路长约 350 公里。预计在 1955 年 6 月以前完工。这条铁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打开沟通苏联的直达铁路线,便于从苏联向中国接运工业设备以及向苏联运输中国商品。

斯大林指出:新疆方向从长远目标看是极其重要的。但这的确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如果中国同志有意修建经过蒙古境内的铁路,那么我们准备从自己一侧援助蒙古境内的建设。这将更快一些。但我们认为,不能放弃新疆方向,因为这是一条穿过含油地区的极其重要的铁路。在中国境内肯定会有石油,而蒙古缺少石油。

周恩来指出:在平地泉^①地区有许多铁矿,而且这里将是炼铁和铸钢工业中心。目前正在建设新疆铁路的设计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建设从兰州到哈密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从哈密到苏联边境的铁路。

斯大林赞同这样做,并再次强调新疆铁路对开采石油的长远意义。

周恩来肯定,这条线路上到处有石油。转入橡胶协议。

斯大林指出,原则上问题已经解决。

周恩来肯定这一点,并转入中国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问题说,正在起草有关的书面报告,待整理好报告后,他想会见斯大林同志并亲自对报告做出说明。

斯大林同意这样办。

周恩来请求帮助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转入中国正在筹建的各种工业项目问题,并说他指的是 151 项工程。他指出,中国需要苏联的设备援助。请求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并且说明苏联能提供多大规模的援助并规定期限以及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他强调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给了中国很大帮助,特别是在帮助培养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斯大林:这是最重要的。当中国有了本国干部的时候,它将牢牢地站稳脚跟。

周恩来通知说,他们希望从苏联得到 800 名专家。

斯大林说,研究一下这项申请并尽我们所能予以派遣。

周恩来请求再帮助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等)。

^① 集宁旧称,1951 年设平地泉镇,1956 年改设集宁市。——编注

斯大林说，没有资料当然不行。

周恩来询问，今后能否再派大学生到苏联学习并向苏联企业派遣实习生。

斯大林表示同意。

周恩来谈到国内五年计划的问题，通知说，正准备材料并将提交有关此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武器装备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说，现在是指提供武器装备。他指出，对60个师的事已经有了协议，他还想讨论海军供货问题。他问，在飞机方面能得到多少援助。

斯大林问，中国政府不打算建设航空工厂吗？

周恩来说，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得到，特别是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

他指出，掌握飞机制造预计至少5年，而发动机制造要3年。

斯大林举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例子，这两国先从装配厂开始。说苏联可向中国运送发动机和其他飞机部件，而中国可在本国进行飞机组装，借此培养干部。装配厂可以变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中国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条道路。先要建立一至二个发动机装配厂。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部件，可在中国组装飞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是这样做的。必须这样安排，组建装配厂以后，经过3年，也就可以建立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简单、最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说，他们已开始懂得这一点，正在组建修理和装配厂，并补充说，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加快这项工作的进程，那么他们将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

斯大林问，苏联向中国运去的供60个师的装备，已用来组建哪些师？

周恩来解释说：他们已经接到10个师的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已交给朝鲜人，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的中国部队。

斯大林问，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即全部装备将用在朝鲜前线。

周恩来确认。他说，如果战争再打下去，就是这样。他告知，中国政府已确定，把60个师装备中的3个师交朝鲜人，42个师准备用于朝鲜……

斯大林问，中国人使用新装备是否习惯。

周恩来解释说：正在逐步掌握这些新装备，要训练3—4个月。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让大家熟悉新装备和师的编制。这大约需要近6个月的时间。否则，会对武器生疏。此外，利用这段时间检验各种仪器的性能，只有在这以后才能把这些部队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在后方，在前线附近，例如在朝鲜，进行这种训练。必须把一半得到新装备的师留在中国。

周恩来指出，把一些师派到朝鲜去，是因为需要补充已有的损失。

斯大林强调，必须派出接受过训练的师，才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提出援助火炮的问题。

斯大林问，中国能不能制造炮弹。

周恩来说,已经着手这件事。

斯大林指出,最困难的是运炮弹,运火炮要容易些。

周恩来再次提出援助火炮的请求。他强调说,中国人发射1发炮弹,美国人要回击9发。

斯大林:这不好。他补充说,如果美国人发射9发炮弹,中国人就应发射20发以上。我们就是用炮弹把德国人压下去的。我们每隔2米距离就有1门炮,而德国人在2公里距离上才有1门炮。炮兵可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帮助建立这类工厂。

周恩来说出他们正在改建现有一些工厂并筹建一些新厂。

斯大林:这件事是必要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机床。

周恩来说他们有机床,不过是老机床。

斯大林说,需要有制造122毫米炮弹、3英寸火炮和高炮的机床。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忙。

他补充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炮弹的:有些厂造药筒,有的厂装药。集中在一个工厂做是有困难的。

周恩来谈到航空工业的问题时说,中国将按苏联政府的建议行事,并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这项工业。

斯大林强调首先组建装配厂的重要性。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筹划建立坦克厂,即一个是年产1000辆坦克的轻型坦克厂,另一个是中型坦克厂,计划建4—5年。

斯大林仍然建议先建装配厂。他指出,战争时期我们把汽车厂变成了坦克厂。说中国若是有一至两个汽车装配厂就太好了。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长春筹建一个年产2万辆汽车的厂,改建一个年产3000辆车的装配厂,请求帮助再设计一个厂。

斯大林强调,应当在装配厂和修理厂培养干部。对这件事必须关心。

周恩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并告知说,中国政府正在办这件事。他们有修理厂,现正在组建装配厂;明年这些厂就开始生产。

斯大林询问,中国有没有厂办徒工学校。还补充说,我们每个工厂都有这种学校。

周恩来承认,这是一个薄弱环节。他们正采取措施,扭转这种情况。在工厂有训练班。他们吸收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派党员参加。

斯大林指出我们有专门的部,即劳动后备部,有徒工学校。中国若采取某种同样办法就好了。我们每年从这类学校中培训近百万青工。

周恩来问我们有哪些培训中级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解释说,有中等专业学校。

周恩来说想讨论一下有关雷达的问题。

斯大林答应帮助这件事。无线电和雷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建设这方面专业的装配厂。

斯大林强调，以后必须建立雷达设备生产厂。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还不能制造雷达设备。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再次提出专家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不仅想请我们派专家，而且还打算组织培养本国专家。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指出，印度、缅甸、印度支那等国也将请求中国政府派专家。又补充说，中国政府最好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工厂充实提高。

周恩来提出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问题。说中国政府想请求新的贷款。这时，周恩来指出，当然这对苏联是一个负担。

斯大林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执政得早，是我们的幸运。如果中国同志执政得早，那么，我们势必也要请求弥补这类差额。

对此，周恩来指出，莫斯科是鼓舞各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接着简要说明了朝鲜局势。他指出，1951年5月以前，朝鲜没有阵地战，只有运动战。从1951年5月起战线明朗了，战争也有了阵地战的性质。双方力量大体相当。敌人不能进攻作战。出现了一定的均势。但我方也未进行大规模进攻。敌人在15—20公里的纵深加固了自己的阵地，我方也建立了自己的坚固地带，并且继续扩大坑道工事。敌人无法摧毁我军的坚固阵地。大约200公里的战线已全部得到加强，左右两翼也有良好坚固的工事。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打退敌人，我们坚信能。第二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守住现有阵地。今年的情况证明，我们能够守住这些阵地。第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发动进攻，攻击敌人。过去我们想，我们不一定能进行7天以上的进攻作战。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

斯大林问，你们能不能发动进攻。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可以发动夺取个别阵地的进攻战役，但难以发动全面的进攻。自从战争形成阵地战以后，美军当局极力拖延谈判，不想缔结停战协定。

斯大林说，看来，美国人想多扣留中国战俘，这是因为他们拒绝遣返战俘，也许他们想把战俘送给蒋介石。

周恩来肯定地说，蒋介石在战俘中安插了特务。

斯大林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违反一切国际法。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与朝鲜同志存在的分歧，美国人同意遣返83 000名战俘，朝鲜准备同意这项建议。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要花招，因为在83 000人中只有6 400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13 600名中国志愿军，而美国不打算这么办，却准备遣返76 000名朝鲜人。这清楚地证明，他们在耍阴谋，企图挑拨中朝关系。

斯大林问,有多少朝鲜战俘。

周恩来指出,有96 600人。强调说,应当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中国政府坚持应遣返全部116 000名战俘,其中20 000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同意少遣返一些,仅就剩余战俘问题继续举行谈判,那么,可以不反对这样办。

斯大林肯定说,这是对的。

周恩来通知说,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

问及朝鲜的粮食情况如何,说我们还能帮他们什么。

周恩来说,朝鲜在这方面有困难。中国政府知道,苏联援助过朝鲜。说他们也援助过朝鲜并曾告诉金日成,这些若不够,他们还可以提供食品、衣服,他们要什么都可以提供,但无法提供武器。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再给朝鲜一些武器,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

周恩来再次说,同美国谈判时不能让步。

斯大林指出,如果美国做些让步,那么,可以同意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谈判。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不想缔和,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哪怕再打一年。

斯大林肯定,这是对的。

周恩来肯定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即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美国没有做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还补充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起了先锋作用,如能挡住美国对朝鲜的进攻,那么,对把大战推迟15—20年是有利的。到那时,美国就根本发动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有一个条件:美国必须在朝鲜战争以后才根本不能打世界大战。美国主要力量在于空袭,在于原子弹。英国不愿为美国打仗。美国打不赢小小的朝鲜。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不让美国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斯大林取笑说,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筒袜、香烟和其他销售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不,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失去了打大战的能力。他们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这需要步兵,但他们步兵少而且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就有人在哭泣,如果他们发动大战会如何呢?那他们岂不人人都将哭泣?

周恩来告知说，如果美国人作某些让步，尽管不大的让步，那么就可以答应他们。如果美国人不同意遣返全部战俘而提出遣返少量战俘，那么可以同意此项建议，同时考虑到可在某中立国，例如印度的调解下解决其余的战俘问题，或者在解决问题以前把这部分战俘转移到第三国境内。

斯大林问，有多少美国战俘。

周恩来解释说，朝、中控制的战俘总数达 12 000 人，其中南朝鲜人 7 400 名。

斯大林不排除按周恩来的建议去解决问题。同时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且向报界宣布。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那么就宣布他们可能想把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如果这些建议都不成功，那么就可以采取调解办法。主要的是建议停火。

周恩来说，实际上缔结停战协定，也就是停火。在交换战俘问题上，定出三项办法：第一，先宣布扣留南朝鲜和美国战俘的比例，这个比例与扣留朝中战俘比例一致，这个办法可以谈；第二，由中立国调解；第三，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战俘问题分开，以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周恩来转入军事援助问题，说明了朝鲜同志要求向他们提供 5 个高炮团的问题。我们告诉朝鲜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将同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斯大林：金日成要求我们提供 5 个团。我们答应向他提供。也许中国可以提供 5 个团？

周恩来再次说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这对他们是新东西。

斯大林认为，这个问题要找金日成弄清楚。

原已答应的以外，周恩来要求再提供 10 个团的装备。斯大林回答说，需要考虑一下。

周恩来转告朝鲜同志要求，即要不要对南朝鲜进行轰炸，他们没有把握，这样做对不对。

斯大林解释说，航空兵归国家所有，中国志愿军也不要动用国家航空兵。

周恩来告知，朝鲜同志问，他们能否发动一次新攻势，中国政府答复说，他们不能进行战略进攻。

斯大林指出，当正在举行停战谈判的时候，无论是战略进攻还是战术进攻都不要进行，不得进行任何进攻。

周恩来问，根据毛泽东的请求，可否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来莫斯科。

斯大林：我乐于同他们谈一谈，但他们离得太远。此外，我不便邀请。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乐于接见他们。

周恩来告知，彭德怀很想来，但还不知道金日成对此事持什么态度。也许可以同他谈谈这件事。

斯大林同意这么办。

周恩来再次说，中国政府认为把板门店的谈判拖延一下是适宜的。但中国也做好了战争可能打 2—3 年的准备。再次请求提供飞机、火炮和炮弹援助，因为中国自己尚无法胜任此项任务。

斯大林宣布,我们能办到的,全部提供。

问朝鲜人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惊慌失措?

周恩来解释说,朝鲜确实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鸭绿江电站被炸以后。这使朝鲜同志的情绪受到了影响,因此,想尽快实现和平。

斯大林说,美国的谋略就是恫吓。但他们吓不倒中国人。能否说,他们也吓不倒朝鲜人?

周恩来肯定地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如果真的这样,那就不错。

周恩来补充说,朝鲜人有些动摇,他们的情绪不太稳定。在部分朝鲜领导人员中甚至有些惊慌情绪。

斯大林提到,他从金日成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知道有这种情绪。

周恩来肯定了这种情况。

问中国代表团下一步如何活动。

斯大林提议现在就着手工作。告知说苏联方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同志任主席,成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库梅金同志。中国代表团可以同莫洛托夫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周恩来感谢通知此事,并请斯大林同志指定什么时候他可以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形势。

斯大林表示同意,周恩来一准备好书面报告就接见他。

A. 维辛斯基、H. 费德林记录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9, л. 54 - 72

№2486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

(1952年8月21日)

机 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 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指出，关于双方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中国代表团已经准备了建议草案。该草案需要修改，或许需要做根本性的修改。请求苏联同志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必须修改的意见。（草案附后）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方将会研究这份草案，如果需要提出意见的话他们将在下一次会谈中提出。

2. 关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签署两份协定：公开的原则性的协议和技术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对此苏联方面表示同意。或许，这一原则性的协议内容不多，并且看起来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参与进来。

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必须取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意，在其境内修建铁路；第二，要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修建铁路的要求。

中国代表团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原则协议可以是三方签署的，也即是说，该协议在苏联、中国和蒙古政府之间签署。至于技术协议，可以由苏蒙“乌兰巴托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中国交通部之间签署。或许，在原则性协议中也应该指出双方铁路的结合点。中国方面认为，这一结合点可以是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

莫洛托夫说，中方关于铁路结合点的建议同苏方的看法一致。

布尔加宁问道，关于铁路修建的期限问题中国方面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回答说，中国政府建议在1952年完成初步的勘查工作，1953年上半年结束勘查工作。预计在1954年年中完成铁路的修建。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铁路轨道的尺寸问题。中国方面认为，从平地泉到中蒙边界的中国路段应该修建宽轨铁路，也即1524毫米。如果是宽轨的话，中苏之间的铁路交通就不用在二连浩特换轨，而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的换轨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二连浩特是个荒漠。此外，考虑到中国铁路发展的前景，我们应该修建宽轨铁路。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中国铁路的轨道应该和苏联的统一。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不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周恩来指出，中国方面的考虑是，货物运输不应该在中蒙边界或在蒙古换轨，因为这些问题主要由苏联或中国预先决定。因此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或者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应该能够直达。

莫洛托夫问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是否有建议草案。

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这样的建议草案，但是在中方的建议草案中有关于各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的条款的概要。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就这个问题准备建议草案。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同意准备这一建议草案，但是希望得到中国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概要，以便能够考虑到中方的意愿。

周恩来说，明天，也就是8月22日中国代表团将就这一问题提出看法。

3. 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的技术合作。周恩来通报说,由于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进行技术合作的协议,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公布这份协议。

莫洛托夫回答说,未必需要公布这一协议。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准备了协议草案。(中国协议草案的翻译本附后)

然后周恩来说,今年8月20日斯大林同志就在新疆建设铁路的问题进行了谈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弄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打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修建从兰州到哈密之间的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从哈密到霍尔果斯(苏联)的铁路。关于中国政府修建这一铁路的计划将会提供给苏联方面,以便了解。

莫洛托夫指出,在今天的会议上对三个问题都进行了审议。他问道,关于进行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有什么希望呢?

周恩来回答说,他希望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关于中国的状况,然后讨论中国的五年计划问题和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同意这样做。

潘友新和费德林记录

1952年8月21日

РГАСПИ, ф. 82, оп. 2, д. 1258, л. 22 - 25

№2018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 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

(1952年8月21日)

关于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①

根据政府和苏联政府和军事部长1952年12月15日第641649号决议,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携两个团(第十六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于1952年12月22日离开卡卢加市,并于1952年1月2日抵达中国境内的安市,以完成政府交付的特别使命。

1952年1月4—21日期间该师所属部队在安东机场按计划完成了地面训练和投入作战

^①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的飞行实习活动，并从1月21日起进入战斗值勤和针对敌空军小型机群的作战状态。

截至1952年2月10日，该部队完成了对敌空军密集空袭的反击作战计划。

我军作战活动的特点如下：部队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活动，即南部飞行边界为平壤、元山和黄海沿岸（朝鲜湾），我飞行员无权飞越这一边界。这就制约了我机群的作战活动，尤其是在追击敌机的时候，因为后者一旦在空战中失利便会立即逃向大海方向，拉升飞机高度，在占据有利地形之后再进入战斗区域……

二、完成任务和战斗结果的总体情况

1. 我部队执行任务情况：

（1）自1952年1月4日至2月10日间，我师所属部队投入战斗。

（2）自1952年1月21日至8月10日间，实施作战，根据作战性质来划分，我师主要任务如下：

白天：

——自1952年1月21日至7月9日，驻防安东和庙沟机场的我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独立和军内其他部队的协助下以机场值勤方式起飞拦截敌机，并为安东、义州和朔州地区的设施和渡口，以及安东、义州、安州、开城、泰川和宣川地区的机场、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

——从1952年7月9日至8月10日，驻防沈阳机场，白天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根据军指挥部的要求，与军内友邻部队一起以值班状态防止敌机对沈阳方向的中国东北工业一行政中心和沈阳市实施空中侦察；在敌机对朔州、安东和大孤山地区的目标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我安东航空枢纽机场时，为我第一梯队战机提供支援，掩护第一梯队米格-15飞机的降落。

夜间：

——1952年1月30日至5月16日期间在安东机场，1952年7月22日至8月10日在沈阳机场，处于一级、二级和三级战备值班状态，起飞拦截敌机，实施机组巡逻，为夜间战斗行动做好准备，防止敌机对安东、义州、铁原和沈阳地区的机场及设施实施轰炸。

在完成主要战斗任务的同时，我部还担负了以下任务：

——在2月份掩护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投入战斗，对敌空军的大规模空袭实施反击。

——我师新补充的飞行员（共33人）也全体投入了战斗。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飞行技术和理论监察员、飞行员对第三五歼击航空师15名飞行员进行了从驾驶拉-11飞机到驾驶米格-15飞机的改装训练，还对其进行夜战心理素质训练。

——承担了在鞍山、安东机场对补充给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和本军其他部队的米格-15战机的卸货、安装和试飞等工作，共安装了116架飞机。

——派遣飞行和技术负责人以监察员身份对中国同志进行了改装训练，其中包括：40名飞行员、75名米格-15飞机和BK-1发动机的技术人员。

根据培训计划对所有班组进行了理论培训，并举行了考核。对飞行员进行了包括全部飞行科目的实战训练。

1952年7月9日以前,我部所完成的部分战斗任务主要是从安东机场起飞的,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952年3月30日至5月5日期间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都是从庙沟机场起飞的(当时该部队属于我军第一梯队,只是从1952年7月9日作为第二梯队起,才开始从沈阳西机场起飞)。

我部参战机组的平均数量为: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6架。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8架。

4—5月间,由于战斗任务过分频繁,加上伤病而不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数量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各团参战机组平均数量下降至10—14架,在个别情形下,由于战斗过于紧张,该平均数量甚至降至6—8架。

整个参战期间我部战斗飞行总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762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418次。

平均每个飞行日战斗起飞架次: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8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2次。

平均每个参战飞行员战斗起飞次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61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80次。

2. 根据我部所完成战斗任务的性质,整个参战时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2年1月21日至4月末,以团为单位参战,主要目标是针对敌歼击机“掩护”,另外,此类起飞的目的还在于支援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与敌强击机作战。

第二阶段:

1952年4月末至6月末,我部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敌强击机,一部分力量用于解除敌机对我安东航空枢纽一机场的封锁,掩护我战机降落。

第三阶段:

自1952年7月初起,我部从安东机场转移至沈阳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所属部队反击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地区地面设施的集群式轰炸和对安东机场的空中封锁,掩护第一梯队飞机降落,即在第三阶段我部作战行动的特点是以我歼击机作为沈阳机场的“掩护”。

另外,根据敌空军作战,我们部队的使用和我歼击机的行动战术等的性质,我部作战的第一阶段又可分为这样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2月份(参见图1)^①。敌空军每天实施2—3次大规模强击机群的集中式

^①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空袭，且几乎每次都有少量歼击机直接为其提供掩护。敌平均每次参战飞机数量 150—170 架，个别情况下可达到 220 架。

与强击机一起同时在战区出现的还有敌歼击机“掩护”：

例如，在新比岛地区便有 24 架 F-86；在朔州地区有 16 架 F-86。

参战时敌歼击机“掩护”高度——15 000 米。

这一阶段敌强击机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安州及其以南地区。

这一时期根据军总体计划我部与其他部队一起行动，起飞时以师为单位，各部队起飞时间稍有间隔，以 3—5 分钟为标准。

起飞之后我部将飞机拉升到一定高度，在进入朔州地区时完成集结（在同一地点），突破敌歼击机所制造的“掩护”，进入敌强击机活动区域。一般情况下当我歼击机突破了敌歼击机的“掩护”以后，敌强击机便会向海上或东南方向退却，而敌歼击机“掩护”也会紧随其后向同样方向撤退。

这一时期的空战我们都是同一地区以团或师为单位的大机群投入战斗，高度大都在 15 000 米。

这一时期我们的作战行动存在重大缺陷：

——指挥员们在作战指挥方面经验不足。

——在同一地区实施大机群作战制约了我战术的发挥和机动性，对战斗进程难以控制，限制了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我殿后机群多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原因：

（1）当敌人发现我整个机群后，其首先会向我负责殿后的部队发起攻击，在此情况下我殿后机群便也首先投入战斗。

（2）当敌发现我先头部队，便企图向其攻击。但他们却常常忽然遭到我殿后机群的攻击。原因在于，从后者所处位置发动的攻击往往具有出敌不意的效果。

不过，我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往往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当巨大的损失。

于是，飞行员们便开始寻求更好的作战方式，以提高我部的空战效率。我部的作战行动便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第二时期：3 月份（参见图 2）^①。敌空军继续保持原有作战方式，只是略微有所变化。

在强击机起飞前 20—35 分钟，敌歼击机“掩护”率先进入作战区域。

例如，——在朔州（Сакусю）、泽光洞（Дзэгуандонг）（敌主力）地区——敌歼击机 F-86 达 24—36 架。

——在尚州（Сиодзйо）地区（从东面或东北方向进入）——F-86 达 8—12 架。

——在新比岛地区——F-86 达 16 架。

^①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敌机作战高度：7 000—12 000 米。敌强击机作战区域与从前一样。

在第二时期开始前夕，我们对上一时期作战行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召集了飞行—战术会议，并讨论了我歼击机作战活动的战术和战斗序列等问题。这对提高我歼击的作战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从3月份开始，我军改变了行动战术：

——在以部分兵力对敌人实施牵制的同时，从广大战线上突破敌歼击机“掩护”（扩大经鸭绿江对敌实施正面突击的我部队之间的间隔，以扇形战斗队形穿过敌机“掩护”）。

——另外，起飞后我部队在进入战区时，一部分向右，一部分向左，以对敌形成夹击态势。

——随机改变我部队的起飞间隔，将作战时间从30—35分钟增加至1小时20分。

——我部队应更多地投入作战，尤其是采用小机群战斗方式。最初，在一个地区参战时，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然后将各部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到3月末，我们开始以中队甚至分队为单位组织战斗。在作战中，我飞行员将战机高度低至7 000—10 000 米，以利于米格-15 战机充分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

——根据空军相关规定在地面对飞行员进行训练，以提高其火力准备技能。

——我飞行员已能够在任何时间和气象条件下完成寻敌和作战任务，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校杜特尼琴科所率中队的飞行员们。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

——对敌机实施拦截时，能掌握战斗主动权。

——在广大战线上实施作战。

——各部队指挥员积极参战。

——全体飞行员的作战效果迅速提高（例如，3月份我共击毁敌机17架，而2月份只有9架；弹药消耗下降：击毁一架敌机，3月份消耗弹药280—300发，而2月份是500发）。

——指挥员和飞行员的作战能力和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指挥员已能够熟巧地指挥整个机群投入作战，并对小股敌人给予有力打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指挥员有：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飞行员巴什曼、现为中队长的上尉克雷洛夫、上尉阿韦林、中校茹拉夫廖夫和少校博伊佐夫等。

——在全天候气象条件下发挥米格-15 战机的技术优势以相应战术投入作战。

这一时期我军也以师为单位实施了一系列战斗行动。

第三时期：4月份（参见图3）^①。敌空军在损失惨重、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开始采取如下战术：

——在歼击机“掩护”地区不同高度集中40—50架，甚至更多歼击机，以小机群为单位。

——对我机场地区上空实施封锁。

——在大量歼击机掩护下，以强击机对我安州、定州、宣川和泰川等地区目标实施定期空袭。

^① 该图尚未公布。——原注

增加对我地面设施的攻击持续时间（2—3 小时），主要采取以缩减其他机群数量而增加参与空袭的机群数量的方式。

这一时期我军的作战方式主要如下：以小机群为单位在我机场空域实施自由“搏击”作战，打破敌人的封锁，并以部分兵力在敌歼击机“掩护”所在地区发动“狩猎”攻势。

我飞行员对每次飞行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以期寻找到新的能够击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新战术。

针对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我们采取了以下战术：

- 以小机群在高空组成封闭式防护圈，我机群有时均沿同一方向飞行，有时则相向而飞。
- 在中等高度采取沿不同航线飞行的方式，最终各机组将同时在机场上空相遇。
- 在飞行过程中以小机群在不同高度对我驻防地区实施掩护。

有时，我们也会同时采用上述所有作战方法。各种战斗方式在实战中不断得到完善。

这一时期是我军作战最困难的时期。我军飞行员在作战过程中从起飞到降落飞行高度落差为：100—7 000 米。

不过，随着我们找到和不断完善自己的行动战术，到 5 月末，敌人在遭到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停止了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活动，与我歼击机的作战也变得愈加消极起来。

与 3 月份击毁敌机 17 架相比，在 4 月份我们共击落敌机 22 架。

第三时期结束之时，我部开始仅针对敌歼击机实施作战，并为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提供支援。

第二阶段：从 4 月末至 6 月末。

我部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强击机。

在少校米涅尔温、博伊佐夫、巴什曼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的指挥下我团通过与敌强击机群的初期作战，获得了一些实战经验。

为了总结与敌强击机的作战经验和寻找合适的行动战术，1952 年 5 月 27 日，我们召集全体飞行员开了一个战术会议。在会上我们对与敌强击机的作战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总结，通过与飞行员广泛交流意见，我们归纳出如下一些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战术：

- 在从机场起飞时利用机场地面的起伏和坡度，采取（掠地）低空飞行方式。
- 在向敌强击机活动区域突击时采取低空（不超过 700 米）进入方式，给敌歼击机来个出其不意。
- 在低空寻找敌强击机。
- 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争取第一次攻击便达到摧毁它的目的。在初期攻击的同时极力击破敌强击机防御圈，如果不成功，则争取在后续攻击中消灭敌人。
- 以低空方式退出与敌强击机的战斗。
- 返回机场和降落时采取掠地落地方式。
- 为了迷惑敌低空飞行的歼击机，我所有与敌强击机作战的飞机均涂上与当地植被

一样的颜色。

通过会议交流意见和对战斗行动进行详细分析,大大提高了全体飞行员的反敌强击机作战技能,涌现出一批技术尖子,如少校博伊佐夫、巴什曼、托卡列夫、米涅尔温、杜比诺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等,他们都成为了攻击敌强击机的模范带头人物。

虽然气象条件差,我军战斗飞行数量受到限制(如在6月份我部共实施作战飞行56次,未击毁一架敌机),但从1952年4月30日至7月1日,各团共击落敌强击机16架,自己损失飞机2架。

我飞行员普遍认为,即使在环境恶劣和机场遭到敌人封锁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成功地战胜敌人的强击机。

第三阶段:从1952年7月1日起,根据军长指示,我师开始投入针对敌歼击机“掩护”的战斗,在7月9日以前(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7月5日以前),我部队在安东机场起落,1952年7月9日以后在沈阳西机场起飞。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师各团的任务——白天和夜间为沈阳市提供空中掩护。

另外,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并增援第一梯队防止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等地区的设施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安东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飞机降落。

我部在从沈阳机场起飞完成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任务的过程中,共击毁敌歼击机4架,击伤5架。

我师各团在第一阶段和第一时期的作战行动中都会仔细分析敌空军的战术变化,以期探寻和完善我师的战术和战斗方式,加强各部队的密切配合,提高飞行员的战斗效率。

3. 各机场的战斗值班安排如下:

拂晓前10—15分钟内全体飞行员到机场集合。相关后勤技术部队开始进行飞机的起飞准备工作,借助“躲闪”将飞机拖至战斗值班位置,并按各分队排好。

必要时可将飞机分散放置。各部队在机场值班飞机的停靠都是固定的。如安东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起飞着陆地带,从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滑行线上,南面起飞。

沈阳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北面起飞。

在确定了作战人员之后,根据空中形势,部队同时或依次进入第一、第二、第三级战备状态。

作战人员的参战方式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般条件下和个别复杂条件下。

部队的战备级别和作战方式由师长把握。是否发出准备战斗或退出战斗准备的信号由师指挥部决定。

各部队从不同状态进入战斗准备的方式:

——从二级、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

战斗准备所需时间：

——从二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 2—4 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 4—6 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需 2—4 分钟。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在安东机场需 35 -45 分钟，沈阳机场需 15—20 分钟。

上述进入战备状态所需时间完全可以确保我军飞机及时起飞，以完成所承担的作战任务。

4. 我部完成战斗任务情况：

编号	名 称	师机关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白天					
1	战斗起飞	9	1 762	2 418	4 189
	其中：拦截	2	1 396	2 009	3 407
	增援		—		
	巡逻		278	271	549
	自由“搏击”	7	24	54	85
	掩护其他部队		54	64	118
	侦察	—	10	20	30
2	机群起飞数量	3	143	212	358
	其中：以师为单位		21	21	21
	以团为单位		54	78	132
	以中队为单位		45	48	93
	以分队为单位		15	54	69
	以双机为单位	3	8	11	22
3	作战里程	6.37	1 480.48	1 881.57	3 369.22
夜间					
1	单机战斗起飞	6	51	75	132
	其中：拦截	6	25	39	70
	巡逻	—	26	36	62
2	作战里程	5.15	33.31	64.40	93.26

附注：该师机群式起飞总数有 21 次没有同时起飞，原因在于在以师为单位的起飞行动中有时是两个团同时起飞的。

5. 我部主要作战方式为：起飞拦截敌机。我部战斗起飞总共 4 189 架次，其中 3 407 架次(81%)是拦截敌机。

起飞拦截作战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的。1—3 月份各团行动时以 14、16、18、20 架飞机为单位组成飞机编队，随后根据我歼击机行动战术的改变，我 16 架飞机分别以 2、4、6、8、12 架为单位组成战斗机群。我部作战初期机群平均飞机数量为 16—18 架，随后改为 8—12 架。

以大规模机群参战不利于我军战术机动及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管理，因而制约了各部队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导致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随着我军开始以小机群为单位作战，上述缺陷也迅速被消除。部队的战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以小机群为单位实施作战的优势在于：

- 迅速起飞，隐蔽地突入敌活动区域，完成战斗任务后返回本部机场；
- 在寻敌和战斗中具有隐蔽性，可以充分发挥机群的灵活、机动性；
- 在寻敌和战斗中便于对整个机群实施管理；
- 在接近敌活动区域和发动攻击时具有突然性；

在战斗中有利于增强和充分发挥直接参战机组(即以双机为单位的机组)的火力优势，尤其是在与敌强击机作战过程中，个别情况下每个机组都可方便地选择合适的目标，并对之实施攻击。

以小规模机群参战和将我歼击机的攻击目标集中在敌强击机身上，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而且自己几乎没有损失。

我部对敌机的拦截作战包括两种类型：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和条件不利的情况下。

在我飞机起飞拦截敌机之时，如果敌机群尚在平壤地区，我方的有利条件如下：

- 可及时突入作战区域。
- 以战斗队形占据有利地势，便于寻敌。
- 便于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天气条件(阳光、云彩、雾和烟)。

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因素将确保我顺利寻敌，并取得战斗胜利。

不过，有时由于我机群起飞不及时，上述这些有利因素便会被敌人所利用，从而转化为我军的不利因素，这在 4 月份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我部起飞时敌歼击机已到了泽光洞、定州和碧坪(Бихен)等地区，有个别敌机甚至出现在我机场区域，并对我机群的起飞实施压制性攻击，这种情况当然无法确保我机群及时赶到作战区域和占据有利作战地形。

如果我机群起飞不及时，有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 1952 年 4 月 21 日由少校塔尔祖津率领的机群在起飞时便有些晚了。当时敌机已位于我机场上空。于是，在塔尔祖津机群起飞到 1 500—2 000 米时便遭到了敌人的攻击，结果导致我飞行员一人牺牲，两架飞机被击毁，一架飞机被击伤。

随后，当再遇到敌机突然出现在我军机场的情况时，我机群的起飞均会得到从其他机

场起飞的机群和当时仍在空中的我军飞机的掩护，因起飞而损失飞机和人员的事情再未发生。

6. 其他作战方式的运用，如在指定地区巡逻，自由“搏击”，掩护其他部队等。

不过，这些并不是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只是根据敌人活动的情况和上级所下达的任务随机采用。

自由“搏击”作战主要是在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其他部队起飞和降落时采用，构成机群的飞机数量不等（2—12架飞机），视空中形势和上级所指派的任务而定。

7. 在我部正在作战期间，共实施了358次机群飞行。其中：184次与敌遭遇（比例为55.4%），174次未遇到敌机（占比重48.6%）。

未遇到敌机的原因如下：

——参战初期，我部还未将重心转入针对敌小机群作战，与其作战没有经验，我部以个别小机群隐蔽起飞，但当升空，选择好高度，突入战区时，已是敌人准备撤退之时，因而遇不到敌机。

——起飞后我部的任务是掩护地面铁路、桥梁、机场和其他部队飞机的起落，多数情况下均遇不到敌机，因为后者往往不会进入我歼击机的巡逻区域，即使有个别敌双机和由4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与我遭遇，也是避而不战。

——在我部初期与敌强击机作战时，我地面导航站所通报的敌强击机活动情报往往不准确或来得较迟，我部飞行员在寻敌方面也缺乏经验。经常是发现有敌强击机经过，但起飞后却找不到或等到发现时敌机已经开始往大海方向撤退。

我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位于低空的敌强击机，这就排除了我部机群与高空区域敌强击机遭遇的可能性。

——当敌人以小机群作战时，一旦发现我部飞机，如果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便会立即撤向鸭绿江口或大海方向，避免与我作战。

以上所述便是我部与敌机遭遇较少的主要原因。

8. 我部一个战斗起飞的平均空中持续时间：

（1）白天，从安东机场起飞40—50分钟。

从沈阳机场起飞55分钟至1小时。

在与敌强击机作战情况下27—30分钟。

（2）夜间40—45分钟。

9. 每个飞行员的作战起飞次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	第一四八歼击航空团
战斗起飞最多次数	87	103
战斗起飞平均次数	61	80

每个飞行员的战果总体情况(参见附录)①

10. 所实施空战的相关资料:

编号	名 称	师机关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1	以机群为单位空战数量		69	95	164
	其中:以师团为单位	—	49	62	111
	以中队为单位	—	12	13	25
	以分队为单位		5	17	22
	双机	—	3	2	5
	单机	—		1	1
2	参加战斗的机组数量		976	1 340	2 316
3	与敌遭遇却未开战的次数(以机群为单位)	—	15	26	41
	机群中的机组数量		192	340	532
4	单机夜间战斗次数	—			—

11. 我部参战期间所实施的 164 次以机群为单位的空战中,与敌 F-86 飞机作战共 152 次;与敌强击机作战 12 次。

我部空战中从未与敌轰炸机遭遇,原因在于:敌轰炸机白天从不在我部作战区域活动。

12. 根据参战机组的人员构成,所实施战斗的相关资料: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1. 参与对敌机作战的总次数	1 360	1 661	3 021
2. 我飞行员与敌人作战次数	976	1 340	2 316
3. 与力量相等敌人空战次数	8	12	20
4. 与优势敌人作战次数	45	58	103
5. 我方力量占优情况下空战次数	16	25	41

根据上表所列数据资料显示,参战敌机的总数大多占优,与我军飞机的比例为:1:1.3。

13. 实施空战的高度随着敌我空军所使用战术的变化而变化。

在第一时期(即 2—3 月份),在战区敌歼击机“掩护”的空中高度均保持在 15 000 米。

我飞行员在作战中经验不足,未充分发挥我米格-15 战机在不同高度的性能优势,空战

① 该文件尚未公布。——原注

高度均继续保持在 12 000—14 000 米。

随着我军战术的改变，转入小机群作战，我米格-15 战机（在 7 000—9 000 米高空）的性能优势逐渐得以体现，我军作战指挥和经验不断得以完善，我飞行员主动将作战高度降至 7 000—9 000 米范围。

在这一高度范围内的战斗行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减少了自身的伤亡。从此，在整个与敌歼击机作战的一段时期内我军均保持这一战斗高度。

在个别情况下，我部在与敌歼击机作战时也会将飞机高度降至 700 米，甚至更低，但这只是为了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我战机降落，在我飞行员被迫起飞迎敌和必须返回机场迫降时的不得已之举。

我部与敌强击机的空战活动都在 700 米或 1 500—2 000 米高度进行。由于作战高度较低，因而很难与敌歼击机遭遇，再加上此时我飞机上均涂有与地表植被类似的迷色，敌机从高空很难发现。

实战证明，我米格-15 飞机在 7 000—9 000 米高度时作战最能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除水平机动性外，在各方面都强于敌 F-86 歼击机。

14. 2—3 月份我部与敌遭遇和作战的主要地区——秦川、安州、定州、泽光洞。

这一时期，我部与敌歼击机“掩护”的遭遇和作战主要在朔州、泽光洞和碧坪地区。我部在承担打破敌机对我机场的封锁时的作战主要区域在安东和庙沟。战斗主要在夜间进行，即当敌机结束集中空袭，我部返回机场之时，敌人往往会出动两个批次的 F-86 飞机（每批 4 架）对我返回机场、燃料即将耗尽之飞机实施攻击，或对我此时奉命起飞、执行战斗任务之飞机实施封锁。

由于敌人此类攻击，导致我军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了 2 名飞行员和 9 架飞机。

我部与敌强击机遭遇主要地区为宣川、定州、秦川和泽光洞。

15. 根据敌空军活动规律和上级所下达任务情况，我部机群实施战斗起飞。

在 1—2 月和 3 月部分时间里，我部以大规模机群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歼击机“掩护”实施反击。此时我机群一般由 18—20 架飞机组成，且与其他师、团级机群共同参战。

以大规模机群实施空战具有重大缺陷，具体如下：

——制约了我机群的机动性，不利于作战指挥和先头机群战斗积极性的发挥。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其他人只是参与防御。

——我军所有部队都突入敌人主力集中的同一地区。敌人利用主力与我机群纠缠的时机，派其侧翼部队，挑选适当战机，对我歼击机，尤其是那些与我主力分离的机群实施突然攻击。

在分析了大机群作战的缺陷之后，我军改变了战术——用由 4—8—12 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在更宽广的战线上向敌发动攻击。

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了我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其战斗更加主动，所有飞行员都踊跃参战，而先头机群则可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气象等有利条件，提高作战能力。

实战经验表明，空战中最能发挥机群战斗力的编队构成为：6—8 架飞机。

16. 空战结果相关数据资料：

编号	名 称	师机关	第十六团	第一四八团	总 计
1	击毁敌机数量	—	26	40	66
	其中：F－86		19	30	49
	F－84		3	3	6
	F－80	-	4	2	6
	F－51			4	4
	F－4 y－4	-		1	1
2	击伤敌机		7	10	17
3	机组射击次数		191	209	400
4	消耗弹药		10 175	9 273	19 448
	其中：H－37	-	2 320	2 308	4 628
	HC－23	—	7 855	6 965	14 820
5	击毁一架敌机所耗弹药		391	332	295*
6	自身损失：飞行员		7	2	9
	飞机		11	10	21
7	我飞机在战斗中损坏数量		15	20	35
8	消耗燃料(吨)	13.8	1 985.3	2 803.1	4 802.2
9	抛弃油箱	6	2 956	4 140	7 102

* 原文如此。——编注

17. 随着行动战术的完善和全体飞行员对敌空战经验的积累,我部战斗效率得以很大提高。

我部作战效率的提高可从不同时期和阶段飞行员战斗技能的完善和提高上明显看到。下表列举我部作战的各项主要参数：

月份	部 队	击毁 敌机	击伤 敌机	自身损失		我飞机 被击伤	击毁 1 架 敌机的弹 药消耗	击毁 1 架 我机的弹 药消耗	机组人员射 击次数占参 战总数的%
				飞行员	飞机				
1 2月	第十六团	6		4	4	4	615	245	17
	第一四八团	3			1	7	521	1 155	9.4
	总计	9	—	4	5	11	617*	278*	13*
3月	第十六团	9	—	1	1	5	268	291	25.2
	第一四八团	8		2	4	5	337	153	20.2

续 表

月份	部 队	击毁 敌机	击伤 敌机	自身损失		我飞机 被击伤	击毁 1 架 敌机的弹 药消耗	击毁 1 架 我机的弹 药消耗	机组人员射 击次数占参 战总数的%
				飞行员	飞机				
4 月	第十六团	8	3	1	4	4	378	63	22
	第一四八团	14	3	—	1	6	176	337	12
	总计	22	6	1	5	10	243*	118*	18*
5 月	第十六团	1	1	—	—	1	500	—	21.5
6 月	第一四八团	13	5		4	2	171	66	38
	总计	14	6	—	4	3	209*	81*	36.5
7 月	第十六团	2	3	1	2		724	236	19.8
8 月至 10 月 6 日前	第一四八团	2	2	—	—	—	165	—	15
	总计	4	5	1	2	—	464*	179*	19.2*

* 原文如此。——编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军击毁敌机的数量逐渐有所增加，但击毁一架敌机所消耗的弹药却较以往有所减少。这些数据说明，在作战过程中我飞行员的对敌作战经验日益丰富，已能够精确地向敌人射击。

5—6 月份我击毁敌机数量之所以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我部的作战活动主要集中在 5 月份，然后就转入针对敌强击机的作战。而这就需要一段时间来摸索和积累经验，学会对付敌强击机的作战方式和战术。

.....

在这方面，我军中表现较好的部队主要有：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为塔尔祖津少校，现中队长为少校泽诺夫，政委为博伊佐夫少校。

该中队：

- 作战飞行 587 次。
-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 60 次(作战时间 299 小时)。
- 击毁敌机 14 架。
- 飞行员和物资装备没有损失。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中校杜特尼琴科，现中队长上尉布尔津，前政委巴什曼少校，现政委大尉古林。

该中队：

- 战斗飞行 560 次。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 61 次(作战时间 500 小时)。

——击毁敌机 20 架。

——自身损失：飞行员无；飞机 3 架。

我师表现优秀的飞行员：

——少校博伊佐夫，击毁敌机 6 架。

——少校巴什曼，击毁敌机 5 架。

——中校巴拉巴伊金，击毁敌机 4 架。

——上尉克雷洛夫，击毁敌机 4 架。

——大尉尼基福罗夫，击毁敌机 4 架。

18. 我师作战期间的损失情况：

——飞行员 9 人。

——飞机 21 架。

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

我部投入战斗初期，目的是对付敌人的集中式空袭，飞行员还不具备对付敌 F-86 歼击机小机群的实战经验。而敌人在空战区域的 F-86 歼击机一般均在 24—80 架左右，因而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仅 2 月份在此类战斗中我第十六歼击航空团便损失飞行员 4 名。

我部在打破敌人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为我起飞和因燃料耗尽、退出战斗并在机场降落之飞机提供掩护时，各部队间缺乏有机配合。导致我军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飞机 9 架，飞行员 2 人。

在与优势敌人进行空战时(尤其是作战初期)，我双机、各分队和各中队间缺乏有效配合。

为防止此类损失再度发生，我们实施了以下措施：

——召集全体飞行员大会，分析和研究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原因；

——以团和中队为单位的机群投入作战应由各师、团及其副职亲自率领；

——召开专门会议，寻找适合小机群和大机群作战的战斗序列，以确保我机群在空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机动性，合理指挥和各部队的紧密协作；

——研究、总结和在全体飞行员中推广优秀飞行员(如杜特尼琴科中校、茹拉夫廖夫中校、巴什曼少校和博伊佐夫少校等)的战斗经验；

——让我歼击机采用有效对付敌人，尤其是在解除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新战术(关于此我们上前面已经提到)；

与全体飞行员认真分析我飞行员跳机时使用弹射座椅装置的每一个案例。决定：今年在我所有飞机上均安装 KAP-3 装置，并确保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打开所携伞具，减少因此而导致的人员伤亡(我军部有两位飞行员曾因弹射装置失灵而在完全清醒状态下阵亡)。

上述措施将有助于大量减少我飞行员的伤亡数量。

关于我部作战结果的结论：

1. 在完成军领导所交给的任务的同时，我部还在白天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以及在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实施了作战，为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铁路、交通线和中国东北沈阳方向的设施提供了空中掩护，防止敌空军对其实施空袭。

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和不同时期的作战行动中，我部飞行员的战斗技能不断得到完善，获得和积累了许多与敌空军作战的新战法和新战术。

在我部作战后期，我们以化整为零的战斗单位，已能够在任何空中形势和各种气象条件下完成任何战斗任务。

2. 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敌机。

在作战行动中我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作战方式，如：以巡逻方式、自由“搏击”等为地面设施和友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部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实施战斗起飞，并根据空中形势、上级所下达的任务和气象条件决定以何战斗单位起飞应敌。

3. 我部实施空战的机群由2—16架战机构成，高度14 000米。根据实战经验，我米格-15战机与敌F-86歼击机作战的优势高度应在7 000—9 000米范围内。

经过在地面和空中根据空中射击勤务相关规定认真练习，我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度已有了相当的进步。如果说，在我部参战第一阶段，我们击毁一架敌机平均需要消耗517发炮弹，那么截至作战后期已缩减到只需209发，在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甚至达到了只需171发炮弹的水平。

4. 我部作战期间共损失飞行员9人，飞机21架。

主要原因如下：

——作战战术有误。我部作战初期主要针对的是敌人的大规模集中空袭，但对与敌小规模歼击机群作战没有经验，因而部队损失比较大。

——各部队间在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掩护我飞机在安东机场的起降时缺乏有机配合。

——与敌优势兵力作战，各机群在战斗中（尤其是参战第一阶段）协作不够。

建议：

1. 所有参战部队必须在有其他部队掩护的情况下与敌小型歼击机群进行1—2次战斗接触，以取得实战经验。

2. 所有飞行员都必须事先进行攻击敌强击机的训练实习。

3. 在制定多种战术方案的同时，还应有一个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总体计划，而且各部队都应当有这样的计划。

4. 为了对付敌歼击机“猎手”，各部队都应配备2个训练有素的分队专门负责实施自由“搏击”作战。在作战过程中对这些飞行员的飞行高度和所锁定目标不应加以限制，只为其划定活动范围。

.....

总结:

1. 上述时期敌空军的作战目标:摧毁我铁路和公路枢纽,破坏工业企业,消灭战区范围内我有生力量和技术设备,我军各集结点和运输线。

2. 敌空军在上述各月份的作战活动次数并不平衡,主要根据气象条件和地面部队的战斗形势而定。

3. 敌空军的行动战术和大规模空袭的组织并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我米格-15歼击机的活动情况而定。

4. 在我前线战区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敌新型战机出现。

5. 在上述时期我部基本完成了上级所下达的任务:保卫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港口,在白天一般、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为沈阳方向的机场和设施提供空中掩护。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团长巴拉巴伊金中校、副政委克拉塔休克中校和团参谋长帕斯图赫中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战果显著:该团共击毁敌机40架;自己损失飞机10架,飞行员2人。

6. 在执行战斗任务过程中我部还采用了如下一些作战方法:

——从一级战备状态起飞,对敌机实施拦截,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小机群实施反击;

——以巡逻方式为我地面设施、渡口和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自由“搏击”。

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我部总共4189次战斗起飞中,有3407次是对敌机实施拦截,比例为81%。

起飞并对敌机实施拦截作战的机群由4—24架飞机组成,具体视敌空军活动情况、上级任务和气象条件而定。

我部战斗效果最突出的作战方式是小机群作战,尤其是针对敌强击机作战时这种作战方式效果最为明显。

7. 随着战斗经验的不断丰富,我所有飞行员和各部队的作战效率不断提高。在作战经验方面我们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付敌空军的战术不断完善;

——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确度不断提高,例如,1月份我们击毁一架敌机需消耗弹药517发,3月份需300发,4月份需243发,5—6月份需209发。

2月份我共击毁敌机9架,3月份击毁17架,4月份击毁22架。

我飞行员的射击距离不断缩短。

——我部在战斗中对机群的指挥质量不断改善,这尤其体现在对先头机群的指挥和各部队的密切协作方面。

在作战过程中各部队中均涌现出了一批有指挥和组织才干的指挥员,如:中校巴拉巴伊金、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巴什曼、少校博伊佐夫、少校米涅尔温和少校津琴科,等等。

作战实践表明，部队的指挥员是否能带领飞行员完成作战任务，不仅取决于他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和职务，更取决于他自己是否能成功地领导部队取得战斗胜利和在战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飞行员战斗减员迅速减少，时至我部作战末期，我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减员率基本为零。

8. 根据空战形势和上级指示，我部同时或依次参加战斗。

参战初期，我部主要是反击敌空军大规模机群的集中空袭，此时多采取同时参战方式；随着转入针对敌小机群和强击机作战，我部的参战方式也随即改为各团、分队依次加入战斗。

9. 作战活动的指挥和组织主要由军指挥部统一安排。

师首长坐阵指挥部，随时准备行使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

针对敌歼击机和强击机等小机群的作战指挥，总体上由军指挥部负责，但多数情况下由各师指挥部领导。

战斗中各机群的参战序列由空中领导小组负责。

10. 部队作战活动的物资、技术保障无可挑剔。由于后勤保障原因而导致战斗起飞失败的情况从未发生。

11. 我部全体飞行员在政治、精神方面积极向上，斗志昂扬，都能严格遵守军事纪律。

.....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上校

A. 舍夫佐夫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副参谋长、中校

B. 卡米舍夫

1952年8月21日

ЦАМО РФ, ф. 97 иад, оп. 174136, д. 1, л. 2, 20 - 47, 51 - 55, 235 - 238

№00554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

（1952年8月25日）

И. В. 斯大林同志：

向您转呈收到的毛泽东同志的电报并附有8月24日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如果您同意他们的请求，请您下指示派专机前往北京以非正式形式接金日成、朴宪永、

彭德怀等同志,共8人。

您的意见如何,请告知。^①

致共产主义敬礼!

周恩来

1952年8月25日

附件: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周恩来同志:

兹将金日成同志的回电转给你。我认为朴宪永同志去莫斯科是有益的。希望你向斯大林同志请求派专机来接金日成同志及其他5位同志、彭德怀同志和一位中国同志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

1952年8月24日

附件:

金日成给毛泽东的电报

致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8月23日电报,我们决定由朴宪永同志陪同前往莫斯科。

为了解决朝鲜人民军的编制和武器等一系列问题,总顾问拉祖瓦耶夫同志与我们一起前往,他会就上述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批准。我们同意您的意见,我们此行应当是秘密的。与我同行的还有5位同志。

如果您赞同这一意见,我们打算能立即成行。请您答复。

金日成

1952年8月24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89 - 90

^① 斯大林表示同意后,商定于8月28日派飞机到北京。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一行于9月1日抵达莫斯科,并于3日与斯大林、周恩来共同讨论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问题。——编注

No2486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

（1952年8月27日）

苏方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和费德林。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 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莫洛托夫说道，关于今后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该草案同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类似，但简练一些。（草案附后^①）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指出，总体上来说，苏方的建议草案同中国代表团的草案类似。但是有一些区别：其中包括，在中国代表团的草案中指出，苏联从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出的期限是，直到日本不再驻有外国军队。这一点在苏方的草案中没有提出。

莫洛托夫就苏方草案的基础和原则立场进行了解释，并对周恩来对苏方草案提出的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周恩来同意莫洛托夫的解释，并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建议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以及苏联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修改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这样的表述是不是更好一些？他强调说，这样表述的立场对中国和苏联在战术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将不会给日本以机会猜测中国和苏联的意图。

莫洛托夫解释说，周恩来表达的看法在1950年签署的苏中条约中已经包含了，并且解释说，将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建议，但他表示，希望他的看法能被予以研究。他说，中国代表团会对苏方的草案进行认真的研究，然后再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2. 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草案。（草案附后^②）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公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强调说，发表这份公报以及关于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照会将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指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苏联，甚至对全世界来说，联合公报这份特别的文件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他说，尽管这一铁路将会完全转交中国所有，但是，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关于苏联军队运输的秘密备忘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②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录仍然有效。他说,应该明确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 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的技术合作。莫洛托夫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草案附后^①)

周恩来指出,应该好好研究这一草案,并建议在下次会谈的时候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1952年8月27日

费德林记录

РГАСПИ, ф. 82, оп. 2, д. 1258, л. 26 - 27

№24863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

(1952年9月1日)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 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的协议草案,并把它交给了周恩来。

在熟悉了这一草案之后,周恩来谈论了关于建立联合委员会对边界线上的铁路建设进行检查和监督的合理性,这一点正如中国代表团在关于中蒙之间的铁路建设问题的想法中所表达的。由于这一协议草案没有对上述问题做出规定,就必须在另一份协议中,也就是在关于相互之间的技术协议中对此做出规定。

莫洛托夫指出,或许,需要签署另一份协议,也就是路段之间的或部门之间的技术协议。至于具有上述职能的联合委员会,则没有必要成立,因为各方在自己的领土上独立建设轨道尺寸统一的铁路。

周恩来表示同意,但是他指出,该草案中没有反映关于火车相互交流的程序问题。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属于运行的问题和条件，应该在各路段之间签署的技术协议中规定，而不是在政府之间签署的协议中规定。

周恩来说，只有在中国的列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的情况下，在中国领土上才会进行宽轨铁路的建设。否则在中国领土上建设宽轨铁路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因为中国的旧铁路都是在窄轨上运行的。但是该草案中没有指出，中国的火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比如，到达乌兰乌德。

莫洛托夫说，这里不存在问题，中国的火车当然可以进入苏联领土，但是这些细节必须在技术协定中做出规定。

米高扬解释说，可以以苏联和芬兰之间火车的相互交流为例子。

周恩来说，该草案中没有指出各方铁路之间的结合点，因为二连浩特和察梅乌德（Цзамын-Удэ）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明确下来。

周恩来问道，为什么该草案中指出在铁路上要使用内燃机车呢？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蒙古领土上使用内燃机车是由如下条件决定的：该地区缺水。使用内燃机能把铁路上的用水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涉及的只是在蒙古领土上机车的使用。

周恩来说，他们认为，在中国领土上使用蒸汽机车比较好一些，因为在中国领土上不存在水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那么，草案中关于使用内燃机车的条款可以删除。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然后，他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内容问道，如果草案中规定，在1955年实现直通，那么，蒙古领土上铁路的修建在1954年能否完成？

莫洛托夫解释说，事实上指的是从1955年底开始运行，而且蒙古领土上铁路沿线的一些设施将在1956年完成。

周恩来说，希望协议草案能够把这一点明确下来。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将对该草案进行研究。

2. 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就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提出的草案。在对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仔细修改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把其提交给苏联方面，以便同俄语文本进行比较。

3. 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公报草案。在把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修改之后，他将把其提供给苏联方面。

4. 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的问题。周恩来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合作的草案，中国方面想弄清楚其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说，每年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以保障对苏联的供应，在此问题上中国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中国正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中，为中国自己购买橡胶尚存在巨大困难，因此，周恩来建议从协议草案中删除关于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供应苏联的条款。否则中国方面将

不能完成这一义务,因此也就会违背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方面认为,每年向苏联供应 1.5 万—2 万吨橡胶对中国来说是可以完成的。因此苏联方面认为不宜从协议中删除上述所指的供应橡胶的数量。

周恩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方面今后将会全力完成在南亚国家为其购买橡胶的请求。但是,由于一些客观的条件,中国方面将面临一些困难,不能保证按上述指定的数量供应橡胶。因此,中国方面希望,协议中不要指出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数量。

莫洛托夫指出,尽管中国方面会存在一些困难,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的橡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苏联需要橡胶。因此,希望在协议中保留关于中国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橡胶的内容。中国可以承担这一义务,因为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不能完成的。如果中国积极寻找机会完成这一义务的话,那么是会找到这样的机会的。共产党人正是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而存在的。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将会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周恩来援引协议的第四条说,向苏联供应协议草案中规定的铅是困难的,因为目前中国共计生产了 8 830 吨铅,还不能满足中国自身的需要。因此,希望删除向苏联供应铅的规定,要么指出,第一年内中国将不向苏联供应铅。

莫洛托夫回答说,协议草案规定,向苏联供应铅、钨、钼、锡和锑的数量根据每年双方进行的协商确定。因此,不应该改变协议草案中的表述。至于铅的生产,苏联对铅的需求也很多,因此中国应该扩大铅的生产。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帮助。

周恩来说,在铅和锌的勘探和开发问题上,中国政府向苏联请求技术援助。

然后周恩来请求澄清一下,协议草案中有关中国以大的工业规模生产橡胶的规定,应该怎样理解。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指的是中国生产的橡胶量,这种生产量在上次会谈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就告诉苏联方面了。

周恩来说,关于向中国提供援助,栽培橡胶树、采集和生产橡胶以及向苏联供应橡胶的协议草案,中国方面将会另外进行研究。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已经在今年 8 月 30 日把关于经济和军事问题的书面报告送给了斯大林同志。他请求告知,斯大林同志在什么时候能够接见中国代表团,当面向他进行报告。

莫洛托夫回答说,中国代表团的请求将会被转告给斯大林同志,结果将会通知周恩来。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将在今年 9 月 3—4 日提出关于派遣苏联设计师和专家的请求以及关于订货和供应设备的请求。

1952 年 9 月 1 日

No0055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

（1952年9月3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梅金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相互问候后，双方开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问题举行会谈。

斯大林：我们了解了你们的五年计划。你们规定年增长率为20%。给工业规定20%的年增长是否高了，或许应在20%里留有余地。

周恩来提醒说，他们对编制计划还经验不足。以往3年的经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预计从苏联得到的援助。

斯大林：我们编制五年计划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不可能估计到所有因素。出现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计划中总是列入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里没有这一点。同时，对计划中规定的全部支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说明。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按各个项目需要提供多少。必须进行计算。在提交的材料里未包含这类数据。因此，我们不能发表自己的最后意见。为了计算并讲出我们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我们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

通常我们起草五年计划至少需要1年时间。然后审查准备好的草案还需要2个月，但还是总出差错。

我想，你们应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研究你们的计划，以便答复你们的问题。

其他问题进展怎样？旅顺口的问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是这样就要决定下来了。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现在就讨论一下。

中长铁路移交公报草稿好像也没有不同意见了。

第三个问题是橡胶问题。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万—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我们希望至少得到1.5万—2万吨橡胶。卖给我们的橡胶很少，英国控制着橡胶。请你们再考虑一下为我们采购所需数量的橡胶问题。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剩下的问题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来解决，因为周恩来急着回国。

周恩来说,他很难在这里停留2个月,他想9月中旬返回中国。李富春可以留在这里。

斯大林:好的。

还剩一个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的问题。来过莫斯科的蒙古总理也同意这件事。

这就是说,要同周恩来解决的就剩下4项问题:旅顺口、中长铁路、橡胶和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

周恩来谈到橡胶问题时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一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但他们担心,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可能妨碍彻底完成这项任务。代表团顾虑,这会被视为违反对苏联的义务。

再次说,他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但在未切实完成供货的特殊情况下,他们有权说明原因,而且不把这种情况认为他们方面不履行承担的义务。

斯大林说,他理解这一点。指出中方将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提供不了商定数量的橡胶,那么,我们只好减少卡车订货。

开玩笑地问,胡志明大经理不能帮忙做这件事吧。

周恩来对此指出,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机会(主要是走私)。

回到建设铁路的问题,指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

斯大林指出,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发表公告,橡胶问题不公布,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铁路等建成后再公布。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回到五年计划问题。再次强调,他们对本国能力估计不足。他们同意,对五年计划很难做出一个全面说明,因为计划中未列入军事问题,而在拟定军事计划方面他们有许多困难。他们根本不清楚,要不要把军事问题列入总计划。对五年计划要不要公布,他们原来并不打算公布五年计划,而只公布该计划的基本方针。

斯大林解释说,我们的五年计划是公布的,我们把军事项目隐含到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中去。为了让人民了解建设规模,公布计划是必要的。仅仅公布基本方针是不行的。总会有人想了解 and 看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总的建设规模。因此,必须把军事建设列入计划,但不必列出各个军工企业,等等。这样比较好。计划应当统一,既包括民用建设,也包括军工建设。

至于苏联,那么,我们作为供货方也必须知道,需要我们提供多少援助,为什么提供这些援助。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苏联。但是,我们既要为民用部分,也要对军用部分进行核算。我们必须了解,按各个部分算出的总数是多少。

譬如说,1953年我们提供10—15个师的装备。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完成这些订货需要多少钢和其他材料。在1953年同一年我们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设备。这也需要计算。然后得出军用和民用部分两个数字,并且确定,我们能不能按这个数量保证供货。据此再编制每年的计划。中国同志也许认为,这类装备全都现成放置在我们的仓库里。不是的,这些装备都需要现造。

周恩来完全同意斯大林说的所有意见，并想确认一下，60个师的装备怎么办，如果这些装备用贷款付，那么，这个问题也需要确定下来。

毛泽东同志有个想法。如果朝鲜战争再打1—2年，那么，可否把20个师装备的供货期延长到下一年度。

斯大林说，现在还难说。也许不得不缩减，也许不需要缩减。需要核算一下，核算的结果才能说明问题，在此以前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周恩来说到海军装备的供货时间，是把这类供货列入计划，还是单独分出来。这一类供货大约应在6年内完成。原先的协定是否依然有效？

斯大林：对于军事供货和海军供货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全部有效。但在确定供货的总金额时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不撤销任何贷款，不拒绝执行任何一项协议。我们认为拒绝执行承担的义务是绝不允许的。既然签订了协议，就必须执行，我们也一定执行。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委托他汇报一下五年计划的总体设想并且弄清楚，在苏联需要订购多少普通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他们规定普通工业的订购额为77亿卢布，军事工业为45亿卢布。毛泽东请求弄清楚，这个比例对不对，军事部分是否太大了。

斯大林：这个数字太勉强了。我们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没有过这样高的军费。

周恩来说，45亿卢布的军事订货是由以下各项构成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飞机供货12亿卢布，等等。并强调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军费开支与工业开支相比并不是这么大，军费部分少一些。

斯大林：战时我们的军工生产约占40%—45%，但现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打仗。不过，需要保证空军和海军的供货。或许，毛泽东说的77亿对45亿卢布的比例是对的。

周恩来告知说，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44%（12亿卢布），1951年占52%（80亿卢布），1952年占27.9%（66亿卢布）。五年计划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兵工厂、航空、坦克制造、舰艇制造）占全部工业设备的12%—13%。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个比例可以接受，那么，他们将按这个比例编制他们的整个申请单。

斯大林：好的，这个比例可以接受。

周恩来说，最初计划建设151项工业企业，现在他们把这个数目缩小到147项，不包括军工厂（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厂、造船厂）。并解释说，这147个企业都不是军工企业，但可以为军事需要服务。

斯大林：我们通常很少建新企业，尽量扩大老企业。这样比较节约。中国却相反，尽量建新企业，因为那里的老企业不多。战时我们把飞机修理车间变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变成坦克制造厂。我们广泛采用了各企业协作的办法，不同的企业制造不同的部件，然后把部件装配起来。中国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这比建设专业工厂要容易。

周恩来说，内战年代他们也采用协作办法生产轻武器，但现在他们开始生产重装备，为此必须打下基础。

谈到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供货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时说，有3种弥补差额的

办法：(1) 扩大中国向苏联的出口；(2) 支付外汇：美元、英镑、港币、瑞士法郎；(3) 贷款。问这3种办法中哪一种更合适。

斯大林：也许，这三种办法全都要用。

周恩来说，他们预定把对苏出口扩大到130亿卢布。我们可以提供牲畜、皮革、毛皮、毛品、丝品、矿产、食品(大豆、油脂、茶叶)。

指出在5年内他们可以筹集2亿美元以及16亿英镑、港币和瑞士法郎。

斯大林：最好是美元。英镑流通范围有限。港币问题需要同我们的财政部商量一下。

苏联十分需要铅、钨、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货。

指出我们还可以进口苏联在其他国家采购的柠檬、橘子、菠萝。

周恩来说，他们想从苏联获得的贷款总数为40亿卢布，是这样安排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

斯大林：势必要给，但具体给多少，要算一下。我们提供不了40亿卢布。

周恩来说，这个数字里不包括飞机。飞机的费用他们考虑用现金支付。

斯大林：问题不在数字上，而在我们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设备。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因此，需要2个月时间。

周恩来转到申请派专家的问题说，从1953年起中国需要190名新的财经专家，417名军事专家，140名医科等学校教师。此外，还需要军工专家，但这些问题还要研究。

斯大林：这个问题要研究，什么专家，哪些专业、部门。我们要派，但派多少难说。

在华苏联专家做出了成效吗？

周恩来回答说，成效极大。

问斯大林同志对提交的报告有什么意见。

斯大林：印象良好。中国在成长。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

周恩来指出，报告里有一条附注：在停战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建立一支320万人的军队，102个师。

斯大林：这很好。但这是最起码的。中国应当有良好的装备，尤其是空军和海军。

周恩来：我们想保持150个航空团，共13000名飞行员。

斯大林：少了，必须增加，需保持200个航空团。

周恩来：那势必要增加飞行人员。

斯大林：必要。也许要改为3团制师。师属机构少，可以节约。

周恩来问，喷气式歼击机与螺旋桨飞机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比例。

斯大林说，螺旋桨飞机要逐步淘汰，改用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的航速800公里。用螺旋桨飞机训练飞行员，然后改飞喷气式飞机。螺旋桨飞机一两年就要全部淘汰了。我们将向你们提供航速1000—1100公里的新式歼击机。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不得。

周恩来提出向中国提供生产122毫米榴弹炮、37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野战炮的技术

文件问题。

斯大林说，图纸可以提供。

周恩来问，要不要马上建立坦克厂，还是先建汽车和拖拉机厂，然后将它们转产坦克。

斯大林回答说，应当建一个坦克制造厂。这个厂还可以逐步扩大。至于汽车厂，则可多建一些。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修改自己的五年计划并请我们提出意见。修改后的材料将交给莫洛托夫同志。

斯大林建议把总增长率规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则规定20%。这样，计划就将留有余地。而对劳动者则必须提出超额完成计划的口号。这样计划就能超额完成。说我们历来就是这样编制我们的计划，留有一定余地，因为总会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总有考虑不周之处。

斯大林对中国制造水雷的情况表示关心。

周恩来回答说，正在筹建水雷制造厂。

斯大林指示说，必须保卫中国的海港。

询问澳门情况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澳门仍然由葡萄牙控制着。

斯大林说，必须把这个留在中国大门口的恶棍赶走。

周恩来说，他们对东南亚各国坚持执行这样的策略，即不派军队，而用和平方式影响这些国家。举缅甸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尽力用和平方式影响该国政府。对西藏也这样。问这种立场对不对。

斯大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必须驻有中国军队，而对缅甸则要谨慎从事。

周恩来说，缅甸政府隐瞒自己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但实际上倾向美英，执行反华政策。

斯大林：如果缅甸有一个亲华政府就好了。在缅甸政府中有不少冒充什么活动家的骗子。

周恩来解释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入西藏，现驻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是不成问题的。

强调说，同西藏保持联系就难了。同拉萨联系需要配有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的四引擎运输机。苏联能否提供这种飞机？双引擎飞机只能飞3/5的路程，就不能往前飞了。

斯大林答复说，这件事苏联可以帮忙。

周恩来问，那么，中国能否在苏联订购20架四引擎飞机？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先提供10架，然后再提供10架。

指出，必须修筑进西藏的道路。

周恩来说，目前正在修，修路要用明年一年，一部分要到1954年。

斯大林指出，没有道路就难以在西藏保持应有的秩序。西藏喇嘛谁都可以投靠，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价高，就投靠谁。

周恩来说，喇嘛确实有敌对情绪。今年（2、3、4月）他们策划叛乱，但中国政府把叛乱镇压下去了。

指出,结果达赖喇嘛的弟弟逃到国外去了。

斯大林说,进藏道路必须修,那里必须驻扎中国军队。

会谈结束时,约好9月4日晚9时会见。

A. 维辛斯基、H. 费德林记录

1952年9月3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9, л. 75 - 87

№11826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

(1952年9月4日)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

我方——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中方和朝鲜方面——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朴宪永。

翻译人员——师哲、费德林。

斯大林：朝鲜居民的情绪如何？

金日成：情绪很好。

斯大林：朴宪永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朴宪永：是的，情绪很好。

斯大林：那么军队中情绪如何？

金日成：军队中的情绪也很好。

斯大林：彭德怀对此是怎么认为的？

彭德怀：是很好。

金日成：如果不考虑弹药问题的话，总的局势是有利的。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歼击航空部队？

金日成：有一个师。

斯大林：中国将自己的航空部队列入其中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会说，这已经不是志愿军了，而是国家的部队。志愿军没有自己的航空部队。我们的人也会询问：这是否有利于民主

主义阵营？在我看来，声明中国的国家部队参与战争是不利的。金日成应该有朝鲜航空部队。

金日成：如果物质条件许可的话，我们是能够组建 1—2 个航空师部队的。

斯大林：朝鲜人民尽管已经疲于战争，但仍然值得称之为英雄的人民。因为朝鲜人民饱受了灾难，我们准备为朝鲜裁掉自己的 1—2 个师。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歼击师部队？

金日成：有。

斯大林：可以将它调运过来。

金日成：学校里还有一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我们可以为 1—3 个师的人员提供物资装备。

金日成：我们能够确保 3 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那好吧，我们就为 3 个师提供物资装备。朝鲜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由于敌人不断加强轰炸，我们必须扩大高射炮部队。不久以前我们曾请求援助 5 个高射炮兵团，但是我们需要 10 个这样的团。我们向您，斯大林同志，请求了 5 个，向中国同志请求了 5 个。毛泽东说，目前中国没有可能满足朝鲜这一请求。因此，我们请求您给予 10 个高射炮兵团部队。

斯大林：你们有几个陆军师？

金日成：有 18 个陆军师。

斯大林：有多少炮兵部队？

金日成：我们有几个炮兵团，但是，他们的装备不足。

斯大林：我们的每个炮兵师是由两个炮兵团组成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你们是怎样的？

金日成：我们实行的也是这种编制。

斯大林：如果你们缺少什么，请编制一份相应的清单。

金日成：这样的清单已经编制好了。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迫击炮？

金日成：有的，122 毫米的。

斯大林：我们给你们提供 10 个高射炮兵团的物资装备。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斯大林同志。我们的陆军部队缺乏榴弹炮和其他的武器。过后我们可以提出清单。

斯大林：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目前尤其尖锐的问题是确保工程兵部队和通信兵部队。这些部队有很大的缺额。这种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存在。我们缺少设备和材料，正是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一个月之后将停止生产口径为 122 毫米的炮弹。

斯大林：把你们需要的材料清单交给我们。

金日成：我们已经编制了清单。

斯大林：粮食情况怎么样，白面、大米？

金日成：今年收成很好，但是，在下一年来临之前粮食还不够用。毛泽东已经答应保证我们的粮食和服装供给。

斯大林：你们那里吃不吃小米，或者只是吃大米？

金日成：在最困难的时候，您，斯大林同志，作为礼物给我们运去了5万吨粮食。我们的人民喜欢吃面粉。目前，在克服着困难的同时，朝鲜居民勉强地维持着生计，但是，我们的运输工具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得到苏联政府援助的机器、拖拉机和化肥。

斯大林：把相应的清单交给我们。据说，在关于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时如何表达自己意见这一问题上，你们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这是真的吗？

金日成：在我看来，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境十分困难，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中国的同志们也关心这一点。

斯大林：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同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即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就应该扣留10%^①的美国战俘，一直到中国和朝鲜战俘返回为止，或者说，如果他们不将这20%的中朝战俘遣返，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也可能，这种观点更好一些。

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并达成停火协定。关于未返回部分战俘问题的谈判，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和停火之后继续进行。

我不清楚，对此你们是什么态度，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将会确信你们的立场是公正的。

美国人可能会说，20%的中朝战俘不愿意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我们对此并不相信。

这种情况下，那20%战俘的问题就会被推迟，而只有80%的战俘会返回。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中国的同志们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等待着美国人提新建议，以便修改自己的建议。你们知道这一点吗？

金日成：我们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了什么？

金日成：在与我们交谈时，毛泽东提出了几套方案：第一，继续坚决地坚持遣返回全部战俘；第二，在停战之后解决全体战俘的问题；第三，由于敌人扣留着我们的战俘，我们也应该扣留敌人的相应数量的战俘。

^① 原文如此，似应是20%。——编注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观点就与您，斯大林同志的观点一致了。

我们认为，这3个方案是最合适的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您能给出个主意，为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斯大林：在我看来，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的时间内），应该继续坚持返回全部战俘。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提出20%的问题。这里说的不是方案，而是立场。第一个立场：这就是返回全部战俘；第二个立场：20%的战俘不返回。

确实，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出某种新的建议，或者是等着美国人提出新的建议。我认为，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坚持全面交换战俘，并观察着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第二个立场对你们以及你们的鼓动工作非常有利。20%的战俘不遣返给你们，你们就不遣返他们的20%战俘。第二个立场将瓦解美国人的阵营。巩固关于返回战俘、停止战争的意见，这将会有利于你们。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美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们是否很会打仗？

彭德怀：美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的士气低落。

斯大林：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战争是不得人心的。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战斗的：是斗志高昂、勇于善战，还是兵力占优势？

彭德怀：在1—2月份期间，美国人发动了200多次进攻，但是成功率只有1%。我们在这一个月期间进行了大约30次的进攻，其中有80%—90%是成功的。

斯大林：这些成绩表现在哪方面？

彭德怀：我们成功地消灭了敌人的小股部队——排或者是连。

斯大林：金日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金日成：当然同意。

斯大林：美国人的工事是否坚固？

彭德怀：最近他们的工事更加地牢固了，而我们的工事也得到了加强。美国人工事设施本身并没有我们的工事好，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技术装备。

斯大林：他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有3条。

斯大林：你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实际上有2条，第3条正在修建中。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地雷场？

彭德怀：我们的地雷和铁丝网都很少。我们在敌人那里缴获了一些（即指地雷和铁丝网）并利用他们来对付敌人。

斯大林：战争期间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了地雷场。我们有专门的地图为自己的部队指示通道。我们认为，没有地雷和地雷场是无法打仗的。

彭德怀：在我们的前沿地区和敌人之间有很小的一段距离——总共只有300—500米。

斯大林：显然，你们的前沿地区防线过于靠前了。

彭德怀：也可能，这是由于自4月份开始我们逐渐向前挺进所造成的。

斯大林：在各条工事防御线之间的距离如何？

彭德怀：距离不大，它取决于地势情况。在某些地方防御线联结在一起，而某些地方距离可达到20公里。目前，我们正在修建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堑壕？

彭德怀：有。

马林科夫：如何解释这一说法，即：我们抓到的俘虏很少，而敌人抓到的很多？

彭德怀：总的来说，我们抓到的俘虏还是比敌人抓到的多。

斯大林：中国和朝鲜的战俘共有多少人？

彭德怀：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人战俘有12 000人，而美国的报道说有20 000人。朝鲜人战俘的数量很大，因为在1951年10月之前，美国人成功地抓获了大量的朝鲜人战俘。美国人在实施进攻行动时还俘获了大批后备队人员。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共俘获了12 000名战俘，其中有8 000名美国人。李承晚军队的战俘数量是40 000人。但是，由于艰难的物质条件，战俘中的许多外国人死掉了。

金日成：根据我们出示的清单，我们总共抓获了12 000人，其中有4 416名外国人，其余的都是李承晚军队的人。战俘中有300名美国飞行员，他们之中有30多名军官。大约有27 000名南朝鲜人转向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关于这一部分战俘报刊上从来没有报道过。

马林科夫：在前线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否进行换班？

彭德怀：是的。

马林科夫：这意味着中国部队有机会进行训练？

彭德怀：是的。临近1953年8月在朝鲜的全体志愿军部队将进行换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人员（军团的、集团军的、师的）都将经过朝鲜前线（的考验）。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卡秋莎（火箭炮部队）”？

彭德怀：前线有一个师，另外一个在后方。

斯大林：在敌人的后方是否有游击队在活动？

金日成：是的，正在活动，尽管条件非常困难。

斯大林：日本人是否有被俘虏的？

彭德怀：被抓获的只有美国籍的日本人。

马林科夫：该如何解释，在美国空军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期间，美国飞机被毁坏的很少？

彭德怀：我们认为，并不少。自战争开始以来，被击毁的美国飞机大约有5 800架。

斯大林：中国飞行员能否驾驶喷气式飞机？

彭德怀：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中国飞机员能够参加战斗行动。

斯大林：为什么，难道他们害怕？

彭德怀：中国飞行员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驾驶技术。

斯大林：应该经常将他们带入空中，只有在空中才能学会驾驶。苏联飞行员有时候也不愿意到空中飞行，他们认为在学校里更好一些。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开始了飞行，就学会了飞行。现在，我们是按飞行的次数来评定飞行员的。谁飞行的次数多，谁就能够获奖。学校里的授课给予的不多。战斗训练才能使其获得真正的经验。不应该害怕空练，而正相反，在空中应该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还应该进行夜间飞行训练。否则你们将不会拥有空军部队的。必须建立奖励制度。

你们是否设立了勋章和纪念章制度？

彭德怀：暂时还没有。我们打算在 1953 年实施这些措施。

斯大林：这样不行。我觉得，对于勋章和纪念章这样的制度，他们持有无政府主义的轻蔑态度。他们那里没有将军。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反共产主义的。其实，军队里设立各种军衔、纪念章和奖励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军队，而拥有的只能是游击队。他们已经进行了 15 年的国内战争，驱除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而军队里却没有实行军衔、勋章和纪念章等奖励制度，这是不正确的。人们在成长，他们的成长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关于这一点应该认真考虑。正规部队应该有良好的保障，应该有奖励制度。最重要的是，应该保护和保障军事干部，为他们建立必需的条件，因为他们是军事人材。

周恩来：斯大林同志，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中国军队里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因为，近 20 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国内战争，而且实际上是处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目前，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来改组我们的军队，将在军中的供职由自愿变为义务，也就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目前，我们的军队里共计有 430 万人，其中有自军士以上的 144 万名军官。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支由 53 万人组成的公安部队。自今年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军队的改建工作，计划在 1954 年全部完成军队的改建工作。我们计划将部队裁减到 300 万人以下，这些考虑应该是在改善部队的装备之后，最终只留下 250 万人，再加上 50 万公安部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但是 250 万人——这是最低的标准了。除了陆军之外，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

彭德怀：早些时候我们无法改组我们的军队，因为朝鲜发生了战争，我们不得不拨出大量的经费供养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自从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的开支已经达到了 26 亿美元。目前，由于国内已经形成了稳固的财政状况，我们才能够相对快一些地改组我们的军队，并在部队里实行奖励制度。

金日成：我们将具体与谁就所提出的与军事问题相关的那些请求和清单进行谈判？

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

我们计划分别向中国和朝鲜派出一个师的歼击机部队，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周恩来和金日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我想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正式的宴会，他们是公开来到我们这里的。至于那

些非公开来这里的同志们,我想为他们举行家庭宴会。

周恩来和金日成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H. 费德林记录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5卷,第1932—1943页

№24864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

(1952年9月8日)

机 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 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说,他就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发给维辛斯基的照会苏方没有反对。至于维辛斯基答复周恩来的照会,则不应该是对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的内容进行叙述,而应该是逐字逐句地写出这一照会。

莫洛托夫说,他接受周恩来的这一建议。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旅顺问题的照会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2. 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方接受联合公报的文本。

莫洛托夫说,联合公报的俄语文本作了一些修改:根据中方的文本,用“进行”一词替代了“准备”一词。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就联合公报的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莫洛托夫提醒说,关于输送军队的备忘录仍然有效。

周恩来确认了这一点。

3. 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

周恩来说,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把如下几点确定下来:

建议决定提供的贷款的规模为1亿卢布;

建议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

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表述，建议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弱化这一表述。

该协议第二条提出的贷款问题改在第四条中指出。

莫洛托夫说，关于贷款数量的确定问题，他必须同相关的同志交换意见。他指出，看起来不会有人反对；他也不反对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问题，他也提出了新的表述：“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为此中国政府应该努力从第三国购买。”莫洛托夫还表示，同意在第四条中指出该协议第二条中规定的贷款问题。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文本交给苏方，以便同俄语文本对照。他建议要么把该协议的附件确定下来，要么就把附件删除。

莫洛托夫同意删除该协议的附件，并再次说，关于贷款的数额将会另行通知。

4. 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他建议删除关于内燃机车的表述。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协议文本交给苏方核对。他建议在今年9月15日签署协议。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想弄清楚，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是否同其他的协议一同签署。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同乔巴山协商，因为这份协议应该由三方签署。

周恩来指出，如果乔巴山不方便在9月15日签署协议，那么中国方面同意在今年9月16日签署这份协议。

5.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周恩来说，在苏联方面提供的关于中国政府请求的援助物资中必须区分两类问题：（1）同朝鲜战争有关的供应，（2）同中国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关的供应。他强调说，他希望首先考虑关于同朝鲜战争问题有关的供应，并希望在他回国之前能够得到苏联政府的具体答复。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将尽快研究关于1952年同朝鲜战争有关的援助请求。并尽可能满足中方的要求。至于1953年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因为中国需要的物资太多。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研究关于在中国组建军火厂的特别问题，并把这一问题同其他的一些援助请求区别开来；周恩来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中国已经在此方面展开了工作，而苏联方面已经派出了以乌达洛夫同志为首的特别的军事专家小组。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必须熟悉提供的材料，这需要几天的时间。

周恩来还请求苏联方面注意关于航空工业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在航空工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莫洛托夫说，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几天时间。

周恩来请求特别研究关于通讯设备的生产问题，特别是关于无线电雷达设备的生产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现在还很难做出答复,因为还没有对中方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

周恩来提议,让他和粟裕与布尔加宁同志以及苏联其他军事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认为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说,他将同布尔加宁进行协商。

6. 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的问题。周恩来请求,首先要考虑关于派遣部分苏联专家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急需这些专家。他说,将会提供急需的这些专家的名单。

莫洛托夫说,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在中国工作的部分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他说,再次请求派往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太多,所以这些请求很难满足。

周恩来再次请求研究关于马上派遣部分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强调说,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解释说,中国方面还不善于充分利用苏联专家,他提议,让苏联负责经济问题的总顾问经常就苏联专家的使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使中国政府注意,以便使得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更加有效。

莫洛托夫说,一些苏联专家未必都必须在中国工作。

7. 关于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

周恩来说,为了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他准备了一些材料,其中阐述了建议提供的商品的规模的主要内容以及相互供应货物的主要内容。

莫洛托夫认为应该做这一工作,他将了解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

周恩来提请苏方注意,最近两年,估计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的总量会超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的总量,随后接下来的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将会显著超过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周恩来阐述了如下可能:要利用最初两年中国向苏联出口货物积累的盈余,以便弥补在随后3年中苏贸易之间的差额。

莫洛托夫说,必须研究这个问题,之后苏联方面才能做出答复。

然后周恩来向莫洛托夫同志请求就五年计划的制定问题同他进行磋商。

莫洛托夫作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周恩来表示感谢。

接下来周恩来表示,希望在他从斯大林格勒返回之后安排中国相关的代表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进行一次会谈。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同意。

1952年9月8日

№04013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

（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部长同志：

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如果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上述建议，本照会与贵方回复的照会将被视为1950年2月14日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于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交换照会之日起生效。

请您，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

1952年9月15日

致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 A. Я. 维辛斯基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84页

№04014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 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

（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总理和部长同志：

我收到了您9月15日的照会。照会中谈到：“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

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并同意自交换照会之日起,您的照会和本回复照会成为上述 1950 年 2 月 14 日关于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

请您,总理和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A. 维辛斯基

1952 年 9 月 15 日

于莫斯科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2185 页

№00556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 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

(1952 年 9 月 16 日)

И. В. 斯大林同志:

送上我收到的毛泽东同志来电的俄译文。

请您阅示,并安排在您方便的时间接见,以便得到您的亲自指示。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周恩来(签名)

1952 年 9 月 16 日

附件：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

周恩来同志：

一、根据我们现有情报，朝鲜问题将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关于战俘问题墨西哥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双方要立即进行交换声明愿意返回祖国的战俘；第二，其余战俘转交给联合国成员国临时保护并应当根据即将达成的协议予以遣返回国；第三，在朝鲜建立正常秩序后，保证这些战俘返回祖国，并对此提供可能的条件。在恢复正常状况之前，如果战俘要求送其返国，有关政府应采取措施并向他们提供回国的一切可能。

看来，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朝鲜问题的提议是美国倡议的。墨西哥的提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打算反对这种做法。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对该问题我们应持何立场。

二、印度和缅甸已暗示，他们想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希望你去访问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尼赫鲁想来中国访问，随后由你对印度进行回访，这一情况我们是从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处得知的。

我认为，印度和缅甸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来交换意见。如果印度和缅甸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们要拒绝是不妥的。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订这些条约是否适宜。

毛泽东

1952年9月15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94 - 96

No005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

(1952年9月17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同意您的看法：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

场。很明显,由于在朝鲜谈判中没有取得成果,美国打算目前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其立场的赞同,并且要以联合国的名义提出同样的要求。墨西哥人只是美国的代言人。

如果墨西哥人向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因其不符合在朝鲜停战的利益而否决这一建议,并将补充下述提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陆、海、空的军事行动。

二、依据国际法准则让全部战俘返回祖国。

三、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2—3个月内撤出朝鲜;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双方各自暂时留下20%的战俘并让其余战俘返国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不会涉及此项建议,它将留给您机动处置。

同印度和缅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菲利波夫

1952年9月17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97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5, л. 99

№24865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

(1952年9月18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对外贸易部在1952年9月2日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第40112/3214号),请求允许在中国购买物资建设木质房屋,房屋的居住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造价为75万卢布,在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造价30万卢布,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造价45万卢布。

所建造房屋供海关机关工作人员使用,作为全苏对外运输企业联合公司办事处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的办公室。

对外贸易部认为,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价值为30万卢布的物资可以用对外贸易联合会在1952年超额的利润购买,据此,对外贸易部请求把1952年的投资计划增加30万卢布。

1951年，苏联对外交通协会在芬兰购买了符合标准的房子，建立了奥特波尔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095卢布，而每平方米的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020卢布。1951年，对外交通协会利用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买的符合标准的房屋建立了格罗迭科沃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373卢布，而每平方米有效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120卢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物资是建设海关和对外交通协会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房屋所需要的，而把这些材料组装起来预计每平方米有效面积需要556卢布，每平方米住宅的有效面积需要926卢布，也就是要便宜2倍多。

此外，没有可能从距离这些站点最近的苏联领土上得到建造房屋的物资。

鉴于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应该允许对外贸易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当地的中国元购买物资，为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建设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的木屋，建造花费75万卢布，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所需造价30万卢布用对外贸易联合会的额外利润支付，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所需造价45万卢布列入对外贸易部1953年的投资计划。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附后。^①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 帕乌金

1952年9月18日

РГАЭ, ф. 4372, оп. 54, д. 1031, л. 45 - 46

№0055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

（1952年9月19日）

出席会谈的有：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同志；

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师哲同志。

会谈从墨西哥关于交换战俘的建议开始，斯大林说，我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墨西哥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如果墨西哥向联合国提出此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项建议,那么,苏联代表团将驳回这项不符合朝鲜停战利益的建议,并争取实现以下各点:

一、双方立即停止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

二、按照国际法准则将全部战俘遣返回国;

三、在2—3个月内,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直接在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补充说,对于哪些国家和多少国家应当参加该委员会,可以另行讨论决定。

至于双方暂时扣留20%战俘和遣返其余全部战俘的提案,苏联代表团将不涉及此项提案,而把它留给毛泽东机动处置。

周恩来问我们,对中国政府可能与印度和缅甸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见。毛泽东认为缔结这项条约是适当的。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此,现在和将来当然都不会有任何障碍。

周恩来问,可否把第二项主张推迟一些提出,再等2—3个星期。

斯大林答复说,这是毛泽东的事。如果毛泽东愿意,那么,我们可以把关于扣留战俘比例的第二项主张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周恩来:提出有关第二项主张的问题,即可否把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便单独解决有关他们今后命运的问题。说把这个问题拿到国际组织去谈,并且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可以支持这项主张。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主张遣返全部战俘。这也符合中方的立场。如果在此基础上达不成协议,那么,把战俘交给联合国是不行的,因为联合国是交战方。接着问道,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把战俘交给哪个国家。

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委托在此转告,考虑交给印度。

斯大林问,在这种情况下战俘的费用由谁出。看来,由相关各方承担喽?

周恩来回答说,考虑到如果把战俘交给印度,那么,这意味着隔一段时间后,战俘将经过印度移交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将支付中朝战俘费。

斯大林说,这个提案可以采纳,但要考虑到,美国不想交出全部战俘,扣留一部分,打算雇佣,对我国战俘就是这样干的,而现在我们每天都抓到被美国投到我方来的几名战俘。他们扣留战俘不是因为战俘不想回国——美国常常利用这种借口,而是为了利用战俘从事特务活动。

周恩来肯定说,情况正是这样。

提出有关下一步主张的问题,即停火,而把整个战俘问题留到以后讨论。提醒说,如果不采用按比例扣留战俘的方案,斯大林同志是否就同意这一主张。

斯大林肯定说,这项建议作为可用方案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国未必接受此方案。

周恩来说,美国也许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果真这样就好了。

周恩来说,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同志曾提出一条意见,让中国在建立大陆或地区联合

国机构方面发挥主动。问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他仍然保留以前的看法，但要补充一点：除现在的联合国外，要单独建立亚洲、欧洲等洲的联合机构，不是代替联合国，而是与联合国平行。让美国人去建立美洲的机构，欧洲人建立欧洲的机构，亚洲人建立亚洲的机构，但都与联合国并行不悖。

周恩来说，中国与联合国不相干，他们清楚，要在建立大陆机构方面发挥主动。

斯大林强调，联合国是美国的机构，要打破这个联合国，但又保持一种不反对联合国的姿态，在尊重联合国的姿态下干这件事，不明说要打破、要削弱这个机构，而实际上却削弱这个机构。

回忆起在战争时期丘吉尔曾建议组成大陆联合国，但遭到美国的反对。当时，我们缄默不语，听着这场争论，但后来英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于是我们便支持建立联合国的提议。

周恩来问，斯大林同志要不要就此事给毛泽东写封信。

斯大林解释说，最好不写信办成事，说他看见周恩来正在记，而且完全信任他。

周恩来谈到定于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大会时说，现在不得不把会期改在10月初，又说，中国将吸收日本和印度参加这次大会。

斯大林问，巴基斯坦参加吧。

周恩来肯定，巴基斯坦也应参加，巴基斯坦已受到了邀请，但巴基斯坦政府不发给护照。至于印度，印度代表团的部分人已经动身，日本人则由香港入境。

斯大林接着说，现在应当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因为：（1）召开大会的倡议是中国发起的；（2）这样会更好，因为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

周恩来问，我国代表团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斯大林回答说：和平。

周恩来说起尼赫鲁关于召开苏、中、英、法、美五国会议的建议。

莫洛托夫更明确地说，这是国大党委员会的建议。

斯大林说，应当支持这项建议。

周恩来强调说，印度当然是同英国一起出席此种会议，但利用这项建议显然是合适的。

斯大林同意此意见。

周恩来说，由于公布关于旅顺口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应持的立场便十分明朗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表明，是日本不想同中国和苏联缔结和约。

斯大林补充说，而且还准备侵略，但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

周恩来提出台湾问题，说既然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缔结了协定，从而就证明了它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排除了缔结和约的可能性。只要保留与台湾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

斯大林强调，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支持周恩来的看法，即只要保留与蒋介石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指出，日本与蒋介石签约一事只能恶化日本的地位。

周恩来问,在德国问题上今后的形势如何发展。

斯大林说,这难以预料。看来,美国不赞成德国统一。美国人在掠夺德国。如果东西德联合起来。那么,对德国就再也不能掠夺了。因此,美国人不希望德国统一。

周恩来发表意见说,虽然美国在重建西德和日本武装力量,指望利用他们,但这些武装也会调转过来对准美国。

斯大林说,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在以希特勒—纳粹分子领导的德国。

周恩来转到新疆形势问题,说新疆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新疆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但同时非法没收牲畜方面、宗教方面以及减租减息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左”倾过火行为。为了纠正这些过火的行为,召开了中央全会,免除了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职务并派多名中央委员到当地处理过火行为。总的来看,当地的不满情绪已经平息,外逃包括逃到苏联境内的事件已被制止。

斯大林说,过火行为是想尽快获得土地和牲畜的反映,于是便没收富人的土地和牲畜。

周恩来指出,改革的消息刚一传开,敌对分子便立即宰杀牲畜。

斯大林指出,当年在我国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必须加快改革。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以后还会出现掠夺行为。

周恩来解释说,土改是在农业区进行,而在其他牧区则进行分配,过火行为是在分配时发生的。既然牧民参加分配,中国领导便决定改善牧民状况,这对改善整个状况也有利。

斯大林说,你们当然了解得更清楚。

周恩来说,刘少奇通知,印尼共产党要派两名代表出席十九大,并询问同他们在莫斯科讨论党的问题是否适时。

斯大林说,现在难说。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向中央提出此事。指出,印共代表来的时候,就请求帮他们制定党的纲领,当时虽然忙,但还是照办了。

周恩来通知说,日本同志也要来,大概也想商谈党务问题。

斯大林答复说,大哥哥不可拒绝给小弟弟办事。说这件事要同刘少奇谈,他有丰富的经验。询问说,中国对此事有何看法。

周恩来对此指出,刘少奇考虑随身带些有关的资料,以便讨论一系列问题。

斯大林指出,如果中国同志愿意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可以,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如果不想谈,则不必谈。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肯定想谈。

斯大林回答说,那样,时间总可抽出来。

周恩来说,不排除越南同志也要来。

斯大林就此指出,越南同志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人。

周恩来结束会谈说,这些是他们想得到指示的全部问题。

斯大林问,是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说,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也可能是建议,但从实际内容上看则是指示。

斯大林对此指出，我们只提建议，谈谈我们的意见，而中国同志可以接受，也可不接受，而指示就必须接受了。

周恩来再次说，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指示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指示。指出，他们不会盲目接受这些指示，而认为要先理解，尔后再自觉接受这些指示。

斯大林强调，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力戒作指示。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到斯大林同志对他们所请教的这些问题肯定非常熟悉。

又问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建议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关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会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十分宝贵的指示。他同意不仅美英法会干这种卑鄙活动，他们还要策动华人干这种卑鄙勾当。

斯大林补充说，还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寻找代理人。

莫洛托夫在回到军事贷款、支付中国 60 个师的装备问题上，问道，他对周恩来上次说的意思是否理解得对，即 60 个师的供货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 1951 年 2 月 1 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中国 60 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

周恩来回答说，莫洛托夫同志理解得完全对，并再次肯定，中国 60 个师的装备结算应全额付款，而不是半价付款，因为这不是为中国制定的办法。

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

随后提起中国政府代表团给苏联代表的赠礼问题，说赠的礼品太多了。

周恩来解释说，斯大林同志 70 寿辰时他们未能及时送礼。去礼品博物馆时看到其他国家赠送的礼物，便决定不能不补上他们未及时办的事。

斯大林说，我们也想赠送中国政府代表团几辆苏制卧车。说我们有一种“吉姆”车，比“吉斯”小，但很漂亮，我们打算赠送几辆“吉姆”车。

随后提起对宋庆龄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说，她正在加紧自我修养，逐步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到他们方面，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发表了几篇好文章。说宋庆龄对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感到非常自豪。

会谈从 10 时 30 分开始，12 时 30 分结束。

A. 维辛斯基、H. 费德林记录

1952 年 9 月 19 日

№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

(1952年9月25日)

绝 密

(特别文件夹)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52 年 4 月 18 日第 1853—703cc 号决议，苏联财政部应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面值为 5 元、10 元、50 元和 100 元的纸币，数量为 4.66 亿张。

面值为 5 元和 10 元的纸币应该准备妥当，并在 1953 年 3—9 月期间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余面值的纸币在 1954 年 3 月提供。

国家货币印制厂根据中国人提供的图纸，已经准备好了面值为 5 元和 10 元的中国纸币的机器印刷样板，并且在 9 月份已经把上述纸币的样板都转交给了中国人，以便进行调整。

为了防止伪造中国货币，国家货币印制厂采用了带水印和化学保护的特别的纸张；在印制中国货币的时候，货币的两面的印制采用了高质量的金属版印刷术、不能通过印刷途径模仿的组组饰线，还采用了特别的防伪措施：在规定的位罝印刷最小的符号、花纹线和图案线，它们的走向是连贯的，由黑到白，由白到黑。

根据中国代表的通报，国家货币印制厂提供的样币不能使中国人满意。今年 9 月 22 日，我接见了中国大使，他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请求说，在中国货币的印制问题上，纸币的印制还应采用苏联货币使用的其中的一项防伪措施(带黑白线的图案)。大使接着说，对样币没有其他的意见。

如果今后在中国印制面值为 5 元、10 元、50 元和 100 元的中国货币，就必须把使用“黑白线图案防伪”印制货币的方法传授给中国人。

考虑到中国人的请求，考虑到在苏联的货币上除了上述的防伪措施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可靠的防伪措施(奥尔洛夫印制法、双重金属线、所谓的涅兹韦茨基防伪法以及在钢网上的照相凹版印刷)，我认为可以在中国的货币上采用“黑白线图案”防伪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草案附后。^①

苏联财政部部长

A. Г. 兹韦列夫

1952 年 9 月 25 日

РГАСПИ, ф. 82, оп. 2, д. 1258, л. 93 - 94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No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 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

（1952年11月17日）

第50530号，1952年11月17日

我们的报告如下：

目前在洛博夫同志所率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中共包括以下部队：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

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是于1952年编入该军的，目的是替换以前在该军服役的各航空师，而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自1951年6月编入该军以来一直未曾替换。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主要承担夜间作战，第八十七高炮师负责掩护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第九十二高炮师和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掩护鸭绿江上各渡口和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安东地区所驻防的各机场。

据洛博夫同志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已连续17个月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指战员身体过于疲劳，各部队战斗力下降，军官、士官和士兵患病者日益增多。

鉴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等部队身体过于疲惫，病员不断增加，洛博夫同志请求对这些部队予以替换。

我们均同意洛博夫同志的请求。

关于上述部队的替换可于1953年2月1日以前进行。替换部队来源：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远东部队，1个高空一探照灯团——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等部队在替换时现有全部装备均留于原地，并移交给新到的歼击航空团、各高炮师和高空一探照灯团。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空一探照灯团编入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我们将提交相关决议草案，并请求您审阅和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附件：

苏联部队会议决议 第__号

1952年11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责成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1953年2月1日以前向驻中国的洛博夫同志发出指令：替换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等。前往替换的部队：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来自远东部队,1个高空一探照灯团来自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上述所有部队发送时一律不携带武器装备。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一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空一探照灯团编入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57, л. 23 - 26

№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

(1952年12月17日)

发自北京,1952年12月17日16时30分收到

谢苗诺夫同志^①：

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止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尚未达到使美国人面对停战的程度,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要更加频繁。

目前艾森豪威尔正在准备其上台掌权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根据在朝鲜的军事

^① 谢苗诺夫是斯大林的化名。——编注

行动,可以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而不大可能对前线的我方阵地前沿和后方较坚固的工事发动进攻。所有的迹象表明,当前敌方正加紧训练和加强李承晚的傀儡军队,敌海军部队在北朝鲜水域不停地进行演习,敌方间谍亦积极地在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搜集情报。

至于敌方军事力量,总共有 19 个师、4 个旅和 7 个独立团,这包括美国的 7 个师,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 4 个旅,李承晚军队的 12 个师和 7 个独立团。

目前在战场上作战的有 14 个师、4 个旅和 5 个独立团。

如果敌方要采取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登陆作战,那至少要从南朝鲜后方地区调出 4—5 个师,还要从日本和美国调出 4 个美军师,只有这样敌方才能够组织大规模登陆战役。否则,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在靠近我后方地区采取战术性和牵制性的登陆战役。

战术性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川地区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和梦金浦里半岛。

对空降兵登陆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云山、咸兴、镇南浦地区和西海岸的新南州地区和铁山半岛。

在西海岸地区的战略性登陆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的主要运输线路通过这些地区。

也许敌方采取的登陆战役会在明年的春季,但也可能更早一些,在明年 2 月份就开始这些战役。为了配合登陆战役,敌方也许会对中国大陆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如轰炸在中国领土安东地区的军用机场;让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搞军事活动;援助在缅甸领土上的中国李弥匪帮军队以加剧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

然而,朝鲜战争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成功地捍卫住在朝鲜我军后方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破坏敌方登陆计划和战场上的战术性协同进攻,使敌方有生力量遭到更大损失,那么朝鲜的军事形势将会更加稳定并将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在回答“如何能完成上述任务”这一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报告当前军事形势及其特点。

在粉碎敌人去年秋季攻势之后,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相对稳定。我方军队利用这段时间加固了前方和沿海岸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且在与敌空军作战取胜的同时,于今年 9 月份为粉碎敌方当时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从而我们保证了对军队的不间断供应。

我方军队首先开始了战术性进攻,结果是敌方军队的 58 个据点被清除。

在 9—11 月的 3 个月时间里我们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到的损失死伤达 11 万多人,其中美国人有 4 万多。

10 月中旬敌人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连续进攻位于金化以北 4 公里的约占 3 平方公里面积的两处据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 11 月末,敌人被毙伤达 2 万多人,敌人每日消耗炮弹 2 万多发,有时多达 3 万发。坦克和飞机每日都参加战斗。然而,最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

由于进行如此激烈的阵地战,我军和敌军的炮火都十分集中。为了消灭敌人的一个连,

平均要集中 30 门火炮,发射约 1 万多发炮弹。

在最近 3 个月时间里,我们消耗了 240 多万发炮弹(其中有 110 万发是苏联型号的),其中迫击炮弹占的比重较大。苏联型号的炮弹(如 152 毫米榴弹炮弹、122 毫米榴弹炮弹、76.2 毫米炮弹、85 毫米高射炮炮弹、37 毫米高射炮弹、“卡秋莎”火箭炮弹以及 122 毫米、85 毫米、76.2 毫米坦克炮弹)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方军队在今年秋季战役中的取胜,不仅仅是由于战士和指挥员的英勇以及加固的工事、正确的作战指挥和不间断的供应,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强有力的炮火和炮兵的准确射击。

至于我方炮兵与敌方炮兵的对比,敌方有 1.4 万门各式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有 1.3 万门各式炮。然而在我方的火炮中,轻型迫击炮和火箭炮占多数,几乎超过全部火炮的半数。敌方的榴弹炮和坦克炮则比我方多得多。缺少炮弹,尤其是缺少苏联型号的炮弹,是我方的一大困难。人民志愿军部队拥有大约 2 000 门苏式大炮。

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 112 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

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所以,提供苏联型号炮弹是我这封电报中向您提出的最紧急请求。

为了击退敌方的登陆战和我们设想的其可能提前开始的攻势,目前我们采取了各种备战措施。

目前在朝鲜战场有人民志愿军 16 个军、4 个榴弹炮师、4 个坦克团、5 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在正面第一线有人民志愿军 7 个军和朝鲜人民军 3 个军团。人民志愿军的其他几个军在第二线并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担负着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任务。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决定于 1953 年 1 月份从中国内地再往朝鲜调 4 个步兵军、1 个榴弹炮团、5 个坦克团、2 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并保持 5 个军去守卫平壤以北的西海岸地区,此外还决定沿海岸线和铁路线加固并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保证供应中朝部队的运输线在这一狭长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他重要据点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

为了使后方沿海岸地区发生的战斗不影响对前线部队的正常供应,我们决定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并决定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以便改善对前线食品和弹药的运输与供应,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储备。

为了给人民志愿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 25 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 1953 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项目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3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

为了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朝鲜成功地进行战斗，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取得胜利不是没有困难的。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1953年我们还不能生产出朝鲜战场急需的所有苏联型号的武器，尤其是不同规格的苏联型号的炮弹。只有在春季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生产供应朝鲜战场的某些苏联型号的武器和弹药，即使这样数量仍然不足。

由于这一极其紧张的状态，恳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满足我们1953年朝鲜战场军需品申请单和1953年军工生产材料贸易额申请单。

第一份申请单已于1952年9月6日由周恩来同志交给莫洛托夫同志，第二份申请单已由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提交给苏联外贸部。

随这封电报，我们附上最急需的军用品申请单。

请您依据所附清单加以审核，对您能向我们提供这些军需品寄予希望。

一、我们请求于1953年第一季度供给不同型号的火炮624门以及这些炮的牵引车和配套零件：

152毫米榴弹炮10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122毫米榴弹炮21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76毫米师用炮150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100门，带备用零件；

85毫米高射炮48门，带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备用炮管200个；

ACT炮队镜300个；

ПАБ炮兵罗盘400个

8倍望远镜2000个；

高射炮指挥镜20个；

БМТ炮兵罗盘50个；

牵引车783辆，其中包括152毫米榴弹炮用履带式牵引车135辆；

吉斯-151型汽车336辆；

嘎斯-63型汽车312辆；

嘎斯-67型指挥车151辆。

二、请于1953年1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805000发：

（一）152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3800发。

（二）152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1000发。

（三）15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200发。以上共5000发。

- (四) 122 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 96 000 发。
 - (五) 122 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 45 000 发。
 - (六) 122 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 4 500 发。
 - (七) 122 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 4 500 发。以上共 150 000 发。
 - (八) 122 毫米坦克杀伤炮弹和自控信管 14 000 发。
 - (九) 122 毫米坦克穿甲炮弹和自控信管 6 000 发。以上共 20 000 发。
 - (十) 120 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 50 000 发。
 - (十一) 107 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 50 000 发。
 - (十二) 85 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 30 000 发。
 - (十三) 37 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 500 000 发。以上共 630 000 发。
- 总计为 805 000 发。

三、请于 1953 年 2—4 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 1 550 000 发：

- (一) 152 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 38 500 发。
 - (二) 152 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 10 000 发。
 - (三) 152 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 1 500 发。以上共 50 000 发。
 - (四) 122 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 128 000 发。
 - (五) 122 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 60 000 发。
 - (六) 122 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 6 000 发。
 - (七) 122 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 6 000 发。以上共 200 000 发。
 - (八) 76 毫米炮的杀伤弹 50 000 发。
 - (九) 76 毫米炮的杀伤爆破弹 27 000 发。
 - (十) 76 毫米炮的穿甲弹 15 000 发。
 - (十一) 76 毫米炮的次口径炮弹 5 000 发。
 - (十二) 76 毫米炮的烟幕弹 3 000 发。以上共 100 000 发。
 - (十三) 85 毫米坦克杀伤炮弹 32 500 发。
 - (十四) 85 毫米坦克穿甲炮弹 12 500 发。
 - (十五) 85 毫米坦克空心炮弹 5 000 发。以上共 50 000 发。
 - (十六) 85 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 150 000 发。
 - (十七) 37 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 1 000 000 发。以上共 1 150 000 发。
- 总计为 1 550 000 发。

请把上述炮兵武器列入军事订货账户内。

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上述炮兵武器从 1952 年 9 月 6 日的申请单中扣除。

至于 20 个步兵师的炮兵武器和弹药以及 1953 年将向其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请求仍按原先协议的计划供应,不要有任何变化。

四、请于 1953 年第一季度提供给我们军工生产的 6 种材料：

用于 122 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引信 500 000 个。

用于 122 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填装药 700 吨。

用于 76 毫米炮炮弹的引信 500 000 个。

用于 76 毫米炮炮弹的填装药 500 吨。

用于 37 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引信 500 000 个。

用于 37 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填装药 100 吨。

请将上述军工生产材料记入贸易额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这
些材料从已提交的 1953 年贸易额申请单中扣除。

此外，为了保证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坦克团有成套的修理材料，请您给苏联外贸部以相应指
示：根据 1952 年 9 月 3 日签订的坦克修理材料合同（第 23109 号的 80% 和第 23119 号的 80%）
应于 1953 年 1 月向我们提供尚短缺的供 1 166 种坦克修理用的材料和 62 种供日常维修用的
成套紧急材料，特别是自控系统用的修理材料，希望能尽早地提供这些材料以解急需。

请您审核上述一切并希望您先告知自己的意见。

致敬礼！

毛泽东

1952 年 12 月 17 日

第 3541 号电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105 - 114

№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 1953 年军需品订购问题

（1952 年 12 月 27 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收到您 12 月 17 日电报。

您关于美国人 1953 年春季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领导下的目前美国在
朝鲜的司令部的计划。为了缓和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有可能改变这

些计划。您根据美国人进攻的可能性考虑到事情的最坏方面,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详细研究了您那份 1953 年军需品申请单和那份紧急军需品申请单。

您所申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数额超过了我们 1953 年的供应能力。根据可能,我们 1953 年将向您提供 20 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也就是说按 20 个师我们将提供炮弹约 80 万发,各式大炮 1 320 门和其他军需品。

考虑到您在电报中说到的情况,我们 1953 年将尽最大努力向您提供超出 20 个师的所预定的武器和弹药,到年底平均运出的数量约为您 12 月 17 日电报申请数的 1/4,计:炮弹 60 万发、各式火炮 332 门、炮牵引车、信管和其他军需品,运送数额我们军事部有详细清单。

这样,将 1953 年提供 20 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弹药计算在内,将向您提供:炮弹 140 万发(1952 年为 112.5 万发)、各式火炮 1 652 门(1952 年为 1 056 门)。

您电报中提及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交来的军火生产材料申请单,目前我国外贸部正在研究这份申请单。

谢苗诺夫

1952 年 12 月 27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115 - 116

№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 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

(1952 年 12 月 30 日)

第 420985 号

鉴于 1952 年 12 月 14 日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发给马林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等同志的第 2996 号电报,我们现报告如下:

1951 年 11 月由 5 位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去了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总部。

总顾问中将沙林同志在临行前得到的任务:

——向苏军总参报告有关前线局势和彭德怀司令部的情况;

——不经苏军总参同意顾问团不得就作战问题提出任何建议;

——顾问团的工作仅限于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范围，顾问不得到司令部以外的部队中去。

根据相关指示，军事顾问可以向彭德怀提供以下帮助：组织和加强防御，解决司令部范围内的工作，军队的指挥、侦察和战备训练的组织等问题。

鉴于沙林同志的建议和克拉马尔同志因病休假，我们决定让炮兵中将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作为临时总顾问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司令部。

……^①

我们请求：

1. 让顾问团继续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

2. 加快确定候选人名单的速度，并责成其到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接替现任军事顾问所担当的职责。相关候选人名单我们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具体包括：少将莫扎耶夫——敖德萨军区作战管理局局长；坦克部队少将马雷金——基辅军区装甲坦克部队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1952年12月30日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57, л. 102 - 105

^① 这里省略了关于对驻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苏联总军事顾问的个人鉴定。——原注

1953 年

№31214

潘友新与朱德会谈纪要： 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1953 年 1 月 3 日)

摘自 A. C. 潘友新的工作日记

机 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A. C. 潘友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政府副主席、总司令朱德的会谈纪要

1953 年 1 月 3 日

在礼节性的交谈后，应我的要求朱德讲述了国内和远东的形势。

朱德说，中国政府认为，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开始积极实施在远东的政策。看来，美国人试图在 3 月份在朝鲜东西海岸登陆。美国还在竭尽可能快速恢复日本的军事工业和组建日本武装部队。

在谈到蒋介石政府的时候，朱德说，美国人也很积极，蒋介石也没有停止向中国东南沿海空投一些小分队从事制造中国紧张局势的活动。朱德指出，即使向中国东南沿海空投大部队，也不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大的威胁，这些空降部队很快就会被消灭。

在再次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朱德指出，尽管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但战况不能令美国人满意，因为战争时间的拖延要求大量的人员，但美国是没有的。而美国仆从国部队即使是使用美国的装备在朝鲜什么也做不了。

朱德说，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准备把朝鲜战争进行到底。中国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至于五年计划，朱德说，在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后，五年计划已重新审订。其中，工业生产的增长由每年增长 20% 更改为 15%。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A. C. 潘友新

No0056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1月7日）

发自北京，1953年1月8日11时10分收到

谢苗诺夫同志：

根据朝鲜形势，为了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新进攻，当敌人在安东至平壤一线的朝鲜西海岸地区实施登陆战役时，我们准备向朝鲜派出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作为志愿军。

请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否适宜。为此，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1953年2月根据1952年海军器材申请单向我们提供以下武器：

一、鱼雷快艇及水雷和鱼雷

- （一）18艘鱼雷快艇（柴油发动机）和全套备用零部件（1952年申请单报的是12艘）。
- （二）上述18艘鱼雷艇的72枚45-YTK鱼雷。
- （三）每艘快艇5个油料基数（共90个油料基数）。
- （四）2台M-50发动机及全套设备和图纸（为训练专业人员用）。
- （五）20枚战斗训练用的45-36K鱼雷。
- （六）4套训练用“斯库姆勃里亚”发射机。
- （七）4套鱼雷学校用YC-4接收机。
- （八）180枚K-B水雷。
- （九）270个护雷具。

二、海岸炮兵

- （一）3个130毫米炮兵连（12门火炮）。
- （二）3个100毫米炮兵连（12门火炮）。
- （三）36门37毫米火炮（防空用）。

最好所有130和100毫米炮兵连均备有“莫斯科中央瞄准”射击指挥仪，并备有以下测距仪：

- 1. 3个130毫米炮兵连，3个4米测距仪。
- 2. 3个100毫米炮兵连，3个3米测距仪。
- 3. 36门37毫米火炮，9个1米测距仪。
- （四）6台“3-15-4”型探照灯（每连1台）。
- （五）海岸炮弹药和37毫米火炮的炮弹。
 - 1. 130毫米半穿甲弹3000发。

2. 130 毫米爆破弹 1 800 发。

3. 130 毫米杀伤爆破弹 1 800 发。

共 6 600 发。

4. 100 毫米爆破弹 2 700 发。

5. 100 毫米空炸炮弹 2 700 发。

共 5 400 发。

6. 37 毫米曳光穿甲弹 20 000 发。

7. 37 毫米曳光杀伤燃烧弹 30 000 发。

8. 配置 130 和 100 毫米炮兵连的临时地基方案。

三、海军航空兵

(一) 图-2 鱼雷飞机(附带全套个人用和集体用的备份零部件和工具)32 架。

(二) 拉-11 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的备份零件和工具)35 架。

(三) 拉-9(或拉-11)歼击教练机 4 架。

(四) 里-2 飞机和里-2 教练机(附带备份零部件和工具)4 架。

(五) 雅克-18 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备份零部件)16 架(1952 年申请单中是 12 架, 现再增加 4 架)。

(六) 雅克-11 飞机(附带个人用和集体用备份零部件)14 架(在 1952 年申请单中我们没有申请这种型号飞机)。

(七) АШ-82ФН 发动机(附带备份零部件)20 台(1952 年申请单中只申请 10 台, 现再增加 10 台)。

(八) М-11ФР 发动机(附带备份零部件)10 台。

(九) 带 45-36-АНУ 弹头的航空鱼雷 60 枚。

(十) АМД-500 水雷 160 枚。

(十一) 假鱼雷 20 枚。

(十二) ПЛАН-100 反潜航空炸弹 100 枚。

(十三) АМД-500 实习水雷 20 枚。

(十四) 45-36-АНУ 实习鱼雷 20 枚。

四、顾问和教官

请向中国派遣以下专家:

(一) 海军航空兵参谋长顾问 1 人。

(二) 水雷鱼雷航空兵总队长顾问 1 人。

(三) 水雷鱼雷航空兵总队工程师顾问 1 人。

(四) 水雷鱼雷航空团长顾问 1 人。

(五) 水雷鱼雷航空团和工程师顾问 1 人。

(六) 拉-9 歼击机航空团长顾问 1 人。

（七）拉-11 歼击机航空团工程师顾问 1 人。

（八）临时基地海岸炮兵连建设顾问工程师 1 人。

（九）M-50 柴油机工程师 1 人。

（十）M-50 柴油发动机教官 3 人。

上述顾问和教官最好能在发运武器的同时派到中国来，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部队能在进行两个月战斗训练后派往朝鲜参加战斗行动。

请研究我们的请求，并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 月 7 日

第 62 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125 - 128

№00567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 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

（1953 年 1 月 12 日）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 12 月 17 日的电报中，请求以您的名义为中国提供 1953 年朝鲜前线所需的装备、弹药和各种军事技术物资。

首先毛泽东请求 1—4 月份提供：火炮 624 门，炮弹 235.5 万发。

根据这个请求，按照您的决定，已通知毛泽东同志，他们所申请装备、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已超过我们 1953 年的能力，因为我们同时还要为 20 个步兵师提供装备、弹药和军事物资。但是考虑到电报中列举的情况，已同意提供超过 20 个师的装备和弹药，年底前提供大约 60 万发炮弹和 332 门火炮，而不是毛泽东申请提供的 235.5 万发炮弹和 624 门火炮。

在 1 月 4 日给您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要 332 门火炮和 60 万发炮弹，这个数量苏联政

府已同意在 1953 年平均的提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 1—2 月提供 332 门火炮和 40 万发炮弹,其余 20 万发炮弹 3—4 月提供。20 个师的炮兵装备从 3 月份开始供货,每个月 2 个师,1953 年底完成。

毛泽东请求,为 20 个师提供弹药和装备的每月数量如下:

	弹 药	火 炮
1 月	20 万发	166 门
2 月	20 万发	166 门
3 月	18 万发	132 门
4 月	18 万发	132 门
5—9 月	每月 8 万发	132 门

根据我们 9 月 27 日关于提供装备和弹药的电报,制定了每个月平均提供的数量:弹炮每月 11.65 万发,火炮每月 138 门。

如果您认为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能力,那么我们认为在 1953 年 5 月 1 日前提提供 332 门火炮和 60 万发炮弹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为 20 个师提供弹药和装备,但不是像毛泽东所要求的在 3 月份,而是在 5 月份。为此,每月给 20 个师提供装备的统计如下:

	弹 药	火 炮
1 月	15 万发	166 门
2 月	15 万发	166 门
3 月	15 万发	166 门
4 月	15 万发	166 门
5—9 月	每月 10 万发	165 门

这是我们向毛泽东同志提供的答复方案。
请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 年 1 月 12 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0056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 向中国提供火炮和弹药问题

（1953年1月15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月4日的电报已收到。

根据电报我们再次研究了能否满足您关于请求加速起运60万枚炮弹和332门大炮的问题。按您电报中要求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保证全部如数运出是不可能的。我们已命令军事部加速运货并保证予以供应60万发炮弹（1—4月，每月15万发）和332门大炮（1—2月，每月166门）。

炮弹和大炮的规格均按您的申请单提供。

因此，提供20个师的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则从5月份开始至年底。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15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137

№12281

华西列夫斯基呈斯大林请示： 召回苏联驻志愿军总部军事顾问

（1953年1月17日）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我们关于从朝鲜召回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的军事顾问组的考虑。

鉴于以彭德怀将军为首的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已回到北京和以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行动的指挥领导从北京实施，以沙林同志为首的我军事顾问组织继续留在朝鲜已不

合时宜。

在您批准从朝鲜召回沙林同志之后,该顾问组只剩下3人:克拉马尔少将、炮兵中将斯特列利比茨基和彼得罗夫中校。

在由北京通过在京的彭德怀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领导的情况下,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责任责成我在华的军事总顾问负责较为合适。

至于我们需要的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继续由拉祖瓦耶夫同志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

请您允许从朝鲜召回我上述军事顾问。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23—2024页

No24868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 委员会函:美国发动细菌战

(1953年1月18日)

译自中文

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

在发送这些信件的同时,我们把“关于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开展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的影片也发送给你们,并且希望,该影片能为贵国的大众放映。

1952年初,美国政府开始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践踏人类道德。美国政府犯下的这些罪行罪证确凿,并且早就被国际组织、被访问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知名人士所证实。1952年6月,由国际著名的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委员会,通过实地对所犯罪行进行详细而严格的科学调查,得出了结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是美军进行细菌攻击的牺牲者。

这一事实具有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证明并揭露了美国政府发动的细菌战。我们希望,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能够坚信美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这些卑鄙的罪行。我们相信,为了保卫和平就应当联合起来进行自卫,坚决开展反对细菌战的斗争,以此来制止这些使用细

菌武器来毁灭人类的罪行。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

1953年1月18日

ГАРФ, ф. Р - 9539, оп. 1, д. 246, л. 17 - 18

№12279

华西列夫斯基呈布尔加宁报告：朝鲜战场的形势

（1953年1月21日）

布尔加宁同志：

兹报告现在朝鲜的形势。

在艾森豪威尔 1952 年 12 月 2—5 日访问朝鲜^①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关于克拉克有进攻计划的侦察情报、许多美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的言论以及美国在远东准备进攻朝鲜的实际措施都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措施反映在以下方面：

——加紧兵力部署，进一步展开南朝鲜军队。1952 年 12 月，组建了 2 个步兵师，3 个独立步兵团。考虑到这些新组建部队，南朝鲜军的战斗编制最近时间可达到 15 个步兵师（原有 10 个师）。

——加强武器和技术装备。南朝鲜每个步兵师都成立了由 4 个炮兵营编制的炮兵集团（72 门火炮），校射航空兵分队（8 架飞机）和一个坦克连。

——美国要求每一个朝鲜参战国都增加自己的部队。对此，比如土耳其政府表示同意并准备再往朝鲜增派一个旅。

——美国人在台湾训练和准备了国民党 3 个师，它们可能被用于朝鲜战场。

——驻在日本和朝鲜的 9 个师有 7 个师完成了登陆训练。在日本和朝鲜东海岸实施了总结性的登陆演习，美国人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登陆能力的检验。

——开始在朝鲜准备海军基地和港口：镇海（釜山以西 40 公里）、釜山和仁川；在北朝鲜西海岸仁川—海州地段诸岛修建基地。在这些岛上发现有增援海军陆战队的美军第二旅分队。

^①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韩国。——编注

——美国在北朝鲜大大加强了侦察和破坏活动。侦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西海岸安州—海州,东海岸城津—元山段,交通枢纽和装备基地。

美航空兵加紧轰炸北朝鲜西部的道路、渡口和人民军基地。

——在前线南朝鲜师逐渐替代美军师。1952年12月,3个美军师由第一梯队调为预备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指挥部是这样评述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的:

朝鲜持久战对美国不利。因此为赢得战争他们不得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在朝鲜顺利进行战争的方法可能是实施大规模海上登陆。

美国人将以近7个步兵师的兵力,通过在朝鲜西海岸格松岛—海州段登陆实施主要突击。

同时,美国人还将以1—2个师的兵力,通过在元山地区登陆,实施辅助突击。与此同时,加紧正面进攻。

此外,中国指挥部估计到以1个师的兵力在安州、云山和开城地区空降的可能性。

认为在黄海半岛登陆不大可能,因为这只能拉长战线。

为实施登陆,敌人可能运用11—12个师的兵力,其中6个师从主要前线抽调,5—6个师从外地调(从日本调一个师,从蒋介石那里调2—3个师,从美国调2个师)。

认为登陆时间很可能是在1953年7月。

中国指挥部认为,美国人在实施登陆战役时将使用原子武器。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指挥部决定:

一、加强自己在北朝鲜的兵力部署,把3个军(第一、第十六和第五十四军,共9个师)连带重武器和一个坦克师调往北朝鲜。

此外,在鸭绿江以北中国东北辑安和临江地区,于1953年3月集中1个军。

二、调整在朝的兵力部署,重点加强西海岸防御。

从前线抽调优秀部队以加强海岸防御:把第四十军和第三十八军调往西海岸地区,把第十五军调往东海岸地区,第四十七军留作前线预备队。

它们的阵地由缺少战斗经验的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四十六和第一军驻守。

由于兵力重新部署,西海岸地区防守兵力将加强到6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数个炮兵部队。

在东段战线,为加大战斗队形密度,规定把朝鲜第七军团配置在第一线,并由驻在西海岸的朝鲜第四军团取代朝鲜第三军团。

部署调整,其中包括中国境内出兵,计划在很短时间里,至1953年1月20日前完成。

但是,计划中的人民军兵力部署调整,由于中国军队入朝推迟,至今尚未全部结束。

三、为指挥部成立了西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和东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

西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十六、第四十和第五十军以及朝

鲜人的3个军团；东岸防御司令部指挥中国人的第十二、第十五军和第三十三步兵师以及朝鲜人的第二军团、第五军团和第二十四旅。

四、立即着手加固海岸防御工事。

五、在最短的期限里（200天）建成开城—海滨（宁远）—休济岛（Сюдзиодо）的铁路，并拓宽主要的公路干线。

六、在1953年实施3次战役，每次1个月，目的是牵制敌人，杀伤敌人，不让其加强登陆部队。

七、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补充伤亡，1953年成立了25万人的预备队。师和军成立了预备营，兵团成立了预备团。

八、为预防敌人在黄海半岛地区登陆，着手组建这一地区的朝鲜游击队。

九、制定的所有反登陆措施，包括构筑钢筋水泥工事和坑道，计划在1953年3月15日前完成。

我们认为中国指挥部对朝鲜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

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对在西海岸格松岛—镇南浦一线登陆不利，美国人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即：

——以登陆部队从镇南浦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汉城以北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海州东北人民军部队，然后向平壤、安州进攻；

——以登陆部队从元山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从铁原、金化地区实施突击，任务是消灭人民军左翼集团，然后向平壤进攻。

在美国人按照这一方案实施行动的情况下，人民军部队的部署可以保障坚固的防御。

不排除美国人通过登陆部队在黄海半岛登陆后实施部分战役的可能性，其任务是前出到开城地区（海州以东75公里），夺取人民军右翼部队的主要交通线。在1952年下半年，美国的谍报—破坏小组不断在这个半岛实施登陆。

为了加强反登陆防御，防止敌人在可能地段登陆，我们已建议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同中国指挥部一起讨论下述问题：

——以驻扎在该方向的第六十四军之兵力加强镇南浦的防御以及以第二梯队兵力实施机动；

——建立军团和兵团反坦克炮兵预备队；

——加强东岸防御部队的炮兵部队。

此外，我们还建议格拉祖诺夫^①同志在近期内向朝鲜派出我们的通信专家和工程专家，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有这方面的要求。

^① 此人任职不详。——编注

同时我们还准备通过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向中国指挥部提供组织反登陆防御的基本原则。

华西列夫斯基

索科洛夫斯基

1953年1月2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23—2024页

№0056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提供海军武器装备问题

(1953年1月27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在朝鲜使用中国海军部队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向您提供鱼雷艇、飞机和装备的电报已收到。

您请求告知我们对派中国海军志愿军赴朝是否适宜的看法。我们认为您大概指的是使用海军陆战队。当然，海军陆战队可以成功地用在沿岸反登陆防御总体战中以消灭敌人靠岸和登陆时的运输工具和登陆部队。我们认为您的上述设想是正确的。

关于向你们提供海军军需品问题我们已下达了指示：拨给你们10艘鱼雷艇、83架飞机（其中图-2型轰炸机32架，拉-11型歼击机35架）、26门37毫米火炮和8门130毫米火炮以及适用于这些火炮的弹药。鱼雷、水雷、空投炸弹及其他军需品均按您的电报拨给。

已向海军部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你们发出上述装备。

关于顾问，我们打算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您邀请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将从目前正在中国的我方海军顾问中派出。

谢苗诺夫

1953年1月27日

№0057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请求苏联提供炸药

（1953年1月29日）

谢苗诺夫同志：

为了保证顺利击退敌人可能发动的登陆战役，中国志愿军部队正在朝鲜西海岸和东海岸修筑防御工事，所以我们急需阿芒拿炸药。

目前我们的阿芒拿炸药还无法满足工业和军队的需要。虽然我们在工业上已采取措施节约阿芒拿炸药，并把一部分供应军队的阿芒拿炸药运往前线，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仍不能保证军队需要。

为了保证在2—3月份完成朝鲜沿岸的防御工事，经我们估算，我们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2—3月份分两批向我们提供3 000吨阿芒拿炸药、2 400万支雷管和960万米导火线。

请苏联政府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告知决定。

敬礼！

毛泽东

1953年1月29日

第223号电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3, л. 140

№24868 - 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电：关于细菌战的材料

（1953年2月4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们收到了你们在1月23日发来的电报，现已将国际科学家委员会的30份报告、一份

费罗(ФИЛО)^①反对使用细菌武器的声明的英文文本复印件以及一套五箱子关于美国战俘供状的材料空运给过去。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

1953年2月4日

ГАРФ, ф. Р-9539, оп. 1, д. 246, л. 4

№24868-2

张闻天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函： 递交细菌战的材料

(1953年2月23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受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委托，有幸就此发送如下材料：

1. 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信件。2. 《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开展细菌战的事实的调查》影片。3. 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凯文、肯尼斯、伊诺克和奥尼尔的录音。4. 30份《国际科学委员会关于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事实的调查报告》。影片、美国被俘飞行员的供状录音以及报告材料都是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赠送给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

中国驻苏联大使

张闻天

1953年2月23日

ГАРФ, ф. Р-9539, оп. 1, д. 246, л. 14

^① 查不到这个缩略语所表示的内容，此处为音译，大概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名称。——编注

№25947

潘友新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表达对斯大林病情的深切慰问

（1953年3月4日）

摘自 A. C. 潘友新的工作日记

1953年3月31日

第290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会 谈 纪 要

今天，3月4日23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高岗同志访问了大使馆。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的病情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部长会议表达了深切的慰问。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表示，相信苏联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将在这段艰难的日子表现出伟大的团结一致和警惕性，这完全被视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应当这样”。

毛泽东表示，真诚地祝愿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尽快康复。

他说，刘少奇和陈云现在正在医院，因此无法同他们一起前来使馆。

A. 潘友新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6, п. 362, д. 12, л. 32

№24869

瓦西里耶夫访华报告：中国的医疗工业状况

（1953年3月7日）

引言。

对医疗工业总的看法。由于向中国派遣专家这些问题包含了工业的组织问题，因此，必

须指出中国医疗工业的总的状况。医疗卫生问题,其中包括医疗工业问题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根据中国现有的状况,特别是由于继续抵抗美国的侵略,并向朝鲜提供帮助,药剂和医疗器械的生产是国家机关关切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怎样增加生产,也包括进行新的建设。在现有的设备条件下,国有工厂、地方所属工厂和私有企业进行的药剂的生产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对药剂的需求,进口花费了大量的外币,特别是为了购买一些新的和其他的一些有效的治疗制剂,这些制剂在国内是不能生产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轻工业建设领域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设一些新的化工和药学工厂,并扩大现有的生产。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五年计划的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工业建设,对医疗工业建设的拨款在中央人民政府在轻工业领域的拨款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根据1952—1957年的五年计划,为了保证所有医疗工业项目的建设,拨款的总数量为人民币13 800亿元。在合成药剂的生产方面,预计1957年将生产800吨磺胺类合剂、500吨阿司匹林、100多吨非那西丁、15吨氯霉素,打算生产大量的对氨基水杨酸。

在国内的原料能够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力量应该能够完成这些生产。为了满足对葡萄糖和淀粉的需要,同时为了纺织业生产的需要,计划建设一座谷物加工厂,这可以利用一些废料——谷物提取物,这是国内现在所缺乏的,为青霉素和链霉素厂的生产提供保证。在抗生药物的生产方面计划建造一些生产青霉素的工厂,使其在1956—1957年形成为12万亿剂青霉素和4 000公斤链霉素的生产能力。目前在抗菌药物的生产方面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决定在上海建设一个青霉素生产工厂,首期建设可以生产4万亿剂结晶青霉素。

现在,中国行政机构主要关注的是通过在东北的沈阳、华东的上海、北方的北京附属轻工业部的中央设计单位进行一些专业化的设计,建设和装配工厂,来组织建设。应当指出,为了完成设计工作,在中国,今年有大量的干部和专家被吸引到了医疗工业企业的设计和建设工作中。上海政府根据我们的建议在1952年7月组建了特别的设计组,该设计组有30多名专家,从事对上海青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的工作。

在中央轻工业部,1952年底有各种小组在进行工作,其中在投资建设局就有73人以上,有造纸和制糖工业的工程师、大量的设计工人和实习工人。尽管在设计 and 建设的组织工作中存在大量不足,有经验的中国专家在领队专家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下,以自己的力量可完成现在正在建设的青霉素工厂的设计工作。但是,为了对今后需要建设的青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特别是为了对链霉素工厂进行设计,目前中国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完全熟悉这些生产的干部,无论是在生产工艺还是在设备和生产的组织方面。因为中国青霉素工艺的生产经验有限,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进行试验生产的规模不大,较为妥当的是把现在的状况看作是组织本国青霉素生产的初级阶段。根据五年计划,随着这一建设计划的完成,预计会广泛进行一些生产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大型工厂的建设。必须大规模地进行生产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建设,这一点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中得到了承认,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民族干部被吸引到了这一工作中,扩大了在上海进行的试验生产,也加强了研究工作。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首批大型建设项目之一,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

中央华东局都对国有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发展非常重视。

抗生素药剂（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需要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医疗卫生部的材料，可以得到一些不太完整的、关于可以获得免费医疗帮助的中国居民的数量信息。根据这些不太完整的材料有 50 万居民可以获得医疗帮助。在 1952 年，预计每千人拥有 2.5 张病床，在五年计划中这一数据应该增加两倍。

五年计划中规定扩大对居民的医疗帮助，这使得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抗菌药剂生产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通过对目前的状况进行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居民肺结核患病率最近非常高，特别是在城市居民中，在上海，肺结核的患病率达到了 5%。如果把中国城市居民的数量看作 4 000 万人，那么肺结核患者的数量大约为 200 万人。这就需要链霉素，如果把链霉素看作是治疗肺结核的主要药剂，那么事实上在近几十年对该药剂的需求是无限的，因为每年大规模组织生产 20 吨链霉素就能满足中国对链霉素的需求。实际上，如果说，1952 年以各种形式获得医疗帮助的肺结核患者的数量为 10 万人，那么就可以确定对链霉素的最低需求为 4 吨。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必须计划每年至少生产 4 吨链霉素，每年链霉素的生产能达到 6 吨就更好了。

为了确定对青霉素的需要就必须注意享受免费医疗的居民的总数，因为青霉素是公认的广泛用于内科病治疗的药剂。根据现行的 1952 年的法律规定，能够享受免费医疗的是如下人群：人民解放军、工人、教师、主要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大概不少于 1 000 万人。因此，考虑到目前对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规模，对青霉素的最低的需求为 4 万亿—6 万亿剂结晶青霉素。

在最近几个五年对居民医疗帮助的增长计划中，最低需求 6 万亿剂青霉素的需求，这一数据应该增加 2 倍，因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和职员的数量在 1952 年为 1 500 万人。最近几年，对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规模将会随着从事大型水利工程生产和建设工人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每年青霉素的生产至少应为 12 万亿剂。

依据 1951 年的进口数据对中国目前对青霉素和链霉素的需求进行确定的时候，最少的需求还要稍多一些，并且对链霉素的需求为 4 000 公斤。1951 年进口这两种药剂的开支为 3 千亿元，或者说，换算成苏联货币为每年 4 500 万卢布；这一数目相当于投资一所现代的青霉素工厂。上述所述使得我们可以指出，对于现在的建设是，首批建设项目每年的生产数量应为 4 万亿剂青霉素和 4 000 公斤链霉素，因此，这些数据是最近两年投资建设计划的基础。在五年计划的投资建设计划中，这些数据得到了增加，其中青霉素增加了 4 倍。经过对具体的计划和建设项目的清单进行研究之后，将会确定对五年计划的拨款。预计在五年计划的草案中，青霉素的生产将达到 16 万亿剂；除了这一总计划之外，为了解决主要的问题，政府将批准在上海建设一个青霉素工厂，其首批生产的青霉素可以使得在 1954 年终止对青霉素的进口。

现在的中国居民达到 4.75 亿人，其中农业居民为 4.28 亿人，医药生产将会得到发展，其中青霉素、链霉素和其他一些有效制剂的发展事实上是没有限制的。当前，工业建设的能

力以及向国内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的发展,是对实际需求量进行具体确定的基础,这些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指了出来。

目前青霉素的生产状况。现在的上海青霉素工厂是最大的进行实验性生产的工厂,其设备是美国人在 1948 年提供的。在这些设备中应当指出如下一些:4 套英格索尔型空气压缩机,功率为 15 立方米每秒;2 套维尔京顿型压缩机。只有部分空气压缩机得到了使用,只有 2 台英格索尔型空气压缩机在工作,剩余的设备将用于扩大实验性生产,而部分设备则应当用于进行新的生产。约克型冷冻机 4 台,其中被使用的 2 台的生产能力为每昼夜生产 15 吨冰(这是美国人计量冷冻的方法)。由于立式锅炉的容量不大(有效生产),最近这些锅炉将会替换成由上海蒸汽锅炉制造的生产能力为每小时 1 吨蒸汽的锅炉。发酵部配备的设备是在 1952 年之前配备 4 台容量为 200 美国加仑的机床以及其他相应的设备。上述 4 台机床中,2 台依靠自己的力量被装配到青霉素工厂,其中的一台由普通的钢材制造,其覆盖面为一层薄薄的不锈钢片。另一台机器带有拌合器,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改变速度,除了有涡轮型的用以改善通风状况之外,发酵器还附带了瓦利多夫型通风设备,该设备的烟囱是不锈钢的,并被牢固地竖立起来。这一机床的详细图纸没有提供,设备也不是标准的,而是从现有的工厂中搜寻到的。总的来说,该设备是用来试验的,以便对搅拌和通风设备的图纸进行研究,至于用来试验的现有设备具体而详细的图纸不应该被当做是标准的指数。1952 年底,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工程师和工人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之外,在 3 个月的时间内,以自己的力量安装了 2 台容量为 1 500 加仑的发酵器,每台发酵器重 5 吨,这 2 台机器是在市场上购买的,是用各类进口的普通钢材制作的。设备是根据原生产图纸制作的,图纸非常详细,搅拌器和减速器的驱动装置除外,因为它们都是从现有的设备中安装的。使这两台设备都装备有开放性的涡轮搅拌器,并且使搅拌器驱动装置的速度为每分钟 240 转到 360 转,这一点还没有最终解决,因此,作为搅拌器的一个组成设备,它没能使搅拌器达到有更大容量的标准条件。

为了保证消毒条件的实施以及发酵器旋管结构的冷却,设置了 3—4 个独立的热交换器。这使得可以更好地调解规程,减少蒸汽和水分的消耗。监督测量设备被集中起来,这一设备是美国生产的,可以根据参数的大小、水分的消耗和压力、蒸汽的消耗和压力、气压、空气的消耗和压力对发酵的过程进行管理,可以自动调节温度,但不能自动消除泡沫,对发酵器的管理以及管理过程的调节由看守仪器的值班人员手工完成。为了对监督和测量仪器进行维修和检查,设立了一个不大的实验室以及一名工程师专家。然后应该指出的是,工厂的供水由两口井来保障,每分钟可以供应 700 加仑的水;来自城市电网的电力保障以及排水设施可以对现有的生产提供保障,并可以扩大生产。

现有的空气渗透程序以及对其进行消毒的工作计划是复杂的:首先,在机械除油净化之后,空气被急剧冷却,除去多余的水分,然后把它放入一个内含普通棉花的总过滤器内进行消毒,然后通过工业棉花过滤器进入发酵器内。其次,在通过棉花进行过滤的时候都要从一个方向经过一层棉花,这就导致在压缩空气的时候造成大量的损失,由此压缩机内被压缩的空气的程度会自动提高,这会增加工厂的电力消耗。

培养液的过滤是根据一般的工作计划来完成的，采用真空鼓过滤器，还有1台生产能力为每小时2吨的仪器；被过滤的培养液被保存在一些涂上了搪瓷釉的钢制罐子里，每个罐子的容量为2000升（美国设备）。过滤器靠2台泵和真空鼓来提供保障，每台泵的功率为每分钟7立方米。

提取处装备有2台拉瓦尔型圆盘式分离器，1台沙尔泊列克斯型圆盘形分离器，以及6台沙尔泊列克斯型筒状离心机。由于发酵器的容量不大，这台设备不经常使用，因此，预计要扩大发酵车间的规模，以便能够充分利用车间的装备提取青霉素。青霉素的分离和青霉素的结晶是在车间的实验室的玻璃容器内手工完成的。晾干设备由两个进行青霉素晾干的基瓦因（Дивайн）烘箱组成，该设备从工厂被拆下来运往北京，来保障北京细菌学研究所的生产，该研究所生产改造的疫苗。上海青霉素厂只生产结晶青霉素，它通过普通途径在烘干箱内晾干。

目前在上海进行的青霉素生产建设项目已经在8个月内完成了，装配工作持续了13个月，也就是整个生产的准备阶段恰好是上海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的2年新生活时期。上海青霉素厂现在被称为第三实验性制药厂，在延安西路第1036号以前的维修汽车的厂房里，位于上海西部，以前是欧洲人租借地的一部分，现在的厂房是一层的生产车间，周围是居住区，空地非常狭小，工厂没有扩张或者进行新的建设的可能。生产面积为2500平方米，可以扩大到3000平方米。根据工厂所在地区的城市建设规划，禁止进行工业建设，因为该地区主要是生活区，因此今后不存在在现有的场地进行新的建设的可能。但是，这种状况不排除通过购买已有的地块组建实验基地来扩大实验性生产的可能。另外一些优势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该厂靠近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轻工业部上海研究中心，这就使得该厂今后便于利用附近的科技图书馆和实验室。在对现状进行讨论后，中国政府通过了计划，建议根据第一期青霉素的生产经验扩大生产，并在第二阶段对链霉素的生产进行研究。

这一计划得到了执行，购买了一些空地和新的建筑，作为进行研究和工厂试验的场所。同时，在工厂的生产车间中组建了仪表实验室来收集和计算数据，以便确定生产工艺的指标，这些都是设计新的建设项目所必需的。工厂的专家小组根据制定的生产议程在该实验室进行工作，这是设计新的青霉素工厂所必需的。工厂的专家小组的这些努力所取得的进展是，1952年试验性生产工作明显加强了，北京生科院的研究小组也被吸引到该工厂的这项工作中，并成立了一个不大的生产试验室来对链霉素的生产进行研究。现在的上海青霉素厂是实验性的，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研究，为今后更大规模的生产积累经验。该厂的生产不超过目前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的1%—2%，对满足国内对青霉素的需求的作用不大，但是该厂的生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里可以培训干部，可以为在上海设计大型的青霉素生产项目提供准备。

中国青霉素工艺生产的计划。尽管拥有一年的生产经验，上海青霉素生产还没有完整的技术资料，原料的挑选和使用量尚不清楚，缺乏生产仪器及其辅助仪表的工作指数。这种

状况加剧了设计工作的难度。1952年6—12月,该工厂按照生产工艺规划完成了必要的工作。在我们的报告中将根据上海青霉素实验性工厂生产200加仑的发酵器生产工艺列举一些材料。应该指出,上海青霉素的生产尚处于初级阶段。在短短的一年的工作时间内不可能研究出新的生产方法,或者进一步完善设备,然而在特殊的国内原料的条件下,有可能制定出利用国内原料生产青霉素的新的计划,上海青霉素制造厂主要根据美英遗留的资产、文献,采用的主要是在国外所描述的哪些生产方法,但对中国的专家来说,非常明显,所获得的材料已经过时,这些文献资料不符合当地具体的生产条件。

因此,在上海青霉素厂进行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些材料的检验,以便利用这些材料,利用国内的原料进行生产;这些工作的结果是制定了自己的新的生产计划。

青霉素的生产用的是来自美国的青霉素菌种激活体,但是它不局限于一定的菌种,使用的是Q-176青霉菌—黄霉素菌种和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第701号、第133号无色素菌种。没有对菌种展开评价工作,但在进行生产的时候对播种材料(种子)进行了一些挑选和选择。除了一般的文献之外,威斯康星大学的报告中对这些菌种都有描述,威斯康星大学的这些报告附在该报告的后面并转交给全苏抗生素研究所。

在看完工厂的材料之后,可以指出如下几点:在这些菌种中,其中包括在第701号菌种中,可以发现,在多次添加苯醋酸、在精选乳糖玉米的工艺中进行配种时,青霉素的含量提高了,第133号菌种也有这些特点。但是由于不正确的栽培方法和保存方法,菌种的这种良好的性能很快就消失了,工厂使用的是Q-176菌种,认为该菌种在栽培和保存的时候比较稳定。工厂的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没有采用正确的保存播种菌种方法的情况下菌种的可变性。工厂在栽培菌种的时候采用了琼脂化的环境,没有使用在植物培养基中采用玉米激活体的方法,随后对其烘干的经验。

在多种情况下,上述菌种在精选的乳糖玉米条件下置入200加仑的容器中,并在多次加入苯醋酸的情况下可以生产出活性为每毫升1400—1700单位青霉素的溶液。在采用棉花的情况下,第133号菌种生产的青霉素的结果要比Q-176和第701号菌种在同样条件下生产出的青霉素情况要差一些。为了培养菌种,需要琼脂化的莫伊尔琼脂以及其他组成成分相似的条件,包括糖浆、甘油、玉米提取物。其中,对于第133号菌种来说要采用如下配置:6%的蜜,1%的蛋白胨,2.5%—4%的琼脂。

由于中国缺少国产的玉米提取物和乳糖,生产原料要依赖进口。为了替代玉米提取物采用了发酵的棉籽饼原料。因此,1952年工厂主要采用了如下发酵配置:1. 葡萄糖0.5%—1%,乳糖2%—3%,玉米提取物(根据晾干的重量)2%—4%,碳酸钙0.3%—0.5%,七水合硫酸镁0.1%,酸碱度5.5;2. 葡萄糖0.5%—1%,乳糖2.3%,棉籽饼3%—5%,碳酸钠0.3%—0.35%,碳酸钙0.3%—0.5%,七水合硫酸镁0.1%,酸碱度3.8—4.0。

酵母繁殖器内培养播种材料的液体配置成分为:1. 葡萄糖4%,玉米提取物2%,碳酸钙0.3%,酸碱度5.2;2. 葡萄糖4%,碳酸钙0.3%,棉籽饼2%—3%,蜜0.3%,酸碱度3.8—4.0。为了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纯玉米激活体对青霉素进行生物合成,在播种物质的培

养过程中采用了三个阶段：在孢子的环境中生长，然后在第二阶段得到播种微孢，随后把其放入 20 升的酵母繁殖器，然后再把其放入 75—100 升的酵母繁殖器内。这种工艺是复杂的，因此在工厂培植孢子，而微孢的培植需要两个阶段，但从原则上来说它的培植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在无菌的环境中从玻璃瓶子中夹住悬浮的孢子，把其放入酵母繁殖器内。

青霉素生产所需要的发酵的棉籽饼要从得到的、适合最优地采集青霉素的原料中进行挑选，这种原料可以用来提取和清洗青霉素。在中国，1951—1952 年两年的时间里，北京和上海的各实验室获得可靠的证据，证明可以采用棉籽饼的粉末作为生物合成青霉素发酵工艺的成分。但是还需要在生产中进一步对这些从实验室中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用棉籽饼粉末取代玉米提取物的可能性。这项工作于 1952 年在工厂完成了，并得到了肯定的结论，这为在上海建立新的生产青霉素的工厂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在玉米提取物的工艺中，还是在棉籽饼的工艺中，都要多次添加苯醋酸，并把乳糖的含量增加到 2%—3%，溶液中青霉素的含量从来都没有低于每升 1 000 个单位，在多次发酵的情况下，溶液的活性可以达到 1 300—1 400 单位的青霉素。但是，由于棉籽饼工艺中的生产能力相对于玉米提取物要小，因此生产出结晶的干燥的联苯酰青霉素就要比在玉米提取物工艺中生产出的青霉素少 25%。由于近年没有可能得到玉米提取物以生产干燥的青霉素，商业制剂的活性为重每升 1 400 单位的青霉素，在这种情况下每升可以得到 1 550—1 600 单位的纯净的制剂。但是在进行两个阶段的结晶的情况下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至于从棉籽饼工艺下得到的青霉素的质量，联苯酰青霉素的含量相当于从玉米提取物中得到的青霉素的含量。同时，对采用棉籽饼进行的研究不妨碍利用玉米残渣或者利用麸皮进行研究，麸皮在中国个别地区的一些小作坊，在加工玉米、生产玉米面的时候都可以得到。综上所述，棉籽饼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原料，在中国的各地区都是供之不竭的；经过调查证明，可以使用预先水解了的弱酸或者水解了的发酵的细霉菌水稻曲霉来代替棉籽饼粉末，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加工方法的效能是：青霉素增产不多。用酸来水解比事先用棉籽饼来加工也并无经济上的优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棉籽饼粉末是生产青霉素最为适合的一种原料。

出于研究的目的，尝试着利用移除丝线后得到的产卵废弃物作为生成青霉素的有机环境。在这些缫丝生产的废弃物中有一些氨基酸可以被利用，利用的途径是在移除丝线之后，收集蛆虫的废弃物。利用这种原料来生产青霉素在实践上尚无可能。由于国内有大量的食用的淀粉、纺织工厂和制药厂，可很好地利用棉籽饼，但工厂和部级的中国行政部门都承认，生产青霉素较为有效的原料是玉米提取物——生产玉米面过程中得到的残渣，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计划指出，到 1957 年底中国将着手建设加工玉米面和玉米葡萄糖的联合加工厂。

在生产青霉素所必需的碳水化合物中，除了葡萄糖之外，还可以使用 1% 的各种糊精；在试验过程中充分利用糊精的工作都已做完。还认为必须使用乳糖，因为还没有找到其或与其有同等价值的替代物，而现在使用的乳糖是进口的。一小部分乳糖可以在国内得到，其中包括，

1953年可以从海拉尔(内蒙古)得到55吨国产乳糖。在合成工艺中生产青霉素的方法在中国是没有前景的,这是由于缺乏大量的醋酸生产,此外还缺乏乳酸。在200加仑的棉籽饼粉末发酵器内进行的实验进展顺利,这一试验解决了近期向青霉素的生产提供原料保障的任务,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能够购买到的乳糖的机会不是没有的。

进行生物合成青霉素的生产计划和工艺流程正在全力制定,以便进行实验性生产,但是上海厂现有的计划需要被简化,需要撤掉一些生产线。需要定期进行消毒,而且,为了保证消毒,需要在摄氏120度的环境内持续30分钟。糖、盐水溶液以及碱和蜜的有机成分都需要在一个不大的设备内单独进行消毒。此外如果认为必要的话,还需要对泡沫灭火器、(苯醋酸)的前身进行消毒,这样就会使生产线的环节大增,难以管理,这在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在对新的生产线建设计划进行选择的时候,就完善发酵工艺仪器的生产计划形成了一些设想。

同时提请中国专家注意,必须研制出更为合理的发酵工艺来更好地获取青霉素,缩短流程,保证酸碱度环境的良性转变,但在发生酸化的情况下不必增加碱。根据已掌握的数据,发酵持续的过程为90—92个小时,在个别情况下少于90个小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采用的工艺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增加了。在棉籽饼的主要环境中,在大的设备内生物合成青霉素的最长时间为70小时,此外,在这一环境中会产生少许泡沫,由于这些泡沫,混合的程度就更加充分。工厂的泡沫灭火器使用的主要是芝麻油和豆油,尽管认为今后需要转而使用其他更加有效的灭火手段。现有的生产流程内,在对营养液进行消毒工作的准备时会受到感染的警告,其中包括在120摄氏度的温度下对油进行30分钟的消毒是不够的,而在个别的情况下对生产环境和生产线进行的消毒是不够的。

因此,提请中国管理部门注意,对进行消毒的工作指示和规程要作认真的研究,其中已经指出,对油的消毒增加到3—4个小时,由于油的传热性不够,可能会使油更加热,会增加使工艺失去效力的可能性。所作的另一项调查是关于搅拌和通风的问题,工厂现有的经验已得出结论:必须采用瓦利多夫型设备。排烟囱应被安置在带有各种搅拌机的200加仑和1500加仑的设备上。

尽管1952年工厂的工作条件是不同的,对采用瓦利多夫型通风方法进行了相互比较,认为采用瓦利多夫装备是合理的,它可以节省20%的空气的消耗,搅拌使用的电力增加也不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改善青霉素生产的目。用于搅拌所需的电力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在生物合成的过程中减少了空气耗费,缩短了生产过程。

由于在没有瓦利多夫型装置的普通发酵期内进行搅拌存在重大的不足,认为应该寻找方法,通过安置排烟囱来改善搅拌工作,尽管这一装置不完全符合所提出的任务。

在通风方面以及在大的整个设备内进行溶液搅拌方面,加强规章制度的工作仍然是不明确的。从所述的材料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在工厂生物合成青霉素的规章制度还没有被完全制定出来,但是这种状况不能妨碍必要的工艺生产规章的制定,相反,已经提请中国的行政部门注意,必须就生产的各阶段拟定技术文件,以便利用这些材

料对新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根据工厂在 1952 年现有的工作经验，在考虑到各种损失的情况下，在棉籽饼工艺的基础上得到培养液中每 1 升有 1 000 单位的青霉素；这一数据可以被用来作为在材料中计算生产的最终的结果。用微生物的方法、用碘量滴定法、用在瓦特曼第 1 号过滤纸上进行色层分析法的方法完成了对青霉素的活性进行确定的分析。

根据用过滤纸分析的方法得到的数据，联苯酰青霉素在培养液中的含量的总活性在 60%—85% 之间摇摆，也就是说，这保证了在培养液中青霉素含量的标准的技术指数。

必须特别指出，定期多次添加苯醋酸——联苯酰青霉素的前身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指出，必须使用机器生产出严格符合标准规格的装青霉素的小瓶，这可以使新的上海青霉素工厂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实现分装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对小瓶进行包装的机械化。

在对上海青霉素生产的工艺图纸进行审视的时候，应当指出，现有的进行实验性生产的技术资料可作为设计新的建设项目的基础，因为可以认为，生产工艺中的主要内容已经清晰。关于原料的选择、结晶阶段设备的安装、在挑选国内不能生产的工艺设备及其辅助设备中的困难，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不会成为实现对新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的障碍。制定技术方案时提出高度的要求，对个别设备的结构进行仔细的检查，根据设计图不间断地组织生产，所有这些，中国专家通过对不断加强的、现有的上海实验性生产的合理成分进行研究和设计，以自己的力量都可以完成。

中国专家的主要困难是，缺乏对整套实验性生产进行正确组织的经验和设计工作的经验，但这一困难会被逐步克服；1952 年下半年通过建立上海青霉素工厂建设筹备管理处再次完成了这些组织工作。

1952 年期间，上海青霉素工厂生产了 400 亿剂青霉素，卖出了 20 万小瓶的结晶青霉素，这些青霉素的质量与进口的最优质的青霉素的质量相当。这些成果可以被看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进行国产青霉素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国产青霉素加工的不足，在上海进行的实验性生产的规模不大，面对这种状况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利用现有的实验性生产经验以及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工人和干部，加快在该厂进行新的建设。

扩大青霉素生产问题以及进行新的建设的任务。中国政府关于扩大上海青霉素生产的初步计划的基础是利用实验工厂的设备和生产场所，并提出了如下的增长要素。根据这一计划，打算从 1950 年 5 月至 1952 年的第一阶段安装 2 台机床，每台机床容量为 750 公升，每月生产 1.2 万瓶干燥的青霉素、每瓶 20 万个单位。预计从 1952 年 2 月至 1954 年 2 月的第二阶段再安装 4 台机床，每台机床的容量为 5 000 公升，每月生产 14 万瓶干燥的青霉素。

预计在 1954 年 2 月至 1955 年 2 月的第三阶段再增加 4 台机床，每台机床的容量为 5 000 公升，至 1954 年底每月生产 75 万瓶青霉素，工厂年生产能力达到 18 000 亿剂干燥的结晶青霉素。根据这一计划，所有的设备，主要是机床都应当在国内生产，因为提取青霉素的压缩工作以及安置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设备需要大量的进口材料。根据这一计划，在上海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建设的总投资预计为 600 亿元，生产出商品 1 150 亿元，或者 500 万美元。

根据对上海青霉素生产工作进行的调查,中国政府关于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初步计划是不充分的,因为现有的生产装备被视为已达到了其扩大生产的极限。实际上合理的生产计划是扩大生产不是达到 900 万瓶,而是该厂的年生产能力不少于 2 000 万瓶。

现有的实验性生产工厂不能被认为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计划的最佳生产场所,因此必须进行新的建设,使得扩大生产要不少于第一期建设产出的 2 倍或者 3 倍(定为 2 000 万瓶),或者生产 4 万亿单位干燥的青霉素。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卫生部的请求,在中国中央轻工业部行政机构的参与下制定了扩大青霉素生产的基本建设计划。

鉴于中国目前的局势,要求加快第一批青霉素工厂的建设,以便停止进口,可以考虑在上海新建一座青霉素工厂,并利用现有的被华东医疗工业管理局长期租赁的前英国啤酒厂的建筑。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前啤酒厂的这些建筑完全适合作为青霉素工厂的生产场所。两栋多层大楼的有效面积不少于 1 万平方米,有两台蒸汽炉和一座变压站,能够保障工厂的电力供应,这就降低了厂房建设、装修的大量开支,而扩大用电业务的长期开支也会不大,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况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出技术方案,并选择技术设备,在 18 个月之内完成所有的生产组织工作。

根据新的扩大方案,可以使其组织者花费最少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在 1953—1954 年的第一期建设中生产 4 万多亿剂青霉素,而且以后的生产还可以增加到 12 万亿剂青霉素。预计在上海进行的建设可以完成最初提出的关于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投入让国产青霉素保障国内需要的任务,这将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节省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还可用于进口青霉素这类药剂。

在同中国专家一起研究了生产技术资料的时候,扩大上海青霉素工厂生产的新方案得到了赞同,随后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轻工业部的批准。他们承认如下的投资建设计划是比较合理的:

1. 在上海建立成套的青霉素生产体系,生产各类青霉素,其中主要应该是小瓶装的结晶青霉素。第一期建设预计在 1954—1955 年生产 20 万小瓶青霉素,每瓶 2 000 毫克。

2. 上海将扩大现有工厂进行的青霉素实验性生产,按照工厂管理部门的最初计划,1954 年逐步更换工厂的设备,以便生产链霉素,1953 年组建一些新的车间,研究链霉素的试验性生产。

3. 在审议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方案的时候,建议在 1953—1957 年的五年计划中规定生产 16 万亿剂的青霉素和 4 000 公斤的链霉素。由于缺乏国产的谷物提取物,预计在五年计划末期建造一座把谷物加工成淀粉和葡萄糖的工厂,以生产必要的谷物提取物,保证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生产。

在有可能利用苏联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五年计划提出的在中国组织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任务,毫无疑问将会完成。

目前在上海进行的青霉素的生产可以成为为新的建设培训干部的学校,该工厂的工人

将能系统地完善技术生产,同时,他们积累的经验将会被利用起来,完成建设新的青霉素工厂的技术方案的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链霉素的生产方面,提出新的建设任务需要在苏联的援助下完成,因为中国在生产链霉素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1952年12月底,投资建设计划被附属国家行政委员会的财经委员会批准,并准备在1953年进行投资和建设。事先决定向上海青霉素工厂第一期新的建设拨付必要的资金。单个的建设项目应该提出必要的财政预算文件 and 设计任务,并应当被总的五年计划批准。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工厂的建设地点尚未确定。把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生产场所放在一起的可能性还没有提出来,因为缺乏生产链霉素的技术材料。

中国在抗生素生产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问题。由于在中国进行国产的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的生产已经得到国家在发展医药生产领域的计划的认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进行科研工作,以便对这些药物的生产提供帮助。中国专家们在这类问题上面临的任务已经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有80多名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来自沈阳、北京、南京和上海。在全体会议上听取了轻工业部副部长、华东卫生局局长和中央药品管理部官员们的报告。会议分为三部分:关于化学问题、关于生物问题、关于医疗问题,会议审议了对青霉素、链霉素和氯霉素的生产和应用进行研究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制定总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对链霉素和金霉素进行研究。会议对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视,并制定了详细的建议,提交各部审议,也就抗生素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任务和课题计划向科学院院长提出了建议。

为了以技术帮助来保证必要的建设,在组织生产的同时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链霉素的生产问题进行研究,该委员会中有工厂工人、上海化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化学药物科研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根据会议的总的计划,在各部门和研究所之间分配了任务,在研究的问题中首先是那些比较有前景的和有效的医疗抗生素制剂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决议,扩大了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研究工作,工厂的工人们对工作计划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对各问题进行研究的计划。为了扩大工厂链霉素生产的试验工作,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实验室,来研究链霉素的生产。1952年11月就抗生素问题召开的会议取得的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确定了各研究所、生产单位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

根据这一方向,在上海,来自如下机构的专家就抗生素问题展开了工作。上海轻工业部的科学研究所成立了发酵工艺实验室,研究获取柠檬酸和青霉素的技术问题。科学院上海分院做了大量的工作,生理生长研究所和植物学研究所被指定就金霉素问题开展研究。

化学发酵科学实验室完成了在获取纯盐阶段对青霉素进行化学清洗的工作,并对抗生素的合成方法,其中包括对氯霉素的合成方法进行了研究。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及轻工业部化学研究所应当成立一些新的小组,对医疗化学试剂进行研究,也就是对抗生素的化学合成进行研究,建议扩大早先已经完成的对单一的桔霉素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方向。

在工作计划中特别关注在生产中推广青霉素和氯霉素的化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其生产所进行监督。在沈阳,应当扩大对通过合成途径得到的氯霉素异构体混合剂的分离工作进行

的研究。

在北京医药科学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下设有两个不大的从事生物和化学抗生素研究的实验室,主要对青霉素和氯霉素进行研究。

1952年中国各单位的科研工作局限于制定一些小规模的计划,事先进行研究,主要是对青霉素的研究,对氯霉素的研究少一些。共计有30名专家参与了这一工作。今后,当关于抗生素问题的决议实现之后,或许可以期待就各类生物问题和化学工艺问题作有计划的研究会得到发展,可以期待找到国内的原料,并完善获取青霉素、氯霉素、链霉素和橘霉素的工业方法。

在上海会议上,中国专家了解了苏联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苏联在抗生素方面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根据得到的苏联在最近5年出版的总的文献、根据卡什金在1952年出版的《抗生素及其实际应用》一书中对一些关于抗生素的医疗应用问题进行讨论,把伊姆舍涅茨基关于微生物变异性问题的文章翻译出来。

会议的报告指出,对关于抗生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研究只有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其中包括同医疗卫生事业和医药工业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会富有成效。

中国专家通过医疗卫生部以公函的形式向苏联提出了在链霉素的生产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以及提供关于苏联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标准。在1953年1月医疗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对青霉素、链霉素进行微生物分析以及对中国生产的制剂,其中包括青霉素和链霉素、从国外进口的制剂质量进行生物检查的工作指示和方法。

对进口的药物作分析是在贸易部设在天津的实验室内进行的以及设在北京的对药剂进行监督的实验室内进行的。

正在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药典准备有关青霉素的词条。在医疗中广泛推广最新的药剂,其中包括青霉素和链霉素,它们的重要性在1952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医疗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医学工作者会议上得到了承认。

在北京和上海的医药研究机构把对国产青霉素的医学评估纳入到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广泛的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在正确利用医疗部门和工业部门旧的专家方面,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方面,了解苏联的科学经验和医疗体系并加以借鉴起到了重大作用。工厂厂长注意到了对工业中的科研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根据苏联专家在化学药物厂和医疗器械厂厂长会议上作的报告,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技术检查,并在工厂开设实验室。特别应指出的是,近来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越来越注意通过研究先进的苏联工艺和苏联医疗工业经验来完善自己的生产技术。

为了推进技术流程,完善技术资料,一些工厂制订了生产规章。为了医药化学工业企业和青霉素工厂培养大量的具有中等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专家,使其担任车间主任的助手、技师和段长,通过对现有的一所普通的药学校进行改造,在华东的上海组建了一所新的技术学校。根据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决议,在制定这所新技校的教学计划中,需要有统一的组织结构

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该技校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还为上海新的、进行青霉素试验性生产的工厂以及新的建设项目培养业务干部。

应当指出，事先进行的一些研究，确定国内生产青霉素的原料、物资和设备，可以使上海的专家小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今后在上海投产新的青霉素生产的保障问题。其中包括，在29种原料中有19种需要进口，但是通过对在上海相近的一些生产进行的研究，有可能把进口的原料缩减到1—2种。这就使得设计时能够更加准确地确定新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指数。

结论。

1. 目前上海青霉素工厂的状况使得可以利用实验性生产的经验，用于在上海进行新的计划 and 建设，把以前拆除的啤酒厂的建筑作为生产场所。第一期计划的生产能力是在1954年生产出4万亿剂青霉素。制定出上述建设的规划和设计任务，在1953年上半年将制定出新的建设技术方案。在上海医疗卫生事业管理局下，设专业的设计小组以及上海青霉素工厂建设筹备管理处。

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生素生产进行的研究任务和课题要事先确定。扩大在上海青霉素工厂的实验性工作，组建试验生产链霉素的车间。制定出在棉花中合成青霉素的最优程序。绘制生产青霉素的工艺图纸。

3. 专家在出差的工作总结中可以指出，在青霉素生产方面，中国政府正确地解决了准备时期的主要任务。所获得的组织青霉素生产的经验可以使得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利用国内的原料、物资和设备完成上海青霉素工厂的设计。在所需设备中必须进口提取青霉素的设备，其中包括分离器或者离心机，其余的技术设备可以在国内生产。由于在所需原料中无法获得乳糖以满足青霉素的生产，故而在生产的最初几年， $\frac{3}{4}$ 至 $\frac{1}{2}$ 的乳糖将需要进口。

有必要进口用来检验和测量青霉素生产的设备。

对局势和现有状况进行仔细考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领导人认为，可以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无论是青霉素和链霉素生产的工艺设计方面，还是在组织建设问题方面（通过向中国供应其所缺乏的工艺设备和物资），来完成大量建设新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工厂的新阶段的任务。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进行新的生产建设，特别是链霉素的生产，在此方面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根据提出的五年计划发展医疗工业的任务正确地组织所有的设计工作和建设工作。

化学副教授、全苏抗生素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Г. М. 瓦西里耶夫

1953年3月7日

№12245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交的备要 报告：联合国与朝鲜问题

(1953年3月14日)

机 密
第 22 号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关于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备要报告^①

一、美国侵略朝鲜开始前的朝鲜问题

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了开罗宣言,其中指出,三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朝鲜应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这一宣言1945年7月26日被上述三国波茨坦公告所肯定。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

粉碎日本之后,根据盟军总司令的一号命令,苏联统帅部在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美国统帅部在其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领土上接受了日军的投降。这样在朝鲜形成了两个军事责任区:北朝鲜——占全国57%的领土面积,人口约1100万;南朝鲜——占全国43%的领土面积,人口1700万。

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通过了成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决定,而为了促使这一政府的成立,决定由苏美驻朝部队指挥部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被授权在有临时政府参加和吸收朝鲜各民主组织的情况下制定四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对朝鲜的5年托管条件。

由于驻朝美军指挥部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同朝鲜民主组织协商,朝鲜临时民主政府未能成立。同时莫斯科会议关于制定四国托管条件的决定也未能实施。

在破坏了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之后,美国政府企图将整个朝鲜隶属于自己,于是于1947年9月把朝鲜问题提交第二届联大会议讨论。根据美国的提案,在联大会议上,英美多数国家建议朝鲜在1948年3月31日之前举行“国民会议”选举,以便由“国民会议”成立“朝鲜国民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建议,联大成立了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包括乌克兰在内共9个成员,该委员会被赋予在整个朝鲜领土上通行的权利。该建议的目的是在朝鲜成立隶属于美国的傀儡政府。

^①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决定重新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而莫洛托夫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策划停止朝鲜战争。这个报告就是为他的计划准备的。——编注

在上述联大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反对联大讨论朝鲜问题，因为该问题是战后调节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不属于联大组织讨论的范围。在联大终于通过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后，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美国和苏联部队于1948年初同时撤出朝鲜”和“给朝鲜人民提供自己成立朝鲜民族政府的可能性”的提案。苏联的这一提案遭到了拒绝。苏联关于邀请北朝鲜和南朝鲜代表参加朝鲜问题讨论的提案也遭到拒绝。因此，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美国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乌克兰拒绝参加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1948年5月10日，南朝鲜在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了所谓的“国民会议”选举。无论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的民主人士都拒绝同委员会合作，没有参加选举。在汉城召开的“国民会议”于1948年12月宣布成立“大韩民国”。

1948年8月，拥有各阶层代表的朝鲜统一民主阵线在北、南朝鲜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选举。在北朝鲜，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占99.98%，在南朝鲜占77.52%。1948年9月成立了最高人民会议，它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高人民会议呼吁美苏政府从朝鲜撤出它们的军队。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满足这一请求并下令在1949年1月1日前从朝鲜撤出苏联军队。1948年10月，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军于1949年6月底撤出了朝鲜。

在1948年和1949年召开的第三届和第四届联大会议上，由于在讨论朝鲜问题时英美占多数，朝鲜委员会的行动得到“赞许”，并被授权为了“朝鲜的统一”而“加紧”活动，对朝鲜整个事态进程进行监督。

在上述两次联大会议上，苏联提议取消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因为它的活动违反联合国原则，妨碍南北朝鲜的统一事业。

1950年6月19日，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应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中央全会请求，决定呼吁南朝鲜“国民会议”，建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民会议”合并为统一的全朝立法机关以使朝鲜统一。该立法机关应通过宪法，建立统一的朝鲜共和国政府。然后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全朝鲜立法机关选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声明，它准备派代表团去汉城或接待南朝鲜“国民会议”代表团来平壤。

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和在其领导下准备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进攻的南朝鲜政府拒绝了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建议。

二、安理会对朝鲜问题的讨论（1950年下半年）

1950年6月25日，即南朝鲜军队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天，应美国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破坏和平并呼吁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把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外。因为拒绝了苏联关于驱逐国民党代表退出联合国和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提议，苏联当时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1950年6月27日早晨，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进入朝鲜，参与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当天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击退武装进

攻所必要的援助”。

为此,苏联政府于1950年6月29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安理会6月27日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因为该决议是在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苏联和中国缺席情况下通过的。

1950年6月27日美国呼吁苏联政府,请它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南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6月29日苏联政府给予答复,指出朝鲜发生的事件伴随着南朝鲜军队对北朝鲜边境地区的侵犯,所以这些事件的责任应由南朝鲜政权和支持它的人来负。苏联政府在答复中还指出,它奉行不允许外国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

1950年7月4日,美国政府借口安理会6月27日决议,通知苏联政府说要对朝鲜海岸实施海上封锁。苏联政府在对这一通知的答复中向美国政府声明,上述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对朝鲜采取任何措施,其中包括实施海上封锁的合法依据”。苏联政府还认为封锁朝鲜是新的侵略行为。

1950年7月7日,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提议,安理会通过了给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书——建议它们出兵朝鲜以反对朝鲜人民,这些军队交由美国任命的“联合司令部”指挥。建议美国政府任命这些军队的总司令。授予联合司令部在进行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的行动时有使用联合国旗帜的权利。苏联政府在答复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这一决议的通知时声明,这一决议作为预谋的产物,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它的目的是“利用联合国旗帜掩盖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朝鲜人民的直接侵略”。

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请求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以便在安理会范围里或其以外,“通过非正式接触,由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帮助或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和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1950年7月15日斯大林复信尼赫鲁,欢迎他的和平倡议,完全赞成他“通过安理会——必须有5国代表,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政府代表参加——调解朝鲜问题的观点”。

美国政府拒绝了尼赫鲁和平调解朝鲜冲突的建议。

1950年7月底,苏联政府通过决定:从8月1日起苏联政府重新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因为这时轮到苏联担任安理会主席。

已指示苏联代表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苏联代表于1950年8月4日提出了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同时提出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苏联代表还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后来,8月8日,苏联代表还把下述提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希望安理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及以后不再派飞机和用其他方法轰炸城市、居民点及从空中扫射朝鲜和平居民。

苏联关于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停止野蛮轰炸朝鲜城市 and 居民点的提案被安理会否定。

1950年9月联大会议开始工作。会议议事日程中列入了“朝鲜独立问题”。第一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提议邀请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讨论。这一建议遭到美英集

团的否定。委员会接受了国民党分子提出的只邀请李承晚政府代表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还提议解散非法机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还呼吁大会建议美国政府停止用飞机和其他手段轰炸城市 and 居民点以及从空中轰炸朝鲜和平居民。此外，苏联还把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恢复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在这一决议草案中建议交战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建议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从朝鲜撤走自己的军队，建议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全朝鲜选举，联合国监督委员会里应有朝鲜邻国的代表（未列举这些国家的名称）。

苏联的提案被联合国大会否定。

与此同时，大会于1950年10月7日通过决议，其中建议采取“相应步骤以保障整个朝鲜的稳定形势”。大会以此批准了“联合国军”对整个朝鲜领土的占领。在这一决议的掩护下，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挺进，直抵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

1950年10月7日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还规定成立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其组成有澳大利亚、荷兰、巴基斯坦、泰国、土耳其、芬兰和智利，想以此取代在这以前存在的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

美国部队前出到中国边境引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950年11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安理会呈递报告，其中称，“联合国军遇到了新的敌人”，“已同中共部队交火……”按照美国的要求，安理会议程上加上了“对侵略大韩民国的控诉问题”。苏联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朝鲜问题，但未被通过。安理会决定只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与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中国政府拒绝参加这一报告的讨论。

1950年11月10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把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讨论，其中指出，“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建议“所有国家和当局，尤其是对上述行动负责的国家 and 当局，应拒绝援助或鼓励北朝鲜当局，不给自己的公民、某些人士或军队提供援助北朝鲜军队的机会……”1950年11月30日，安理会否定了这一决议草案，因为苏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三、在五届联大会议上的朝鲜问题

在苏联代表恢复参加安理会工作之后，美国已不能利用安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它把朝鲜问题提到了联合国大会。

1950年12月6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代表团的坚持下，联大议程上列入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美国、英国、法国、古巴、挪威和厄瓜多尔的代表在第一委员会提出了1950年11月10日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该草案陈述部分的一句话“中共部队已展开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军队正实施军事行动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一决议草案，并于1950年12月9日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呼吁注意美军和参与侵略战争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继续武装干涉朝鲜给和平和人民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为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苏联建议：“1. 立即从朝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2. 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

第一委员会没有讨论苏联的提案。

1950年12月12日,印度代表劳以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名义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在第一个草案里建议成立以大会主席安迪让(伊朗)为首的三人小组,并责成该小组准备提案,以便为“能达成朝鲜停战协定确立基本原则”。第二个草案建议由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并授权该委员会起草“和平解决所发生问题的建议”。1950年12月14日大会通过了成立“三人小组”的提案。苏联代表团投票反对。除安迪让外,“三人小组”里还有劳和皮尔逊^①。

“三人小组”请麦克阿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朝鲜停战的条件。1951年1月11日“三人小组”向第一委员会提出了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1)“立即保证停火”;(2)“利用停火之机,继续讨论下一步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步骤”;(3)所有非朝鲜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并按照联合国的原则采取措施,“让朝鲜人民可以在自己未来政府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志”;(4)在完成这些措施之前,采取必要的保障朝鲜“行政管理的措施以维护那里的和平和安全”;(5)在签订停火协定之后,联合国大会应立即成立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组成的机构,其目的是使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代表席位问题获得调解。这些原则于1951年1月13日得到了第一委员会的赞许。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挪威提议通过了决议,其中委托第一委员会主席把上述原则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知,它是否讨论这些原则中所包括的作为远东问题调解基础的提议。

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作了答复,指出为了真正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和其他涉及亚洲的重要问题,必须:

“(一)为尽快停止朝鲜战争,有关国家的谈判应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内部事务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之协定的基础上进行。

(二)谈判日程应包括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问题以及其他涉及远东的问题。

(三)参加谈判的应是7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应在这次七国会议上确定之。”

苏联代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案。

1951年1月20日,在第一委员会上美国代表提出了决议草案,其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和当局给予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以可能的援助,拒绝“给朝鲜侵略者以任何援助”;还建议责成该委员会采取集体措施,“紧急讨论击退侵略的补充措施并向大会报告这些情况”。

1951年1月22日,在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印度代表劳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自己1月17日的通报作了如下说明:

“(一)假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原则得以通过并付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① 皮尔逊,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后任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编注

人民政府则承诺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

（二）至于朝鲜战争结束和和平调解朝鲜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分两步走：首先，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可在第一次七国会议上先就暂时停火达成协议。

第二步，为了朝鲜战争彻底停止和东亚和平有保证，所有停战条件讨论应考虑政治问题，应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必要措施；关于由朝鲜人民自己调解朝鲜内部问题的必要步骤和措施给朝鲜人民的提议；按照开罗和波茨坦宣言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军队；涉及远东的其他问题。

（三）应保证彻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于1951年1月24日提出了新的决议草案，其中建议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尽快会晤，以便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它对第一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关于朝鲜问题五项调解原则决议答复的解释。

“十二国提案”于1951年1月30日被第一委员会否定。当天，委员会通过了美国1951年1月20日提出的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未经讨论批准了这个决议草案。

在大会1951年2月1日通过的决议中，除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措施外，还规定成立由美、英、法、澳、比利时、缅甸、巴西、委内瑞拉、埃及、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和南斯拉夫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受命紧急讨论下一步措施问题。缅甸和南斯拉夫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在1951年3月8日的会议上，以前未冠名称的委员会决定自称“补充措施委员会”。

1951年5月3日，“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

1951年5月9日，美国代表向“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武器、弹药、石油等禁运的决议草案。1951年5月14日，委员会赞同美国提出的草案并把它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在第一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苏联代表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的问题属于安理会的特别职能，按照宪章第二条第二款，大会无权对这一问题做出决定。因此，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补充措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1951年5月18日，该决议草案得到大会全会的赞同，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

1951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在非法通过这一可耻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之后，联合国大会这一新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破坏，是对安理会职权的侵犯，是蓄意扩大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还指出，这一决议的通过充分证明，“联合国已完全变成了侵略战争的工具，正在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服务”。

四、朝鲜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秘书处组织的无线电

广播节目发表讲话时,在指出联合国通过了非法决定、事后批准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之后,声明如下:

“苏联人民相信,即使在现在朝鲜军事冲突的时刻,也可以调解最尖锐的问题。对此需要各方做好和平调解朝鲜问题的准备。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该开始停火谈判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的谈判。”

1951年7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拜见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请他对马立克发言中的上述引文做出解释。葛罗米柯同志回答说,谈判应在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代表为一方和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统帅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为另一方之间进行。葛罗米柯同志说,谈判应只涉及军事问题,其中包括停火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苏联政府,葛罗米柯同志说,强调的只是签订停战协定,在苏联代表马立克同志的声明中没有规定任何和平调解的其他步骤。但是,葛罗米柯同志补充说,朝鲜交战双方的事情决定着必须采取哪些措施以调解政治和领土问题(1951年6月29日给联合国秘书处的信)。

1951年6月29日,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发表广播讲话,建议在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火谈判。1951年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将军,表示同意与其会晤并进行“和平停战谈判”,建议谈判在开城地区三八线上举行。1951年7月4日美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会议直到1951年7月10日才开始进行。

前10次会议讨论谈判议事日程。1951年7月26日,通过了以下谈判日程:

“(一)通过谈判议程。

(二)为建立非军事区确立双方军事分界线,以此作为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三)制定实现朝鲜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确定停战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编成、权力和职能。

(四)关于战俘问题。

(五)给双方有关政府的建议。”

从1951年8月10日开始,按照上述议程举行了谈判,除战俘遣返问题外,达成了停战协定的所有条件。

所达成的停战条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一)军事分界线沿停战协定生效之日双方部队对峙线,即沿“为了建立非军事区双方部队各后撤两公里”的正面前沿划分(停战协定草案第1条)。

(二)军事行动应在停战协定签字12小时后停止(草案第12条)。

(三)应成立停战军事委员会,由10名资深军官组成,其中5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另外5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19条)。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谈判调解可能出现的对协定的违反问题(第24、25条)。

(四)应成立停战协定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和瑞士的代

表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36、37条）。

该委员会可成立由这些国家代表构成的监察小组（第40条）。

中立国家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履行监督职能（第41条）。

中立国家监察小组分别驻在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光州、群山。

（五）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3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60条）。

1951年12月18日，美军司令部向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递交了美军俘获的132474名俘虏名单。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向美国人递交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11559名战俘名单，其中包括3198名美军俘虏。美方指出，截至1951年12月18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士兵至少有11000人。

正如艾奇逊在1952年10月24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声明的，美军司令部手里有17万名俘虏。这些俘虏中，似乎愿意被遣返的只有8.3万人。其余的或是当地居民（37000），或似乎反对遣返。

在和平谈判中美国代表声明，只能遣返那些同意遣返的战俘。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坚决反对关于滞留一部分战俘的说法，坚决要求遣返所有战俘。

1952年6月9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信美军司令克拉克将军，要求“双方所俘获的所有外国武装人员——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都应遣返；双方所俘获的朝鲜军人——南朝鲜军人和北朝鲜军人，其出生地在敌对一方的应该遣返，其出生地在擒获其一方的，应允许直接返回故里，无需遣返”。

美国人反对这一建议。同时，他们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居民点与和平企业的空袭，想以此恫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居民，迫使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同意美军滞留大部分被美军俘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以便将来利用他们反对北朝鲜和中国。

1952年9月28日在板门店会议上美国代表提出了以下3点选择性提议：

（一）每一方手中的战俘，在非军事区商定地点验明身份之后都将被认为是“已遣返人员”。任何一名战俘，只要在验明身份时表示愿回到抓获他的一方的领土上去，都应该允许这样做，应该给他保证必要的交通工具。

所有战俘都应恢复公民生活，再不允许他们参加朝鲜的战斗行动。

验明身份，或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由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或由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某种联合组织实施。

（二）所有表示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反对遣返的，应少量分批把他们送到

非军事区,解除各方的军事监督。

然后由双方同意选择的国家的代表或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同他们进行谈话,之后允许这些战俘去他们选择的一方的领土。

如果同意,该程序可由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或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织的代表,或联合军事小组的代表,或由这些组织组成的联合组织实施。

(三)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尽快遣返。那些愿意留在抓获他们一方的战俘应分批把他们送到非军事区,并解除任何军事管制。然后允许他们去他们所选择的一方的领土,无需任何谈话、调查和审核。

这件事可在红十字会或联合军事小组监督下实施。

在1952年10月8日的会议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代表南日将军声明,美国1952年9月28日的提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它是美国人以前强行扣留战俘要求的翻版,它完全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和双方所有战俘遣返的原则。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哈里逊将军以最后通牒方式声明中止停战谈判,直到通过美国提案时为止,说完就离开了会场。

当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说停战谈判不应认为已经终止,它只是拖延一段时间,并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

五、在第六、第七届联大上的朝鲜问题

在第六届联大会议上,朝鲜问题被列入议事日程,但实际并未讨论。美英多数借口联大讨论朝鲜问题会妨碍平壤谈判和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故通过了第六次会议不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呼吁在安理会收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开联大特别会议。

苏联代表团坚持在六届联大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以便促使朝鲜停战。

在1952年10月14日开幕的第七届联大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苏联代表团建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会议参与朝鲜问题讨论。这一建议未被通过。

1952年10月24日艾奇逊在会议上发言,他以美国的观点回顾了朝鲜问题,坚持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在这次会议上,以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18个国家的名义提出了联大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指出,“赞同联合国‘代表’,即美国代表为签署公正的体面的朝鲜停战协定所作的努力”。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自愿遣返”战俘的提案。

在1952年10月29日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同志发言,陈述了朝鲜问题的历史,揭露了美国在朝鲜的侵略。他指出,美国坚持所谓的战俘自愿遣返,粗暴地违反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尤其是公约的第118条和第119条。维辛斯基把这一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其中建议成立“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吸收当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没有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应“采取调解朝鲜问题的措施,指导思想是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实现朝鲜统一”。

1952年11月3日，墨西哥代表团把一项战俘问题决议草案提交第一委员会讨论。该草案建议根据以下原则遣返战俘：

（一）对于“自愿表示要回自己出生地国家”的战俘，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应立即遣返。

（二）其余的战俘遣往愿在自己领土上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如果战俘愿意，也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就给他们提供这种遣返的机会。

在1952年11月3日委员会会议上，秘鲁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提议“成立五成员委员会，其中每一方都有1名代表。联合国大会任命2名代表，并呼吁一个未加入联合国的中立国家（指瑞士）给予合作，参加并主持该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立即投入遣返战俘的工作，同时要考虑战俘自己的意愿。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中立区受委员会保护”。委员会应尽快向联合国提出“彻底解决它保护之下的战俘命运的妥善措施，注意在愿意接收这些战俘的国家安置他们或在主管国家同意后在托管领土安置他们”。

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团对它1952年10月29日提出的决议草案提出了补充。补充里规定，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应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在第一委员会辩论朝鲜问题时，美国和美英集团其他国家的报纸上围绕印度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议论纷纷。这似乎表明，英美之间出现了分歧，因为英国赞成印度的提案，而美国反对。1952年11月17日，印度提出了只涉及部分朝鲜问题即战俘问题的决议草案。

印度的提案建议成立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代表组成的朝鲜战俘遣返委员会，将所有战俘交这一委员会管辖。在按照民族和居住地对他们进行分类后给他们提供回国的权利。在90天期限里还未归国的战俘问题，交政治会议讨论——该会议按照和平协议草案第60条^①召开。印度的决议草案还规定，遣返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要根据相互协商的原则进行任命调停人的谈判。如果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会议后3个星期时间里还未达成任命调停人的协议，这个问题则提交联合国大会”。在遣返委员会里，一切问题都根据简单多数决定。“如果形不成多数，调停人则有决定权……”

这样，印度建议交换的仅是那些“自愿”表示想回故里的战俘，实际上这是在重复美国的立场。遣返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归结为调停，就像作为朝鲜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本身那种调停一样。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印度草案中只字未提。

美国代表急忙声明他们支持印度的方案。英国代表艾登在1952年11月20日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欢迎印度的提案，把它看成是走出朝鲜僵局的“建设性一步”。

1952年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提出给讨论过的苏联代表团决议草案（作为第1条）补充以下内容：“建议朝鲜交战双方立即全面停火，即根据交战双方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草案停止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全部遣返战俘问题交苏联决议草案中规定的朝鲜问题和

^① 草案第60条规定：双方司令部应“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和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双方更高级别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编注

平调解委员会解决,在那里,问题将由 2/3 以上的委员会成员决定。”

维辛斯基同志在 1952 年 11 月 24 日发言时指出,印度的决议草案同 1949 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相矛盾,没有提及必须立即停止朝鲜的流血冲突。维辛斯基同志呼吁通过苏联的决议草案,其中呼吁在朝鲜立即停火。

1952 年 11 月 26 日,根据伊朗代表的提议,第一委员会决定首先讨论印度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对印度的草案提出了修改,这些修改包含了苏联关于朝鲜问题决议草案的原则。

1952 年 11 月 28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在第七届联大会议上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完全符合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利益,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1952 年 11 月 29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发表声明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苏联的提案“最公正,它旨在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因此完全支持这一提案……”

1952 年 12 月 1 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丹麦代表团提出的对印度决议草案的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如果在 30 天时间里战俘问题在政治会议上得不到解决(印度草案规定的期限为 60 天^①),该问题转交联合国解决。当天,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按照丹麦修正案修改过的印度决议草案。

1952 年 12 月 2 日第一委员会否决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委员会至此结束了对朝鲜问题的讨论。决定:在大会主席向委员会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提案的决议的答复之后,委员会再讨论这一问题。

1952 年 12 月 3 日,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印度决议草案以 54 票赞成,5 票反对,1 票弃权被通过。

苏联的决议草案以 41 票反对,5 票赞成,12 票弃权被否决。

1952 年 12 月 5 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加拿大人)把大会通过的决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 年 12 月 14 日,周恩来致电皮尔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这一决议不能保证“协定的公正和合理的基本原则”,“接受这一决议——这将意味着在美国粗暴的武力面前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议联大废除这一非法提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谈判,在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作为第一步先完全停火,然后把所有战俘的遣返问题交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调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也致电皮尔逊,要求废除联大 1952 年 12 月 3 日通过的决议,“应根据苏联的提案讨论和通过朝鲜立即停火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需的措施……”

1952 年 12 月 20 日,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皮尔逊向大会提交报告,其中包括简短序言、皮尔逊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长的电报和附件——大会 1952 年 12 月 3 日通过的朝鲜问题决议以及上述中国和北朝鲜外长的答复。

^① 原文如此,而本文件前引文为 90 天。——编注

这一报告以及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对六届和七届联大会议的报告和所谓的联合国朝鲜恢复总代表的报告，在1953年2月24日开幕的七届联大第二次会议上得到了讨论。

苏联代表团提议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但遭到美英集团的拒绝。

美国代表洛奇于2月25日在第一委员会上讲话诬蔑苏联，“苏联为扩大朝鲜战争走得很远了……”，“苏联政府可以停止战争，当它想停的时候”。

1953年3月2日，维辛斯基在第一委员会上发言回击洛奇，指出，苏联任何时候也不隐瞒，它根据1945年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给自己的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过、现在也在提供武器。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苏联同它没有友好和互助条约，苏联没有义务向它出售武器，也没有出售，如果不考虑1948年苏联从朝鲜撤军时给其留下了苏军多余的武器。维辛斯基指出，苏联主张立即全面停止朝鲜战争，坚持自己在七届联大第一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朝鲜问题提案。他驳斥了美国代表洛奇的谎言，似乎苏联对朝鲜战争的延续感兴趣。

1953年3月5日，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菲律宾、丹麦和泰国的代表团提出决议草案，其中大会满意地指出联合国朝鲜恢复总代表的活动，“请求承诺对联合国恢复朝鲜承担费用的政府尽快履行这一义务”。

草案里没谈停止朝鲜战争的愿望，也没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大主席的信和1952年12月3日的联大决议复件的答复。

1953年3月9日，第一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苏联关于取缔联合国朝鲜统一和恢复委员会的提案被否决。1953年3月11日，第一委员会赞同的决议草案由联大全体会议通过。苏联代表团投了反对票。七届联大二次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表明，美国不打算立即让联合国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决议。

在讨论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和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合作的决议草案时，七届联大会议将回到朝鲜问题上来。第一部分涉及朝鲜问题的该决议草案规定迅速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按照国际规则使所有战俘回到祖国，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按照由朝鲜人民实现朝鲜统一的精神对朝鲜问题进行和平调解。

备注：文件（见清单）^①

B. 帕夫洛夫

B. 特鲁哈诺夫斯基

A. 罗申

1953年3月1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39—2062页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附清单。——编注

№0057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战俘 遣返问题的指示和信函

(1953年3月19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一、批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的信函(附件一)。

此信通过周恩来同志^①和库兹涅佐夫同志^②转交毛泽东同志,通过马立克同志寄给金日成同志,立即发往平壤。

二、批准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附件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马林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波马兹涅夫

附件一：

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

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

无需详细谈论侵略者在朝鲜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全世界诚实人们的心目中,英美侵略集团在朝鲜的作为,越来越暴露出这个集团特别是美国侵略势力,是一种推行准备新的战争并企图扩大战争的政策国际因素,其目的只是强迫人民服从他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意志,即妄图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并迫使人民屈服于这些帝国主义者的目的。

① 周恩来已于3月8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会和葬礼,同时准备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一五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编注

② 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潘友新)。——编注

苏联政府认为，对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情况应该如以往那样予以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

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虑到最近时期有关朝鲜战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急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即：

一、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二、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三、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四、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五、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我们认为对以上所述需要作下面几点说明：

第一，对克拉克将军的答复。我们认为，在金日成和彭德怀致克拉克将军的复函中，应表明完全同意克拉克将军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指出这里考虑的是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

在给克拉克的答复中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

建议由双方联络官确定上述谈判的日期。

在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规定：“对任何一个伤病战俘的遣返，都不能违背他在战争期间的意愿。”在进行的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过程中，应力求获得美军司令部的如下保证，即对上述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强制手段阻拦他们返回祖国。

还应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的代表们组成委员会，促使伤病战俘返回祖国。

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为此应运用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特别是这一条的第二段，其中规定缔结“有关遣返或在中立国扣留已长期被俘的健康战俘的协议”。

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

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对这些战俘应像金日成和彭德怀 1952 年 10 月 16 日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建议的那样,按民族和居住地分类。

战俘分类后,立即获得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这样使有关各方便于协助。

第二,关于北京声明。此声明应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讨论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问题,两国政府同样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命令自己的代表,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开始与克拉克将军谈判,考虑按照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 109 条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考虑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声明应指出,在开城和板门店的双边谈判过程中,已经就战俘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例如,就停止军事行动达成了协议:双方武装力量司令员发出命令,命令其属下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所有部队和人员,停止在朝鲜的各种军事行动,命令将于停战协议签字 12 小时后生效,并保证该命令得到执行。

还对停战的下述重要条件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 关于建立军事分界线:该分界线应沿停战生效时作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即前线)划分。“为组成非军事区,双方部队从分界线向后撤退两公里”(停战协议草案第 1 条)。

(二) 关于成立由 10 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停战军事委员会,其中 5 名由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5 名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任命(第 19 条)。

该委员会应监督停战协议遵守情况,包括监督战俘遣返委员会的工作和通过谈判解决破坏停战协议的问题(第 24 条和第 25 条)。

(三) 关于建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经联合国军总司令任命的瑞典与瑞士代表,和经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任命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第 36 条和第 37 条)。

该委员会可建立由上述四国代表组成的观察小组。

中立国观察小组将分驻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和新安州(以上属北朝鲜);仁川、大邱、釜山、光州和群山(以上属南朝鲜)。

此外还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司令员应“建议双方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 3 个月期间里召开双方最高政治会议……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第 60 条)。

还在协议草稿有关战俘(除遣返战俘问题外)的许多条款上取得了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自己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政策,力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全力以赴争取立即停止战争,主张全面解决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问题中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是缔结停火和停战协议的唯一障碍。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立刻遣返全部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将其余的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公

正地解决他们的遣送问题。

在北京的声明中还应谈到以下内容：

我们迈向结束朝鲜战争的新的一步，也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积极解决，首先应有助于恢复中国和朝鲜在联合国中的权利。

第三，关于平壤声明。我们以为，在金日成同志的这一声明中应该指出，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声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商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对北京声明中关于政治形势的评价，还是对其中的具体结论和建议都完全赞同。这里不仅要强调完全支持，还要着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的合理性。

第四，关于莫斯科声明。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是恰当的，它应紧随北京和平壤的表态之后。我们认为莫斯科声明含义在于，在全世界面前强调苏、中、朝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第五，关于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苏联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应按上述对待朝鲜战争的政策计划行事。因此，只要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波兰的“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就必定对此草案涉及朝鲜部分提出相应的修改，并提出苏联代表团和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必要的表态。

第六，补充意见。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满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附件二：

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

一、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同志）在即将进行的讨论波兰代表团有关朝鲜问题的提议时，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的建议和声明。

苏联代表应陈明苏联对待交换战俘问题的立场，这种立场完全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然后应指出以下一点：苏联曾不止一次建议而且仍然主张在朝交战双方立即和全面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

按照苏联的倡议，1951年7月开始了交战双方关于在朝停火和停战的开城谈判。这些谈判使双方就遣返战俘以外的所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苏联仍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公正的，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

际行为的准则,也符合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关于交换战俘的问题是在朝作战双方谈判中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准备从自己一方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消除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

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光明磊落的倡议。苏联热情支持恢复朝鲜谈判的建议,以求达成有关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以及有关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解决停止朝鲜战争和签订和约的协议。

二、责成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作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二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以下文字:“二、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830, л. 60 - 71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4, л. 54 - 65

№12280

索科洛夫致维诺库罗夫电：关于反登陆 防御给志愿军司令部的建议

(1953 年 3 月 21 日)

没有副本

致 И. К. 维诺库罗夫同志^①：

对第 14 号(文件)的答复。

关于组织反登陆防御可以向中国志愿军司令部建议以下原则：

——部队反登陆防御的任务是防止敌之登陆部队和空降兵在沿海地区登陆。在敌人登陆的情况下,防守部队应在岸边将其消灭之,不让其有可能站稳脚跟和利用后续登陆梯队以发展其登陆。

——组织反登陆防御的部队应集中主要兵力固守敌人易于登陆的海岸地段和敌人登陆后易于向重要目标方向和陆上主要防御部队集团后方运动的海岸地段。

① 维诺库罗夫,时任驻华使馆助理武官。——编注

——组织防御必须依据详细的海岸形势分析：在易于登陆的地段设防应根据正常正面防御的原则，在不易于登陆的地段设防应根据宽大正面防御的原则。在难以登陆的地段组织警戒和观察。通常，主要防御地段的前沿选在水线上。

——步兵部队应牢固把守沿岸地区防守阵地。其火力武器应配置在正面的纵深，火力交叉和斜射配置，无论是前沿还是纵深。要特别注意建立各种密集火力以消灭登陆器具。

——在反击登陆之敌时，使用各种火炮直接射击以及使用坦克和自行火炮具有重要的意义。炮兵打击登陆之敌的最好时机是敌换乘登陆器具和乘登陆器具抵达岸边之时。

——在防御工程保障方面，应考虑建立水上和岸上障碍物，为兵器和有生力量建立掩蔽工事以防敌舰炮和飞机的打击。为加固防御，防御目标伪装和建立假工事具有重要意义。防御地区系统的建立应根据陆上防御的原则进行。

——军和师里应有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总预备队、坦克、反坦克炮兵和工程兵预备队），应有障碍器材。第二梯队和预备队通常配置在防御地区的纵深，其离岸边的距离以其能与第一梯队一起及时实施反突击消灭登陆之敌为宜。

——为了同空降之敌作斗争，应在其可能空投地区组织观察，准备必要的精锐步兵预备队和坦克、高射炮以及保持战备状态的航空兵。

——海岸反登陆防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心组织各种兵力和火器的协同动作，因此所通过的防御计划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应到现场进行研究。

为了不间断指挥部队，必须有备用指挥所，备用通信器材，同时还要研究指挥所的替换问题。

远东战线少将主任

索科洛夫（签名）

1953年3月21日

文件送：科托夫^①同志、帕夫洛夫斯基^②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075—2077页

① 科托夫，时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编注

② 帕夫洛夫斯基，时任驻志愿军总部顾问。 编注

№21322

格里戈良致苏斯洛夫函：中国请求向 苏联介绍学者情况

(1953 年 3 月 23 日)

第 25 - с - 442 号

致苏共中央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周恩来同志请求协助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党小组负责人张家福(Чжан Цзя-фу)同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进行会见。

周恩来同志提到,张家福希望向苏联科学院党组书记汇报一些关于中国学者的必要情况,以使得苏联科学院与这些学者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

我认为可以满足周恩来同志的请求。

请求您的许可。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格里戈良(签名)

1953 年 3 月 23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3

№09994

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 朝鲜对停战问题的立场

(1953 年 3 月 29 日)

发自平壤

优先拍发

特档

答复您的第 359 号来电。

在3月29日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

金日成进一步强调，在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实现和平的问题上，从我们一方来说时机是主动的。金说，主动进行军事行动，或者结束战争，两者都是必要的。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对整个民主阵营都不利。有关这一点，金指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并且，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十分明智。在现在的条件下，金说，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

金日成将采取措施为预期的谈判做准备：确定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俘里的伤病员数字，准备在板门店谈判的材料，准备一份来自平壤的声明，等等。

按照您的指示（您的第242号电报），我们与金日成商定，谈判代表（如果他们重新开始的话）仍旧是南日。与此相关，任命南日为外务相的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命令将推迟公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外务相的职务暂时由李东根担任。金日成将向中国朋友通知这件事。

库兹涅佐夫

费德林

1953年3月29日

1953年3月29日第359号报告

库兹涅佐夫、拉祖瓦耶夫和费德林报告说，3月29日他们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南日将军也参加了，金日成收到了从莫斯科送达的文件，并且他们约定在金日成详细熟悉文件之后，再一次接触。

在1953年3月24日的第242号电报中，莫洛托夫指示向金日成转达，莫斯科建议任命南日任外务相的决定暂缓执行，直到马立克到达，而目前仅限于任命他为代理外务相，以后再任命为外务相。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830, л. 97 - 99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5, л. 120 - 122

№24871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为中国五年计划提供援助

(1953 年 4 月^①)

关于向中国五年计划中的工业企业提供的援助

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向中国五年计划中的工业企业的建设给予援助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委托苏联国内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同负责总的供货的各部一起：

一、同中国政府代表就黑色和有色金属企业、煤炭企业、石化工业企业、电力企业、汽车制造企业、轻工业企业、军事工业企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企业的设计工作的执行、设备供应以及建设和修复等问题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同意保证设计工作的履行、设备供应，并在建设中提供技术帮助、安装设备，使企业投入生产，援助的总量大约为 36 亿—42 亿卢布，援助的期限根据附件一和附件二^②进行，其中：

对重工业企业提供的援助：

2 套金属组合器，功率为每台每年生产 120 万—150 万吨钢；

9 个有色金属企业，年生产 3 万吨锡、7.5 万吨铝、1 万吨精钼、13 万吨精钒和 3 万吨精钨；

8 个煤矿和一个露天煤矿，总的开采能力为 1 990 万吨以及 3 个选矿厂，年生产能力为 550 万吨；

3 座化工厂，年生产能力为 6.5 万吨合成橡胶和每年 9 万吨铝锭；

1 座石油加工厂，生产能力为每年加工 100 万吨原油；

3 个每年生产 7.5 万吨金属设备、矿山设备和石油设备的工厂；

1 个生产蒸汽涡轮的涡轮生产厂，平均每年生产 36 万千瓦，并可以扩大到 60 万千瓦；

2 个生产重型和中型机床的机床厂，每年总的生产能力为生产 2.6 万吨；

1 个汽车厂，每年生产 6 万辆嘎斯-51 载重汽车；

1 个拖拉机厂，每年生产 1.5 万辆拖拉机；

1 个滚珠轴承厂，每年生产 1 000 万个滚珠轴承；

6 个电子设备制造厂，其中包括 1 个生产涡轮发电机的工厂，年总的生产能力为 36 万千

①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估计为 4 月。——编注

② 俄国在公布该档案时，均未公布附件。——编注

瓦，并可以扩大到 60 万千瓦；

9 座发电站，总的发电能力为 31.3 万千瓦。

对军工企业提供的援助：

2 个生产飞机的工厂；

2 个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工厂；

4 个生产机组和航空仪器的工厂；

4 个修理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的工厂；

2 个生产坦克和柴油机的工厂；

1 个生产地雷和深层炸弹的工厂；

2 个高射炮工厂；

1 个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

7 个生产子弹的工厂；

3 个生产炸药和爆破材料的工厂；

1 个生产防毒气设备的工厂；

1 个生产探照灯的工厂；

1 个生产雷达的工厂和 2 个生产无线电设备的工厂。

二、原则上同意中国政府代表完成设计工作，关于设备的总量和供应期限问题的解决如下：

1. 附件三中列举的有色金属企业。

企业的数量，其生产能力、设计的期限以及向其提供设备的供应将在苏联在中国的专家对有色金属矿藏储备的材料进行研究之后确定。

2. 制造军舰的工厂——该厂的生产能力、设计期限、设备供应以及对其进行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将在苏联船舶制造专家从中国返回之后确定。

三、向中国政府代表做出如下声明：

1. 苏联相关机构完成设计工作，提供设备，并向提出申请的 4 个工厂（包头、大冶、石景山和本溪）中的 2 个金属工厂的建设提供技术帮助，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的总量是每个工厂生产 120 万—150 万吨钢材，一个完整的冶炼周期的期限如下：为一个金属工厂提供的设计工作在 1954—1956 年进行，供应设备在 1956—1958 年进行；为第二个金属联合企业提供的设计工作在 1955—1957 年进行，供应设备在 1957—1959 年进行。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相关机构应该在 1954 年第一季度提供关于这 4 个工厂中的 2 个工厂的地质调查资料，工厂的建设地点将由中国政府确定。

双方在 1 个月的时间内协商关于开展地质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计划。

2. 对于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企业，苏联相关组织将按照惯例，根据在苏联确立的专业化标准进行设计。关于这一点，附件五中列举的关于部分半成品、产品、成套物资及其辅助材料的生产应该由中国政府在现有的企业组织生产或者重建。

这些半成品、产品和物资的详细清单及其技术性能将会在设计的过程中通报给中国的相关单位。

3. 由中国政府划出一些企业进行重组,以生产军工产品,但要同苏方负责供货单位的专家进行磋商。

4. 苏联将为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指出的企业提供所需 65%—75% 的设备,这些企业所需的其余设备应由中国的工业企业生产。

如果中国的企业在生产这些设备上需要帮助,那么苏联同意提供这些帮助,帮助的途径是转交技术资料以及苏联专家到中国提供咨询。

关于转交的资料的数量和期限以及到中国出差的专家的数量和期限应该由双方另行商定。

关于设计工作的执行问题以及关于向上述企业供应热电站装备,为上述企业提供必要的电力和蒸汽保证的问题,在每一个单独的情况下,在任务草案批准之后以及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之后,将由双方另行商议。

5. 在苏联的相关单位进行鞍山钢铁联合加工厂 2 800/1 700 毫米轧钢机车间的设计工作的时候,将会考虑在这一车间生产铜片,而必须供应的设备的总量和期限根据双方的协商供应。

四、向中国政府代表承诺:

1. 向中国政府无偿地转让产品生产的许可权,其中包括附件一和附件二中规定的、打算在企业成批生产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转交的技术资料(其中包括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产品和特别器材的图纸、工艺生产图、技术条件以及物质生产中采用的特点、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也是无偿提供的。

2. 50 名苏联地质专家到中国出差,以补充以前派出的 16 名地质专家,出差的期限最长 2 年,以便对地质工作的组织提供帮助,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并在工作中培训中国的地质工作者。

3. 根据电气化远景计划、黑色和有色金属发展计划、机械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发展计划,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

4. 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对拥有的物资进行技术鉴定,并根据综合利用黄河、长江和汉水上的可视能源的设计和勘探工作计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援助。

5. 接受中国专家到苏联的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实习,这些实习专家的数量和实习期限由双方商定,就此需要指出,每年到苏联实习的中国专家的总数不应超过 1 000 人。

6. 在 1953—1954 年要对内蒙古、东北和西南的森林资源进行航拍,这些森林的总面积大约为 2 000 万公顷,为这项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

五、在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的谈判中需要商定:

1. 中国方面要提供最终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是总的供应设备的单位按时设计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指出的企业所必需的,并在得到设计资料之后的 2 至 2 个半月内批准设计任务

和技术方案。

2. 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企业将依靠中国方面的力量 and 资源进行建设，而苏联方面对这些企业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援助的途径是实地派遣苏联专家，对建设项目进行监督，并就建设、装配、处理好企业投产的各项工作提供咨询，派遣专家的数量由双方协商。

3. 中国方面有责任不泄露设计资料和技术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什么样的内容，不把苏联参与军工厂设计和建设的事实转交或转告第三国以及外国的法人和自然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外国，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

六、建议中国方面不要建设中国政府请求建设的新的工厂，而应在现有工厂组织矿井电力机车、电炉、焦炭化学和粉碎设备的生产，还有起重机的生产和金属设备的生产，同意转让技术资料和在上述设备的组织生产中提供咨询。

七、为了完成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中列举的企业的一部分设计工作以及培养本国的设计干部和实施提出的建设计划，建议中国方面设立本国的设计所来设计金属、化学、机械制造以及电力工厂、电站、煤矿和军工企业。

向中国方面声明，上述设计所应该完成的设计工作量不超过上述企业设计工作总量的10%—25%，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苏联政府同意向这些设计所派遣200名苏联专家。

八、关于应该向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列举的向中国企业供应设备的价值的补偿以及设计工作和其他类型的技术援助的补偿，在就这些问题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的谈判中的出发点如下：

1. 中国政府应该在1953—1960年向苏联供应价值为36亿—42亿卢布的商品，其数量大致如下：

精钨矿，16万吨

锡，11万吨

精钼矿，3.8万吨

铜，2.5万吨

锑，3万吨

天然橡胶，9万吨

毛皮，5.6万吨

大米，120万吨

根据附件四分别供应这些商品。

2. 向中国供应商品的价格和供应条件应当在贸易协议的基础上每年进行确定。

3. 在工业企业的设备的价格、设计勘探工作的价格以及其他类型的援助的费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供应的商品的价值也应进行相应的确定；在签署每年的贸易协定的时候将对这些商品的价值进行确定。

九、在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之后的一个月內应该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谈判的结果，并

就该问题提出建议。

РГАЭ, ф. 4372, оп. 11, д. 995, л. 26 - 32

№23756

斯米尔诺夫致苏斯洛夫函： 向中国索要有关缅共的资料

(1953 年 4 月 13 日)

第 24785 号

1953 年 4 月 14 日

需归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据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大使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通报，他能够从驻仰光的中国大使那里得到缅甸红旗派和白旗派、人民志愿团体等其他各共产党组织召开的七月联合代表大会的材料。

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最好能获得其中最为重要的已译成俄语或英语的材料。

附上电报拟稿。

请予以同意。

苏共中央与国外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A. 斯米尔诺夫(签名)

1953 年 4 月 13 日

第 25 - c - 611 号

附件：

仰光

致苏联大使

如果能获得 7 月共产党联合代表大会材料的话，就将其搞到，同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且已译成俄语或英语的材料寄回。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91, л. 1 - 2

№21323

谢尔巴科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 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领导人会谈

（1953年4月17日）

致 M. A. 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对 1953 年 3 月 23 日的第 19943 号文件的复函。

张家福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党组领导人已经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①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3 年 4 月 17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4

№23756 - 1

科兹洛夫致苏斯洛夫秘书处函：索要缅共资料电已发

（1953年4月29日）

致 M. A. 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已要求获得缅甸进步党和各组织七月联合代表大会的材料；给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的电报已发。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科兹洛夫（签名）

1953 年 4 月 29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91, л. 3

^① 此处俄文原文系 Зав сектором Отдела ЦК КПСС，直译为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处（局）长。在俄国档案文件中凡涉及 И. 谢尔巴科夫的职务，用的都是这个词。经查，在俄国词典中对谢尔巴科夫的介绍只是说他在苏共中央工作，从未谈到具体部门。从俄国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谢尔巴科夫是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而在中国的有关文献中，则称其为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为了使读者明了其身份，故有此译法。下同。——编注

No25948

库兹涅佐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 感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

(1953年5月7日)

摘自 B. B. 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3年5月26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中国大使 B. B. 库兹涅佐夫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会谈纪要

1953年5月7日

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把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交给了他。

毛泽东就苏联政府在中国五年计划问题方面给予的帮助表达了谢意。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将全权委托谁来签订苏中协议以及附属该协议的关于苏联就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备忘录,毛泽东说,中国方面将全权委托李富春签订协议。

在随后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没有五年计划,只是现在,在苏联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研究材料,并提出了正确而宝贵的意见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开始制定计划。毛泽东说,今年无法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只能拟定控制数字。在这整个工作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见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在谈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不足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领导人分析形势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在研究和解决个别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主观主义。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不得不同主观主义作许多斗争。毛泽东说,只是到了现在才明白,要想保证胜利,就必须考虑一些基本的条件。现在不得不由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来处理经济问题,他们在建设问题上还没有必要的经验。因此,在中国,近几年还无法从这方面做出安排。毛泽东说,但是中共党员们将会努力把这个时期缩短,因为具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苏联提供的帮助是重要的因素。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在努力地工作,积极地支持共产党和

政府的看法，毛泽东说，成功当然是有的，但是不足还有很多。最大的不足是群众政治工作还很薄弱，官僚主义严重，因此损害了与群众的关系。中国的上级机关向下面发布了过多的笼统的建议、指令，但是并没有给执行者提供有效的帮助，对自己的任务的实质也没有解释清楚。下级机关（区级和乡级的干部）尤其深受其害。毛泽东笑道：“往一个干部的头上压了一万项任务，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发现，下面对许多领导干部采取的官僚主义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在一些地区农民们表达了对大量征税的不满。

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在朝鲜进行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今天朝中方面提出了自己新的建议。毛泽东还通报说，昨天也就是5月6日，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北京使馆参赞（大使当时在上海）并告之，朝中方面在5月7日的平壤谈判中将提出关于战俘问题的第二个方案，并向其解释了这个提议的实质，以便印度政府理解并予以支持。

我对毛泽东提供的信息表示了感谢。

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周恩来、使馆参赞 B. И. 利哈切夫和周恩来的助理马列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
B. 库兹涅佐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6, п. 362, д. 11, л. 71 - 73

№20023

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电： 毛泽东谈细菌武器问题

（1953年5月11日）

根据1953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第1212/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带着苏联政府的指示被派往北京和平壤。

1953年5月11日24时，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得知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在减少揭露美国在中国和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动之后，毛泽东说，这一行动是在得到在朝鲜和东北的中国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后开始的。现在要确认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会再一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发现确实有弄虚作假之处，那么就不应该相信这些来自下层的

报道了。毛还说,在和反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全国有 65 万人被处死,而事实上,人们并不认为所有被杀掉的人都是有罪的。有相当一些人明显是被冤枉了。

在谈话过程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有一些紧张,他抽了很多烟,碾碎烟头,还喝了很多茶。在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笑起来,并且开玩笑,平静了下来。周恩来则表现得严肃认真,还有一丝不安。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20 卷,第 950 页

№21338

齐坦科对长征参加者手稿的简要评介

(1953 年 5 月 27 日)

《回忆录》为各种记录手稿(日记、墙报文章)的汇编,作者为 1934 -1936 年中国红军长征的参加者,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打仗的同时从南向北步行了 13 000 公里。

汇编于 1937 年在延安(特区首府)由专门的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统计材料来自各项命令和报告。材料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编辑。

手稿由 4 卷组成,共 819 页,汉语。部分文章字迹已经模糊,需要修复。

总务部报告人

齐坦科

1953 年 5 月 27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20

№21339

维纳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 关于《长征回忆录》的整理

（1953年6月9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务部（雅科夫列夫同志）建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移交保存在该部第五处的名为《长征回忆录》的中文手稿。

上述手稿为1934—1936年从中国南方向北方长征的中国红军参加者的各种记录、日记、文章等的合编。这些手稿可以作为编订长征史的辅助材料。

中国的同志知道苏联保存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资料。因为他们自己（周恩来及其他人）在不同的年代将这些文件和资料交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管。中国的同志尚未提出关于将这些资料移交给他们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当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总务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档案进行整理，之后再从整体上对关于这整批档案的问题进行审议。

请您给予指示。

苏共中央同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纳格拉多夫（签名）

1953年6月9日

第25-c-948号

手写批注：

交书记处苏斯洛夫同志，可以存档。

И. 谢尔巴科夫

1953年6月10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21

No24872

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

(1953年6月15日)

代表团由8人组成,1953年4月23日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北京,1953年6月4日返回。1953年4月25日代表团到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①的首都北京,并在5月1日之前参观了该城市,参观了北京的历史文物和文物单位。对上述地点的访问是根据中国全国总工会的建议进行的。代表团参加了一些庆祝活动,在人民游行的时候,在观礼台上观看了游行。1953年5月2日第七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召开,5月11日会议闭幕。我们只是到了5月10日才得知了国外代表团今后的日程和行动计划。在计划规定的各项活动中,苏联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都一起参加。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之外,经代表团领导人 И. В. 戈罗什金的允许,我个人还完成了一些工作。应中国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请求,我在一些省市的工会进行了座谈,以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为例,谈论了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我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进行了这样的座谈。在北京进行了两次座谈,其中一次是应市委的请求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市委的工作人员。在北京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除了北京市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外,天津市工会主席、浙江省工会秘书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出席的工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工会部门负责人共计95人,其中北京市40人,上海市30人,杭州市25人。

在所有的谈话中,工会工作人员感兴趣的是关于工会实践工作的组织问题。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是:(1)工会应该怎样在实践上总结社会主义竞赛,在对社会主义竞赛的参与者进行评价的问题上是否应当实行等级制。(2)苏联在工业领域有什么样的竞赛形式。(3)在乌拉尔和苏联是否有手工业者,对他们开展什么样的工作。(4)文化宫的工作内容。(5)在恢复时期,苏联工会怎样组织工作。(6)苏联工会局怎样在实践上领导工会。(7)工会应当怎样实地进行党的领导。(8)工会委员会应当怎样在实践上对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和地方工会委员会实施领导。

在工作人员如此少的情况下,怎样在实践上胜任州的工作这一问题引起了巨大的兴趣。确实,差距是巨大的,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31人,而上海市委工会委员会有400人,100名工人和职员为市工会委员会的大楼提供服务,该市有20个区一级的工会分会,其人员组成不少于1000人,一个市郊的工会分会有10个下属机构,人员配置为500人。上海市的工会工作人员大约是:在139万名工人中有2000人,其中115万名工业和建筑工人。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机关结构如下。市委员会每2年选举一次,直接向中华

^① 原文如此。——译注

全国总工会负责，省级的委员会尚未联合起来。选举出的上海市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130 人，常务委员会选举出 35 人。委员会下设的部为：群众组织部，群众文化部，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部，生产部，私营企业部，工资部，妇女工作部，青年工作部，工会委员会办公厅，总务管理部，财务处，工会工作办公室。

委员会有 1 名主席，3 名副主席，1 名秘书长。在上海市，除了广泛设立的青年组织网络之外，另还有 22 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具备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部门结构，有 98 名成员。此外还有流动电影播放设备，附属的工会委员会有 70 人，编辑报纸的成员 23 人，工会学校有 70 名教师，学员有 500 人。有 8 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已经有了关于全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大会通过的新的章程，以及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贾拓夫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因此，在我的简短报告里解释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述提到的官方材料对这些问题已经解释得非常充分了。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总的工作之外，我还不得不同我们的另一名代表 И. Т. 索洛维约夫同志（季诺夫斯基机务段机车司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一起会见丰台（在北京市区）机务段的铁路工人，一同到北京市的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和沈阳市的一些铁路修理厂（事实上是火车车厢修理厂）。关于同铁路工人的这些会见，在索洛维约夫同志的报告中已经阐述得非常详细了。再重复已经阐述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我不得不两次到农村去，因此，我将尽力简短地阐述这一问题。

农村的状况。中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封建地主、富农恶霸的压迫，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和国外资本的沉重剥削。国家对农民课以重税，地主收取高额的地租，农民通常在经济上依赖于富农，房租高得难以置信，而许多其他的支出也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掠夺：日本的地方政权，蒋介石的军队和警察。士兵、军官、警察从农民那里掠夺粮食、财产，然后出售这些掠夺的东西，而得到的钱财用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或者以此为自己聚敛资本。此外，确立起来的地方税收制度还规定要供养村长及其助手，供养社会治安（警察），供养驻扎在村里的军队。村民们还要担保及时送青年农民参军，但由于农民不愿把自己的儿子送往蒋介石的军队，因此，对于农村中每一位没有参军的青年农民要对农户处于巨额罚款。所有这些数目众多的税收和掠夺使劳动农民陷于困境。农民不能购置劳作的牲畜、器具、机器、生活和生产设施、化肥、种子及灌溉设施。农民大量破产，被迫长期向地主和富农承担义务，永远都陷于被奴役的地位，依赖于地主和富农。农民在经济上遭受压迫，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被迫耕种土地，通常都用手工劳动，只有稍富裕一点的农民才能用骡马和水牛耕地。在农业上缺乏技术的应用，缺乏对土壤进行施肥，而这是保持农业的发展所应该做的，这导致了土地的贫瘠和粮食产量的低下，导致经常出现干旱和洪灾，这使农民深受其害。比如，1931 年，在长江谷地的洪水摧毁了 550 万公顷的农作物和 400 万所住房，使 1 000 多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年复一年的洪灾和干旱，灾难的规模在不断增加，因为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

施同这些灾害作斗争。1949年,仍然在长江流域淹没了1.2亿亩的农作物,使4000万人受害。由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的这种困境,致使他们不能把大米和小麦出售用来缴纳税收、租金和债务。他们吃的是米糠、麸皮、玉米、蔬菜和各类野草。占农民绝大多数的雇农和贫农以及大量的中农不能获得衣物和鞋子,因此穿着衣衫褴褛,而孩子们简直就是一丝不挂。在严寒侵袭农村的时候,会发现农村有大量的患病者,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孩子们。这样,就不难把农民发动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因为剥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极限。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较复杂,这是由于国内确立了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残酷的、反动的军事独裁。另一方面,受反动宣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都非常相信如下看法:即“他们的命不好”。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以便消除这一反动的思想,来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巩固的联盟,消灭农村的封建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成功地把各种进步力量都联合了起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国外资本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和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决定条件是苏联军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土地改革前提出了农民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减地租的斗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废除农村各种封建关系,把土地分给农民。

随着一些地区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地主、战犯、叛徒、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富农多余的东西都被没收,并被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土地很少的农民。在这项工作的整个过程中特别组建了以贫农和雇农组成的、联合中农的农会。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确立了上述制度,贯彻土地改革。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些地区被国民党的军队夺取之后,土地改革被废除了,农民协会的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的成员遭到迫害,但这具有另外的意义,农会成员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积极的战士,这样就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批准了新的土地法,根据该法,封建的土地制度被废除了,并开始推行农民的土地制度。地主、教堂和教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多余的房屋都应当被充公。所有被没收和征用的土地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通过农会被分配给贫困无地的农民和贫困少地的农民、分配给返回农村的失业的工人以及从人民军队复员的军人。根据这一法律,富农的土地及其财产将不被没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第一,为了使农民的劳作获得大量的商品产量;第二,不使中农经济的增长丧失前景,否则它将破坏同贫农的联盟。

富农经济的继续增长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比如,全国10%的贫农经济被免于征税,其余农民缴纳的税额平均不超过17%,而从地主经济得到的税收是60%—80%。中国基本上都推行了土地改革,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中国的土地改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一场伟大的运动,是在农村推行的一场革命。它废除了农民的所有债契,它就像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一样,时刻提醒农民,他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由于土地改革的开展,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全国的各个地区每人得到了2—10亩的土地,而整个农民无偿地从人民政府手中得到7亿亩土地。此外,最贫困的农民和以前的雇

工得到大量的从事劳作的牲畜、生产工具、住房和生产场所、种子、用于购买日常用具的国家贷款和水利设施建设的贷款。

根据国务院副秘书长廖岭（Ле Лиень）的说法，仅仅向地主交付地租，农民每年就要缴纳3亿吨谷物、稻子和小麦。

1953年5月4日，在同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苏联代表团一起接见康东（Кэндун）村（距北京市18公里）农民的时候，对于人民政权建立之前农民的状况和人民政权时期农民的生活，人民政府主席辛尊易（Син Цун-и）同志做出了如下介绍。以前农村中有18户地主，99口人，拥有1487亩土地，或者说，每户地主有82.6亩地，每户富农和每户中农平均有27亩地，而每户贫农只有0.5亩地。贫农没有院子，没有可能养鸡，更不要说养牲畜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夺取了我们的村庄，在这一年饿死了8口人，而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前，都有数人由于饥饿死亡。然后蒋介石政府到来了，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当局一下子就从村子抓了24人去当兵，针对逃兵建立了一些小队，为供养这些小队确定了24斤的税收，对于每一个不去当兵的人村子还应缴纳301斤小麦，为供养地方政府，每个家庭要缴纳5000元，这还不算国家总的税收和各种租金，缴纳给地主的礼品，士兵和警察夺取的东西。大部分农民的孩子都没有去上学，没有什么可以穿着去上学，缺少衣服和鞋子。以前全村350户人家在过节的时候向店铺的商人购买3头猪，现在过节时每家每户都可以屠杀一头饲养得很好的猪。现在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村子里有342户人家，人口为1522人，有2814亩地，其中种植稻谷的水田600亩。因此，如果说以前每户贫农有0.5亩地，那么他们现在有2.2亩地，有牲畜、住房以及房舍。

1948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们的村子。1949年秋开展了土地改革，从地主那里夺取了1347亩土地，并转交给了农民。1950年开始开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爱国主义运动。人民政府发放了贷款、牲畜、种子，我们一下子就获得了丰收，如果说以前一亩地收获150斤粮食，那么在1950年已经收获了220斤。1951年农民已经能够购买42头牲畜，建造65栋房子，4口水井，在这些方面得到的贷款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农民的收入也开始多了起来。1951年，每亩地已经可以收获300斤庄稼。1952年，每亩地收获达331斤。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要归功于增加耕地作物，扩大可以灌溉的作物面积。1953年组建了生产合作社，接受了18户家庭，有207亩土地，其中60亩是种植水稻的水田。现在每个家庭每天都可以吃一顿大米饭，吃一顿白面馒头，这在以前他们是吃不到的。村子里的所有人穿得都很好，所有的孩子都在上学，上学率100%，为成年人开办了夜校，以扫除文盲，有181名成年人参加。1950年组建了供销社。第一年有20种商品，1951年有89种商品，1952年有100多种商品，有大米、白面、糖和其他的商品和食品。

Л. 巴尔马索夫

1953年6月15日

No20203

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朝鲜停战谈判进展情况

(1953年7月3日)

1953年7月3日23时40分

第1211—1220号

7月3日凌晨3时30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受周恩来的委托,驱车来到使馆交给我一些文件,具体包括: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答复草案(给克拉克的答复草案准备于7月5日发出);一份报告——中国政府对和谈现状的评估和就克拉克的来信拟准备采取的相应举措。

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如下:

停战谈判的现状以及就克拉克的来信采取的措施

谈判情况。最近12天来,已释放战俘的李承晚开展了反对和谈的运动。而深陷朝鲜战争泥淖的美国则主要是劝导李承晚,以便其弱化自己的反和谈运动,并与之妥协。

为了安抚李承晚,美国人打算与其签订一个临时协定。该协定将可能使和谈协议得以签署,并使美国人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不过,李承晚的本意是想让美国人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他对与美国人签订一个临时协定并不满意。因而他继续提出要求:在3个月之内举行政治会议,如果过了这一期限,将重新恢复战争行动;在该会议上他将拥有否决权。李承晚的这一要求与美国人关于停战的决定发生了冲突。因此两天来美国和李承晚关于这一问题上所举行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人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李承晚施加压力。

鉴于上述情况,克拉克出人意料地于6月29日去信回复了金日成和彭德怀。其目的在于:其一,让李承晚明白,美国人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已不可能再作让步。他打算不顾及李承晚的反对而签署停战协议。其二,让我们知道,他(克拉克)能在多大限度内履行自己的承诺;他希望以和平协议的签署来增加自己与李承晚谈判的筹码(和平协议签署后将有利于限制对李承晚的武器供给)和收回关于27000名战俘的问题。其三,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希望结束战争。

可以预知的是,深刻了解美国人弱点的李承晚是不会让步的。不过,我们也知道,美国是朝鲜战争的主角。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李承晚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尽管美国和李承晚之间仍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最终他们依然可能在朝鲜和谈问题上达成妥协。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实现妥协之后李承晚仍将会继续发动一些小规模的挑衅活动。

我们的对策。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的政策会因其国内外在南朝鲜问题上观点的分歧而发生摇摆，我们打算坚持如下方针：

在实现停战方面掌握主动权，在停战问题上与美国取得一致，以便达到打击、孤立李承晚，促使美国对李承晚施压和加剧美方内、外部分歧的目的。与这一方针密切相关，我们打算预先采取如下步骤：

一、起草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的答复信，并于7月5日发出。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恢复和谈，驳斥美方的指责，并指出美国推行纵容（李承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

该复信的具体内容见附件。

二、准备在和平协定签署前对李承晚傀儡军队实施打击，将前线向南方推移。在和谈会议恢复后，向对方指出，只是由于李承晚的原因才拖延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和导致了前线形势的变化。而根据双方以前所达成的约定，即根据战场实际状况来划定边界。建议再次修正（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可以预测的是，由于目前谈判对手与李承晚的关系陷于恶化，其将同意我们的这一建议。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对方不同意让步，并以此作为其对外宣传的口实。一旦出现这种情形，我们将选择适当的时机，最终做出妥协，拟以1953年6月17日双方的约定来划分（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

三、准备于7月5日以后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在会议上我们拟向对方提出如下与实现停战协议相关的问题：

1. 关于修正分界线；
2. 李承晚是否参加停战以及与此相关，他是否会根据停战协议而将自己的军队及时撤出所占地区？
3. 李承晚集团是否是停战委员会联合检查小组的成员？
4. 关于要求美方负责27 000名战俘的遣返工作；如果美方拒绝承担这方面责任，那么我们将有权将这一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讨论；
5. 关于保障红十字会联合小组在对战俘及其代表进行讯问和解释工作时的人身安全；
6. 关于确保所有坚决要求被遣送回国的外国战俘不遭受强制性扣留；
7. 关于如何保证在运用“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法”解决非直接遣返战俘问题时该法律能得到真正落实和如何动用该委员会军队来保证战俘的人身安全；
8. 关于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何时开始工作；
9. 关于停战协定的效力。

四、在代表团会议重新开始的同时，所属军官—参谋和翻译人员亦应开始进行与停战协定的签署有关的预备工作。其中包括重新修复准备用于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房屋。

五、我们认为，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应在7月15日左右举行。必须说明的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及其在中立国观察小组中的副手——20个检查小组中的成员以及他们在最初阶段至少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均将在7月10日左右去北京。鉴此，在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便应在代表团会议上将上述情况向对方说明。

附件: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收)

在1953年6月29日的复信中您已经承认,李承晚集团强行释放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并强力扣留这些战俘是严重和悲惨的事件。这是对的。但您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却不能令人满意。

所有事实均明显的证实,联合国军不能完全排除自己对这一事件应担负的责任。人们很早就已看到,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对这一事件是事先作了准备的。而你们对此也是知道的,却未采取任何预防性的举措。即使在事件发生以后,你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来阻止在联合国军监督下的南朝鲜警卫部队的行动。南朝鲜军队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之间)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结果是导致战俘们被迫离开了战俘营。我们在6月12日的去信中已指出,我们将高度关注这一事件。但您依然允许南朝鲜警卫队继续使用强制手段从战俘营中释放战俘。结果导致被李承晚集团强制扣留的战俘总量达到了27 000人以上,其中包括5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在6月18日你方代表团团长哈里逊将军的信中和您在6月29日的复信中均提到,目前应采取措施以遣返战俘中的“逃跑者”。但与此同时,你们在信中又说不可能全部遣返这些战俘。实际中,你们的宪兵队得到的指令是:不采取任何针对“逃跑”战俘的措施。甚至于,在宪兵队的纵容下,这些战俘还被强制性地送进了专门培训李承晚军队的军事基地(中心)。联合国军所采取的上述立场,在军事方面至少可得出如下结论:纵容李承晚集团旨在粗暴破坏双方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和为实现停战设置障碍的行动。

我们在停战谈判开始前便已释放了自己战场上俘获的你方士兵。而您却试图将我广播人道主义做法与南朝鲜警卫队的破坏活动相类比,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须知,后者即使在我们签署了关于战俘的协议之后仍强迫战俘离开战俘营。关于“逃跑”战俘的遣返问题,你们无论如何都应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不得不向你们提出警告,李承晚集团仍将会继续叫嚣,即要求释放和强制扣留8 500多名未被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李承晚集团与蒋介石的代理人密谋要强迫中国志愿军战俘脱离战俘营,并以此来彻底撕毁我们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战俘的协议。我们认为,你们应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并保证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您在来信中保证,联合国军将在一些必要的站点采取甚至可能动用预防性的军事手段来确保停战协定的落实。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但你们又声明说,自己并不能有效保证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也遵守双方代表团所达成的停战协议。与此同时,李承晚集团仍在继续叫喊要“通过武力方式统一朝鲜”。仅从这一声明便已经证明,3年前究竟是谁发动了侵略。如果现在联合国军继续纵容李承晚集团和允许其采取各种破坏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罪恶活动,则将导致:虽然朝鲜停战协定业已签署,但却依然可能随时爆发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力侵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使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能遵守停战协定及其相关其他协议。只有这样,朝鲜的停战才会得到保障和不致遭到破坏。

综上所述，虽然您的答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鉴于你们已表达了致力于迅速达成停战的意愿，我们在关注你们所做出的保证的同时，同意由双方代表团确定会谈的时间和商定如何真正落实停战协定相关问题和提前为签署这一协定作准备。双方会谈的日期应通过联络官由两个代表团团长来决定。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元帅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3年7月5日

在当面交付了这些文件之后，伍修权又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向我口头通报了如下内容：

中国政府认为，近期李承晚的挑衅活动有二：一方面，极力想向美国讨价还价，以得到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向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和中国实施恐吓。也正因为此，李承晚坚决要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李承晚还说了一些空话，如他声称，如果美国不满足他的要求，那么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

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将只会给予李承晚有限的援助。因为美国也担心，如果给李承晚的援助过大，那么后者就可能真的进行军事冒险，并将美国也拖入其中。不论是未来可能被强行拖入战争，还是目前就远东地区进行相当规模的军事冒险，都是违背美国人意愿的。在这方面，美国人的观点与李承晚存在一定的分歧。

关于在未来政治会议上应如何行动的问题上，李承晚和美国也不尽相同。李承晚认为，如果会议不接受他（李承晚）的要求，那么，就应当离开大会，重新恢复针对北朝鲜的大规模进攻，一直打到鸭绿江畔，即朝中边界。美国人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在政治会议上谈判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终止，即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朝中代表将获得他们凭借武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鉴于以上所述，中国政府认为，为了和平，我们必须签署停战协定。伍修权开玩笑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场面，好像是我们与美国在共同反对李承晚。”

伍修权接着说，中国政府认为，李承晚只可能会干一些小规模的挑衅和破坏活动，而要采取某种真正颇具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这个实力。

最后，伍修权说，中国政府正在等苏联政府对给克拉克的这一答复草案、报告和他受委托口头传达的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提出意见和建议。

瓦西科夫
1953年7月3日

№005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中方关于 停战谈判的立场和措施

(1953年7月4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 П14/1 号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3 年 7 月 4 日会议第 14 号记录

关于金日成和彭德怀给克拉克 1953 年 6 月 29 日来信 的复函方案

鉴于克拉克 1953 年 6 月 29 日的来信,委托马林科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答复中国同志,苏联同意他们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

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830, л. 135

№00580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 苏联同意中方答复克拉克函等

(1953年7月4日)

苏联外交部第十司

1953 年 7 月 4 日 20 时 19 分发出

1957 年 7 月 4 日 20 时 21 分收到

绝 密

特字第 1041—1043 号

密电
北京

致苏联大使：

第 1211—1220 号。拜会伍修权并告知他下述情况：

一、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拟订的措施是正确的。苏联政府同样同意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名义复函克拉克的方案。

二、苏联政府认为，停战谈判的全部过程证明，中朝方面在这次谈判中的战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中朝方面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了自己要和平的愿望和在保障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为进行谈判和寻求达成协议的基础，已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孤立了，现在国际社会舆论认为，美国应对拖延停战谈判和延长朝鲜战争负责。

三、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做的挑拨行径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美国垄断资本家中最富侵略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

由于中朝方面的成功战术，消除了缔结停战协定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从而不仅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且也使它的国内政策陷于困境，因为这使美国无法为国际局势的尖锐化和朝鲜战争等找到借口。在现有的局势下，美国统治集团在继续对战争的狂热叫嚣和高额军事订货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难题。所以，美国统治集团利用李承晚和他周围人的叫嚣，以便在美国（不仅在美国）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

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舆论压力是如此强大，从而使美国统治集团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

四、苏联政府认为，再谈一下金日成去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的问题是必要的。不可忽视李承晚集团的挑衅行为，该集团可能会对金日成采取某些危险的越轨行动。因此，应当劝告金日成不要前往板门店，而指派另一位负责的朝鲜同志签署协议。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同意这样做。

请电告执行情况。

莫洛托夫

发送 8 份副本，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等同志，第十司，备份

1953 年 7 月 5 日

通知：波采罗布、费德林

№23759

科兹洛夫提交的情况汇报： 来自中国使馆的缅共材料

(1953年7月8日)

情况汇报

1952年初从王稼祥处得到评述缅甸国内局势的各种材料12份。主要的材料已翻译,并用于准备有关共产党和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的情报。

随附的材料及其译文(按照目录)应予以登记并谨慎归档。

И. 科兹洛夫(签名)

1953年7月8日

手写批注:

来自中国的特别邮件。存档。

1953年7月9日

.....^①

附件:

译自中文

1949年9月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德钦 丹东(根据中文音译) 在共产党中央和农民协会中央联合 会议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

一、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和会议后的情况

(一) 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

1949年2月召开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会议,会上解决了土地分配的政策。

^①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在土地问题会议之前完成了下列的工作：

1. 1948年4月党中央就采取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召开的会议。
2. 1947年10月颁布了由全中国土地会议通过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3. 在党的政治方针中增加了有关土地改革的部分，出版了有关进行土地改革的阐述说明册子。
4. 发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宣传工作、收集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和庄稼收割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
5. 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48年在山西—绥远解放区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6. 获得了在利维什峡村（Ливейшия）和奥西来村（Аосилайцунь）以及山汶诺县（Шаньвэньно）（根据中文音译）进行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和教训。
7. 最后，进行了各农民协会委员会和共产党委员会的会议，以及八个县的县代表会议，该会议上讨论了在奥西来村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

甲、中农的定义（在奥西来村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曾用过以下对中农的定义）。

分配土地时对中农与富农的划分极为重要。

中农的定义标准是其生活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必须要依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公平地分配土地。

乙、以下各项数据是对农民进行分类的标准：

1. 贫农：收入少于40个单位（可见这里所说的农民一年的收入，相当于40大桶^①或维德罗^②的粮食）。
2. 中农：收入在40到80个单位。
3. 富农：收入在80个单位以上。

丙、恢复农民——中农对原有土地的所有权。

在土地问题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原则：

1. 富农、中农和贫农都同等视为中农。
2. 根据人口数量（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分配土地。
3. 写得不清楚。——译者注^③
4. 对雇农提供优待。
5. 按照中农以前原有的土地面积分给他们同样面积的土地（有条件的话可增加中农的土地面积）。如果土地不够分配，可以部分削减中农的土地并予以相应的补偿。
6. 没收地主的田地（以及农具和役畜）。

① 大桶为俄旧时容量单位，等于40维德罗，相当于480升。——译注

② 维德罗，俄旧时容量单位，等于12.3升或1/40大桶。——译注

③ 在这段话的旁边有一句中文手写文字：“村长管区，为一分田区。”看起来情况是这样，俄文译者在翻译时看不清这段话的中文，译后由中方补充了这句中文。——编注

7. 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和役畜。

8. 列入中农的农民,其家庭有足够数量的粮食保障,并且还有少量余粮,在丰收年时这些余粮可以成为财产(比如那些收入能达到80—100个单位的农民)。

9. 那些因土地纠纷要求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要废除现时存在的土地所有权。

10. 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进行土地分配。

11. 土地分配的限额量为截止到1948年3月28日之前的耕地。

12. 进行土地改革后保证新农民的经济发展。

13. 分配土地时,同样也将部分土地划分给军人(解放军)。

14. 对数量实施仔细的监督(也许是土地的地段)。

15. 为使农村建设顺利进行,必须向农村委员会转交执行权。

除了上述15点外,土地问题会议还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削减中农的土地时所做的相应补偿应与被削减土地的年收入的價值相符合。

2. 没收富农所有多余的财产。

3. 根据当地的情况可以将部分地段的土地进行合并。

4. 对于一些兼任拥有其他生产的人,必须根据检查确定他们的主要收入(所说的是为了确定税收——译者注)。

5. 应当分配的是1948年3月28日之前存在的耕地(3月28日以后被开垦的荒地依旧属于去垦荒的人)。

6. 决定移植果树。

7. 鱼相对丰富的水库转交给集体使用。

8. 在得到人民行政委员会批准后才能进行荒地的开垦。

.....^①

土地会议决议的另一部分内容为:

18. ^②削减中农的非灌溉土地时应予以赔偿(赔偿数额与被削减地块的年收成相符)。

19. 根据当地的条件由农民协会确定雇佣劳动力的工资。

对于不从事农业的城市居民,不划分土地。

土地问题会议的不足之处。

会议通过了有关赔偿中农损失的決定,但没有解决如何赔偿小农经济的类似损失的问题。

承认敏建县(Миньцзяньсянь)的方案(地主制度在农村还没有发展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地主方式的结构事实上已经遍及整个缅甸。因此需要将郊泊东峡(Цзяободунся)和敏建县的特殊情况解释一下。

① 档案原件此处空一行。——编注

②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拿破仑^①曾说，先投入战斗，再讨论结果。

马克思曾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列宁同样教导我们说，与其刊登 1 000 份声明，不如在小范围内实行某些决定。

拿破仑、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主要实质在于，为了坚定不移地实行某项政策，就必须在实践中学习。

因此，在土地问题会议上提出了以下口号：“更大胆地去分配土地吧”、“在土地分配工作的过程中学习”、“不必怕犯错”、“大胆去工作”、“有错就改”，等等。

（二）土地分配工作的展开。

从以下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县都已经实行了土地分配：

由农民协会进行土地分配工作的山汶诺县，所有土地的一半已经分配。在工作中成绩显著，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在缅甸北部有 200 多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在缅甸的西部，尽管缺少干部，有 80 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缅甸南部的土地分配工作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尽管那里农民协会的组织力量被认为是最强大的，可仅有 14 个村进行了土地分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我们的力量因此而壮大。

（三）农民协会组织。

由于战争前线不断取得的胜利，解放区的区域日益扩大，土地改革进行得也更为广泛，与此同时，各农民协会的组织体系也日益壮大。以下是农民协会组织的有关资料。

序号	地 名	1949 年 2 月农民 协会会员人数	农民协会会员的 拟定人数	会员人数	百分比(%)
1	山汶诺县	60 000	100 000	92 408	154
2	缅甸南部	150 000	249 000	157 989	104
3	三角洲	143 000	123 000	8 000	6
4	缅甸西部	49 000	84 000	41 000	80.3
5	缅甸北部	117 000	280 000	126 721	100.3
	共 计	519 000	836 000	436 118	85.2

雇农协会的组织问题。

雇农协会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参加农民协会的雇农人数比加入雇农协会的人数多。

例如，山汶诺县的农民协会人数超过 68 000 人，其中雇农多达 38 000 人以上。雇农协

① 原文 Чжан По-лунь，显然是拼写有误。——编注

会里的人数还不是那么多。在其他地区雇农加入协会组织的情况更为糟糕。这说明了要更加关注雇农协会组织的必要性。

农民协会中还存在着陈旧的组织形式,即协会内部还有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组织。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陈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要将雇农协会组织划分出来。

(四) 经验、错误和极端情况。

1. 无原则的执行。

在居民区利维什峡村(根据中文音译)妇女协会为了成为“样板区”,请求划分给她们土地。最初,党中央同意了这一请求,可后来因农民协会反对,党中央也就拒绝了划分土地。共青团组织同样也要求将体育场附近地段划分给他们。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人民军队也可以要求给他们运动场地了。

毫无疑问,不应该将土地划分给任何组织和团体。

2. 取消特别优惠。

曾有这样的指示:1948年3月28日之后就可以开垦荒地,地方当局有这项许可,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而后,有过这样的指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家庭成员人数增加给家庭的土地面积,而事实上这也没有执行。

3. 经济收入的平等分配。

比方说,为了得到平等分配的经济收入,在给赶马人分配土地时就要将他们的年收入折算成粮食来计算。

认为不可能平等分配收入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能得到平等分配的收入。

4. 关于农产品。

那些在土地分配前已经播种在地里的种子,没有归还给土地的主人,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5. 关于僧侣们占有的可耕地。

不许将留给僧侣们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可产500吨粮食)在农民中分配。

6. 关于地主的服装。

地主的服装,特别是贵重的服装,同样应予没收。

7. 关于富农的役畜。

有两对役畜的富农,没收一对役畜,没收时要成对地挑出母牛和公牛。

8. 无原则性的宣传。

有这样的宣传,呼吁按照富农被没收的财产对他们进行赔偿。

知洞干(Чжидунгань)和岱敏(Дэминь)(根据中文音译)居民会议的决议表示,山汶诺县的农民会议决议指示,不改变现有的耕地,可现在进行土地分配的委员会还是破坏了这项指示,所以他们要求停止分配土地。党的市级和乡级领导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当发生这些问题时,市级和乡级领导本应该亲自去调查并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领导没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仅以一篇官僚主义的文章和命令区领导去调查并报

告此事，他们就是这样敷衍了事。

一名来自利维什峡的中农说：“统一民主阵线的宣言上说：要满足中农的要求。现在我的要求在于不要划走我拥有的耕地。”后来这位中农承认，自己是受富农的挑唆说了以上这些话的。

在富农的挑唆下和出于富农的利益，尊德北村（Цаундэбэйцунь）的农民们出来反对土地改革，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召集村里开会，赶走农委会并通报上级机关。

10^①。分配和土地耕耘问题。土地分配不当会影响土地耕耘。有这样一些农民，由于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土地，在土地分配期间就停止了土地耕耘。

二、其他方面的经验

1. 如果是流动在外非常住在村里的农民，就不必分给他们土地。

2. 土地分配时，按照经济收入一亩“竹林地”相等于七亩水浇地。可农民不要“竹林地”，因为“竹林地”无法加工耕耘。

3. 在一些地区，没收来的役畜被完全公有化了。

4. 源于组织干部在分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致大部分农民认为将来还要重新分配土地，结果造成农民感到不安。

5. 在一些地区，由于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无端恐吓，以致农委会被藐视。

6. 利维什峡的农民因为对土地分配不均感到不满，要与党组织书记进行谈判，书记指责这些农民并答道：“你们话说得太多，该多少就拿多少。”听到这样的答复后，农民再不敢重提这样的话题。

7. 为了恢复原先所有的地块（这里指分配前的地块），农民进行地块交换。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秘密张贴的标语，表示反对土地分配。

在划分中农与富农时不注意当地的情况，而是按照通常的标准（400—500 桶谷子），造成确定富农和中农时出现混乱，经常犯错。

我们一些不善于农村工作的同志经常是用拳头去对付富农，可结果拳头却落在了中农身上。

农民有两头母牛的，没收一头，如果有两个竹筐的，没收其中的一个，有两把大镰刀的，没收一把，以此类推。总而言之，现有的财产一半要没收。

农民不敢与这样的行为抗争，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是党和军队。

“毫无疑问，党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好的，可这样的工作方式我们不喜欢”——有许多人，甚至那些对党深信不疑的人都这样说，但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让雇农成为主人”的口号提高了雇农的地位。幸亏有党和军队的存在，农民以及中农们有点惧怕雇农，不敢去招惹他们。小部分雇农开垦着每一块地（土地——译者注），不让中农有多余的土地。

① 原文如此。——编注

有关对待中农方面的错误立场。

“左”倾和违反临时制定的规定。

1. 敏建县和什泽县(Шицзе)以及缅甸北部,在进行土地分配的工作中违反了由农委会制定的原则。他们改变了“保留原先存在的耕地”的基本政策。

2. 缅甸南部的同志,尽管专门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案,可在有些地方工作却进行不下去。甚至那些开展了工作的人,也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擅自处理——译者注)。

3. 提出的口号“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核心”由于戒严而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实行土地改革和军事行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是没有土地改革,就无法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没有军事行动同样也无法进行土地改革。

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分歧。

党内在土地改革方面的观点有分歧,革命拥护者们之间对这个问题表现出非常大的犹豫。党和组织的志愿者们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其中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将雇农从贫农中划分出来,该不该给雇农划分土地,该不该没收部分地主的财产等。

在第二次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以下决定:

——以前属于封建领主的已经分配了的土地不动。

——准备好明年要进行的土地改革工作。

——宣布“土地分配”口号。

在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志愿者组织代表就土地改革提出了要求,在解决问题之前,应当征求群众的意见。

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去征求群众的需求,这意味着可能将革命引向失败,所以人民民主统一阵线坚决地拒绝了志愿者部队代表的要求。

这种“征求群众意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意识不仅存在于志愿者之间,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同样也有。东秀县(Дунсюйсянь)农民协会的负责同志就“要不要分地”去征求农民的意见。

像这类的意见必须消除。

党内的观点分歧给反对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合适机会。“过去的革命斗争教训表明,利用领导党最亲近的党内宗派破坏了革命政权并为反革命工作开辟了道路。”(摘自《列宁选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旨在破坏革命的行动,是通往建立反革命地主和资本家统治道路的一个政治步骤。”(摘自《列宁选集》)

党内的观点分歧造成了志愿者组织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反对派自由同盟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些不一致。为了阻止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它利用了与党有最密切关系的志愿者组织,他们就是这样做出了消灭革命政权的计划。

志愿者组织能够联合那些对党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不满的农民,不采取公开的政治斗

争就能组织起暴动。

在政权属于人民民主主义的地区，如果无法平定暴动，这就将等于为自由同盟德钦努^①的军队开辟了道路。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

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分歧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危害。

如今，在农民问题上已经显露出非常大的分歧，导致出现了错误、极端和破坏章程的因素。

某些同志不承认党内的组织问题上存在种种困难，因此也不将它们列入议事日程。

我相信我们的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从今后，我们的努力应当用在建立党内观点的一致性上。必须要尽力争取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一致性。

政治纲领

1. 讨论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

研究我们的纲领和已完成的工作成为现行会议的一项任务。

在讨论存在的错误时会产生两个问题：（1）是否会出现政策是正确的，而实际工作却是错误的情况？（2）是否会出现错误的政策和实际工作同样也是错误的情况？

经过讨论我们在6月所做的工作，我们感到，首先必须对政策问题作全面的修正，然后再讨论实际工作中的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极端和破坏章程的现象？

（1）当全缅甸的土地分配工作结束时，班汶纳县（Баньвэньнасянь）持摇摆立场的人就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执行指示时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正确”。没有责任感。

（2）对整个缅甸北部来说，其指示为“在工作中根据现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事实上并没改变这项政策）

（3）在缅甸南部：“主要的政策是错误的，必须采用新的政策，在没有得到新的指示前，任何工作不得进行。”

总而言之，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执行所有的指示。

2. 在组织问题上也存在混乱。

党内部的观点分歧影响了志愿者的组织，导致的局面是党无法恢复对志愿者组织的领导。

党与志愿者之间在进行土地改革上出现的分歧，导致人民民主阵线搁浅。敌人的自由同盟竭力利用这种局面，但是目前人民民主革命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主要的环节在哪里？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极端和破坏纪律的现象？

总的来说，我们的同志是最恪守纪律的，可为什么他们却可能让党和革命遭受危险？

^① 德钦努，即后来担任缅甸总理的吴努。——编注

在这个问题上,错误并不仅在于实际的工作中,所以我们应该全面地分析基本政策。

党在领导方面的任务

有关党的领导方式,斯大林同志曾说过以下的话:“当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或换句话说,当与党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否认为该党还能实现对这些阶级的领导?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加强领导权,党应该分析党的政策并加以修改。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

为此,我们应该分析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

关于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

二月农村问题会议上通过的政策基本要点:

——没收全部土地。

——完全和平等的分配土地。

——赔偿中农在没收土地中的损失。

在讨论以上所说的各点时,我们应该研讨一下我们的基本原则:

1. 有关土地国有化。
2. 有关对待中农的立场。
3. 平等分配的原则。
4. 有关土地国有化。

共产党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土地国有化原则。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中有这样的指示。

共产国际认为最为重要的任务如下:

1. 推翻国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2. 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工人和农民的人民民主专政。
3. 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
4. 废除外债。
5. 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
6. 没收地主、寺院和教会的土地。所有土地将归国家所有。
7. 实行工作日八小时工作制。
8. 工农革命军队组织。

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的决议中写道,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同的基本任务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要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它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租界、铁路和银行归国家所有)。

在那些所有地区还没有取得统一的国家,要创建统一,推翻为剥削者服务的帝国主义政权,组织工农联盟和红军,建立起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2. 实现农村革命,把农民从资本主义和殖民制度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土地国

有化，采取有效的方式改善农民的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3. 按照工业和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将会增加，为此就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巩固共产党，使它在劳动大众之间能争取到稳固的领导地位，争取实现工作日八小时工作制。

4. 建立起民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取消对获得教育的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总体文化水平等等。

（摘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纲领）

中国的土地改革：

——废除地主制度。

——耕者有其田。

——废除征收地租制度。

——满足贫农和中农的需求。

保加利亚的土地改革（摘自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工人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报告）。

罗马尼亚的土地改革（罗马尼亚工人党书记在党中央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苏联和其他民主主义国家在进行土地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

苏联、新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在土地改革中所总结的经验是

——废除地主制度。

——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废除征收地租制度。

——关心贫农和中农的所有权。

——不急于进行土地国有化。

——借助于合作社转为集体农庄。

我们的政策：

——没收所有土地。

——中农和贫农的土地同样予以没收。

——土地全部分配。

——提供私有财产权。

5. 对待中农的立场。

我们对中农问题还没有充分了解清楚。

（1）我们认为农民中的中农是暂时的同盟者，而事实上中农绝对不是暂时的同盟者，而是永久的同盟者（在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关于中农是永久同盟者问题的论述）。

（2）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有人说中农是摇摆的和不定的人，所以他是不可信赖的同盟者。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等于提出口号要与中农建立起可靠的同盟。

领导摇摆的和不确定的人,正是工人阶级的任务。

“领导各个阶层是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治权利时应当将摇摆的和不确定的人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摘自《列宁选集》)

(3) 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斯大林):

① 依靠贫农。

② 联合中农。

③ 消灭富农。

(……摘自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

(4) 如果以错误的立场对待中农,那么就将违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对待中农问题做出以下决议:“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内),那就不仅是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而且是违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5) 轻视中农是托洛茨基主义和走极端。

“右倾托洛茨基分子在农村看到的只有两个阶级:贫农和富农,并抛弃依靠其他阶级,其中包括中农。”(摘自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

(6) 巩固中农的所有权。

列宁同志在有关农村问题的著作中写道:因为中农具有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这些都直接表现在投机买卖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上,所以私有者与雇佣工人之间就展开了冲突。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了地租和抵押债务,并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权不应当马上废除私有制,它应该保证贫农和中农不仅要保留原有土地,还要扩大他们土地的面积(废除地租)。

(7) 我们给中农哪些保障?

尽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过指示,要保留中农和贫农对原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我们还是没收所有的土地,然后再平等分配土地。我们将遵照应对中农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

关于赔偿中农和贫农的财产,以前列宁同志和恩格斯同志就曾说过,在我们获得政权的时候,将不需要进行这样的没收,就像没收地主财产那样,不管要赔偿还是没有赔偿,将不需要没收小农的财产。

我们对待小农的基本政策如下:将他们的私有财产转为合作制财产,但这不是通过权力方式来实现,而是逐步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恩格斯“法国和德国的农民问题”。

给不给赔偿并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不没收财产(关于中农的问题)。

至于“赔偿”中农所遭受的损失,这个问题不值得考虑,因为我们给中农赔偿的契约如同“废纸”,中农对此不屑一顾。

对待贫农,不仅不需要没收土地,而且还要添加土地。

(8) 对待富农的立场。

在富农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甚至在大农（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对大农的定义：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通常雇佣几个工人，之所以也能归入“农民”之列，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与农民相同，也亲自参加自己农场里的体力劳动。这是个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译者注）被剥夺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不可能顺利完成，因为还不具备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同样也不具备将农村实行公有化的社会条件。

个别情况下，特殊环境内，可以没收富农部分被出租的土地或特别需要的和毗连小农土地的地块。除此以外，还必须保障小农在一定的条件下无偿使用大农的全部农具。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保证大农保留土地所有权。

只有在大农反对劳动者和被压迫者政权的情况下，可以对大农进行没收土地。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这个阶层在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后，同样能够完成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的任务，甚至开始（尽管非常地缓慢）对捍卫所有劳动者而无情地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

当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俄罗斯的大农展开斗争时，这时期的这场斗争便具有了各种复杂而独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俄罗斯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后经历了所有农民起来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斗争阶段。

2. 城市无产阶级人数少和文化水平低。

3. 幅员辽阔和交通不便。

既然各先进国家中没有上述情况造成的阻碍，欧美的无产阶级应当更积极、更迅速、更坚决和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消除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

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之前，农村中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是不会相信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已经是十分稳固的。

由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存在很强的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和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农民阶级划分过程相当缓慢。但在这些国家市场关系归根结底将发展到那种程度，以致在阶级关系上农民开始有更明确的形式。

在中国和印度的农村已经能见到农民出身的剥削分子，为了剥削雇农和农民，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如高利贷、贸易，利用雇佣劳动，出租土地，租赁土地，出租役畜和农具。

总而言之，在农民与地主斗争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可以带领所有的农民。

可在斗争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中出现的上层分子可能会站到反革命阵营的一边。

无产阶级只有在为满足农民的要求、为完全实现土地改革而斗争之时，只有在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运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之时，才可能成为农民阶级的领导者。

（摘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报告）

有关中国的富农

在中国与富农的斗争是重要的事。

老富农手里的土地数量超过了总体的平均数量,没收他们多余的土地,不没收新富农的土地。

中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因为:

1. 工人阶级共产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2. 20 多年的土地改革斗争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同样也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地位。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尚未对富农进行彻底的斗争。这一点的解释如下:

1. 在有利于建立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众多原因中,尽管不应撇开为争取国内民主的斗争,可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苏联红军解放它们时所给予的帮助。
2. 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所取得的地位比在中国的地位更强有力。
3. 城市是创建人民民主国家的基础。苏联红军解放了城市,所以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作是从城市开始的。
4. 在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最初阶段,农村中没有可靠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农民阶层中没有基础。

缅甸的富农问题

缅甸人民民主革命战争的最初阶段有可能发展为与富农的斗争。

原因如下:

1. 缅甸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得到了解放)不同,而与中国相像,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创建了自己的人民解放军。
2. 缅甸与那些以城市建设为基础的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不同,而与以农村建设为基础的中国相似。
3. 缅甸共产党同样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4. 在组织方面,缅甸农民的地位比中国农民要低。

所以我们要废除旧式富农,监管新富农。

没收富农土地时,除留给他们的土地外,所有多余的土地都没收(与没收地主财产不同的是仅没收超过中农的那部分财产)。

绝对平等的土地分配原则。我们在分配土地时坚持“绝对平等的分配原则”,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在有关平等分配土地问题上说过以下内容:

“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农民群众更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分土地原则。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等分配原则,谁就会犯错误。这样的观点是反动的、落后的、投降主义的,我们必须批判。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无需干涉经营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

总结上述内容可以看到,绝对的平等分配原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平等分配

原则”，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应当赞成“不平等分配原则”。

在进行反封建斗争的进程中，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平等分配”的口号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可在今后这将成为向前发展的阻碍。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平等分配，但绝不主张绝对的平等分配。

在平等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应当依照这个观点。

不应通过武力方式和随后的土地平等分配去没收中农和贫农的土地，而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吸收中农和贫农参加平等的土地分配。如果他们将来参加，就吸收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招惹他们。

就比如，如果中农将不参加土地的平等分配，那他就有比贫农多的土地。中农和贫农的土地占有权就将不同，可这点还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不主张土地分配的绝对平等。

土地改革的新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土地改革的新旧政策有什么不同？

以前的政策是没收所有的土地和平等的土地分配。

新政策内容如下：

1. 没收土地的问题和土地的国有化。目前还没有进行土地国有化。

推翻地主制度。

保护农民所有权。

从合作化转向集体经济。

目前还需要准许私人贸易的自由，但必须不断限制它。

2. 没收土地的办法。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保留中农的土地（如有可能，可以从分配的土地中划出部分土地用以增加中农土地的数量）。

贫农的土地，非但不应割让，反而更应增加土地。

其他阶层同样应划分土地。

3. 平等分配问题。不必力求绝对平等分配土地的原则。

在给中农与其他阶级分配土地时不应搞平均主义。

4. 为什么必须改变政策？

在各地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基础上，政治局和农民协会中央委员会应该再次加强土地改革的理论研究，然后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确定新的政策。

缅甸北部和南部的同志们也同样同意并承认，这项政策是“我们的政策”。缅甸南部提出的政策不准确。仅仅是刚在错误中找到真理。

在“没收所有土地并予以分配”的错误政策中找寻划分农民各阶层的正确方式，所以就找不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可我们必须承认，缅甸南部的同志非常细心地寻找正确的政策。

在缅甸北部数量相当多的土地所有者是中农和贫农，所以那里没采用“没收所有土地并予以分配”的政策。

缅甸北部的同志认同保留农民原有土地的政策。

尽管有些同志感觉政策上有错误,徘徊不前,但也无法准确地指出错误的地方。

在政治局成员中仅只有吴江志(У Ця Чжи,根据中文音译)提议修改这项政策。他(吴江志)参加了缅甸南部代表大会并跟我讲述了缅南会议的要求。并且他还考虑一下中农的土地问题,说在缅南会议上还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局和农民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研究后,做出了回答。

5. 对农民的阶级划分。

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阶级划分。

最初阶段必须要说明,谁的土地必须没收,谁的土地不没收,用什么方式划分土地等等,然后才进行阶级划分。

有关阶级划分的问题,我们认同第二次会议的决议。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如下:

(1) 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劳动”。

农民自己在劳动。

所以在划分地主和农民时(包括富农)主要的一点就是他自己是否劳动。

(2) 在农民内部划分阶级时,除了本人是否劳动的问题外,还必须遵循这样的标准,是否雇佣劳动力,雇佣多少劳动力。

富农自己劳动,可雇佣大量的劳动力。

中农自己同样也劳动,可不雇佣劳动力。

贫农不雇佣劳动力,自己劳动。

(3) 没收和分配土地时中农与富农之间的划分。

中农的确定不仅要观察雇佣劳动力的问题,第二次代表大会用以下的方式确定中农:

(1) ……(略)①

结束

1950年8月27日

手写批注:

翻译: ……②

1952年12月19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91, л. 7, 540 - 568

① 原文如此。——编注

②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0996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 中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的态度

（1953年7月17日）

948/ДВ号

致苏共中央

B. П. 斯捷潘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7月17日、7月27日和7月30日电报的正本。这些电报的俄文本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通过电报拍发过来的。（专线：1385,140度,187-20）

附上述电报共3页（只发给收报人）

A. 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8月26日

附件：

致苏共中央：

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决定，完全赞成苏共中央这一决议，认为清除贝利亚出党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这是苏联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胜利，它给了帝国主义阵营趁斯大林逝世的时候破坏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动企图以严重的打击。

我们在7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完全拥护苏共清除贝利亚的社论，中共中央并已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就《真理报》7月10日社论和《人民日报》7月12日社论进行讨论，并向对此事件不甚了解的人们进行解释工作。我们保证与苏共中央团结一致，并将根据苏共中央决议结合中国情况改善我们党的工作。

二、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现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传阅。这个决议是否可以发给所有中共中央委员和省委及大城市市委书记以上高级干部阅读，请复。

中共中央

1953年7月17日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是以前苏共中央收到过的电报的原件。永久保存。

И. 谢尔巴科夫
1953 年 9 月 4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30 - 39

№20205

波科洛夫斯基致苏军总参谋部报告： 向中国派遣雷达专家

(1953 年 7 月 22 日)

苏联国防部第五局局长关于必须向中国派遣苏联国防部科研所的雷达专家给苏军总参谋部副部长的报告

第 10688 号, 1953 年 7 月 22 日^①

根据总参谋部的计划, 为 П-8 无线电雷达站配备的两台抗干扰装置已发给了斯柳萨列夫同志所率部队。

鉴于斯柳萨列夫同志已就抗干扰装置的使用问题提出给予技术帮助的请求, 我请您允许派遣该装置的专家——国防部第五研究所代表、工程师一中校 В. П. 多尔加切夫同志去那里出差, 为期一个月。国防部火炮管理总局局长已同意派遣多尔加切夫同志到斯柳萨列夫同志所率部队。

多尔加切夫同志也已整装待发, 准备到那里就地测试该装置的使用情况, 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观察其工作状况。

国防部第五所代理所长、工程师兼上校
Р. 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57, л. 69

^① 苏军总参谋长于 1953 年 7 月 25 日发布了命令：同意派遣。——原注

№00582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 关于停战协议签字问题

（1953年7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马林科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上就北京来电而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的第1356号电文稿。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复电如经批准，将同时向平壤发去相同的电报。

莫洛托夫

1953年7月23日

附件：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的电报稿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将下列事项通知他：

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板门店交换停战协议文本时，金日成和彭德怀不出席的意见。要向美国人指出，每一方要由自己决定在交换协议文本时，由谁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务必要坚持这一点。

但是，必须估计到，鉴于中朝方面坚持这一立场，美国人可能借口谁在板门店作为代表的问题不合常规，而拖延签署协议。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可以同意由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代表中朝方面。当然，在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前往板门店时，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关于这项答复，苏联政府将同时照会金日成同志。

请将同周恩来会谈的结果电告。

№0058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金日成 不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1953年7月24日)

关于金日成同志参加停战协议签字问题给北朝鲜的电报草案。

批准苏联外交部(莫洛托夫同志)送来的就该问题所拟的电报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莫洛托夫给苏兹达列夫的电报稿

北朝鲜

致苏联大使：

请转告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下述事项：

苏共中央赞同板门店停战协议朝中方面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副首相和彭德怀签字。作为首相，金日成本人不必亲自签署停战协定。由谁代表朝中方面签署停战协议，完全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丝毫不应受美国人的压力等所左右。

在当前条件下，由于李承晚分子可能采取某种针对金日成同志的挑衅行为，金日成赴板门店带有一定的危险性。问题的重要性要求排除李承晚分子进行这类挑衅的任何一点可能性，而金日成不亲自参加板门店停战协议签字，这一点就可得到保证。在这个问题上，苏共中央建议不要对其他任何意见让步，因为在此情况下，这些意见是次要的。但是，金日成拒绝前往板门店当然不应有示威性质。此外，正因为金日成将不去板门店，故彭德怀同志在板门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就十分重要。

苏共中央不认为，金日成不去板门店有可能被美国人用来拖延签署停战协定。由于这个理由而拖延停战协定的签署是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的。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如果金日成不亲自签署停战协定，将会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造成不良的印象。我们毫不怀疑，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会以应有的方式解释这一点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苏共中央希望朝鲜朋友和中国朋友注意到这些意见。我们希望这些意见将被重视。

请通报金日成和朝鲜朋友们，我们同时还将上述意见发给北京的苏联大使，以便使其通报毛泽东和中国朋友们。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830, л. 169 - 171

№0986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 关于请求增派教授来中国

（1953年7月27日）

苏共中央：

中共中央曾在7月7日电报中提出请求为北京马列学院增聘教授四人。我们应当补充说明的是：一、我们对1952年11月聘请的3位教授舍夫佐夫、契尔特科夫、斯皮里多诺夫的工作很满意，需要他们组织工作，望告他们在休假期满后即来北京。这次提出增聘教授是为了适应学校扩大的需要。二、增聘的四位教授主要是请他们来校讲课。如果其中能有一位或两位有办党校或社会科学院的经验者最好，这对我们学习苏共经验，把我们的党校办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中共中央

1953年7月27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р. 5082, л. 34 - 35

№09995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毛泽东谈停战问题

(1953年7月29日)

发自北京

紧急密电

(关于7月28日会谈的报告)

在接受了苏共中央的问候之后，毛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我向苏共中央转达深切的感谢。毛注意到敌人被迫提出停战不仅迫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迫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在军事问题上，最近一年的情况已经表明敌人在陆地上不仅不能前进，也不能稳固地保持和守卫前线。中国军队不仅已经开始实施阵地战，也能够打破(敌人的)防线。

在迫使敌人停战的政治原因中，毛提到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上的矛盾和世界反对朝鲜战争的社会舆论的重大作用。

关于经济上的原因，毛阐述了在战争的头两年，美国的垄断集团在军火订货和交付中积累了庞大的利润，但是随着停战谈判的结束，也随着朝鲜战争停战运动加强的结果，他们的利润开始急剧地下降。

回到军事问题上，毛指出，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但再向南方深入，就会冒过分暴露朝鲜东西海岸侧翼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中朝军队的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将会大大增加。

谈到停战签字后更进一步的打算，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许多相关问题想和苏联政府商量。大约到8月10日，我们将准备一个有关必须要与苏联政府商量的措施计划的建议。

周恩来出席了会谈。

库兹涅佐夫

文件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波采罗布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830, л. 187 - 189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11, д. 5, л. 156 - 158

№09862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 感谢苏联为实现停战的努力

（1953年7月3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实现朝鲜停战的贺电，深为感谢。

在整个朝鲜反侵略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都给了中国和朝鲜人民以重大的支持。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充分的团结一致，保证了朝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将继续与苏联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3年7月30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30

№23733

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报告： 在中国组建日本共产党特别党校

（1953年8月6日）

苏共中央印鉴，第41525号

1953年8月6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H. C. 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相关委托，兹报告关于日本共产党在中国的特殊学校的情况。

该学校始建于1952年8月。最初，该校为中共下属的马列学院分院，随后才成为一所

独立的学校。

1952年8月,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野坂参三曾向苏共中央通报说,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中国成立一所日本特殊学校,并已将这一想法告知了1952年7月正访问莫斯科的德田秋一。野坂参三又说,关于建立这所学校的问题,(自己)已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同志)作了协商。

1953年3月,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西泽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在给苏共中央的致函中指出,在中国建立的日本特殊学校的学员人数将增至1500人。该校目前位于延安市,但在1953年秋将被迁至离北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另外,在会谈中西泽还通报道,该校学员多数都是从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中挑选出来的。中共领导人任命(日本共产党)中央前委员高仓辉为该校校长,该校副校长打算由中国同志担任。

目前,关于这所学校的性质、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苏共中央联络部尚不掌握其他更为详细的情况。

野坂参三同志请求苏共中央为该日本特殊学校发送一些俄文版和日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一些书籍。此类书籍(苏联)以前曾向中国发送过。另外,应野坂参三同志的请求,苏共中央已决定向中国的日本特殊学校派遣一位苏共历史教师、一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和2位俄语教师。据日本朋友说,该校将有两个班学习俄语。

截至目前,该校仍未正式开始工作。野坂参三同志于1953年8月1日向苏共中央通报道,已为该校挑选了825名学员,这些人将进入预科班学习。学校计划于1954年1月开始正常教学工作。

鉴于非常有必要了解该校的管理和人员构成等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派遣一个由苏共中央联络部、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北京。另外,鉴于该校目前尚未正式开始工作以及日本朋友请求我们为该校筹备俄语教科书,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向中国和日本朋友询问如下做法的可能性,即是否可以让我们派往北京的上述小组中的工作人员协助该校的组织工作。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B. 斯捷潘诺夫

1953年8月6日

第25-C-1323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3, л. 94 - 95

№25108

中共中央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电： 缅共中央对贝利亚事件表态

（1953年8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苏斯洛夫同志：

现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致苏共中央的信件发送给您，该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戈宝权在今年8月15日交给苏联外交部的。

附件2页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1953年8月25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兹寄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今年7月29日从缅甸共产党中央得到的通报。

1953年7月28日缅甸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决议，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就贝利亚案件召开的全体会议做出的通报，现在我们把该决议的主要内容作一阐述。

一、缅甸共产党中央表示，完全支持以Г. М. 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把贝利亚开除出苏联共产党的决议。贝利亚混入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企图攫取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他企图破坏共产主义建设，恢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间谍。缅甸共产党中央也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

二、缅甸共产党中央表示，使他们感到赞叹的是，以Г. М. 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就贝利亚案件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措施，贝利亚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间谍，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和平和民主事业的敌人。

三、对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的揭露是迅速而坚决的，这证明了苏联共产党牢不可破的团结，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同苏联人民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也向世界证明了苏联各民族的力量。

四、苏联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对贝利亚这一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国际资本主义间谍进行的揭露警告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党员都应该更加提高革命的警惕。全

世界的共产党人将会一直感激苏联共产党采取的这些措施。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953年8月10日

于北京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91, л. 607 - 609

№23818

苏斯洛夫致马林科夫等报告：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

(1953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和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

今年6月15—20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通过了关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广泛开展国际运动的决议。

与以往的运动，如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和各大国之间签署和平协定的请愿书所发起的签名运动不同，本次即将开始的这场运动，在内容上强调根据各个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进行，如国家退出侵略性集团，撤出外国军队和清除在一些国家境内的外国军事基地等；在运动进行的方式上，要求在各种会议、群众集会、国际会议及自治市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机关会议上讨论保卫和平的问题，通过针对本国政府和议会以及给五大国政府的请愿书，呼吁和平调解国际问题。在一些国家中仍打算继续开展征集签名的运动。

出席本次世界和平大会的苏联代表——吉洪诺夫、爱伦堡和苏尔科夫等同志介绍了苏联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根据世界和平大会的要求开展运动的情况，并请求就这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做出指示。与此同时，他们还通报了法国和意大利保卫和平运动领导人所提出的愿望，以便在苏联展开的这场运动能够与其他国家同时进行。

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召开保卫和平民族委员会会议以及一些单独的群众性集会和会议。在此类会议上一些本次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参与者们报告了例会的决议和世界和平大会发出的开展运动的倡议等情况。这些会议和集会均通过了赞成世界和平大会例会决议的决定。最迟在今年8月中旬以前，在这些国家中就将开始广泛的运动。该运动将具有长期性，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部分大国之间就一些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签署协议——即使

是部分性质的协议。

为了和平调解国际问题，在苏联国内也应开展相应的运动。其中具体内容包括：

1. 苏联社会舆论广泛赞同布达佩斯世界和平大会决议所提出的以谈判方式调解国际争端的决议。
2. 全体苏联人民支持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后者的依据是：“当今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无法在相关国家相互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有争议的、而未解决的问题。”
3. 表明苏联人民非常满意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该协议的签署是朝鲜和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和民主阵营的巨大胜利；显示了和平解决所有其他国际问题的可能性。
4. 揭露敌视和平、阻碍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各种势力的阴谋。

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鉴于这场运动所具有的长期性质，苏联公众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将采取的那些具体措施（如苏联对三大国提出的关于召集四大国外交部长会议的答复，苏联就德国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以及苏联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例会所提交的提案，等等）。

与此同时，苏联公众应对敌视和平势力为破坏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可能实施的那些具体活动给予回击。

至于开展这场运动的方式，具体如下：可在今年8月下旬举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在9月——举行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并就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结果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等问题作报告；自8月起——在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高校召开会议，并作关于当代国际形势和各民族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报告。这些会议均应在1953年12月以前进行。

此外，还希望苏联各社会组织（工会、妇女和青年等）不约而同地发表支持这场运动的声明。

理应在1953年12月召集全苏拥护和平者第五届大会，期间将讨论A. A. 苏尔科夫同志就“国际形势和各民族为捍卫和平而斗争”问题所作的报告。第四届全苏拥护和平者大会是在1952年12月举行的。

需要指出的是，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全苏拥护和平者大会和劳动者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反映苏联公众对一些国际问题的具体看法。

今年9月9日，将在哥本哈根召集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以讨论那些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这场国际性运动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理应派遣如下苏联代表——H. C. 吉洪诺夫、И. Г. 爱伦堡、A. A. 苏尔科夫和П. B. 古利亚耶夫等同志参加这次会议。

在这次就运动开展问题而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上。苏联代表们的活动应以苏共中央于今年6月12日所确认的批示以及附录的决议草案中所表述的指示精神为指导。

为了加强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对保卫和平运动的日常工作领导，在世界和平大会中的苏联代表——吉洪诺夫、爱伦堡和苏尔科夫等同志认为，有必要再派一名苏联代表到该秘书

处工作。

我们认为,可以采纳这一建议,派遣 B. A. 索罗金同志到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从事长期工作,届时将免去该同志目前所担任的苏联新闻局副局长职务。索罗金同志,1904 年生,1927 年成为苏共党员,具有丰富的国外工作经验,精通英语,我同意派其到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工作。

有必要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中设立能够在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工作的第二个苏联代表的职务,个人工资为 4 500 卢布。

关于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内容,具体参见附录。

M. 苏斯洛夫(签名)

1953 年 8 月 11 日

附件:

关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运动

苏共中央决议:

一、鉴于世界和平大会所提出的为以谈判方式调解一切国际问题而开展世界性运动的倡议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有必要于今年 8—12 月间在苏联广泛展开这一运动。

该运动的主要任务理应如下:

1. 苏联劳动者赞成世界和平大会提出的通过谈判方式调解国家间存在的一切国际性问题的要求。
2. 苏联全体人民拥护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该政策坚信,当代国际形势中任何有争议的或未解决的问题均可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彼此协商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苏联全体人民支持苏联政府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3. 苏联人民非常满意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该协定是朝鲜和中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和民主阵营的巨大胜利,展示了和平解决所有其他国际问题的可能性。
4. 揭露敌视和平势力的阴谋,及其为阻碍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可能采取的各种挑拨离间方式(如柏林冒险者们、李承晚的挑拨离间等)。必须针对和平的敌人们为挑起战争和破坏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可能实施的一切罪恶活动给予有力的回击。

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情况,有必要对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为实现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而采取的具体举措给予支持(例如,苏联政府对三大国提出的关于召集四国外交部长会议的提议的答复,苏联就德国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以及苏联代表团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例会所提交的提案,等等)。

这场运动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苏联各民族,加强其为争取和平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提高其

对战争煽动者的阴谋的警惕性，巩固和扩大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国际主义兄弟联系。

二、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应采取以下举措：

1. 于今年8月下半期在莫斯科召集由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参加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以讨论如下问题：《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结果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即H.C.吉洪诺夫同志的报告）。

2. 根据世界和平大会例会的决议，于今年9月召开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扩大全会，参加者包括各地方社会组织的代表，以讨论苏联各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任务的问题。

3. 在8—12月间在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高校召集劳动者会议，以听取题目为：《国际形势和各国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报告。

4. 为了对这场运动的成果进行总结，计划于1953年12月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举行第五届全苏和平拥护者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当代国际形势和各国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即A.A.苏尔科夫同志的报告）

责成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最晚于今年11月1日以前就召集上述会议事宜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关草案。

建议各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和劳动者会议，根据本决议第一款所提出的这次运动的任务，通过相应的决议。

三、责成苏联社会组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科学院，共青团中央，苏联作家协会管理局，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苏联作曲家、建筑师和艺术家联盟管理局等——在运动期间的不同期限内发表支持运动的声明。

四、责成各级党组织积极参与这场运动。

责成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根据本决议第一款之要求，确保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劳动者集会的顺利举行。

五、责成中央，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报刊编辑部以及苏联文化部确保通过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及时报道如下相关资料：各保卫和平委员会全会的召开，苏联各社会组织和劳动者为开展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运动而举行的会议。

六、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和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在全国范围内负责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的运动的领导工作。

七、派遣苏联代表——H.C.吉洪诺夫、И.Г.爱伦堡、A.A.苏尔科夫和П.В.古利亚耶夫等同志参加即将于今年9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会议期限为10天。此次世界和平大会机关会议将讨论，与为和平调解国际问题而开展世界规模运动的相关问题。届时，苏联代表将依据苏共中央于今年6月12日所批复的指令以及本决议的相关内容，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指针。

为了加强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对保卫和平运动的日常领导工作，兹责成在世界和平大会机关工作的苏联代表争取实现如下目标，即选举在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从事长期工作的B.A.索罗金同志担任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

计划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定员内设立第二个苏联常驻世界和平大会秘书处的代表职位,其个人薪水每月为4500卢布。

批准B. A. 索罗金同志担任世界和平大会的秘书职务,并免去其目前所担任的苏联新闻局副局长职务。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33, л. 64 - 71

№20207

斯柳萨列夫的报告：第六十四 歼击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

(1953年9月以后)

.....^①

1950年11月,鉴于美国侵略军已逼近中朝边境,我歼击航空师(第二十八和第一五一师)奉命:防止美国空军空袭,掩护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和行政中心,朝鲜人民军后方设施(包括鸭绿江铁路桥、安东地区的机场和朔州地区的水丰水电站)。

我歼击机的作战范围被限制在:鸭绿江沿线和朝鲜湾沿岸。

随着朝鲜和中国军队的向南挺进,我部又接到如下补充任务:掩护北朝鲜境内设施和交通线,作战又向纵深推进了75公里。

1950年11月末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成立,其中包括3个歼击航空师,即第二十八、第一五一和第五十师。

总的来说,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包括如下部队:2—3个歼击航空师、1个独立夜战歼击航空团、2个高炮师、1个高空探照灯团。不过,该军的部队构成并不固定,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至同年8月末该军所属只剩2个歼击航空师、1个夜战歼击航空团、2个高炮师和1个高空探照灯团。

1951年6月以前由于受到中朝边境附近机场分布和本军所肩负的对中朝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的限制,本军实际参战的部队只约有2个团的兵力,60个机组。

只是从1951年7月始,庙沟机场投入使用之后,我军才有可能将5个团的兵力(120—150个战斗机组)投入作战。

^① 该档案在俄国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从我军在朝鲜参战至 1951 年末，美国空军白天的主要突击力量是轰炸机（B-29 和 B-26）。根据这一情况我军这一时期的重点打击目标也以敌轰炸机为主。稍后，随着敌人白天的突击力量转变为强击机，我军的打击重点也随即转为主要针对敌强击机作战。

在防止敌轰炸机空袭和为北朝鲜地方设施和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的过程中，我军不仅要面对敌轰炸机和强击机，而且还要与敌为上述飞机担当掩护任务的歼击机作战。

为了完成所肩负的战斗任务，我军各部队自 1950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 月期间共实施战斗起飞 19 203 架次。

这一期间我军歼击机在白天以机群为单位实施的空战共 307 次，其中：以双机为单位作战 19 次，以中队为单位作战 112 次，以团为单位作战 84 次，以师为单位作战 50 次，以军为单位作战 42 次。

参加空战的机组共 7 986 个，占全军飞行机组总数的比重为 43%。

战斗中共击毁敌机 562 架，其中：B-29——48 架，B-26——1 架，PB-45——2 架，F-47——2 架，F-51——20 架，F-80——103 架，F-84——132 架，F-86——218 架，F-94——8 架，“流星”——25 架，F-6 和 F-5——共 3 架。

夜间单机空战 16 次，击毁敌机 2 架 B-26。

自 1950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 月，我军空战中共击毁敌机 564 架。

期间，自身损失：飞行员——34 人，飞机——71 架。

敌我损失比率：7.9 : 1。

我军平均实施战斗起飞 33 架次击毁 1 架敌机，战斗起飞 285 架次自身损失 1 架飞机。

我击毁 1 架敌机平均消耗弹药 212 发。

我 1 个机群平均空战时间：与敌轰炸机和强击机——15 分钟，期间我歼击机平均实施攻击 2—3 次；与敌歼击机——10 分钟，平均攻击次数 2 次。

我歼击机小型和大型机群作战情况。

以高空作战为主：与敌歼击机——8 000—12 000 米，与敌轰炸机和强击机——7 000 米以下。

此类空战的特点：敌歼击机极力将空战高度保持在 8 000 米和以下，因为敌歼击机 F-86 如果超过 8 000 米以上，其战斗性能便远远不如我米格-15 战机。

在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受到我军重创之后，敌人被迫重新审视自身空军的使用问题，并采用了一些新战术，还通过将 F-80 改装为 F-86 的方法来加强其歼击机群力量。

从初期的空战实践中敌人已清醒地认识到，其 F-80 和 F-84 等歼击机在性能上已不能继续作为歼击机来使用。

随着美军司令部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增加空军力量、改进飞机性能、改变行动战术等，到 1952 年初，朝鲜战场白天和夜间的空战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而我军在 1952 年上半年的战斗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军战斗部队已缩减为两个歼击航空师（3 月份以前为第三二四和第三〇三师，3—6 月为第

九十七和第一九〇师)。

1952年以后朝鲜空战形势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敌人白天的主要突击力量已变为强击机;另一方面,此时敌强击机与原先的轰炸机相比,兵力上已约达到原先的4倍。

这一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我部队的战斗力,集中对付敌强击机,我军主要以小机群(以分队和中队为单位)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高度保持在8000—14000米之间。这将有利于我以劣势兵力对数量众多的敌歼击机“掩护”在广阔战线上实施干扰作战,从而为我突击机群向敌强击机发动攻击创造条件。

如果1951年我军18759次战斗起飞中以大机群(以团、师、军为单位)为单位的作战共14112次,比重为75%,那么时至1952年,我军白天23539次战斗起飞中以大规模机群为单位的作战总数则为12529次,比例仅占到53%。

.....

这一时期我夜间战斗起飞共1062架次。

1952年我军歼击机共实施机群式空战868次,其中参战机组共计9014个。

空战中共击毁敌机379架,其中:F-51——8架,F-80——13架,F-84——41架,F-86——315架,“流星”——1架,F-4y4——1架。

夜间单机空战32架次,击毁敌机15架(11架B-29、3架B-26和1架F-94)。

1952年我军共击毁敌机394架。

自身损失:飞行员——51人,飞机——172架。

敌我损失比率:2.2:1。与1951年相比,这一时期的战斗起飞架次大幅增长。1952年我军战斗起飞月平均增至600架次。

鉴于我歼击机战斗积极性不断增加,歼击机和强击机损失惨重,敌空军于1952年末调整了自己的行动战术——不再使用大机群,而是利用安州和开城一线以北地区的复杂气象条件,以小机群在广阔战线上展开活动。

与1951年相比,1952年我军的空战效率也有所下滑。

我歼击机作战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 我军空战的主要对象是敌歼击机。后者在飞行—战术参数上与我米格-15相差无几。

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些实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1951年在空战中我军共击毁敌机496架,其中F-86歼击机206架,1952年我共击毁敌机379架,其中歼击机315架。

2. 我军在同敌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进行空战中取得胜利的明显小于同敌轰炸机作战。

3. 1952年在我军与敌空军作战的同时,中国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也开始参战。

1952年11月以前,中国空军部队作战时主要是配合我歼击机对敌歼击机和强击机小型机群实施攻击。

从1952年11月起,我军司令部开始高度重视让中国空军积极参战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空军指挥部和各部队在作战行动的组织上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具体如下：

1. 向其传授作战经验，通过开会分析和研究与敌歼击机、强击机作战的协同配合等空战技术。

2. 在空军部队的指挥、组织和导航等方面对其进行指导。

中国空军参战主要遵循了如下顺序：先是与敌小机群作战，随后对敌空军的大规模集中空袭实施反击作战。这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空军与我军歼击机协同作战。我部队承担主攻，在安州和开城一线远程空域对敌“掩护”歼击机实施干扰作战；中国空军在定州（Тэйсю）和浦津（Бугдин）地区参战，对我作战行动实施策应；中国空军退出战斗时，由我歼击机群负责掩护。

第二阶段，中国空军参加一线作战，我军歼击机实施策应和掩护其退出战斗。

第三阶段，中国空军独立作战，作战主要对象是敌歼击机。中国空军部队的作战区域主要是西部沿海；朝鲜空军作战区域主要是东部沿海。我军各部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根据空战形势随时准备向上述两空军部队提供援助。

至1952年末，中国空军数量已颇具规模。其不仅可配合我军歼击机参加对敌一般机群的作战，而且还参加了对敌空军大规模空袭的反击作战。

中国空军的积极参战加强了我军与敌空军对抗的实力，激发了我歼击机在远距离关键地区对敌实施作战的积极性，并给予敌人以更重大的打击。

我军不断增加的作战积极性，促使敌人被迫于1952年底对自己的空军机群进行了重新武装——将F-84改装为F-86和F-30。

与此同时，从1953年初起，美军司令部决定让自己的轰炸机在夜间积极行动，对安州和咸兴以北地区的设施和交通线实施空袭，以替代强击机白天在上述地区的活动。

1953年1月上旬，我军歼击机夜间重创了敌轰炸机。空战中共击毁敌B-29轰炸机7架。因此，1月下旬至停战协定签署期间，敌轰炸机只是在气象条件复杂的情况下才敢夜间趁机在北朝鲜地区展开活动。

与1951—1952年间不同，1953年我军的作战行动是在更为复杂的空战和气象条件下进行的。

自1953年3月起，美军指挥部开始以F-86和F-30代替强击机参战，针对这一情况，我军的应对之策是：在所掩护地区以小机群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积极作战。

在这一战斗中，我军承担了主要责任。因为此时中国空军对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尚未作好准备。

因此，我军的战斗任务极其繁重，尤其是在1月至停战协定签署之间一段时期。这里有如下数据可以作为佐证：如果1952年的12个月间，我军的战斗起飞为23 539架次，平均每月1 961个架次，那么仅在1953年的7个月间，白天我军便实施作战起飞18 152个架次，平均每月2 600架次。1953年的战斗起飞月平均架次比以前增加了650架次，即33%。

为了给我突击机群创造更有利的对敌强击机实施攻击的条件，我军原准备与敌歼击机

“掩护”作战的歼击机现在均采取小机群作战的方式。1953年的7个月间,我军18 152架次战斗起飞中,以双机、分队和中队为单位的战斗起飞便达到13 009架次,达72%。

在我歼击机的积极进攻下,敌歼击机只敢在战术条件有利和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投入战斗。

而美军指挥部,即使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仍无法在空战中为自己的强击机提供有效的保障。为了遏制我歼击机的活动,其加强了在我安东机场地区上空的“猎杀”作战行动。敌人利用一切有利战术条件对我歼击机实施压制性攻击。

1953年白天我军共实施机群式空战508次,其中参战机组达3 713个。空战在各个高度上展开——从超低空至米格-15飞机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

上述空战我共击毁敌机125架,其中:强击机F-80和F-84——12架,歼击机——114架。

空战结果显示:我军歼击机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歼击机;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在我军所掩护的地面设施上空,带有偶然性。

我军夜间战斗起飞1 373架次,实施单机空战59次,击毁敌机13架,其中:PB-29飞机——1架,B-29飞机——6架,B-26飞机——1架,F-84飞机——2架,F-94飞机——2架,F-3D飞机——1架。

在1953年7个月白天和夜间的空战中,共消灭敌机139架。自身损失:飞行员——25人,米格-15歼击机——76架。1953年敌我损失比率为1.9:1。

与1952—1953年间不同,1953年我军在完成了所承担的战斗任务的同时,还在机场值班时的一级和三级战备状态下实施起飞,以巡逻方式对我军负责的设施提供了空中掩护。须知,此类在机场值班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战斗起飞含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它可能导致其不能对敌机实施及时的拦截。

我军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共击毁敌机1 097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10人,飞机——319架。战争期间的敌我损失比率为3.4:1。

结论:

……从在朝鲜参战开始至停战协定签署,尽管美国空军力量上优于我军,但我们还是没有让其得到摧毁我军所保护的主要设施的机会,而且期间敌各类型空军均遭到了我军的重创。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近卫空军中将
斯柳萨列夫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参谋长、上校
别列日诺伊

№005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国通报 联合国会议的结果

（1953年9月1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向其通报联合国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讨论结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同志的电报稿。

基本上赞同苏联外交部呈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向其通报联合国朝鲜政治会议问题讨论结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同志的电报稿。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考虑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511, л. 4

№25109

格拉德舍夫致苏斯洛夫函：缅共中央 支持苏共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议

（1953年9月11日）

致苏斯洛夫同志秘书处：

苏联外交部转送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支持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全体会议做出的决议。这样的决议在我国的报纸上没有发表。

通报材料将供苏共中央联络部本部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П. 格拉德舍夫

1953年9月11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91, л. 610

№21350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刘少奇请 帮助校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1953年9月12日)

苏共中央印鉴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刘少奇的信和我们通过苏联驻中国使馆获得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英文译稿。

附以上所述的内容(收件人亲启)

A. 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9月12日

第2129/ДВ号

附件：

刘少奇给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同志的信

致苏共中央

苏斯洛夫同志：

感谢苏联方面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文译稿的校对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如今，该译本已获准并转交给英国同志。不久，该书将在伦敦出版。兹发给你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英文译稿，请你们帮助我们校对这些译稿。

如果你们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英文译稿已校对完毕，那就请把译稿发回给我们。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刘少奇(签名)

1953年8月15日

№24873

佩罗夫致葛罗米柯函：关于 在华苏联专家组组长的报告

（1953年9月15日）

葛罗米柯同志：

对于您在1953年5月25日发来的第087-1/ДВ号信函，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如下通报。

布拉金同志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组长，他的报告主要列举了1952年期间中国在计划设计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此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计划设计小组通过提供咨询给予了帮助，有时候则直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比如，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在1952年首次及时完成了计划任务。

苏联专家还对1953年国民经济方案的制订工作提供了帮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的制定提供了帮助。

根据我们专家提出的建议，成立了物质技术保障计划管理局，制定了组建国家物资和粮食储备管理局的方案及1952年的国家商品储备计划。

但是，报告没有阐述苏联专家在完成他们的主要任务——在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上向中国的计划单位提供帮助的作用。关于中国的计划单位在中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发展方面向苏联专家提出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报告中一点也没有谈到，报告中也没有通报，我们的专家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关于苏联专家主动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一点也没有谈到。从报告中也不能看出，苏联专家在建议采取某些措施的时候考虑到了中国现今经济状况的特点。

布拉金同志提交的报告不能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工作做出实质性的结论。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Г. 佩罗夫

1953年9月15日

№00593

葛罗米柯与张闻天谈话纪要： 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

(1953年9月29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3年10月1日

第211号

1953年9月29日接见中国大使张闻天

今天4时30分接见了中国大使张闻天，并向他声明如下：

鉴于法国、美国和英国政府9月2日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问题的照会，9月28日苏联外交部向法国、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

在这个照会中，苏联政府建议：

一、在法、英、美、中、苏外长会议上讨论缓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措施。

二、在法、英、美、苏外长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包括会议筹备过程中提出的所有建议。

而且，这里指的是召开一个外长会议，它应当按上述次序讨论所提出的问题。

我向张闻天递交照会后，请他将照会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照会的态度。

张闻天表示感谢并说将向本国政府报告照会内容和上述声明。根据大使的请求，我把声明文本交给了他。

谈话持续了15分钟。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和远东司副司长列多夫斯基同志参加了会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11423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函： 就答复沈阳总领事馆来函给的信

(1953 年 10 月 10 日)

归入第 448 号文件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H. Γ. 叶罗费耶夫同志：

现将苏联驻沈阳市总领事馆收到的信函寄给您，请就写信人所感兴趣的问题给他以答复。
附信件全文。^①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卡普拉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2203 页

№23762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 转呈中共中央寄送的材料

(1953 年 10 月 15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向您呈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寄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关亚洲各国的资料。材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于 10 月 12 日转交给苏联外交部。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附信件。——编注

附上述提及的资料及十二页的资料目录。

A. 葛罗米柯(签名)

1953 年 10 月 15 日

第 2427/OB 号

手写批注: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根据收到的资料, 请准备一个情况说明。

苏斯洛夫

10 月 16 日

第 50045 号文件的说明

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同志处收到中文的有关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马来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资料, 共有 32 本小册子(4261 页)和 29 份文件(773 页)。

这批材料的绝大部分是对外联络部较早时收到的, 并译成了俄语, 没有实际意义的部分材料不需要翻译。

收到已译成俄语的材料中, 只有部分材料应该是译自缅甸语、越南语和马来语。

因上述情况, 我们请求:

1. 不考虑将小册子转交给对外联络部图书馆。
2. 装订清单编号为“第一号”上的文件, 作长期保存并返还部里翻译。部领导将按翻译的进展通报文件内容。
3. 清单编号为“第二号”的文件归档。

И. 维诺格拉多夫^①(签名)

第一号材料清单

需译成俄语的有关越南、缅甸和马来亚方面的中文材料。

一、有关越南的材料

1. 1953 年 2 月 8 日长征(曾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在国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 页。
2.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关一些特别问题的第 38 号指示, 5 页。
3. 1953 年 4 月 23 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 4 页。
4.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主席)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5 页。
5. 1953 年 6 月 10 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8 页。

^① 维诺格拉多夫, 时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编注

二、有关缅甸的材料

6. 缅甸农民运动简史,7 页。
7. 缅甸共产党副书记德钦丹东的电报与信件,22 页。
8. 有关缅甸共产党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21 页。
9. 1952 年 12 月 15 日各农民联盟会议上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讨论,21 页。
10. 1952 年 7 月 3 日批准的缅甸共产党新纲领,18 页。

三、有关马来亚的材料

11.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有关马来亚共产党的政策与组织情况的报告,337 页。
 12. 关于森林根据地的一些补充意见,4 页。
- 共计 481 页。

第二号材料清单

应归档保存的有关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日本的中文材料。

一、缅甸

1. 缅甸共产党总书记关于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1951 年 9 月),11 页。
2. 缅甸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给党中央的报告(1951 年 9 月),19 页。
3. 有关缅甸人民军的情况(1952 年 12 月),17 页。
4.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宣传干部问题的报告(1950 年 9 月),28 页。

二、越南

5. 关于审判机构法,6 页。
6. 土地法草案、人民法院组织的情况、有关惩治犯法地主的临时条例,15 页。
7. 党在发动群众运动中的政治方针,5 页。

三、尼泊尔

8. 一些有关尼泊尔革命运动的材料,76 页。
9. 古埃尔(Гуэрли)、巴坎特(Бакэт)和普拉坦哈(Пулатэхань),76 页(根据中文音译)的自传,9 页。

10. 古埃尔(Гуэрли)论辛格,5 页。

四、印度尼西亚

11. 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争取民族彻底自由的斗争,25 页。
12. 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斗争,艾地的文章,13 页。
13. 有关印度尼西亚各政党和其领导材料,28 页。

五、日本

14. 日本共产党北京支部有关古(Гу)问题的决议,8 页。
15. 有关“促进中日贸易的国会同盟”材料,9 页。
16. 共产党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7 页。

17. 希达(Сида)写给宋(Сун)和野坂参三的信,11 页。
共计 292 页。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92, л. 75 - 80

№21357

西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 帮助翻译西班牙语《毛泽东选集》

(1953 年 10 月 30 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答复经苏共中央转发的中共中央 1953 年 8 月来电,我请你们向中共中央转发以下所附电报。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Ф. 克拉乌金^①(签名)

1953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

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致中共中央

北京市

作为对你们于 1953 年 8 月 21 日(给我们)所发电报的回复,兹建议由拉卡萨·路易斯同志及其妻子桑恰·索列达特同志担任著作出版的西班牙语顾问。

上述同志的个人简历如下:

拉卡萨·路易斯,54 周岁,自 1937 年起便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著名建筑师。现以政治侨民身份居住在苏联。目前工作单位为莫斯科市苏联建筑科学院。除西班牙语外,还懂俄、法和德语,也可译英文。不是文学和出版问题专家,但广泛涉猎西班牙文学,在翻译和编辑方面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该同志以函授方式毕业于马列主义大学。

^① 克拉乌金,按照俄文音译,西班牙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具体职务不详。——编注

桑恰·索列达特，43 周岁，自 1936 年起便为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职业为中学教师。自 1939 年起，以政治侨民身份留居苏联。除西班牙语外，还懂英、俄语和部分法语。该同志并非文学问题专家，但了解西班牙文学，具有师范教育工作经验和一定的翻译工作经验。她也是以函授方式毕业于马列主义大学。

上述两同志有两个孩子——分别为 13 和 10 周岁。父母希望，孩子们能与自己一起前往，从而有可能继续在苏联中学上学。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将派遣这两位同志来完成上述工作，为期 2—3 年。

致敬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3 年 10 月 30 日

归档

手写批注：

1953 年 11 月 5 日发给驻中国大使的信，以便其转交中共中央。

И. 谢尔巴科夫，1953 年 11 月 5 日

М. 维诺格拉多夫，1953 年 11 月 6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55 – 57

№20219

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总结报告： 苏联空军及中朝空军战果情况

（1953 年 11 月 3 日）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和中朝空军联军

1953 年 6 月 25 日到 7 月 27 日作战结果的报告

1953 年 11 月 3 日

一、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活动

（一）我军歼击航空兵

1. 我军开始在朝鲜作战始于 1950 年 11 月，期间派出参战的共有 10 个航空师……^①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2. 共实施战斗起飞 64 300 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 49 449 小时。

实施空战 1 872 次,期间向敌射击的飞行员共计 6 462 人。

3. 击毁敌机 1 106 架,其中:

F-86-30——1 架

F-86——650 架

F-84——178 架

F-80——121 架

F-4-y5——2 架

“流星”——28 架

F-47——2 架

F-51——30 架

F-94——13 架

B-26——8 架

B-29——69 架

B-45——2 架

其他——2 架

4. 我军损失:飞行员——120 人,飞机——335 架。

(二) 我军高炮部队

1. 自 1951 年 6 月我军高炮部队也参加了作战,担当安东各重要机场和水丰水电站的地面掩护任务。

期间,我 2 个高空探照灯团、4 个高炮师(第八十七、第九十二、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五师)或 9 个高炮团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各师承担此项特殊任务的时间长短不一,从 6 个月至 1 年零 8 个月不等。

2. 被我高炮击毁的敌机共计 153 架,其中:

F-86-30——5 架

F-86——35 架

F-84——25 架

F-80——47 架

F-51——5 架

B-26——17 架

B-29——7 架

其他——12 架

3. 我军高炮部队自身损失——阵亡 68 人,受伤 165 人;高炮 6 门,探照灯 1 台。

二、我联合空军部队的作战活动(据不完整资料)

1. 自 1951 年 12 月起中国空军参战,兵力共计 2 个师(第三和第四歼击航空师)。从

1952年3月起又增加了3个师(第二、第六和第十五歼击航空师)。从1952年5月起又增加了2个师。朝鲜空军在1952年初有1个师开始参战,截至1952年底,其兵力增至3个师,其中2个歼击航空师作为联合空军部队参战。

2. 中朝空军共实施战斗起飞22 300架次,空战366次。期间共击毁敌机271架,其中:

F-86-30——5架

F-86——176架

F-84——27架

F-80——30架

F-4-y4——15架

F-51——12架

B-26——1架

“流星”——2架

“野马”——1架

其他——2架

3. 联合空军部队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

三、共击毁敌机2 814架,其中: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航空兵部队——1 106架,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高炮部队——153架。

共计: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 259架。

中国和朝鲜空军——271架,

朝鲜人民军陆军——1 284架。

总共——1 555架。

自身损失: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飞机335架,飞行员120人。

联合空军部队——飞机231架,飞行员126人。

总计——飞机566架,飞行员246人。

第五战区指挥官、少将

莫尔德文采夫

№24875

什维尔尼克致楚库洛夫函： 对中国煤炭矿井的设计

(1953 年 11 月 5 日)

致苏联煤炭工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

M. M. 楚库洛夫：

1953 年 9 月 8 日对地质材料进行的技术鉴定结果和对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另外提供的矿山开采材料进行检查(这些材料已经得到现有煤炭资源管理总局小矿井的检验)的结果显示,现有的地质资料质量不行,这些资料对于设计中国第 11 号新的深度(500 米)地道矿井是不够的。

开展的钻探工作不是完全有价值的——完全缺乏关于钻探过的煤田的出口信息,在钻探出的一些样煤含灰量达到 40%—60%的情况下,对煤田的钻探程度是不够的。看起来,对一些钻孔钻出的煤进行的取样分析是不够的,其中包括缺少关于含灰量的数据。

对采矿开发工作进行的取样分析的结果也不是完全有价值的,因为取样地点同采矿点没有关系。

为了保证在第 11 号深层地道矿井的设计工作中获得所需的完全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就必须另外再进行钻探,必须钻过煤田 60%以上的地段,此外还必须从各相关的矿井中进行取样分析,把所有的数据都混合起来纳入矿山测量专家的计划中,并制定地质报告,根据全苏矿藏委员会的请求对煤田的储量进行计算。

在得到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另外提供的上述材料之前,要着手进行第 11 号地道矿井的设计工作就不能不请求您向订货单位下达相关的关于进行必要的补充工作的指示。

同时,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认为,考虑到矿产地机械条件复杂,煤炭的质量较低,要把其建设成为一个生产能力较强的矿井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最好向订货单位建议不要加快第 11 号地道矿井的基建工作,而将其建设延迟到第二期进行。

列宁格勒国家矿场设计院院长

A. M. 什维尔尼克

1953 年 11 月 5 日

№21358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 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

（1953年11月17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M. A. 苏斯洛夫同志：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今年8月31日第2019/ДВ号信函的请求，兹给您送去中共中央给英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其中请求推荐两名英国共产党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外语文学作品的顾问。

在提及这封电报的同时，中国使馆还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说，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克列门特·达特（巴里姆·达特的兄弟）夫妇正在编辑一本著作，而到今年年底他们就可能结束这方面的工作。鉴此，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国（驻苏联）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经相关部门了解一下，在结束了在莫斯科的编辑工作之后，克列门特·达特夫妇是否同意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外语文学出版顾问的身份从事编辑工作；另外，再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再向中国派遣一位出版方面的顾问，以从事英文书籍的编辑工作。

Г. 葛罗米柯（签名）

1953年11月17日

第297/АГ号

附件：

伦敦

苏联大使：

请向英国朋友转达如下内容：

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经我们请求英国朋友向中国派遣两位英文著作出版方面的顾问。目前，中国朋友已确认了这一请求，并表示希望不是像以前所请求的那样派遣两位，而是三位此类顾问前往中国。请向英国朋友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满足（中国朋友的）这一请求并（向我们）通报（相关情况）。

1953年11月17日

№11424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 在东北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

(1953年11月17日)

归入第610号文件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H. T. 叶罗费耶夫同志：

11月15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全权代表应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的邀请参观了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之际举办的苏联摄影展览会。展览会设在东北图书馆大楼一层，占据了几个房间。

展览会上展出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寄来的材料，如《乌克兰共和国的建设》、《苏联的工业》、《苏联的选举制度》、《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农业》，展览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东北图书馆馆长杨同志对我们说，每天来参观的有2000多人，他们是各单位集体组织来的。他说，今天早晨来参观展览的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苏联工业的机械模型很感兴趣。

中国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说，市内共举办6个这样的展览会。我们觉得，在准备寄给中国的苏联人民的文化信息、苏联的图书馆、苏联的剧院等材料时，需要经常有一些反映苏联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发展的画报材料。在东北图书馆举办的展览会上没有这类材料。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放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的照片，观看中国的戏剧《白毛女》的观众的照片，去展览有中国作家作品的工厂图书馆的观众的照片等。这些照片在展览会的参观者中都享有盛誉。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 卡普拉洛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04—2205页

No25110

费德林致赫鲁晓夫秘书处函： 中国驻苏使馆转交缅共中央贺电

（1953年11月21日）

附件是中国驻苏大使馆转交的电报：关于缅甸共产党就十月革命36周年给苏共中央的贺电。

送赫鲁晓夫同志书记处

舒伊斯基同志：

兹把缅甸共产党中央的电报呈送给您，该电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在今年11月16日送给苏联外交部的。

上述附件是英语及其翻译文本，共4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费德林

1953年11月21日

附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36周年之际，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并通过苏联共产党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衷心的祝贺！

在列宁—斯大林的党的英勇领导下，俄国人民突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推翻了帝国主义，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胜利之日成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奴役、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对战争贩子的各族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的节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其国际意义。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根本转折，是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通往新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伟大成功是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它宣告了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端。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伟大成就宣告了殖民地革命时代的开端。苏联是苏维埃各族人民友谊的支柱，是苏联人民的骄傲，它坚定地支持世界的和平力量，自其成立之日起就举起了为世界各国和平和友谊而斗争的旗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国家经受了各种风浪，经受了所有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今天，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在强大而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走向共产主义。世界1/3的人民正在以苏联人民为榜样，他们也忠于社会主义道路。

缅甸共产党中央希望,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各国和平和友谊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全世界牢不可破的支柱——苏联万岁!

英勇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列宁—斯大林的党——苏联共产党万岁! 全世界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旗手万岁!

缅甸共产党中央

1953年11月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91, л. 802 - 806

№11425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 在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

(1953年11月23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 Г. 叶罗费耶夫同志：

关于在中国东北举办的苏联电影节。

11月7日至16日在(中国)东北五大城市(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和大连市)举办了苏联电影节,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电影节期间放映的电影有:《科尔季的光明》、《勇敢者的舞台》、《在大洋的冰层》、《远离莫斯科》以及苏联的一些动画片。

在沈阳市,电影节于11月4日在友谊宫开幕。出席电影节开幕式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载,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委员会书记黄欧东,市内党、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及先进生产者、文学艺术活动家、人民解放军英雄等,总共有600多人。出席电影节开幕式的还有苏联驻沈阳市总领事Б. Н. 魏列夏金及一些苏联专家。

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发言的有: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张东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王化南(Ван Хун-нань),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刘长东(Лю Чжань-дун)。

在东北其他一些城市举办的电影节也是在隆重的气氛中开幕的，出席开幕式的有党组织、社会团体的各行政组织的代表。

苏联电影节举办得非常成功。东北的一些报纸登载了大量的材料，向民众介绍苏联的电影，一致指出，苏联电影对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他们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报纸还反映了民众想看到苏联电影的愿望。沈阳报纸《沈阳日报》写道：“电影节开幕后的几天来出现了初寒，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然而在各电影院门前总是有很多人，都是来看苏联电影的。”

在许多单位，人们看过苏联电影之后都举行座谈会。例如东北工业学院（沈阳市）所属工农速成中学就举行了这样的座谈会。劳动英雄姜贵银、马恒昌、郑希申（Чжэн Си-шен）都是这所中学的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发言中表示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以便掌握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鞍山报纸《工人生活》报道说，在讨论电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时，基本建设工作人员中的一位叫陈云绍（Цэйн Юй-шао）的说：“苏联人民有高尚的品质，响应祖国的召唤，不怕困难，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应当以此为榜样不断地学习。”

在举办电影节的东北五大城市里，观看苏联电影的人数有 110 多万，其中：沈阳市 43.7 万人，鞍山市 15 万人，长春市 15.2 万人。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 卡普拉洛夫（签名）

1953 年 11 月 23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2206—2208 页

№20220

拉科夫宁的报告：苏联空军与 侵入中国领空敌机作战的限制

（1953 年 11 月 24 日）

1. 今年 10 月 26 日斯柳萨列夫同志向总参谋长报告说，他已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各部队，一旦在中国东北领空发现入侵飞机，歼击机立即投入战斗，并一直尾追至鸭绿江（不得进入海域）；高炮部队也可立即向其开火。

总参谋长对斯柳萨列夫同志的建议表示同意，总参谋部还于今年 11 月 6 日发布了第 557644 号指令，对该决定予以确认。

2. 与此同时，斯柳萨列夫同志还报告说，联合空军中的中国空军部队在任何情况下，不

必根据任何指令,便可向侵略者实施攻击。

根据波特鲁舍夫斯基同志今年 11 月 18 日的报告,中国司令部通报说,联合空军部队已接到了关于可以与入侵飞机开战的命令。

3. 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布尔加宁认为,首先与入侵中国边境的飞机作战的应当是中国空军,而我们的歼击机只应在我空军受到直接威胁之时才可投入战斗。

4. 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驻防的机场是与联合空军部队中的中国空军在一起的,后者在沈阳、安东地区共驻有 7 个歼击航空师,驾驶的机型为米格-15 和米格-15Б。

在拥有如此兵力的情况下,联合空军中的中国歼击航空兵部队完全有能力独立地与入侵敌机作战。

结论:

1. 斯柳萨列夫同志应当发出指令,要求与侵犯中国边境的入侵飞机的作战活动应由联合空军中的中国歼击机部队来完成。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只是在自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即入侵飞机已逼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驻防机场或我飞机在空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才可投入战斗,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飞机也不得越过鸭绿江边界和海岸线。

2. 关于斯柳萨列夫同志的命令已发生部分变更的情况,请通过我最高军事顾问向中国司令部通报。

空军中将

拉科夫宁

1953 年 11 月 24 日

ЦАМО РФ, ф. 16, оп. 3139, д. 157, л. 296 - 298

№213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斯洛夫报告: 中共请求英共派遣文学顾问

(1953 年 11 月 26 日)

致苏共中央

M. A. 苏斯洛夫同志:

1953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请求苏共中央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转发一封电报,其中请求向中国派遣两名英国共产党员,以从事英文著作出版顾问方面的工作。

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已发给苏联驻伦敦大使，并于 1953 年 9 月 7 日转交给了 Г. 波立特^①同志。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在今年 11 月提及这封电报的同时，又请求苏联外交部了解一下，目前正在莫斯科从事 И. В. 斯大林著作选集编辑工作的克列门特·达特夫妇是否愿意前往中国从事英文著作出版顾问的工作，另外中国使馆还请求我们了解一下，英国朋友是否可能除克列门特·达特夫妇，再向中国派遣一位英文著作编辑方面的顾问。

我们认为，英国共产党中央最好能满足中国朋友的要求。

发送给苏联驻英国使节的电报草案请参见附录。^②

我还要请你们允许经苏联外交部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通报如下内容：中共中央关于派遣克列门特·达特夫妇和补充派遣另一位英文著作出版顾问前往中国的请求，我们已向英国共产党中央作了相应的转达。

Д. 维诺格拉多夫

1953 年 11 月 26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61

№24876

莫洛托夫与张闻天谈话记录： 中国增加粮食供应有困难

（1953 年 12 月 3 日）

机 密

出席会谈的有：戈宝权、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以及费德林。

张闻天通报说，中国政府同意任命尤金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欢迎他前往中国。

莫洛托夫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

张闻天请求告诉他关于尤金到中国的日期。

① 哈里·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主席。——编注

② 参见以上 №21358 文件。——编注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同意,并通报说,现在尤金正在柏林交接工作,几天后将会返回莫斯科,以便准备前往中国。

张闻天通报说,最近几天,中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并开始同苏联对外贸易部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国粮食作物(大米、小麦等)和植物油的生产出现了困难,中国对苏联粮食的供应量没有增加,并且,看起来这种供应不得不停留在去年的水平上。中国也不能增加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粮食的供应,尽管他们坚持要求中国增加供应。

由于中国的粮食困难(在城市出现了购买大米和面粉的队伍),中国政府决定垄断粮食贸易,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看起来,今后将实行供应粮食的票证制度。

莫洛托夫说到,如果粮食困难要求中国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实行票证制度的话,那么,当然必须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利用苏联在这方面丰富的经验,苏联的票证制度实行过好多次了。关于这个问题应当注意的一个状况是,实行粮食供应的票证制度的目的应当保障的不是对全体居民的供应,而只是保障对特定人员的供应。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应该坚持阶级的态度和原则,而且也要坚持对个别工人阶级阶层有差别供应的原则,也就是说,首先应当保障对比较重要的、先进的工人阶层的供应,因为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要由他们来完成,其次还必须对家庭成员实行有差别的供应等等。至于农民,苏联从来就不保障对他们的供应。

张闻天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并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必须利用苏联丰富的经验。

会谈持续了 10 分钟。

1953 年 12 月 3 日

费德林记录

РГАСПИ, ф. 82, оп. 2, д. 1258, л. 146 - 147

№11426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 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资料

(1953 年 12 月 8 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Н. Г. 叶罗费耶夫同志：

中苏友好协会东北分会总书记文建平在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全权代表的一次谈话中

说，现在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主要的任务是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此，文建平指出，中苏友好协会希望能得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以下材料：苏联是怎样搞工业化的？苏联工人阶级在搞工业化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苏联是如何解决工业化期间的粮食困难的？在工业化方面曾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样克服的？

苏联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 卡普拉洛夫

1953 年 12 月 8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9 卷，第 2209 页

№23828

波斯佩洛夫致赫鲁晓夫函： 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

（1953 年 12 月 16 日）

致 H. C. 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递给您根据您的委托起草的给毛泽东同志的问候函（一式两份）。

П. 波斯佩洛夫

1953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

给毛泽东的祝贺函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 60 寿辰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向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您辉煌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了这场斗争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真正的人民的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和主导力量。

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目前已成为维护和平和民主的巨大力量。中国劳动者所树立的光辉榜样正鼓舞着东方所有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殖民奴役、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建设新生活,殖民地和依附性国家的成千上万劳动者为摆脱一个世纪以来的压迫、饥饿和贫困而进行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成功地恢复了国家经济,实行了规模宏大的、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和其他一些最重大的革命民主措施。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坚定不移地提高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道路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自其无限忠诚于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学说,并创造性地把这一学说运用于自己的各方面实践。您在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领域所撰写的杰出著作就是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的鲜明范例。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您以自己的伟大贡献赢得了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真诚爱戴和深深敬意。

苏联人民从您的身上已深切地认识到,您是一位忠诚的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捍卫者,是一位维护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坚定斗士,是维护亚洲和整个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苏联人民祝愿自己的朋友和盟友以及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繁荣。

为了伟大中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我们衷心祝愿您——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健康、强壮、长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发送: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和 В. М. 米高扬同志

手写批注:

文件分送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12月17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35, л. 199 - 201

№11427

卡普拉洛夫致叶罗费耶夫报告：中国需要苏联歌曲

(1953年12月17日)

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人民民主国家部部长

H. Г. 叶罗费耶夫同志：

东北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找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请求在获得苏联新歌和俄罗斯民间歌曲方面给他们以帮助。剧院在研究苏联音乐方面工作量很大，许多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间歌曲正在由剧院的工作人员译成汉语。

现请求将苏联作曲家的新歌曲集和俄罗斯民歌集寄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处。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沈阳市全权代表

Б. 卡普拉洛夫(签名)

1953年12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210页

№21360

库兹涅佐夫致斯捷潘诺夫函： 转交中共中央和中宣部的电报

(1953年12月17日)

机 密

1953年12月18日

第2834/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В. И. 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给您中共中央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的电报以及由中国驻苏联使馆于今年12月16

日转交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给《真理报》主编 Д. Т. 谢皮洛夫同志的电报。

附具体涉及上述内容,共计 3 页(收件人亲启)。

B.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3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并转交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的电报

我们已收到你们于今年 10 月 30 日所发电报。中共中央对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欢迎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派遣的拉卡萨·路易斯和桑恰·索列达特等同志来中国从事西班牙文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上述同志可以携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并可以让其在北京的苏联中学里上学。中共中央请求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及时通报上述同志启程的具体日期。

中共中央

1953 年 12 月 10 日

译自中文

致苏共中央并转交《真理报》主编 Д. Т. 谢皮洛夫同志的电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已收到谢皮洛夫同志关于邀请 5 位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进行为期 3—4 个星期的访问,以了解苏联报刊工作经验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收到这一邀请表示深深的感谢。鉴于中国许多大型报刊的编辑部都很期望学习苏联报刊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希望该代表团的组成人数不是 5 人,而是 15 人,其中具体包括:来自《人民日报》4 人,以下报刊分别为 1 人——《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上海)、《东北日报》、《长江日报》(汉口)、《新华日报》(重庆)和《群众日报》(西安)等,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刊管理局——1 人以及两名翻译。该代表团团长为《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如果《真理报》编辑部接受我们的上述建议,那么我们的代表团将于 1954 年 1 月初启程前往莫斯科。关于访问苏联的具体问题将由邓拓同志与《真理报》驻北京特约记者科任同志直接商议。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中共中央宣传部

1953 年 12 月 12 日

归档

手写批注：

电文转给西班牙朋友及 Д. Т. 谢皮洛夫，永久保存。

И. 谢尔巴科夫

1953 年 12 月 21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8, л. 62—65

№23826

波斯佩洛夫致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函： 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贺电修改稿

（1953 年 12 月 24 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和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相关指示，兹呈递一份新的给毛泽东同志的六十寿辰贺电草稿，以替代我们于 12 月 23 日呈送的那份贺电草稿。^①

П. 波斯佩洛夫（签名）

1953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的六十寿辰到来之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谨向您致以自己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您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以您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并成为和平与民主阵营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在反对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斗争的严峻岁月，身为中央人民政府

^① 在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 12 月 23 日贺电草稿。——编注

主席的您,始终不渝地在为人民服务 and 为劳动者而斗争的壮丽事业中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您英明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新的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学说。您是中国和苏联人民之间永久友谊的旗手。

为了伟大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祉和繁荣,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我们衷心祝愿您——亲爱的朋友,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1953年12月24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35, л. 196 – 197

№13729

捷沃相、尤金与高岗会谈纪要： 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①

(1953年12月30日)

这次会谈是在鞍山回北京的火车车厢里进行的。高岗讲到中国的阶级斗争以及党对待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策。他指出,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在党内个别人和一些派别以言论的形式反对党的路线,并且实践中严重曲解党的路线。他援引薄一波的事作为例子,薄一波在担任财政部长时,对资本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表现为,在处理商业中的私营企业者时像对待工业中的私营企业者一样,给予优惠(不注重征税,反而向他们优先提供原料等)。根本没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超出了党和政府决议规定的范围,薄一波对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初级形式表现出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所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化在农村都不会有结果,也不会使农村经济生产有所增长。薄一波甚至还说,农村经济发展的事必须让农民自己去解决等。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放弃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放任自流。

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薄一波在1953年6—8月召开的财政经济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薄一波和追随他的小团体中的人的行为,激起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愤怒,毛泽东十分激烈地批判了薄一波的路线。薄一波因为所犯的错误被撤掉了财政部长的职位。

^① 该文件系在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编注

谈到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高岗说，东北在土地改革时就已经消灭了原来的富农，土地改革结束之后，80%左右的农民家庭成了中农。但农村中在土改时得到土地的农民中间开始产生新富农。这些富农所占的比重还不小——不超过2%。但值得担心的是，当共产党员也成为富农时，这些党员会开始反对党的路线，特别是反对向国家上交和出售粮食，开始进行投机倒把和放高利贷。高岗指出，不过，在东北富农的力量还不小，因为党从1951年开始就积极引导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社组织。现在80%左右的农户参加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组织，最主要的是劳动互助组。现在一共有5000多个生产合作社了，国家给这些合作社的农民提供贷款、种子和其他援助。

高岗没有详细地描述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只是说那些地方合作社农民的贷款利率明显比东北的低。

谈到城市里的阶级关系时，高岗说，一部分党员对城市资产阶级的态度使他很担心。他说，在党内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加强，由于混合型企业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和平阵营的成长，中国的资产阶级大概不会再追随美国人，而是有可能追随中国共产党，接受社会主义精神的改造。高岗说，他还不很理解这个问题的理论观点，所以他不太自信这种观点是否准确。高岗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 and 团体赞成他的观点。

当高岗谈到城市资产阶级时，他引用了1949年同斯大林的谈话，在谈话中斯大林跟他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他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高岗强调，按他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在农村，因为在中国有4亿农民——小私有者。他指出，但是，现在党内谁也没有提出加紧消灭富农和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的问题。

高岗说，资产阶级在某些领域里不愿意加入合营企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在那些领域里资产阶级拥有非常好的设备、技术熟练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那些领域里，资产阶级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特别是在轻工业企业中。重工业中那些设备老、旧并且已经磨损的领域，资产阶级比较愿意加入合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期望，高岗说，有大约80%的私有资本家加入轻工业部门，大约20%加入重工业部门。

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方面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资产阶级顽强地企图把工人、知识分子、党内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拉到自己一边。为此，开始采用多种手段：随意提高私营工厂工人的工资，使之比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高；收买和贿赂骨干工人；政策上理论上的分化等等。高岗着重指出，虽然资产阶级事实上没有取得成效，但这些破坏活动的危害不能忽视。

高岗指出，中国企业家中间那些被称作“民主党派的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暂时还不具备有组织的对抗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力量。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也谈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有可能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甚至会进攻苏联。安全机关应该注意监视加入政府机关和其他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家的情况。

那些称作“民主派和无党派”的参加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的团体与我们还不是统一的整体。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活动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郭沫若、沈雁冰（茅盾）、李四光、史良和其他人。也有一些人，受到比较多的怀疑，如罗隆基、陈济棠和其他人。还有一

些是显出了原形的美国和蒋介石的直接代理人,如梁漱溟。

高岗指出,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代表很多,在 22 个部中的 16 个部,其中包括农业部、轻工业部等(外交部、社会安全部、财政部、重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和其他关键部除外),其部长或副部长的职位被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占据。不过,在由民主派人士担任部长的所有部的实际工作都由副部长——共产党员来主持,民主派的部长大部分只履行咨询职能。大多数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人民中不享有声望和信任。由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中共中央委员会需要在地方党组织中作专门指示,为了在选举中资产阶级的代表获得支持和通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们之中的人谁也无法当选。

在会谈的结尾,交换了参观鞍山联合企业和在沈阳和抚顺的重工业工厂的感受。

会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B. 瓦西科夫和高岗的翻译李越然。

记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B. 瓦西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7, д. 7, п. 379, л. 3 - 6

№05304

费德林的调查报告：苏联和 中国对朝鲜援助情况

(1953 年 12 月 31 日)

机 密

1953 年 12 月 31 日

第 2975/ДВ 号

关于苏联和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援助数额的情况调查

一、苏联的援助

(一) 根据 1953 年 9 月 19 日的苏朝协议,苏联承担了在两年期限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给予无偿援助 10 亿卢布的义务。在这笔款项下，将对恢复和建设 17 个工业企业和其他设施进行援助（总共 3 亿以上卢布）以及提供各种商品及工业设备。

（二）苏联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偿还苏联 1949 年、1951 年和 1953 年债务的比较优惠的条件。上述信贷的全部数额为 2.98 亿卢布，这笔信贷将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从 1957 年 1 月 1 日开始在 10 年期限内用供应商品来抵偿，收取信贷的年利率为 1%（按照 1949 年的贷款协议应收取的年利率为 2%）。

（三）苏联政府按照非贸易付款，在 1950—1953 年的期限内减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债务的 50%（到 1953 年 9 月 1 日上述债务为 72 888 500 卢布）。余下的一笔债务按照非贸易支付，从 1957 年 1 月 1 日开始在 2 年内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清偿。

（四）苏联政府同意在头 4 年内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回专门的信贷，（根据 1951 年 2 月 28 日的协议）这笔贷款在头 4 年内是应偿清的（1956—1959 年），苏联政府还缩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上述信贷的偿还数额（远东司不知道按照该协议偿还的总额）。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免除了从 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195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中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的偿付。这项援助为 72 900 亿元（14.5 亿卢布，比价为 5 000 元对 1 卢布）。

（二）在 4 年期限内（1954—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对朝鲜提供的援助总额为 80 000 亿元，即 16 亿卢布（比价为 5 000 元对 1 卢布）。1954 年将援助 30 000 亿元人民币（6 亿卢布）。在这笔款项下，将向朝鲜供应粮食、煤、纺织工业用的原料、建筑材料、一些机器、农业工具、捕鱼船及渔具等。

用于 1954 年的援助费用，除了供应工业及食品货物外，将建设新的铁路（32 公里直达线），恢复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在线路的 3 个区段上建设和恢复铁路建筑物，供应 1 000 节货车车厢，修理 500 个货车车厢和 100 个客车车厢及修理 80 辆机车。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1954—1956 年）3 年期限内自己负担费用，收养 22 735 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难民儿童以及赡养对这些儿童从事教育工作的 7 186 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总共是 31 338 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除签订了经济和文化协议之外，1953 年 11 月 23 日还签订了其他一些协议，把这些协议同在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类似协议条件相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比较优惠的条件。

例如：

（一）根据中朝关于中国专家在朝鲜工作条件的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专家在朝鲜工作期间，仅向他们支付其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的工资，包括出差费用及补

助费用以及保证中国专家的医疗费和住宿费,支付他们的交通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担其他的费用。

根据苏联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如下:

1. 用朝鲜币向派遣来朝鲜的苏联专家支付工资,所支付的工资应与相应职务和技术等级的朝鲜专家的工资相同;

2. 要向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补偿路费,补偿每人 80 公斤的行李运输费,补偿相当于专家派出前在苏联所领取的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补偿相当于一个月工资额的每工作一年未享受例假的补助费,对在高等院校工作的专家在朝鲜每工作一年享受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

3. 对于每个被派遣的苏联专家,根据技术等级的情况,每月要向苏联支付 2 000—4 000 卢布补偿损失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被派往朝鲜,有关的苏联机关或企业承担了损失。

(二) 根据中朝关于朝鲜专家在中国进行生产实习的条件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接受朝鲜的技术工人及技术员时,将保证他们在实习地享受中国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相同技术等级的供给,包括享受国家的医疗保障。朝鲜的实习生仅支付中国向他们提供住宿的住宿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仅承担朝鲜实习生来中国往返的差旅费。

在苏联实习的朝鲜专家的费用则完全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供给,每个专家从政府那里领取 1 000 卢布,用来支付他们的住宿费用和差旅费。此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要向苏联政府提供一笔对指导朝鲜专家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补偿费用,数额为工资的 10%—20%,指导实习生的人员主要按照其职务领取的工资(平均每个朝鲜实习生每月支付 100—150 卢布)。目前有 400 名朝鲜专家在苏联进行实习。

(三) 根据关于朝鲜公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及技术学校学习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给朝鲜学员的助学金的开支及朝鲜学员在中国境内旅费的开支。至于谈到教学费用及为朝鲜学员提供的住宿费用,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了这笔费用。

根据苏朝关于朝鲜公民在普通高等院校学习条件的协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向苏联补偿花在朝鲜学员的教学和供给的实际费用的 50%,其中包括:教学、住宿、助学金及在苏联境内的差旅费。

结论和远东司的建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 1954—1957 年的期限内将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很大的援助。从中国向朝鲜供给必需品以及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援助进行建设和恢复铁路与桥梁,实质上补充了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恢复和建设工业项目,供应商品及工业设备、农业化肥等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朝鲜援助的规模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民经济以及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了一切条件。

有鉴于此,远东司认为,委托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细心地注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合理利用了这种援助,并向苏联政府通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政府是否在动员和利用国内资源以最快速度恢复国民经济和提高朝鲜人民的福利水平方面采取了措施,并是合理的。

二、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接受朝鲜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里实习的较优惠的条件以及派遣中国专家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作也提供了优惠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同于类似的苏朝协议的条件,远东司认为,与苏联财政部一起向苏联部长会议草拟一个关于修改有关的苏朝协议的提议是合理的。按照远东司的意见,免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每个被派往朝鲜的苏联专家向苏联政府支付所谓的补偿损失费 2 000—4 000 卢布是合理的(据说,似乎因派遣自己的专家去朝鲜,有关的苏联机关或企业承担了这笔损失);不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取朝鲜专家在苏联企业进行生产实习的费用,也是合理的。

三、远东司认为,修改有关朝鲜公民在苏联普通高等院校和技术学校学习及供给条件的苏朝协议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些协议的条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说,负担是不重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朝鲜学员的学习及供给向苏联政府所补偿的 50% 开支,甚至抵补不了苏联发给朝鲜学员的助学金费用。例如,一名朝鲜大学生在 1952 年苏联教学及供给方面的总开支为 11 611 卢布,一名朝鲜研究生为 16 976 卢布。而朝鲜政府向苏联支付的补偿费,每名大学生为 5 805 卢布 50 戈比,每名研究生为 8 488 卢布,与此同时,每名朝鲜大学生每年的助学金为 6 000 卢布,每名研究生为 10 800 卢布。

Н. 费德林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7, д. 47, п. 27, л. 115—120

1954 年

No24883

在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 成就展主题计划

(1954 年^①)

苏联在上海举办展览会的目的是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成就。因此展览会上将展出许多的展品、模型、资料照片、艺术镶板、图片、图表,这些展品应当能够表现:1. 苏联的工业能力,以及苏联工业用现代生产手段生产各种产品的高度工艺水平。2. 苏联在工业领域、日用品和食品方面的取得的成就。3. 苏联在发展铁路、公路和水上运输方面取得的成就。4. 苏联农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农业生产高度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及农业机械广泛的应用并获得较高的粮食生产。5. 在国民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专家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医疗卫生、体育运动、音乐、造型艺术和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苏联展览馆建筑物的顶部,在苏联国徽之上放置“СССР”这些巨大的字母。在国徽下放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字句。在入口处悬挂用俄语和汉语题写的祝词:“苏中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前厅是展览会的开场。在前厅的中央放置“列宁—斯大林”雕塑群。在前厅放置四个深深的弧形龛,它们是宏大的雕塑镶板,其主题应该展示苏联人民的劳动、休息和学习,同时也以“莫斯科——我们祖国的首都”为主题。在镶板上部弧形的涡卷饰上题写如下标语:“苏联是个自由的、各民族权利平等的联盟——И. 斯大林”;“苏联公民享有教育权”;“苏联公民享有休息权”。此外,在通往工业展厅的中央的巨大侧墙上题写如下标语:“我们的和平政策得到了全球最大多数的人的赞同。——В. 列宁”。

在中央展厅以及与其相邻的展厅的隔板展出机械制造、电子设备、测量和其他仪器、金属样品、石油产品、无烟煤、矿石等展品。

在入口处的木墙上,在苏联国徽(直径 4 米)下方题写如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则的特点和要求大体可以以如下形式表述:通过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不断增长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И. 斯大林”;“重工业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今后增长的基础,现在重工业的生产几乎是战前 1940 年的 3.5 倍”,“重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农业、轻

^① 该档案在俄国发表时标注的文件时间即如此。——编注

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它们是苏联人民的福祉不断增长的源泉”。

在前厅出口左右边的木墙上可以绘制如下光电表格：

苏联石油开采的增长（相对于 1913 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73	285

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相对于 1940 年）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00	164	近 250

在与木墙正面邻近的侧墙上也可以绘制如下表格：

苏联工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 1940 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37	183

苏联工人和职员人数的增长（相对于 1940 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31.5	39.2	约 47

在大厅的中央放置如下大型展品：金属切削机床（旋床、六角车床、单支柱立式车床、铣床、磨床等）、纺织设备、工业缝纫机器、印刷设备。此外，在大厅里安置 12 个展览台，这些展览台 中的展品要表现出苏联主要工业领域的成就。在展览台的中央可以绘制一些图表，图表的底色可以是色彩鲜艳的镶板。

石油工业展览台。在展览台陈设的石油产品的样品（汽油、煤油、粗柴油、润滑油等）要有精美的展览包装。该展览台要有石油工厂和石油加工厂的 照片。镶板的底色为海上石油工厂，镶板上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石油开采业的增长（相对于 1913 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337	410	642

煤炭工业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经过包装的煤炭和无烟煤样品、气压装置等。该展览台的照片要表现出煤炭工业中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的工艺生产的高度机械化水平。镶板的底色做成矿场大门的样子，上面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煤炭开采工业的增长(相对于 1913 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570	897	1 192

矿山原料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包装过的铁矿石、锰矿石、铬矿石、石棉和石棉产品。该展览台的照片要表现出矿场和露天开采矿场中对矿山原料开采的机械化。

黑色和有色金属展览台。该展览台的展品是黑色金属轧块、有色金属轧块和铝轧块以及作为商品形式出售的相关金属,它们都应被放在特别的挡板内。该展览台的照片要展示苏联金属工业先进的技术。镶板的底色是铸铁和轧钢的情形,镶板上题上如下表格:

苏联生铁生产(相对于 1913 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353	455	711

苏联钢铁生产(相对于 1913 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433	645	977

测量和切削工具、试验机器和仪器(两个展览台)。在这两个展览台展出的机器是用来测试金属的裂痕和老化以及其他特性;测量仪器和机器,成套的测量工具和切削工具等等。展览台的照片要展现一些独一无二的大型机床,机床自动生产线、金属加工工具车间以及其他的机械车间。在展出以工业为主题的照片的同时,中央大厅展览台靠墙的展品也要展出一些工业领域著名人物的照片。上述原则也适用于绝大多数展览台的商品和图片资料。

在大厅的隔板设置电子设备、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工具和电子通讯设备(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X 射线装置、开关、避雷针、发电站;功率为 100 千瓦的涡轮发电机、功率为 72 千瓦的发电机;焊接设备;高频通讯设备;矿场用转换开关和调度转换器、电报设备、自动收费公用电话、无线电台和有线广播装置)展位。

该展位镶板的底色要精美,要配置光电表格,表现出苏联电力生产的增长,并题写如下标语:“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B. 列宁”。

苏联的电力生产(相对于 1913 年的百分比)

1913 年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2 482	4 674	766①

① 原文如此,该数字显然有误。——编注

在齐姆良斯克电站、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电站、高压变电站、科研试验室和工厂实验室的照片下面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正在根据第五个五年计划实施宏大的电气化计划。正在建设的和扩建的电站有 711 个，在这些电站建成之后，苏联总的发电能力与上个五年计划期间的 1950 年相比，将增加 75%。”

交通设备展位。展出桥梁模型、水箱模型和悬臂起重机模型；密集的交通线路、铁路运输的信号化、密码自动闭塞、ИС 内燃机车模型、等容的车厢模型、载重量为 1 万吨的油轮模型、江河拖船模型、地铁车厢模型、自动升降机模型以及其他的一些模型。在该展位还可以放置如下展品：伏尔加—顿河运河全景、“五海之港莫斯科”图画、莫斯科地铁线路图以及一些地铁站的照片，图片下题写如下字句：“莫斯科地铁是最为宏大的建筑，它被认为是服务大众需要的最好形式。”在交通设备展位相应的图片镶板上应题写如下字句：“1954 年的铁路运输量同 1950 年相比增长了 42%。这意味着，五年计划就铁路运输量的增长提出的任务提前四年完成了”，“1954 年的公路运输量同 1953 年相比增长了 66%”。

在伏尔加—顿河全景图上题写如下字句：“1952 年夏，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伏尔加—顿河航运运河投入使用，该运河把苏联在欧洲部分的所有海洋——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黑海都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水上运输系统。”

电视、电报、无线电展位。展出无线电台、无线电装置、真空管试验仪、电视机的调谐仪器，以及如下电报电话设备：基层通信自动电话交换机、各种各样的转换器、电阻测量仪、质量因数计等等。在该展位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无线电事业应要求得到发展，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向他们灌输人类社会最高尚的人文主义原则。——М. 加里宁”。该展位的照片要展示无线电技术工业企业、电报和电话局一些方面的工作。

光学仪器展位。展出验电器、微生物显微镜、矿石显微镜、金属版印刷术设备、工具设备、万能测量仪、放映机、显微镜的聚光镜、摄谱仪、万能光度计、深度测量仪等。展出高校实验室、农业科学实验室中能够展示光学仪器的实际应用的照片等等。

摄影、摄像设备展位。展出各种各样的摄影设备模型、一套各种各样的镜头和滤光镜、固定的有声电影放映设备等等。该展位应题写如下字句：“电影是对群众进行宣传的最为强大的手段。——И. 斯大林”。在摄影棚和自然条件下拍摄的相片，演员和其他电影明星以及最为优秀的电影干部的肖像。

计算分析仪器、精密仪器展位。展出计算器、穿孔机、检验器、制表机、积分仪等等，展出各种工艺的手表。

电子气象仪器展位。展出风速表、水样采取器、日光仪、特制温度计、计程仪、卷扬机、雨量计和气象计、电流计、反照仪、生产进度表和一览表、高空经纬仪、铸铁水位尺、测位计、海水水样采取器、雨量器等等。在水文气象观测站大厅的墙的中央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水文气象工作者在苏联拥有数千个网络站点，他们被配备国产的仪表设备，顺利地的气候、天气和河流、海洋、湖泊、水库的水文气象条件进行研究，并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提供广泛的水文气象服务。”展位展出的照片应展示气象仪表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

在与前厅相邻的左右两个大厅设置如下展位：林业和造纸工业展位(撑材、造纸木材、胶合板、纸浆、细木工平板、木质纤维雕塑、各种纸张、火柴)。这些展位的照片应展示木材的加工、运输、合成、制材厂、纸浆联合加工厂。还要展出关于苏联森林的图画，并在图画上题上如下字句：“苏联拥有巨大的森林资源，是世界上木材储备最为丰富的国家。”

化学和林产化学展位。该展位应当展示大量的化学制品、阿尼林染料颜料样品、林产化学品：松香、树脂、松节油、福尔马林等。该展位的照片应该展示颜料在化学工业的应用以及一些化学企业的生产。

食品工业设备展位。展出乳脂分离器、用于香肠生产的挤注器、马铃薯去皮机、磨坊机床、冷冻器。还要展出奶制品和肉食企业、磨坊生产以及其他的饮食企业的照片以及公共食堂、企业餐厅的照片以及现代技术装备的照片。

日用工业品生产展位。该展位的大部分展品应放置在位于展厅中央的隔板上。在这些隔板展出布匹(棉布、毛布和丝绸)、成衣、内衣、针织品、化妆品、鞋子、毛皮制品。在该展位题写如下字句：“1947—1954年，苏联共7次降低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由此食品和工业品总的价格水平还不及原来的一半。”

该展位展出的照片应当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示他们物质福利的增长，展示一些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一些贸易企业等等。在照片之问题写如下字句：“同1954年相比，苏联国营和合作社零售贸易额增加了80%。这意味着五年计划就零售贸易额提出的任务提前四年完成了。”部分日用品展品应在展览厅右侧的第一层内展出。在这些地方展出的展品可以是家具、日用家具、住宅装饰品。

家具展位。该展位展出四组家具——餐厅家具、饭店家具、卧室家具、教授或者科研人员完全装修过的办公室内的家具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大学生宿舍内的家具。展出的照片应反映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他们的休息和家庭生活等等。在住宅照片、关于新住宅内外情形的照片上题写如下字句：“战后数年，在苏联的城市和工人居住点为工人和职员建造了21 500万平方米的住宅，在农村地区为集体农庄农民和农业工作者建造了447万套房屋。”

日用电器展位。展出电冰箱、电烙铁、电茶壶、咖啡壶、除尘器、电风扇、电动地板打蜡机、电力剪毛机、反射炉、厨用电炉等等。展出的照片应展示苏联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电器的使用以及这些电器的生产。

收音机和电视机展位。展出“世界”牌收音机、“波罗的海”派收音机、“祖国”牌收音机、“莫斯科人”牌收音机、“图拉”牌收音机、“里加-6”型收音机和“里加-10”型收音机、“白俄罗斯”牌收音机、“头牌”收音电唱两用机、“乌拉尔-52”型收音电唱两用机、“卡马”收音电唱两用机、T-2型电视机等。展出的照片应该展示苏联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使用。

乐器展位。展出大钢琴、立式钢琴、竖琴、管乐器、弓弦乐器、拨弦乐器。展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键钮式手风琴、手风琴、键盘式手风琴和一组民族乐器。该展位展出的照片要集中表现唱诗班的合唱表演、交响音乐家的表演以及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和参与国际竞赛者的表演，表现歌舞演唱、戏剧和芭蕾舞表演和艺术活动，展出演员和艺术家的肖像。

手工艺品、玩具、地毯和地毯制品、家什和水晶玻璃展。展出用木材、石头、骨头、金属、纸质做成的手工艺品、密缝刺绣品和钩花制品、赛璐铬制玩具和橡胶玩具、塑料制品、手工制作的地毯和机器制作的地毯。展出的照片要展示在狩猎中使用的手工艺品的生产，展示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

卫生保健品展位。该展位设在中央展出大厅右侧的隔板上。在该展位展出的是手术台、麻醉设备、静脉注射设备、照射灯、水疗所、理疗设备等，展出医疗设备和药物以及以妇幼护理为题材的三组相册，要展示苏联的疗养事业和医疗教育，要有一些传单、招贴画、幻灯片等等。要题写如下字句和图表：“全体苏联居民都享受免费的医疗帮助”，“苏联人民的福利在增长、国家一直注重加强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关心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这使苏联国内的死亡率急剧降低。苏联的人口平均每年都增长 300 多万人”，“苏联现在有 350 多个疗养地，有 2 500 多个疗养院，建造了大量的疗养网络。向劳动人民发放的疗养证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或者是根据优惠的价格”，“同 1953 年相比，疗养站和疗养所的数量几乎增加了 8 000 个”，“同 1953 年相比，药品、医疗设备和医疗工具的生产增长了 19%”。

苏联城市和农村病房的增加(相对于 1940 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25	150

五年计划中就增加病房的数量提出的任务在四年内提前完成了。

苏联医生数量的增长(相对于 1940 年的百分比)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100	175	219

苏联在医疗保健和体育文化事业上的国家预算开支(亿卢布)

1940 年	1950 年	1954 年
90.35	213.96	304.85

该展位展出的照片要展示城市和农村的医院、门诊部、疗养院和疗养所，展示儿科咨询所、保育院、幼儿园、医生上门服务。要有一些照片展现东方各加盟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这些照片中要题写如下字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整个医疗机构网络和防疫机构网络都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建立起来的。”

体育用品展位。在该展位展出溜冰的冰刀、滑雪板、各种各样的球、运动鞋、哑铃、杠铃、曲棍等。在展位上题写如下字句：“苏联的体育文化和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健康的手段，是人们争取长寿的积极因素”，“在第 15 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苏联运动员获得了 38 枚金牌、56 枚银牌和 18 枚铜牌，打破了 2 项世界纪录和 12 项苏联纪录”。展出的照片要表现各

种体育运动,展出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体育比赛中获胜的体育冠军的肖像。

出版物展位。展出政治、经济、科技和艺术著作,展出用俄语和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的艺术作品、国外古典作品和现代文学作品,展出一些艺术复制品、乐谱、招贴画、邮票、留声机唱片等等。

该展位设在展览大楼的右侧,被分为两大部分:马克思列宁著作展位,其中也展出一些关于个别科学领域的研究专著;文艺作品展位,其中也展出一些儿童文学。该展位展出的照片和题写的字句要表现出苏联各民族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展览台上展出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作品,在这些展品上悬挂一些石印版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在展位上题写如下字句:“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犹如钢铁般的团结,它同人民紧密联系,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它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出版物展位的入口处题写如下字句:“在苏联政权时期,全国出版了 170 亿册图书;其中包括 10 亿多册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著作”,“1954 年,苏联共发行了大约 10 亿册书籍,超过革命前的俄国出版的书籍”,“苏联政府通过决议,打算在 1954—1960 年使出版业的能力增加 2.5 倍,使彩印出版业增长将近 3 倍”。

在文艺作品展览台的上方题写如下字句:“苏联文学和艺术在同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的同时,以新的先进的东西塑造人们的思想,帮助党和国家向劳动者培养共产主义情感”,“苏联的文学作品用苏联 70 多种民族语言出版,其中的 19 种语言是在十月革命之前没有自己的书面形式的”。在照片之间题写如下字句:“1954 年苏联大约有 39 万所各类图书馆,拥有的图书数量为 12 亿册。”

职业教育展位。展出步行式挖土机模型、煤矿联合加工厂模型以及其他的机器,展出技工学校学生和工厂学校学生制作的艺术品,展出中学教科书和直观教学参考书。该展位位于同出版物展位相邻的一个大厅里。展出的大量照片的主题应该是表现对青年职工的培养,反映技校和工厂学校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休息、从事的体育运动、业余艺术活动等。

“高校为国家培养劳动力后备军,从 1946—1954 年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输送了 470 多万年轻的专业工人”,“在苏联,作为劳动力储备的学生得到国家的充分保障:免费提供职业培训,免费提供饮食、被褥、鞋子、宿舍、教科书和直观参考书”。

在“中学”展位、“职业教育”展位、“高校”展位和“技术学校”展位每两个展位的连接处题写如下字句:“在苏联接受各类教育的学员的人数在 1953 年达到 5 700 万人,与 1940 年相比几乎增加了 800 多万人。”

高校展位。高校展位位于展览大楼右侧的一个方形大厅内。大厅的中央是国立莫斯科大学主楼模型,该模型高 2.5 米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主要建设计划。在展览大厅中央正面的墙壁上安装展现苏联高校的电动图片装置,关于高校数量的增长及其大学生和教授数量的增长等方面的一些词句交替出现。在展示图片的同时要配上口述录音机,播出的内容是关于苏联高校以及科研工作总的情况。在图片上题写如下词句:“苏联为青年一代掌握知识、为天才和有能力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会”,“1954 年在苏联高校(包括函授)有 173.2 万名大学生,比 1953 年多出 17 万人”。

在正面墙壁各高校图片的两侧放置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展览台，以这两个苏联最大的高校为例子展示苏联的科技培养体系。在大厅正墙附设两个不大的展览台，展出苏联另一些较大的大学：喀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等等。

在该展厅的其他展位展出一些照片，展现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培养专家的性质和方法，展现苏联高校和技术学校的科学和艺术。除了展示一些关于教学过程（课堂、讨论课和实验课、实践课等等）的某些方面的图片之外，在展览台还要展出一些关于大学生日常生活、休息和进行体育运动的图片。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学习的大学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大学生的学习要占据特别的地位。除了在高校展厅中展出图片、教科书和直观教学参考书之外，还要在展览台上悬挂俄国科学巨匠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茹科夫斯基、门捷列夫、皮罗戈夫、梅奇尼科夫、罗巴捷夫斯基、米丘林的椭圆形肖像以及俄国科学的奠基者 M. B. 罗蒙诺索夫的半身像，半身像应在各高校图片的下方，放在支架上，并且应被着色。

农业和农产品展位。该展位展出的是：粮食和粮食产品、种子和一捆一捆的各类谷物、搜集到的各类农作物、几株棉花、各种籽棉、亚麻纤维、大麻纤维、洋麻纤维、蚕茧和各类桑树植物叶子的标本、毛皮样品、细毛绵羊标本、水果和蔬菜、模型。该展位设在展览馆的六个大厅内。还要展出一些资料照片、图片、数据和实物展品，展示苏联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国营农场取得的成就，表现党和政府就迅速提高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而提出的任务。

该展位由如下部分组成：前厅展位、粮食展、畜牧产品展、经济作物和油作物展、蔬菜作物展、水果葡萄展、粮食产品展。

前厅展位。用文字、数据、图表、图片和照片阐释集体农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展示拖拉机工作站是集体农庄生产先进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以具体的事例展示拖拉机工作站动力装备的增长，展示集体农庄生产中综合机械化的推广以及拖拉机工作站在今后增加粮食、土豆、蔬菜、经济作物生产以及增加畜牧产品生产中的作用。应分出特别的展览台来展示苏联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工作。在该展厅中应特别展出一些材料，来解释苏联共产党就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制定的纲领。在大厅的中央设置一大束用丙烯酸盐制作的金黄色小麦实物样品。

“粮食作物”大厅。该展厅的主题材料应反映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为今后扩大粮食这一主要的农业领域的生产制定的政策。要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一些具体实例展现苏联在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生产以及在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要强调苏共中央1月全体会议决议中提出的任务：在最近五到六年的时间内使粮食总产量达到每年100亿普特。展示正在推行的关于扩大玉米这一最为重要的储备粮食的播种面积而开展的工作，以便增加粮食的总产量和扩大饲料的产量。到1960年，玉米的播种面积应该增加到2800万公顷。要强调提高农作物产量和急剧减少农作物损失的任务。在大厅中展出的产品要表现粮食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是丰富的。

畜牧产品展厅。以一些先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例子，展示社会主义畜牧业取得的成就，牲畜的数量得到了提高，牛、猪、羊、家禽的产量都得到了提高，在每百公顷土地上这

些牲畜的产量都很高。要强调如下一项最为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使肉食和沙拉(各类)、牛奶的生产在 1960 年的时候为 1954 年的 2 倍,鸡蛋的生产为 1954 年的 2.2 倍,毛皮(各类)的生产为 1954 年的 1.8 倍。在一些展览台上展出关于为发展畜牧业组建饲料基地的材料。

经济作物和油作物展厅。该展厅的主题材料应该表现苏联在主要的经济作物和油作物——棉花、亚麻、大麻、洋麻、黄麻、青麻、甜菜、向日葵的生产上取得的成就,表现苏联在发展茶叶和丝织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蔬菜、水果和葡萄展厅。以一些具体的农作物为实例,展示采用的一些先进的栽培土豆和蔬菜(正方形穴播和栽培、使用草炭腐殖质的瓦盆)的方法,展示得到较高的产量,展示大面积播种和栽培这些作物的措施以及发展大棚蔬菜的方法。要详细地说明在发展水果和蔬菜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明使用米丘林方法顺利取得较高的产量,要展示一些较为珍贵的葡萄、梨品种以及其他珍贵的水果品种。

粮食产品展厅。该展厅同农业原料展位相邻。展厅展出一些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展出一些熏猪肉制品、香肠、乳酪、鱼子酱、鱼、植物油、果汁、干果、果酱、糖果点心、糖果、维生素、浓缩食品、海产品、伏特加酒、茶叶、烟草和香烟。

展出的照片应该展示以米高扬的名字命名的肉食品联合加工厂的车间,展示肉产品联合加工厂、糖果点心工厂明亮而宽敞的车间,展示浓缩食品的生产以及茶叶、葡萄、烟草种植园烟叶的采摘等。

该展位要题写如下字句：“同 1950 年相比,1955 年苏联的食品产量将增长 84.7%”,在香肠和肉食品展览台上题写如下字句：“1956 年苏联将生产大约 300 万吨的肉和肉制品,是 1950 年的 2.4 倍。”在鱼产品的展览台上题写如下字句：“1956 年苏联的渔业捕捞将增加到 3 600 万公担,是 1950 年的 2.1 倍。”在罐头食品展览台题写如下字句：“1956 年苏联罐头食品的生产将增加到 415 万罐,是 1950 年的 2.9 倍多。”在糖果点心展位题写如下字句：“1955 年苏联糖果点心的生产将增加到 1 825 吨,几乎是 1950 年的 2 倍。”

造型艺术展厅。该展厅重点突出的标语是：“艺术属于人民,它需要根植到广大劳动群众中,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了解和喜爱,必须能够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提高,同时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使他们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B. 列宁”。在该展厅应展出苏联彩色写生画大师、线条画大师以及雕塑大师最为优秀的作品。

建议：括号中标出的一些引用的数据来源,不要在展厅中出现。

№13014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贝利亚事件和王明问题

（1954年1月4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4年2月23日

绝 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4年1月4日

今天在杭州毛泽东的休假地，我向毛泽东宣读了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判决。在场的还有苏方翻译 B. B. 瓦西科夫（大使馆官员）和师哲（毛泽东的私人翻译）。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对判决书中的如下部分提出了一些问题：贝利亚在内战中的变节行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和战争中的变节行为以及在斯大林死后的变节行为。毛泽东对关于贝利亚与外国间谍和帝国主义机构的关系也表现出兴趣。毛泽东对贝利亚破坏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表现出强烈愤慨。

在宣读了判决书之后，毛泽东强调指出，对贝利亚的揭露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揭露贝利亚一事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感激。毛泽东认为，揭露贝利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形势，毛泽东提到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些现象没有蔓延，但是由于这些现象甚至影响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的成员，因而不对其引起重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某些人试图使政治局中的一部分委员反对另一部分委员。有些人企图把一些政治局成员的偶然失误或者错误公式化，以此来玷辱这些同志的名誉。毛泽东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时刻把保持党的各级组织的团结和凝聚力牢记心头，因为这是完成我党面临的各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正在草拟一份关于党的团结统一的特别文件，它不会公开发表。这一文件将在两或三周内完成。毛泽东说这份文件完成后，他将通知我，让我知道其内容。

接下来，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准备了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份文件。毛允诺将告知我这一文件的内容。

在讨论中，毛表示了将贝利亚事件的判决通报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愿望。毛承诺他将以适当的方式将此事通知刘少奇。

当提及判决书中贝利亚在国内战争期间的变节行为时，毛让我注意，在北京从国民党手中解放后，中共获得的档案文件显示，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著名叛徒）早在1920年就

被中国的秘密警察收买了。毛还让我注意,1930年王明在上海曾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过。尽管他(王)在当时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共产党活跃分子,但竟能设法出狱。同时,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共产党活跃分子却被国民党处决了。

谈话进行了大约4小时,大使馆官员B. B. 瓦西科夫和毛的私人翻译师哲在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Ф. 尤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7, п. 379, д. 7, л. 41 - 43

№21367 - 1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 中国要求在莫斯科设常驻通讯员

(1954年1月14日以前)

致 H. C. 赫鲁晓夫同志：

如今,正在莫斯科的中国记者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表示,希望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能够在莫斯科设立自己的通讯员。截至目前,《人民日报》通讯员职责由中国《新华》电讯社驻莫斯科代表兼任。

请允许我们在下次与邓拓同志的会谈中向其明确地传达如下信息,如果中国外交部向苏联外交部发出希望在莫斯科设立《人民日报》常驻通讯员的请求,那么该请求一定会得到无条件的满足。

Д. 谢皮洛夫(签名)

手写批注：

已转告,赫鲁晓夫同志同意。1954年1月14日

谢皮洛夫同志已将答复交给邓拓同志。

И. 谢尔巴科夫

1954年5月27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5, л. 5

№21367

杰尼索夫致斯捷潘诺夫函： 外交部提交苏中友好协会草案

（1954年1月21日）

机 密

1954年1月21日

第161-c号

致苏共中央

B. П. 斯捷潘诺夫同志：

应 B. И. 戈尔什科夫同志的请求，兹发出苏联外交部就建立苏中友好协会问题所提交的草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希望该草案能得到补充和修改。

附草案内容共计4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A. 杰尼索夫（签名）

附件：

机 密

第1号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

H. С. 赫鲁晓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中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通过广泛采取一系列举措，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正在中国普及开来。而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将更有利于在中国完成这一任务。目前，该协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组织，并在中国各城市、工业企业、机关和农业地区建有大量分支机构。其拥有自己的文化—教育设施、定期出版物、可以放映苏联电影的流动放映设备。该协会在开展活动以来的4年间，共出版书籍和小册子近1000万份，举办了约3万次图片展以及9万场关于苏联情况的报告会和讲座。

在苏联国内也有一些国家和社会组织在从事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文化合作关系的组织——苏联文化部、苏联科学院、苏联作家协会、苏联音乐家协会、苏联妇女

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以来的4年间,该组织采取了大量措施以促进和加强中苏人民之间的文化合作,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但总体而言,该协会在落实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任务的水平上仍显得落后。其中问题主要在于,在苏联国内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承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从而无法对其他社会组织在保持和发展苏中文化合作方面所进行的活动进行整合与协调。

目前,负责与中苏友好协会进行日常事务接触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但是,后者同时还承担着扩展和加强苏联和所有外国的文化合作工作,因而我们还没有一个核心组织能够对所有苏联组织在巩固苏中友好关系和文化合作方面的活动进行整体协调。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无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更加广泛地发展苏中文化关系和进一步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生活情况,以及我们系统地帮助中苏友好协会了解苏联人民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够的,不能满足我们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的要求。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广泛而全面地发展苏中人民之间的文化关系,苏联外交部认为应当建立独立的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组织。该协会的工作任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通过组织展览会、讲座、音乐会、中国艺术联欢会、中国文学和音乐晚会、发行中苏友好协会的出版物和出版自己的杂志等方式,系统地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成就。
2. 帮助中苏友好协会在中国开展宣传苏联成就的工作;组织两国文化和社会代表团互访;帮助两国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个别活动家,以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编撰与苏联和中国有关的科学著作、普及性刊物、艺术著作以及苏联和中国的戏剧。
3. 促进和发展苏联和中国学者、专家之间的科技合作。

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一样,中国与苏联之间也没有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因此,类似这样的合作只能通过科技经验的交流来加以促进。

全苏苏中友好协会应当有来自如下苏联社会、文化、科学组织和单位的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青团中央、苏联科学院、苏联对外关系协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协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作家协会等。同时,该理事会也是完成日常实际工作的必要的机构。

为了长期保持与中苏友好协会的联系,全苏苏中友好协会有必要在北京相应设立自己的特派机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该协会应当在莫斯科拥有带有会议厅的建筑设施,以召集会议、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协会也应在各共和国首都、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领导应当由著名苏联国务和社会活动家来担任，因为在中国中苏友好协会的主席为刘少奇，副主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

为了集中精力领导协会的日常工作，凡在该协会担任副主席职务的科技和文化界著名人物应当同时被解除在其他方面所担任的职务。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请见附件。

请审批。

苏联外交部

附件：

机 密
草 案

苏共中央决议：

一、为了更广泛而全面地发展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合作，兹认为有必要在苏联建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

二、全苏苏中友好协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如下：

1. 系统性地使苏联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2. 帮助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开展宣传苏联成就的工作；组织两国文化和社会代表团互访；促进两国的社会和文化组织、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专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相互交流经验和互相帮助，并对两国生活和文化的各方面情况加以研究。

三、批准_____同志为全苏苏中友好协会主席。

四、责成以_____（为首）、И. Г. 博利沙科夫、А. И. 杰尼索夫、В. В. 库兹涅佐夫、А. В. 科罗博夫和 М. А. 亚斯诺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1个月期限内就以下情况起草相关提案：关于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结构、人员数量和财政预算；关于该协会管理机关的构成，协会章程草案，应向协会提供那些必要的建筑设施以安置协会各机关和成立苏中友谊宫以及与建立协会相关的其他物质—经济措施。

手写批注：

归档。苏联外交部对这个问题已经准备了新的建议。

И. 谢尔巴科夫
1954年4月12日